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陈原书话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序 言

姜德明

去秋“现代书话丛书”问世后，引起爱书人的广泛兴趣，评家多有，有人更誉为“中国书话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信哉斯言！这是知者之见，也是对所有参与这一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的一大鼓励。

目前，凡得到书话丛书的读者，以及评家、写家们关于书话的特点各有理解，侧重点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好事。因为只有在众说纷纭和各自的实践中，书话创作方能不断发展，日臻完美。我没有更新的想法，但愿在继续摸索中别有体味，并借鉴他人的长处。

从编辑这套丛书的开始，我便讲过作家一般是爱书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藏书或喜欢写书话，也可以说爱写书话的毕竟是少数。为此，我们选题中计划的人选极为有限。当然，像资深的书话作家曹聚仁、叶灵凤先生，当时由于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原因而未能收入第一辑，这是很遗憾的。好在远见的出版家早就声明，一年后续出“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现在这一预想已经实现。曹、叶两家的书话不仅收入丛书，而且都是在海外亦未曾结集过的文章，这是曹雷、小思两位女士辛勤搜集的结果。曹雷为了搜集父亲的遗稿，甚至自费访港，这一行动令人感佩。这次除了尽量容纳前辈书话作家的作品外，为了反映近三十年来某些追随者热衷于写作书话的实际状况，亦吸收了晚辈三家，即胡从经、倪墨炎和笔者的作品。其中有新作，也有一部分从他们历年出版的书话集中选来。

写过书话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当然不限于两辑丛书中的这十儿人，但因版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尽收求全，如茅盾、叶圣陶、俞平伯等先生的序跋集，李一氓的《一氓题跋》，冯亦代的《书人书事》，谢国桢的《明清笔记谈丛》等都是书话著作。好在这些书出版时间较近，似乎在书市上不难见到。

借此，我想再介绍几位喜欢书话的作家。

老作家赵景深先生除了专门从事古典戏曲文学外，尤爱文坛掌故和书话。1946年他在《上海文化》中以《书呆温梦录》为题，发表了一组现代文学书话。最初他对于新文学书籍颇为热心搜集，后来才转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这次他写了《袖珍诗册》、《髭须》、《扬鞭集》、《鬼与人心》、《茵梦湖》、《狂飚社》、《徐志摩手迹》、《挂枝儿》、《诗经今译》等题，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是典型的书话文字。他在文后赘言：“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文艺作品。我因为喜爱它们，使每天从《文汇报》上剪下来保存。”看来赵先生这组文章是拟晦庵书话而作，也是对唐弢书话最早的一位鼓吹者。他又说：“我感谢晦庵，他让我把十几年前的爱侣，重新唤归来，让我俩再温了一番旧情。”遗憾的是赵先生此后未能续温旧梦，再写书话。

散文家何为亦爱藏书和书话，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联合晚报》的副刊《夕拾》上，开辟了《书海撷拾》的专栏，写了很多书话。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陈翰伯，《夕拾》的编者是冯亦代。此外，何为还化名在《文艺春秋副刊》小型杂志上连载了几篇书话。这从他1982年出版的散文集《小树与大地》下辑所收的旧作中可见端倪，如《新月诗选》、《西班牙的黎明》、《伦敦

杂记》等即是。他承认自己的作品近乎晦庵的书话，记叙与抒情兼而有之。又说：“我是《书话》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书话》散文的拙劣临摹者。”不久以前，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还以未能续写书话为憾。

林辰先生于1948年7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事迹考》，此书对我有计划地搜集鲁迅及新文学资料大有启示。他写的虽属考证文字，却无枯燥之感，其中如《论 红星佚史 非鲁迅所译》等应以书话视之。林先生收藏的新文学书刊颇丰，我常向他求教。

1945年4月，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了杨世骥的《文苑谈往》，这是谈近代文学版本和作家的一部书话集，他是继阿英之后搜集晚清民初资料最为勤奋，创见亦多的一位书话作者和研究家。他的书话有的千余字，有的上万字。篇幅过长的失去了书话的特点，怕是与引录原文过繁，又想面面俱到有关，是否妥当，可以研究。

建国后从事新文学史料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丁景唐先生。他关于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的研究论文，间或亦以书话的形式出之，绝大部分还是论文及资料长编。

已故瞿光熙先生，六十年代初在《新民晚报》上开辟了新文学书话的专栏，篇幅短小，一书一事，娓娓动人。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正是当年他在报上连载的作品，实为一部书话集。我看也是受了唐弢书话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写书话的队伍不断扩大，海外人士亦有参加，这是令人可喜的。书话本是冷漠无闻的事业，或被认为副刊上的补白文章，更不为出版界所重；如今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愿这刮起来的不是炒作之风。书话的写作要靠甘于寂寞的人埋头资料，默默耕耘，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夸。风光之后，最好顺其自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到头来还是要回到故纸堆中去有所寻觅有所发现，写点豆腐块似的补白文章。扬名与发财似与书话无关。

“现代书话丛书”的编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合作者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如有不周之处，希望谅解。敬盼读者不吝指正。

1997年6月于北京

陈原书话

上编

失书记

俗语说，言多必失；以我的经验看，书多必失。——多必失：这符合生活的规律。

我一生有过四次失书的经历，而且失书的数量一次比一次多。正如地震一样，能量积聚到相当程度，就必须释放出来；要是书多不失，则居住的空间必定越来越小，以至于只能让给书去住，那又何必呢？！现今想起来，从1938到1969三十年间，只失书四次，不为多也；故颇有怡然自得之感。试想看看，如果没有失的苦恼，哪里能享受到“得”的乐趣呢。所以人到黄昏，权衡得失，心安理得，无怨无悔。

失书最多的一次，是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而这次失书，比较自觉，真可传世。这是在被送往“五七干校”去战天斗地和洗涤灵魂的前夜；其时，幸乎不幸乎，我已被“解放”，“回到”“革命群众”中去了。忽一日，派驻我们部里的军宣队“政委”找我谈话，说：你的书都是黑书，现今你已是革命群众的一员，理应跟黑书划清界限，不如把所有黑书都交给军宣队处理。我回答，我的书不见得全黑，我想先不处理如何。“政委”说，不成，你现在全家下干校，住的洋房（确实是一栋小洋房）要立刻交出。我心想，这是平常听说的“扫地出门”了。没法子了。但我仍然不甘心或不放心把那许多陪着我度过几十年的“老朋友”送到绝灭文化的群体手里；我迅速作出反应，我反问，自行处理掉成不成？“政委”面有愠色，厉声说，那你必须下去以前处理掉。我胜利了，面有得意地回到家里，于是连忙同书告别。天啊！我有十个大书橱，书橱的每一格都前后各排一行，总共不下四五千册。另外还有一个房间堆满了未能上架的书，至少也有四五千。还算幸运，一大堆古典音乐唱片都被革命造反英雄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多少只脚，早已变成一堆垃圾，用不着我费心去照顾它们了。

家人分头去接洽收破烂的处所，看是否肯收购这些破烂。居然有一家敢收购，但声明只能按废纸论价——本来“黑”书还有什么价呢？竟然还按“废纸”的价钱，岂非福从天降？——并且声明凡精装的书，都得撕去书皮才能过秤。

于是一家人喜出望外，连忙全体总动员，一夜之间就把上千本洋书都给肢解了，皮肉两分离，洋书们自己一定也觉得“无皮一身轻”了。这样，我在全国解放后购置的所有书籍，连同解放前残存下来的，用板车一次又一次地往那大胆的收购站拉去“按质论价”，换回人民币一百七十元。好阔气！

第二天，我把“黑书”已经处理掉的消息向“政委”汇报了，他面无表情，手一扬，我知道我已过了这一关，上帝作证，我那时如得了大赦，有点飘飘然，不过还没有下干校后那种无书一身轻的高贵感觉。其实我的书中没有善本，珍本，孤本，更没有明本，宋本，只不过是日常要用或由于我的癖好买来的，早晚也该找个归宿地。后来有人问我可惜不可惜，心痛不心痛，答案都是否定的。不过在干校时听见一位那时尚未“解放”却已颇为神气的“老同志”嚷嚷什么把马列的书卖掉的人是叛徒——不知他是否指我，反正觉得此公不是太天真，太教条，就是太风派。在我那卖去了的书中就有一大车马列，中文的，英文的，俄文的，日文的都有，其中有一部《资本论》第

一卷，我还作了密麻麻的批注（抄家的英雄们居然放过了；他们有一次抄走了我的《鲁迅全集》中的两卷，至今未还，就是因为上面有我的许多符号和注文，作为我的罪证！）。

同与我相处数十年的书们告别，是一种什么滋味？今天，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发誓，我那天确实一点滋味都没有。“呆若木鸡”。我的一个读大学的女儿被毒打临近死的边缘，只因为她是我这大黑帮的“狗崽子”。人命危殆，书何足惜呢？此刻值得我怀念的是几十本用拉丁化方言译写的圣经或福音书——那是到中国传教的洋人们，创制了各地方言的拉丁化写法，翻译圣书以便传教的。这批书是抗日战争时期周达甫教授去印度前留给我的，因为他也是三十年代中文拉丁化运动的参加者。不记得它们怎样会留下来，也许曾寄放在某个亲戚家里，但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我的“珍本”书。再就是几大车的各种字典辞典和几大车的中外地图；解放初旧书店这类东西很多，没人要，而且价钱很便宜。我在京沪两地收购了不少。好！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让它们赶快离开我这黑窝找它们的安息地吧。

至于另外三次失书，比起这次自觉的清除来，那就微不足道了。首先，因为三次失书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战争嘛，什么都会一刹那被毁，何况区区几本书！头一次是在1938年，广州沦陷前夜，我把一些当时我自认为珍贵的洋书（其中有我为研究当年新兴学科“建筑音响学”的英文日文书多册），连同几部手稿（包括我翻译的日本教授川崎直一的语学研究著作《爱之所在即神之所在》），交给一位西撤的同志带走，因为当时我已确定随军撤退，不能带行李。谁知这位同志临时改了去向，直奔新四军去了——而我的书成了无主孤魂，不过也到了“大后方”，不知是贵阳还是重庆，总之书们被卖给爱书的人了，手稿则不知去向了。两年后，我的朋友诗人刘火子买到我的一册书，笑嘻嘻地问书上的签名是否我的手迹，我那时阅世不深，简直是啼笑皆非。至于那几本建筑音响学到了哪位爱书人手里，我就不得而知了，虽则我至今还怀念着它们。

第二次失书这笔债也得向日本侵略者讨还。1943年初我住在曲江（今韶关）。日本二十七架轰炸机把我的住所轰成废墟，我和妻儿逃出火海，但所有衣物书籍一概化为灰烬了。这次损失最大的是被毁了瞿秋白的中文拉丁化方案手稿，那是叶籁士去新四军前交给我保管的。最后一次则是1944年桂林撤退（当然也是日本侵略军作的孽），我把一箱外文字典和学术书交给我的一个好友带往贵阳，等我只身到达这个城市时，这位好友却交给我几十块钱，说你的书一下子卖光了，很值几个钱。我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毕竟人家是一片好心，而几十块钱确实也解救了我。

可见书生要保存他那几本破书，也真不容易，特别是在战争和社会动乱的时候。

得书记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说的得书，就是这样的“得”；知道有那么一本书，很想得到它，却到处都找不着，忽然一下子不知不觉跳到你眼前，这一喜，真不能用笔墨形容。“喜出望外”，“喜从天降”，“欣喜若狂”，所有这些熟语都用上了，也还表达不出你那飘飘然的感情。

60年代初，我正迷上了鸦片战争史，千方百计找寻我知道书名却见不到的书。其中一本是上海出版的英文本《中国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Sinica)。北京图书馆书目上有，书库却无。那是1964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而又紧了，我们在新侨饭店开会，也许可以叫做所谓“文艺黑线”最后一次垂死挣扎的会。忽一日，有几个外地代表要我陪他们去中国书店看旧书。去了。在国子监，书堆中忽然跳出一部大开本的洋书，古色古香，像我见过的欧洲十九世纪的旧书一般装璜。羊皮的书脊，一瞧，哎哟我的天，正是踏破铁鞋找不到的那本天天想念着的《中国百科全书》！

这部中国百科全书可能是同类书籍的头一种。十六开本，别发洋行(Keily and Walsh) 1917年上海版。这家洋行是英国人开的，当时在上海、新加坡和日本横滨三地设点，上海的一家直到全国解放时还在南京路上开着，很大的卖洋书的书店。主编是顾令(Samuel Gouling)，他的衔头是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那时叫华北分会，英美在上海开办的机构那时都取名“华北”)的名誉秘书。序文作于1917年8月25日——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参加写作和审稿的有几十人，其中有学者，有商人，有外交官。全书有629页，按百科全书方式编排，条目有长有短，估计达四百条。内容包括古代到近代中国的人名、地名、书名、典章、制度、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无所不包。

我那时研究鸦片战争史，苦无英国方面的资料；不是完全没有，而是离开我想要的我知道的史料远得很。此书算不上什么原始材料，也不是第一手记录，但它毕竟是十九世纪末与英国官方有密切联系的作者所编著，看看它表达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须知60年代根本没有条件得到什么原始资料。

我偶然得到这本书，自然喜出望外。书中有《鸦片战争》一条，仅寥寥七行(404页)，这在意料之内，因为英帝国官方直到本世纪二战以前从不承认有鸦片战争！这七行字就是明证。《鸦片和鸦片问题在中国》，则写了七页半(405—410页)。洋洋大文列举了十大论点(这个作者也学会了中国传统的“十大”什么什么)，证明英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从未挑起战争，只不过是像林钦差那样的人把战争强加在英国头上。读来不禁火冒三丈！冒火归冒火，还是细心地读完，圈圈点点，做了笔记，可见我当日得到此书时急不可待的情景。书中有《林则徐》一条(310—311页)，明白披露了当时的英国代表义律为鸦片商人的人身安全，“被迫”交出鸦片20291箱。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有趣的是，不知由于什么动机，此书收了一个词目《世界语运动》(168页)，记录了1912年孙国璋等人在上海建立的世界语会，说函授部有学员一千人，说是由于英语在商业方面优势，以及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语运动未能长足发展云云。可见民国初年中国世界语运动颇有气势，否

则这个英国主编不会收这样与大局无关的条目。

《中国百科全书》的条目也介绍了很多有关中国特别是古代中国的知识，虽然其中不少在介绍时不免带着某种偏见。在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这一点上，此书不失为英语界的头一本。70年代末，我头一次访问美国的出版社时，有一家小出版社正在编印一部类似的中国百科全书，因为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西方很多读者都想了解这个自我封闭了近一个世代的古老国家。主人把他们那部书的部分清样给我看，我翻看后问他：你们是不是根据《中国百科全书》改编的？主人十分惊奇，他说，您看过这部老书？说着说着，他把原书拿出来了。我劝告他说，这部书有些有用的资料，但总的说，太陈旧，参考时要小心。他连连称是。没有想到偶然得来的这部书，竟引出了这一小段插曲。

书中有“商务印书馆”一条（124页），仅14行，读之令人捧腹。说这是由一家印刷厂逐渐演变成为出版社的——这倒也说得不错——，说这是一家纯粹中国资本的企业，也不错，1914年赎回日本投资，确实全为中资注册有限公司，资本额为白银二百两，职工约2000人，所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可笑的是，说这家企业的创办人都是基督教徒，按照基督教的传统办事（例如礼拜天休息，设置医疗、储蓄等“基督教制度”云云），不出版反对基督教的书籍。书中没有提到创办人的名字，当然没有提例如夏瑞芳（这确实是基督教徒），更没有提这家企业的灵魂张元济。我曾说过，除了专业圈子之外，局外很少人知道张元济，不仅解放后，就是解放前也如此。这一条目也证明了我的论点。

70年代中期，传说欧洲某个极小的国家首脑来访，赠我国以三册大词典；我国首脑回赠一部小小的《新华字典》。不知是真是假。在这传说二十年后，我有机会访问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圣马力诺），当我存心去找这个国家有没有三卷本大词典，在证实我所听到的传说时，圣马力诺教育部长真的送给我三大卷辞书模样的圣马力诺史记（Storia），即圣马力诺百科全书。果然三大卷！

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一本书，则是珍贵的陀雷木刻插图本《拉布雷》（Rabelais）英译本。陀雷（Gustave Doré 1832—1883）是法国著名木刻家和插画家，鲁迅先生曾介绍过。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初，我在上海善钟路（今不知叫什么路）口一家叫做Paragon的西书店的废书里找到的，用很少几个钱买得。书是伦敦Chatto and Windus出版社印行的，扉页上没有注明出版年月，也无现在必有的版权页。不过从书末所附几十页书籍广告看，则记有“1874年4月份书目”字样，可以推断此书出版于十九世纪70年代。陀雷的插画几百幅，甚是少见。书末的广告也颇耐人寻味，但已超出本文所论，一笔表过不提。此书未化灰，是它运气好，浩劫前被人借去了劫后归来，如见故人，真想哭。

焚书记

哀莫大于心死，乐莫胜似焚书。

这是二十五年前我在向阳湖畔一边焚书，一边胡诌出来的两句非诗非文的“偈语”。

向阳湖，在湖北咸宁；地图上本来没有这个名字，只因十年浩劫“创造”了所谓的“五七干校”，而我们部机关和它下属单位的五六千干部，1969年9月浩浩荡荡滚到这个用于泻洪的地带，人们这时才把它取了个美丽的名字——向阳湖。

多好听的名字啊！

到了向阳湖，我的心几乎已经半死。不说1966年一闷棍打下来，不知这场“革命”究竟革到何方去；就是困扰着我的许多问题，挨过成百次“斗争”，进行过几年“脱胎换骨”的劳动，都得不到解答，难于让心情平静下来。

何止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革命革到头来，只剩下一个“亲密战友”？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像宗教徒一样早晚祈祷？为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一部小红书顶得上一万个原子弹？为什么十七年一切的一切都漆黑一团？为什么革命学说竟然有尽头，走到了顶峰？为什么？为什么？当所有难题都无法解答时，我的心有点冷，有点悲凉。

于是我只能在向阳湖畔沉思。我能做什么呢，不，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能默默地沉思。

好容易熬到1971年冬天。

晴天一声霹雳，旱地一声炸雷！

林彪出逃，摔死在异国。这无疑是黑色夜空的一道闪电。向阳湖响彻了歌声。林彪，还有他的一伙，还有跟这一伙连成一气的另一伙，他们的毁灭以及隐藏着未曾暴露的鬼脸，打破了几年埋在心里的疑团。啊，原来这样！

最使人乐的是上面下达命令：收缴林彪的像片、林彪的讲话、林彪的“著作”，包括那篇臭名远扬的“政变经”。

幸乎不幸乎，我那时已经被“解放”并且由“黑线的红人”变成“红线的黑人”。我是一大队军宣队的“文书”，准确点说，是向阳湖最高权威的文职“打杂”。我享有令人羡慕的“特权”：一个人住一间屋子，保管着所有的干部材料，“揭发”材料，“证明”材料，“外调”材料。

其时，我奉命收缴有关林彪的一切印刷品。五七战士都喜气洋洋地往我住的屋子缴交这些垃圾。好不热闹！从书上撕下来的图片，撕下来的讲话、文章、“指示”。一份一份送到我手中。好家伙！还有四大卷五大卷六大卷文集！这些垃圾堆满我的办公桌。看着看着，凉了的心渐渐又热起来，真有如陈老总（陈毅）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

接着，我奉命将所有这一切垃圾——那时叫做“反动”的东西通通销毁。多痛快的命令。这是我一生接受过最痛快的命令。不止我，无论谁接到这样的命令，都会感到痛快。

摧毁一个将人民赶上绝路的奸贼印在纸上的一切，多么解恨啊！

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内置备了一个火盆。这就是焚书炉。每天，白天，晚上，深夜，我在愉快地劳动着。我把一张一张林彪的像片，一篇一篇“亲密

战友”的恶言，包括那篇“政变经”，都投到火盆里，看着它们化成灰烬，看着林彪的彩色像变成一团火，然后变成一小撮黑灰，心中顿时充满了阳光。人民得救了。

偷书记

人的命运常常作弄人。不管你相信“命运”还是不相信“命运”，反正到头来人还是被命运折磨。

比方说，我从来没有偷过书，甚至连偷书的想法都从来没有过；但是我却屡屡在光天化日下被目为偷书贼。

比较“显赫”的指责有两次：一次在解放前，一次在解放后。我爱书，恨书，买书，卖书，失书，得书，甚至禁书，焚书，可就是没有偷过书。然而偷书的美誉却被“命运”安排到我头上。

日本投降前一年，我住在重庆。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有一阵不得不每天下午到中央图书馆去查书。某日黄昏，我查毕离开，走出馆门才三尺，四个大汉从馆里奔出来，前后左右把我包围着，大叫抓偷书的。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弄得几乎不知所措。不过我还是少有的镇静，反问大汉们：什么偷书？我根本没有偷书！大汉们嚷着要搜身。我抵抗着。我说，你们没有权利搜身。大汉们哪里听我的说理，正要动手强搜时，我不慌不忙从兜里摸出一张名片扔在他们面前。须知那是地下时期，我们这些人都有各种各色的“护身符”。我的名片印着“国民政府”某机关的不大不小的“官衔”。大汉们一看，顿时傻了眼。那时图书馆门前，已有途人“围观如堵”。大汉们苦笑着，连声说，误会误会，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想到这张名片有那么大的威力。于是我环视四周，悻悻然带着胜利者的神气，离开这家图书馆。以后我还是天天下午去，偶然也见到那几个抓偷书贼的大汉，不过他们已换上似曾相识的面孔了。

不料事隔多年，人间已换了新天了，“命运”又安排我再次扮演一个偷书贼的角色。50年代，我做了管理书的“官员”。我在北京最热闹的大街上一家书店饱餐了一个多小时的书“宴”后，踏出店门，正想开步走之际，书店奔出几位同志，把我团团围着，说要搜查我的背包。哎哟，命运又一次作弄我了。我此时却没能掏出名片，因为解放初还不时兴名片。我当然比在重庆时期更加镇静，因为我此时确实是国家干部，更重要的是，我确实没有偷书，连一丝丝的偷书念头都没有。我对那几位热心维护公共财产的同志们说：你们没有权利搜我的背包。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店员，哪里有搜查的仅利。他们说，你偷书，我们就有权利搜查。50年代时，人们哪里有什么“法”的观念？人们只有专政的观念。人们甚至认为所有的国家机关都是专政机关，而国家机关管辖下的书店，都具有某种专政的职权。现在的读者看了这一段，一定不可理解，但是当时确实是这样。

一方说有搜查的权利，一方说没有。此时途人也已经围在那里，好像真的抓到偷书贼了。我无法说服我的同志们，只得高声嚷嚷：把你们的经理找来，否则不让搜。同志们还是很讲道理的，真的把经理找来了。经理一边走过来，一边怒气冲冲，排开众人一看，哎哟，原来他见到的是他所熟悉的主管“官员”。我笑嘻嘻地说，经理同志，请吧，请搜查吧，一面作解开背包的动作。经理连忙说，别别，请到楼上说话。我说，对不起，打搅了，我赶着要回家，改天再谈。于是一场喜剧落下了帷幕。

难道我真的像旧小说所描写的那种贼头贼脑贼心贼肝贼肺的人吗？起码我缺少一种男子大丈夫的气概，缺少一种做官的官气，缺少一种让人们一看就肃然起敬的那股正气。要不，就是人们的防范意识太强，特别是在书的领

域内，传统的“藏”书意识太浓厚（古有藏书楼而无流通图书馆），动不动就怀疑书的流失，或者对书的灵物崇拜观念，以为书是应当供奉起来的神物。凡此种种，都与我的偷书命运无关，不过是一种联想而已。

最值得追记的是在70年代后期，我为了查考在书店积压的小册子究竟是一些什么选题，有一天我到住处附近的一家书店去察看。那天下雨，书店里很暗，几个书架上方都开着日光灯照明。书店的北边书架，全是没有书脊的小册子。我非常高兴。一册一册地抽出来看看，心中暗暗记下书名，然后又搁回去。如是者过了大约不止一个钟头。外面下着雨。店里只能靠那几管日光灯才看得清楚书名。不料我站在那里的书架上方的日光灯忽然熄灭了。一团漆黑。什么书也看不见了。哎哟，原来是厌烦我这个人的这种一抽一放的动作，人们把日光灯关了：下逐客令！好，我就走。可惜没看够，不过心里已有点数。连忙自己反省，究竟在哪个方面冒犯了书店或店员同志们。这回倒也幸运，没有被斥作偷书贼。

书啊，书啊，您给我带来多少烦恼啊！

“图+文”书记

我理解读者谴责这个似通不通的文题，我自己也一样谴责我自己。不过我没有别的办法表达我所想表达的事物，暂且由它这样不通罢。

我要说的这样一种书籍，它有很多很多插图，却又不是看图识字；它本身是词典或百科全书，却又不是每条词目都有一个相应的插图；它当然更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插图本”。总之，当读者在读完一段文字或一条释义之后，觉得还是不甚了解时，文字旁边便出现了图，这个虽然缩得很小的图像，却使你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个事物。比方说，一篇小说或一篇什么文章，提到有那么一种叫做“波斯猫”的小动物（宠物），在“波斯猫”这个词目的释义中，就有个波斯猫的照片（不单是从前插绘的线条示意画）。文字有时确实难以解释清楚的东西，一张简单的图表或图像，一下子就使人完全明白过来，省却许多猜想或错误的感觉。

改革开放之初，我第一次踏上新大陆，正好赶上《美国传统英文字典》新版（大学生用版本）特价发售，便连忙花掉我那时可以自己支配的十元美金，捧回一册，贪婪地察看每页左边（或右边）的插图，那么丰富的插图，那么清晰的插图！我曾经有过一部影印的旧版（那是在我们参加世界版权公约之前的所谓“海盗版”），插图完全看不清，每幅插画或照片，都像处在黑夜里，根本不知是什么东西。好了，十块美金换来了极大的满足和极大的快乐。波斯猫看清楚了，熊猫看清楚了，北京猫也看清楚了——在那之前，人们编英汉字典时还发生过争论的这个英文单字 *Pekinese* 或 *Pekingese* 应不应收进字典去（据说这是洋人把北京人侮辱成动物，其时刚刚发生过所谓“蜗牛”事件，人们尤有余悸！）。这个字旁一张北京猫的图片，说是生长在中国的一种宠物。北京猫，波斯猫，全然不是有意侮辱北京人或波斯人的字眼，其理自明。

《美国传统词典》是十六开本的大书，每页排三栏，两栏各占五分之一的页面，留下五分之一约一寸多一点篇幅，是登图片的，也不是密麻麻地塞满这一个空地，有时一张图片，有时两三张，也有全空白的。我们这里的出版家习惯要把版面塞得满满的。他们那样看起来觉得“浪费”篇幅，其实不然，空白有时是很必要的，天头或地头稍稍宽一点，使读者少一些压迫感。（西洋人的书，天头留得小，地头的空白较多；我们习惯正好相反，我们是天宽地窄）。

不过我花十块美金买来的这部书，并不使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它用的纸太薄，纸质又不佳，印出的图不那么好，尤其是照片更不清楚。比起法国拉鲁斯字典来，简直不能相提并论。

《小拉鲁斯字典》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字典，以其释义简明扼要、插图丰富、人名地名并重著称于世。列宁很欣赏这本词典。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三番四次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组织学者编集一本简明的俄语词典，规模和释义仿照小拉鲁斯，却始终没有编写成功；甚至动员了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亲自出马，也未能如愿。后来出版的乌莎可夫四卷本《俄语详解词典》，是一本很好的词典，但不是列宁所想编的那种词典。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崇高威信，这样的事都办不成，实在有点出人意料。其所以如此，细细想来，大约因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但凡在热烘烘的革命高潮中，是不能编字典的；以前我没有感性知识，不得其解，经过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

频繁运动，再经历了十年浩劫，才明白这个粗浅的道理。也许还有一点原因，是俄国文人的思维方式与欧洲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派的思维方式很不相同，试看俄国某些文论冗长拖拉，与法国某些文论明朗敏锐，互不相容，可见要俄国学者编纂小拉鲁斯那样的图文并茂的中型（按其时的俄国说，恐怕是小型）字典，实在是不容易的。

《小拉鲁斯》是大三十二开本，经常修订；自从利用了计算机排版后，几乎是每年修订一次，总是在一千八百页上下，不超过两千页。上半部是字典，下半部是人名地名词典，中间用色纸多页相隔，色纸排印的是从外文接受过来的名言录。不论是前半还是后半，都在有关处所插排图片、照片或地图，图排在文中，不排在页边，图与文字浑成一体。这可以说是一般读者日常需要的语文和百科词典，其中又以一般读者最需要了解的人名地名为主要内容。用的是很光滑的道林纸，所以图片极其清晰，地图还是彩色排印的。

当我在 80 年代初得到一部南斯拉夫 1974 年出版的《百科词典》（Leksikon）时，我实在感慨万分。1974 年正是“四人帮”对词典进行大张挞伐之际，而在萨格列布（只是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首府）却出版如此精美的百科词典！十六开大本，一千零九十五页，重磅道林纸印的，有多张彩色插页，彩印地图，以及不计其数的插画——包括美术作品、名人图像、动植物和科学图解，应有尽有。而且取舍也已打破了那时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按照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办事。比方人物头像，不以正面和反面人物加以取舍（在前苏联的出版物中，别说反面人物的头像不能出现，连反面人物的生平都不许记载）。只有真善美，没有假丑恶。南斯拉夫早已脱离了那个“阵营”，所以它的词典能够保持起码的知识独立性。这也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化社会史。

到了 90 年代，读者已经不满足于这样的“图+文”的书了。多媒体问世以来，我们从机器上读到的，不仅是图+文，而且有声音。我手头常用的一张软件——微软公司出版的《Encarta 96》就是一部有图有文有声音的百科全书。比方查“贝多芬”一条，一下子就得到他的传记，他的头像，以及听到他的某个代表作品的一段音乐。有一次我查出“卡夫卡”这条词目，不用说此人的传记和头像一秒钟就呈现在你面前，如果你按一按发声符号，你就会听到卡夫卡的一段文句（不过不是每一个作者都附有朗读或歌唱就是了）。这样的“书”，在用眼睛的同时，还可以用耳朵。有声的书比无声的书，无论如何是吸引人得多的。

尽管如此，我却仍然对一部插图本《音乐百科全书》（The Golden Encyclopedia of Music）感到极大的兴趣，常常翻阅，不但长了知识。而且感到一种难得的乐趣。这部十六开本七百二十页的大书，只有美国人才能编印出来。也许我见识不广，很难看见欧洲的出版家肯出版这样的图文并茂的给非专业读者看的（甚至是给他们消遣用的）专科词典。英国、法国、德国出版的音乐百科全书或词典，大都是非常专业化的，古板严肃有余，活泼趣味不足，这些专书都是供读者去查阅的，去检索的，而不是给读者阅读的，更没有想到要有一种百科全书是给人随时阅读，唤起对这一专门学科的兴趣的。唯有美国出版家有面对广大非专业读者的关注。

原书名有“Golden”一字，意为“黄金”或“金色”，是出版社的名字，纽约金色出版社（Golden Press New York）出版，诺曼·劳德（Norman Lloyd）编著。书中除了解说文字外，有照片，有乐谱，有剧照，有漫画，有画像，

大的小的，正经的，滑稽的，应有尽有，翻阅起来甚至是一种享受，一种艺术享受。比方说，在肖邦这个词目下，有肖邦像。有乔治·桑像，还有乔治·桑为肖邦作的画像，引出一段文坛恋爱故事，耐人寻味。世间制作百科全书者，多半没有想到非专业的读者，出版的专书，让人不想去读它，或者读了也还是不知所云。

掌上书记

古语词：“掌上明珠”——指最钟爱的人。我套用这个词义，写“掌上书”，我要记的是令人喜爱的小书，也是我自己最钟爱的可以置放在掌中的小书，或称微型书；照香港人的说法，是“迷你”书，这些小书迷你不迷你，我不知道，它可是迷我，它使我着迷。

朋友从欧陆归来，赠我一册微型诗集，使我欣喜若狂。这是我见过和拥有的微型书籍中最小的也是最可爱的一册，自然也是我得到过的礼物中最珍贵的一种。

只有半个火柴盒大小的这部微型书，是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力作《金星》。印得精美绝伦，可称“绝”品。它包装在一个信封大小的外函里。包封的一角印诗集的封面，右下则印出版社和丛书的名称——出版社设在罗马尼亚的雅西城，这个地方是著名的文化古城，也许正因为是文化古城，才想到要出版发放着浓郁的文化气息的微型册籍吧。丛书的名字也很迷人：BIBLIOPIL，拉丁文的字根，跟意大利文的BIB-LIOFILO几乎一模一样，意思是爱书的人，爱书成癖的人，收藏珍本的人，或者就是我常说的“书迷”的那类人。《金星》是这套丛书的第三种，前面两种未见，照此书所附广告看，也都是罗马尼亚诗人的诗作。

版权页记载着：开本，3.5×4.5CM（厘米），正文 80 页，彩色插页 10。插页印巴拉沙（BALASA）的油画。诗篇用蓝黑两色套印，除了首尾两页外，每页印两个诗段，每段四行，每行第一个大写字母用蓝色套印。一根蓝线印在每页的下方，显得十分潇洒；蓝线下左或右角用斜体阿拉伯数字印页码，彩图插页亦在码中。版芯小，天地很宽，使人觉得心胸舒畅，一点也没有局促之感。印诗句的字母很小很小，看来比我们的七号字还小，但是清晰度却令人惊叹，不用放大镜也能清楚读出。真叫一绝！

爱明内斯库（M.Eminescu, 1850—1889）是罗马尼亚现代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作影响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整两个世代的文风和诗风。他的诗情溶化在这个民族中世纪的光辉历史和美丽的民间传说之中，《金星》（作于 1883 年）也不例外，它就是围绕着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展开的。世人说他的语言简练而明快，诗歌技巧纯熟而灵活，感情是那么充沛，寓意却又那么深刻，时常教人掩卷沉思。插画十幅，画家可能也是同国人，画面笼罩着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评论家有时也说，诗人自己也有某种神秘主义的味道，果如是，则诗和画就更加显得十分匹配了。

印制得如此优雅的微型诗集，只能作为最珍贵的礼品送给爱书的人，要不就送给爱人间的人和人间所爱的人。

十多年前，我在多瑙河畔的古城申吞德利（Szentendre）也曾得到过一部微型画册。虽也是微型，不过比上面说的那本诗集大一倍，刚好是一个火柴盒大小。那是这个小城以著名女雕刻家玛格烈（Magaret）命名的博物馆送的。女雕刻家以泥塑著名。彩印泥塑图片凡一百余幅。书前有这位雕塑家的序文，是用英文、法文、德文印的，可见这书也是让人作为礼品送给爱书的人、爱人的人和所爱的人的。

这篇短序写得很动人，她说：

这几行字是为了表示我的敬意：我向那些进入这间可爱的老房子的人们致敬，他们不久就会同我的作品结识。我也要向参观完毕要离开的人们告别。

我希望他们会记得我们见面时的若干情景，或者还会在他们的心中留下永恒的回声，这是人与人之间互通的心声。

接着这位女雕刻家讲了她如何进入雕塑这个艺术殿堂，然后带着无限深情告诉我们：

这古老的技艺是十分神奇的。在造物的最初时刻，人的手就拿着这粘土。当第一个陶器成为他第一件有用的器物时，他一定既欣赏它又使用它，两者都会同时发生；所以他在那上面雕刻了一些什么，或者是吉祥物，或者是毫无意义的图像。从那时起，这技艺便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而人不仅制作用具，他还刻成形象或浮雕……每一个人把他自己的灵魂注入他的作品里，注入了他的欢笑，他的快乐和他的哀愁。

说得真好，注入了艺术家的整个内心世界：他的欢乐，他的哀愁，他的幸运，他的坎坷！说得真好呀，无疑她也是一个热爱人间的人，人间也热爱她，否则怎样会有这样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

提到这个女雕刻家，使我想起她的祖国——匈牙利。二十一年前（1975），当这个中东欧的小小的艺术大国为纪念它从纳粹奴役下解放三十年时，布达佩斯也出过一本微型画册：《美术成就三十年》，收载了几十幅彩印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图像。书前也有译成多种外国文的简短序言，但这篇短序除了留下时代的烙印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激动人心的语言。它只不过像背书似的交代几句套话，而这些套话我们是司空见惯了。它说这三十年的艺术，大大不同于过去的资产阶级艺术，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云云。其实这部微型画册里面有不少现代主义或所谓“形式主义”的作品，连毕加索式的“资产阶级”绘画都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云云，只不过是当时的一幅挡灾布而已。值得一记的是，我得到这部微型书时，不是在1975年，而是在成书后十年（1985）——出书时我要不是斗私批修，就是战天斗地，哪里顾得上艺术上的什么主义呢，至于什么微型书，那就连想也不曾想到过。

前些年我在德国一个控制论研究所作客时，柏德波恩市的市长为着表示对我这个远方来客的欢迎，礼貌地跟我作过短暂的会晤，临别时他送给我一包纪念品，其中却有一册微型书。这书也是火柴盒大小，一百七十六页，厚厚的一册，有图有文，书名叫做《柏德波恩小字典：A至Z》。怪有趣的，举凡这个小城市的所有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文化设施，以及一切有用的信息例如医院，交通，急救……等等，无所不包，原来微型书不只有艺术的感染力，它还可以是很实用的辞书，或旅游指南。

比微型书大的是叫做袖珍本的册籍。“袖珍本”这个语词，可能已经出现了一百年，即西方所称的 Pocket Book，直译应作“袋中书”，西装的衣袋比较大，否则装不下这种出版物。国际袖珍本那样的开本，是比普通的三十二开略短而窄，比起微型书来则大上好几倍了。袖珍本或袋中书只是一种携带方便，价钱便宜，看过以后随时扔掉也不可惜的书种，完全没有微型书那种情趣和魅力了。

昔年我在丹麦还见过比微型书略大比袖珍本略小的“枕中书”。枕中书这个语词是我杜撰的，英语是 Pillow book。“枕中书”大约有三个火柴盒大小。我见到的那册，是印得很考究的彩色画集，就用了 PILLOW BOOK 这个英语词组作书名。这部枕中书收录了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古代印度、阿拉伯、日本和中国的浪漫绘画（不完全是春宫画，其中有些日本的浮世绘是很美的东方式裸体画）。我的职业病让我查过大大小小的英语字典辞书，都没有找

到 Pillow book 这个语词的确切语义。直到前三年（1993），新编的两卷本牛津大字典出版了，才在 2211 页上找到 Pillow book 的记载，一个释义“适合在床上读的带有浪漫情调或色情描写的书”，另一个释义是指日本古典作品特别是私人日记札记之类。前者大约即荷兰学者高罗佩（R.H.vanGulik）收集的“房内考”那类书吧。可那已经与我所欣赏的微型书籍大异其趣，完全失去微型书那种典雅、优美、潇洒的情趣了。

西方宗教界也常散发宣传教义的微型书，有一次我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城乘坐出租车时，司机就塞给我几本这样的宣传品，这些小书往往只有寥寥几页，无足记者。只有各国世界语团体二三十年代竞相印制的微型书《世界语之钥》（Shlosiloj de Esperanto），却同时达到宣传和实用（学习）的目的。这种微型书有两个火柴盒大小，各国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印制，封面印着一把钥匙，并标明这册小书是用什么文字写的。书中主要介绍世界语是什么，怎样去学世界语，还简单列举了世界语的十六条基本语法，书末用该种民族语解释的世界语常用字字典。最早的一册是 1905 年在英国出版的，德籍英国人荷佛勒（H.F.Hoeveler）跟另一个英国人米烈治（E.A.Millidge）合编的。在第一次大战前夜印行的这类书，共出版了十八种语文本，到第二次大战前夜则有二十六种；据 70 年代初的统计，已达三十九种语言，包括英、法、德、俄、西、意、葡等文字本。这些微型书，我从前收罗了大批，由于用不同颜色的封面印制的，显得五色缤纷，甚是可爱。一场浩劫，这些微不足道的微型书，都化成纸浆了。前几年在国外陆续得到其中的四本，按出版年份先后排列，它们是：桃色封面的阿尔巴尼亚文本，意大利印的（1928）；白色的英文本，伦敦印的（1954）；绿色的西班牙文本，乌拉圭印的（1959）——那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它的首都通过了承认世界语为有效的国际辅助语的决议案——；黄色封面的瑞典文本，斯德哥尔摩印的（1972）。遗憾的是 30 年代我们想印而没有编印成功中文版的《世界语之钥》；只在 1932 年出过一本《世界语？》，六十四开本十六页，是很简单的宣传品，没有语法和字典，未能手执一书，便可作为钥匙打开世界语的语言库。

前几年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韩国学者送给我两本小诗集，六十四开本，不算微型，但是很可爱。是美国一个好像不太出名的诗人 S·希尔法西坦的寓言诗，一本叫《自我牺牲的树》，一本叫《我寻找我失去了的……》。其可爱之处是在每页只印一句或一段，却有很动人的插图，有时连一个字也没有，只有图；图是用线条画成的，活像在计算机屏幕上画的东西，很简单，很耐人寻味。

我手上还有一本非常可爱的微型书，两个火柴盒大小的《鲁迅诗集》，是 60 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线装本。陈毅题签，郭沫若序。题签和序文是两个诗人的手迹，秀丽喜人。序是 1960 年 5 月 8 日作的。这应当是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的一种精神安慰剂。所收鲁迅诗，从 1901—1902 年的《自题小像》到 1935 年 12 月的《亥年残秋偶作》，共四十首。手迹套印在淡黄的底色上。有近乎西式的硬纸包封，与线装内涵相映成趣。现在恐怕不容易找到，它应当成为读书界的珍品了。

腹中书记

我爱幻想，也作种种空想。有时不自量力，想写这个，又想写那个，不免腹中藏了不少“未完成的杰作”——不消说，几乎都是胎死腹中，因此我有“腹中书”之说，即永远不能完成的腹稿。但是有时在梦中却好像它们已经面世了。不能不说，我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幻觉，或幻想狂。不过对于自己来说，却很有趣。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我手头还保存着一张发了黄的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中文和英文字。看着看着，脑海中泛起了几十年前的幻想：一部腹中书的幻想。

那是在60年代初，我正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其中特别着重美国如何趁鸦片战争打开了东方古国的大门之际，千方百计渗透到中华大地来。于是形成了一部腹中书。发黄的稿纸上写着书名三个：

美国侵略者在中国

美国冒险家在中国

美国佬在中国

第三个拟议中的书名，《美国佬在中国》，下面加了着重点，可见当时我认为这个简单明了的书名比较可取。那时正是古巴反美的高潮，Cuba si, Yankee no!的口号响彻世界。Yankee就是“美国佬”。美国佬指的就是一群冒险家，鸦片商人，虔诚的传教士或披着袈裟进行不法勾当的传教士，新殖民主义者甚至流氓……

保存下来的这张黄纸记录了九个人名，以及为写这九个人而准备的主要材料。上面写道：

- | | |
|---------|------------------------|
| 一山茂召 | 【《日记》No.1】 |
| 二罗柏特—福士 | 【《个人回忆录》；《鸦片飞剪船》，罗博克著】 |
| 三亨脱 | 【《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 |
| 四裨治文 | 【《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先驱—裨治文》】 |
| 五卫三畏 | 【《卫三畏生平和书简》；《中华帝国》】 |
| 六伯驾 | 【《伯驾生平、书简和日记》】 |
| 七顾盛 | 【C.R.】 |
| 八沙克 | 【《中国档案》】 |
| 九柏列斯戈 | 【《柏列斯戈船长与鸦片走私》】 |

纸上左边是九个人名，右边则是英文原书名，加上一些记号，标明是在某图书馆，还是在我的书柜里，或者是我把要用的内容摘录在我的笔记本中，同时标明我的笔记本号码——这里所录从简，而且将英文书名都译成中文了。【 】内的书，那时都没有中文译本，可喜的是第三位亨脱——我那时理解他是到海外去冒险的流氓——的两本“著作”前几年已有中译本了。第七位的主要材料，只有C.R.两个缩写字母，事隔三十六七年，连我自己也不记得它代表什么书了。

这张纸的天地头，还注有十一种英文书名，则是后人论述这些美国佬或论述当时形势的学术著作，照我现在推断，天头的五本当时已有中文本，下面的六本则还没有中译。

也是那个年代，即60年代初期，美国派出所谓“和平队”到发展中国家去（特别是派到非洲去），当时世界进步人士都认为这行动是不怀好意的。

1963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专文，最后一段曾有如下的论述：

鸦片商人，流氓打手，情报特务，学者教授，江湖医生……正是披着各色各样的外衣，干着同一目的的侵华活动：一堆牛鬼蛇神组成了一幅美国侵华先遣队的绝妙图画。从这幅图画不难识破今日美国派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去的、满口“仁义道德”、大攀亲戚、侈谈和平的“和平队”所要干的是什么勾当。这叫做：

“温故而知新”。

也许我当时的理解比较简单，缺乏深入的具体分析便加以类比，略有偏颇之处。但是我列举的那九个人，却是真正的“美国佬”，因为我曾仔细研读过他们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都是第一手资料。

与此同时，我酝酿着另外一部“腹中书”，则是《美国人在中国》，也写下一张表，可惜不见了。其中包括斯诺，他的前夫人，史沫特莱，斯特朗以及别的一些善良的美国人——“四人帮”垮台后，我曾写过一份计划要编印这几个人的文选，交给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他心有余悸，不敢考虑这个选题，连那份计划大纲也不见了。

腹中书！腹中书！我一生不知有过多少腹中书，都胎死腹中了。为什么？我绝不怨客观，主要是我“志大才疏”，由于我浅尝即止的幻想狂！

不读书记

读书读了几十年，越读越蠢。到了1969年下干校时，什么事情都弄不懂了。什么现象都解释不通。比如说，为什么革命革了一辈子，忽然变成反革命？为什么反修反了一大阵，反而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一下子所有的书，前人写的，今人写的，一日之间几乎通通变成什么黑书？为什么书店图书馆学校一朝都关了门，或等于关了门？到了命定的那一年，即下干校的那一年，我才顿悟：这全是书作怪。读书读多了，思维僵化了，人变蠢了，蠢到无可再蠢了。于是下决心不读书。

下干校时我一本书也没有带下去。啊，这话不对，随身带着一本小红书，一本小书等于一万本。其实那时要我带也无书可带，我所有的书都被目为“黑”书，送到造纸厂去进行“再生产”了。“无书一身轻”！不过我又讲了假话，我偷偷带了一本修正主义洋教授写的语汇学，但那书却藏在我的家人的行李中，而我的家人住家属连（家属也编成连队了！），在金口镇，离开我们的驻地咸宁好几百里路，要搭车搭船一天又半才到达，所以偷偷藏了一册书，等于不带，完全无碍于贯彻我的决心：不读书。

我在干校确实是运交华盖，某日突然被军宣队的政委看中，做了非军职的文书，一个人住一居室，伴我的只是档案柜以及柜中不会说话的档案；另外，政委交给我九麻袋的揭发材料，两派外调材料，还有部分大字报底稿，某些日记笔记片断等等似废料又不是废料的东西，让我天天读，以这样的脑力劳动代替沉重的体力劳动；并且指令我全权处理这九麻袋不是废料的废料，要留则留，要不留则将它毁去。

真是幸乎不幸乎，我摆脱了书，却沾上了废料。别小看这些废料，那时废料有无穷威力，能置人于死地，也能救活一个“垂危”的君子。我不读书，却成天读着废料。读完九麻袋的废料之后，茅塞顿开，世界的真面目展示在我面前，人的本质展露在我面前。本来貌似善良的，其实是丑恶不堪；本来以为居心不良的，却在无人处显得玉洁冰清。有在监狱中还能仗义直言，揭示真相；有的却落井下石，顺着别人的意旨，诬陷好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啊！我读到一部大书，一部不是平常的书的大书。九麻袋废料，让我埋头读了好几个月，多半让我付之一炬，但也有少数几份难得的证明材料我留下了，也许对于后来平反有点用处。最珍贵的是居然读到有关我这个“黑帮”分子的废料，约有两寸厚的一包。天下奇事莫过于此矣。

除了管废料外，我还管接待外调——凡是外边来向我们这个大队的成员调查、要写证明材料的，都通过我；于是又在我眼前展开了另外的一幅图景：人性，党性，无性，乃至兽性，调查的和被调查的，都在广泛意义上给我增加了许多读书所不能得到的东西。

读着读着这样的大书，或无字的书，每每深夜不能入睡，促使我反复沉思，当然也包括自我反省。解放前我工作了十年，解放后工作了十七年，然后进入被斗的几年，几十年的事迹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展现在脑际。不读书的三年，是反思的三年；而这三年不读书，竟胜过读三年书。如果不以人废言，真可谓“一通百通”了。

读书人不读书，就聪明起来了。难道不是吗？

书中的话

书中的话不是书话；但如果加上圈圈点点，再加上评注，那就成了书话。我爱书，可是我有个坏习惯，喜欢在书上添上红红绿绿的符号，这些符号只有我自己能解读；有时还加几个字的批语，这些批语往往不成文，可是写成普通话，却变成一则复一则的书话。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常青。

语出哥德的《浮士德》第一部。这句话说得多好呀。“理论”，可以理解为空谈，大话，空话，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世间到处都可看到听到这些所谓“理论”，别理会它，到生活中去，那里的生命之树常青！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语出马克思 1859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了《共产党宣言》（1848）后十年，作者深入研究了欧洲的社会现实，他实际上修改了他在《宣言》中那种太过乐观的论点（认为社会革命很快就会席卷欧洲），断然说，旧的社会形态（注意：社会形态，不是单纯说旧制度）不是一朝用暴力打碎国家机器就必定灭亡的。腐朽也罢，垂死也罢，却腐而未朽，垂而不死。超阶段跃进，盲目乐观，到头来只剩下一堆美丽的甚至凄凉的回忆。

历史上，有一个美国总统曾经说过“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的确，在美国社会里，一切价值都可以用商业价值来衡量。

语见钱宁：《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173 页。美国总统这句话说得妙极了！“事业”和“商业”原文用的是同一个字：business，所以上句引语也可以翻译成“美国的商业就是事业”。如果用我们常用的说法，那就是：一切都是买卖，一切都是做生意，一切都是——不过是商业行为。越说越可怕，什么人权，什么正义，什么友谊，什么什么，通通是一种买卖！钱，钱生钱，黑钱可以通过洗钱而得到白钱，事业就是钱，有钱就是一切。如此而已。

至于钱宁这部书，关于留学历史和留学政策的篇章，我没有看，也许它是很真实的或很详尽的，我不敢置评。政策以外的描述，是一个新闻记者的所见所闻，有朋友说，是《南方周末》一类的有趣文字。也许是的吧。

呵，无限美好的青春呵，当情欲还没有萌发，只是从急速的心跳而隐约地被感到的时候；当无意间触及爱人胸脯的手像受惊一样的颤抖和赶快移开的时候；当纯洁的青春的友情阻住最后一着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爱人搂着脖颈的手臂，比像触电一样的热烈的亲吻更甜蜜的呢！

语见 N·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段抒情的散文诗似的文字下面，有这么一句：“他没有想到在残酷的、受迫害的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欢愉。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这个姑娘，真是极大的幸福！”后面据说原稿还有一大段描写心情的——近来俄国的出版社作为附录公布了被删的文字。见梅益译本（新版）453 页。上面引文

见 139 页。细细推敲，被删的一段其实可以不要，删去也许更简洁些。奥氏的书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如果连我们这一代算在内，则何止一代人受到教育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句名言已成为两代人的神圣的箴言，激励着多少人走向理想，走向他所追求的太阳啊。

世事白云苍狗，风涛浪激。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陡浪急。

语见茅盾“为商务印书馆建立八十周年纪念作”的词，调寄《桂枝香》。说的虽只是商务印书馆八十年间经历了无数险阻，最后还是化险为夷，全靠主事者镇静自如，巧妙应付，既不随风倒，又不顶风干：它一心只为着传播文化，积累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振兴中华而默默地工作着，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着。说的是一个机关，一个老字号，可是概括了多少人生哲理。只有经历过那十年浩劫，作者才能写出如此深邃的“箴言”来。

我们的时代本质上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因此我们不能仓皇失措。大灾难已经来临，我们处在废墟之中，此刻我们开始建立一些小小的新栖息地。这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现在没有一条通往未来的康庄大道：但是我们却迂回前进，或者竟然跨越过所有的障碍。不管天翻地覆，我们必须生活下去。

没有人想得到这几句满含哲理的话，竟出自劳伦斯那本争议了好几十年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第一章开头的几句。1960 年经过法庭辩论，这部有争议的小说在作者的祖国已经解禁了。最有意思的是，法庭辩论全文早已公布，世界有些地方还是把这部小说列入禁书或黄书。30 年代时，人称这部小说是西洋《金瓶梅》，给它增加了一层不可触摸的色彩。现在法庭辩论全本也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尽管你不同意其中某些论点（甚至完全反对其中为此书辩护的论点），也可以平心静气地细细推敲一下。劳伦斯的文体，流畅而不豪华，平淡无奇，没有那种装腔作势的语调：所以我很喜欢读他的文字，故上引句子常在我脑中盘旋。特别是经过一场浩劫，更感到有很多启发。

三个读书人：一部“书史”

去年是邹韬奋一百周年诞辰（1895—1995），今年是胡愈之一百周年诞辰（1896—1996），明年是张元济一百三十周年诞辰（1867—1997）。

三个读书人，一部“书史”——一部近百年中国的书史，也就是近百年中国的出版社会史：实际上可以看作近百年中国社会史的一个侧面，甚至可以说，一个很重要的侧面。

这三个读书人，叫做什么“分子”好呢？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进步知识分子？爱国知识分子？谁也说不清。为了省得花功夫去考证、推论、论断、评定，不如干脆称之为“智者”算了。

这三个智者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知识：张是科举制度孕育出来的晚清进士，住过封建王朝的最高学术机关（翰林院），民国时期又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邹毕业于洋人在中国设立的大学；而胡则只读过初中，他的浩瀚知识都是自学得来的，只是流亡法国时才在巴黎的大学里研习国际法。

张、胡都不以文传世，虽则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是人们记得的倒是他们的业绩，他们所创建的文化设施；只有邹却有名传四海的政论。因此，后人称邹为政论家，称张为企业家，而胡则被称为社会活动家。不过他们一辈子都从事出版工作，因此他们都以出版家闻名于世；然而，世纪将尽之际，回头一望，难道不该把这三个智者称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吗？

这三个读书人读饱了书，满怀着华夏智者济世救民的传统观念，先后环游世界，吸取了西洋和东洋的思想精华，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他们以新闻出版为职业，为事业，为工具，为媒介，为武器，锲而不舍地在书报林里“寻找”了一生，“奋斗”了一生，甚至“战斗”了一生。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着提高民智，振兴中华；为着子孙万代的幸福，为着千古哲人的崇高理想。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方法，带着世纪的豪情和少有的组织才能，加上他们自身的言行，开拓了近代中国一个崭新的书的世界——由是培育了整整几代中国人。

三个读书人，经历了一个大时代，一个激变的时代，一个艰辛和苦难的时代，当然也是英雄的时代，英雄辈出的时代：列强侵略，国运式微；百日维新，变法失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终于在世纪的中叶（1949）取得了胜利：从此，世人看到了一个自豪地屹立于世界上的充满生机的中国，看到这个古老的民族在奋力进行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历史记载张元济参与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个老字号是在1897年由四个爱国的印刷工人创立的，但是作为一个出版社，则应当从夏瑞芳（四个工人中的一个）邀请张元济入主馆务开始（1902）。世人往往忽略了张是作为思想家来操作这家出版社的：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一个出书的机构，实际上是他的理想试验场。他的改造社会的理想的试验场。张元济由于自己的出身和经历，他没有企图去变革整个社会结构，也许百日维新的失败，使这位智者觉得，作为读书人，他的力量不足以变革社会，但他却要找寻另外一条挽救祖国危亡的道路。受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熏陶，环游世界

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又得到严复翻译《天演论》所归纳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启发，他选择了为社会变革打基础的路。这就是他和他的好友蔡元培达到的共识：只有开发民智，才能从根本上拯救垂危的祖国。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蓝图，不是理想国，不是乌托邦的试验场，而是为变革社会需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那样的蓝图。张设想的试验场是围绕着广义的文化教育而铺的机构。简而言之，张元济办出版社，确实不是单纯为了出书，他是在办一个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大学校”。这样，在本世纪的头三十年（1902—1932），商务印书馆不是孤零零的一个出书机构，而是一个庞大的文化教育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包括一个出版社，十个或更多的杂志社，一个发行机构，有最新装备的现代化印刷厂，拍科教片和艺术片的电影厂，新式的益智玩具厂，文具教具科学仪器厂，幼儿园，小学，中学，函授学校，图书馆。在出书的层面上，后人见到这家出版机构以教科书先行，继之以字典辞典和各种工具书，与此同时整理国故，介绍西学，举凡文学，科学，哲学，凡有利于提高民智者，都在视野之内。而他的经营思想，也是超前的：在世纪之初，至少在文教领域，他敢于引进外资，引进人才，引进新技术，这不就是开放的思路吗？自然在这过程中，有成功，有失败，有挫折，有经验，有教训。所以说，这是张的新的思维的试验场。只是在他退居二线后（主要是在“一·二八”之役，差不多整个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夷平之后），商务才收缩而成一个单纯的出书机构。张的继任者们当然做了很多的工作，为恢复这家企业作过很值得称赞的努力，尽管也继续为文化积累出过很多好书，但是理想淡化了，知识的价值缩小了，试验场不再是试验场了，人才也陆续流失了。而出版社特别是编辑部的经营，也减少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愈益变得纯粹资本主义化了。所有这些，都与张元济无关，或者更准确点说，张的朴素的开发民智，藉此兴邦的理想，在现实的撞击下粉碎或几乎粉碎了。他已无能为力了。世人会记得在那所谓火红的年代，这个读书人，为了保护他的这片试验场，小心翼翼地，甚至战战兢兢地，不愿触及现实政治，极力避免同激进的革命的现实接触。一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会明白张的苦心吧。

邹韬奋由主编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生活周刊》（1929）到创办生活书店（1932），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大飞跃。这不光是他个人的思想飞跃，这甚至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一大飞跃。这个飞跃的特征是，告别了单纯以提高民智挽救民族危亡的思路，勇猛地同现实斗争结合在一起，理想主义升华了，书籍杂志成为新的启蒙运动的武器，它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武装读者的头脑，引导他们走向抗击侵略，变革社会的大道。这个飞跃之所以能够实现，不容置疑是时代迫成的，但在现实进程中，不能抹煞邹的新交却又是深知的胡愈之的诱导。尽管胡在生活书店并不担任什么领导职务，但是他显然是邹（以及邹经营的生活书店）的“灵魂”，或者说“设计师”；从30年代到40年代，是我们民族受难史最艰难的年代。生活书店不能走商务的路，也不想走这条路。他们要走变革社会的路。

所以生活书店（以及以生活书店为代表的其他出版社）进行的是新时代的启蒙工作，他们引进的首先是马列经典著作和引导时代前进的富有现实意义的著译。当然也包括文学，科学，哲学和一切有利于提高读者政治思想水平的各种书刊。而生活书店在经营思想上也是超前的，它已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萌芽，当然只是一点点萌芽，比如它的组织是按照合作社的原则实施的，所有的从业人员都是书店的主人，是他们（而不是旧时的股东）成为书店的

主宰。

至于胡愈之，他投身社会是从进入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开始的（1914），他三度在商务工作（1914—1927，1931—1932，1932—1933），熟悉出版工作的一切运作，而他的精神世界已跨越了民主主义到达更高的境界（共产主义的境界），他在离开商务前后，以他的智慧和组织力，帮助许多智者开创了一系列的进步文化事业，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了整个国家的出版规模。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三个智者都办过报，当过主笔：张元济与蔡元培办过《外交报》，邹韬奋和胡愈之办过《生活日报》，而胡愈之到新加坡办《南侨日报》，解放后办《光明日报》。三人都是著名刊物的编辑、主编或策划者：《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生活周刊》，《大众生活》，《世界知识》、《月报》一直到解放后的《新华月报》。三个智者所编的报刊，都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推动了人民运动，促成了社会进步，与此同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

三个读书人，前后近一个世纪，用他们的汗水写下了一部近代现代中国的出版社会史，造成了本世纪上半期（1902—1949）中国出版事业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红色的，以生活书店为代表；黑色的，以正中书局为代表；在红与黑之间，有很大的一片中间地带，这就是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机构。而在近代中国文化领域中，在漫长的半个世纪内，一方面是生活书店和它类似的书店群（读书，新知等等），另一方面是商务印书馆和它类似的书店群（中华、开明等等），迫使黑色的出版业完全处于绝对的劣势，他们的黑色读物在读者中的作用几乎等于零。这就是近代中国出版社会史的图景。

1996.12.10

商务印书馆创业百年随想

(关于张元济，他的理想和他的探索的若干思考)

创业难。

一百年前(1897)商务印书馆创业于沪滨。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正所谓：大厦将倾，群魔乱舞，内外交困，民不聊生。

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都在探索要走什么路才能振兴中华。

四个接受过现代西方启蒙教育的青年，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路。他们集资办了一个小小的印刷厂，取名商务。五年后(1902)，四人中为首的一位夏瑞芳(1871—1914)，邀请大学者张元济(1867—1959)参加创业，于是在世纪之交，崛起了一个民办的出版机构，这就是商务印书馆。

从此，中国近代出版事业和印刷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张元济入主商务前，已在政治风云中浮沉了十年。这个博古通今，胸怀济世救民的宏愿的智者，入主商务后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挚友蔡元培(1868—1940)出任编译所所长，蔡虽因故未能到任，却毕生都互相支持，成为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精神支柱。

张元济是带着一个爱国智者的不平常却又切实可行的理想，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创业的。那就是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信念和理想。张元济与夏瑞芳共事十二年(1902—1914)，张主编务，夏当经理，不但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创业时期以及其后发展时期的坚实基础，而且因两人“意气相投”(张元济语)，合作无间，使这个新开垦的园地成为张元济的理想试验场。

商务印书馆创业时期是富有创造性的。这里呈现着一个非常奇特而又非常壮观的图景：它不单是一个出版社，而且是一个“多媒体”。作为主体的出版机构，拥有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它的编译所不单积聚了大批学贯中西的能人，还设置一个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后来演化而成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它的发行所不单开办了国内和海外(包括香港和新加坡)几十家分支机构，还有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今称邮购部)；它的印刷所不单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还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技术力量。

更值得惊奇的是，在这个主体的周围，展开了庞大的两翼。

一翼是一系列的教育机关：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和商业讲习所，以及对象更加广泛的函授学校。出版社办教育机关，而不是教育机关办出版社！这就是本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的奇景。

另一翼则是一系列的文化设施：电影厂、玩具厂、文具标本仪器厂、印刷机械制造厂和尚未成形的唱片厂。出版社办文化机构，而不是文化机构办出版社！这又是商务印书馆呈现的另外一个奇景。这里呈现的图景，表明商务印书馆是张元济的理想的试验场。

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逐步朝着全方位的出版结构迈进。从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尽可能有计划地高质量地编印工具书、整理古籍、翻译西学以及各个学科各种层次的著作。在解放前约半个世纪，它广泛联系了国内差不多所有的学者、作家和许多社会活动家；吸引了从儿童到成人，从学生到专家各个层面的最广大的读书人。一方面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供了基础读物，另一方面为文化积累作出了贡献。即在本世纪下半期，向这

两个方面奋进的势头也从未衰减，不过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创业真不易：资金不足；人才不足；技术落后；政潮冲击，人事纠纷，还得随时灵活化解。难关一个一个克服了，“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创业第一个十年末（1907），营业额仅一百五十万元（银元）；第二个十年末（1917），营业额成倍地增长，达三百七十万元，第三个十年末（1927），营业额增加到七百九十万元；到商务印书馆大部分厂房连同东方图书馆被侵略军炮火摧毁前一年（1931），它的营业额竟高达一千四百三十万元。

这就是创业者和从业者的艰苦奋斗和文化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群鼎力支持的结果。

守业也难。

要守业，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就只能倡言“在商言商”——躲开现实政治的冲击。但是纷至沓来的爱国浪潮，人民运动，政治风波，文化思潮，有些躲得过去，有些却躲不过，或不愿躲。于是出现了曲折奇特的场面：张元济和他的领导层诸君，对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活动，有利于维护正义的活动，有益于开发民智的活动，只好半明半暗地在精神上或物质上予以支持。

凡此种种，长期在商务工作过的茅盾和胡愈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有真实的记载。二十年前（1977），茅公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八十周年填的一首词，更生动形象地慨乎言之了。他写道：

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

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

然而最大的困难是在领导层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张元济跟夏瑞芳共事的十二年，合作得很好。不幸夏瑞芳被刺身亡（1914），继任掌握全局者，虽都是爱国的企业家，却不甚理解张元济的理想，他们对新事物新思维缺乏敏感，从而缺乏适应力。显然他们飘荡在时代的激流之中，而张元济则走在时代激流的前面。夏瑞芳阵亡后，内部矛盾就日益激化了。这绝非今日常见的那种权力之争，而是对如何守业——即如何维护、如何发展这个事业的方针方法，发生严重的分歧。

这分歧，全面记录在张元济1918年4月15日写的一封信里。信是写给继夏掌握全局的、也是创办人之一的高凤池（1864—1950）的。信中揭示了在守业方针方法上的六点分歧：

勿以为成效已著，而不思改良；

勿以为旧贯宜仍，而不求进步；

勿以为人才足用，而不广登进之途；

勿以为故旧不遗，而不思去冗之策；

勿以为用财宜节，并当用者而亦吝之；

勿以为听言宜广，并不当听者而亦纳之。

“勿以为”，“勿以为”，壮哉六个“勿以为”！后人从这六个“勿以为”中，领略到并且吃惊于张元济头脑中蕴藏着多么现代化的管理科学思想。由此可知，张元济在企业经营上是一个超前的急进派。

此时，张元济的理想试验场的规模，受到内外的种种干扰，只能日益缩小。于是他一步一步退却了，他辞去实际管理全局的职务，埋头整理古籍。他的继任人王云五（1888—1979）登场了。继任者实实在在办了一个出版社，

但是张元济的理想试验场萎缩了，消失了，不见了。30年代这家出版机构的口号是“日出新书一种”，它也确实做到了。好书源源不断的问世。然而张元济原先的搞大文化的宏伟理想中止了。

这样，商务印书馆只能沿着没有张元济理想的单纯出书机构的路子走了。这条路也不好走，困难重重，可是总算走过来了。

守业也不易。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人民终于自豪地站起来了。商务印书馆从1958年起，走上一条新的路。这条路，从本质上说，跟张元济的开发民智以振兴中华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跟张元济提高全民素质的理想是一致的。张元济在本世纪初进行的试验，已经在更广阔得多的园地上开花结果了，而他培育的商务印书馆则仍在屹立着。

今天，商务印书馆面临着新的挑战：这是时代的挑战。如今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的时代，是全球性的信息革命时代。

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再创业。再创业更难。需要更大的勇气、毅力、机智和韧性，需要进行果敢的革新和创造。

它，商务，将带着张元济的理想，带着先行者们以及几代爱国智者“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心愿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理想一定会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实现，而不局限于商务印书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997.4.19

中编 读巴金《家书》

“家书抵万金！”古人这样说。其实一个真正的人的家书，何止值万金！一个真正的人，善良的人，正直的人的家书，简直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我找了一年，找了整整一年，才在不显眼的书摊上找到这部书。这里记录着我们可敬的巴老解放后头十七年的战斗历程——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叫做心路历程。同时，这部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书，也铭刻了一个正直的善良的灵魂那灼热的心——热爱他的亲人，热爱这多难的人间，热爱这得来不易的新社会的心。

解放，欢乐，希望，忙碌，奔波，思念，劳作，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保卫和平，抗美援朝，人民民主……所有这些活动，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所有这些活动以及它所包孕着的喜悦和烦恼，朴实无华地展现在平凡的家书上。平凡，普通，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都在家书中表露无遗，那么真诚，那么真挚，那么自然，但那么动人。

然而在那疯狂的十年间，在那颠倒黑白的十年间，所有这一切，所有美好的情感都被吞噬了。家书中断了。家几乎都没有了。见不了面，说不上话，人的尊严被粉碎了。庄严的工作被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活动。巴老的两篇代序（《怀念萧珊》和《再忆萧珊》）连同他们的女儿李小林的《后记》，是对这邪恶年代的控诉——充满激情和愤懑的控诉！读吧，年轻的朋友；好好地细细地读呀，年轻的朋友！尽量享受一下人间真挚的爱，善良的情吧；但是不能忘记邪恶，不能忘记代序和后记所表达的一切，绝对不能忘记！多少年以后，人们将会认为，这部书是那个伟大的同时又是多灾多难的，充满着欢乐和悲哀的时代最可靠的证言。

《人间词话·人间词》新版

最近看到《人间词话·人间词》的新版，谭汝为先生校注，群言出版社版。注得很精确，排得很大方，印得很典雅。国际袖珍型，233页。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著名的文艺批评集；《人间词》则是这位自沉的天才学者的创作。两者合印一册，真是可爱的书物。书前冠以陈寅恪那篇传诵一时的《王观堂先生挽词一并序》，“风仪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

注者给作者所引每一断句，都查出原词，让读者得以窥见全貌；特别对于不是专门钻研文学的普通读者有帮助。这也是古籍大众化的一法。比如那一节有名的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境界说，注者把作者借用的柳永《蝶恋花》和辛弃疾《青玉案》原词，全首录入，省却读者自己去查考。注者还给每一节词话，加上一个小标题，有些加得确切，有些却未必。我以为不加为好；加了限制着读者的思路，未必是好主意。

《人间词》前有序两篇，均署“山阴樊志厚”撰，实则为王国维本人所作；这已为前人学者所证实，注本也记录了此事。所收各词，均有语词注释，对不谙熟古文的读者自有裨益，但注文不一定得到学人的一致赞同，这倒也是没办法的事。

楚图南诗词选集

楚老是一个和善的长者。他早年参加革命，也翻译了不少著名作品，例如尼克拉斯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与自由》，惠特曼的《草叶集》，还译过尼采那些难懂的警句。是一个非常诚恳的，慈祥的，勤奋的长辈。

他留下的诗词，汇集成书，发放着老而不息的那种锐气，难得的锐气。

《听雨》：

听雨听风百事哀，仁贤儿辈展雄才。

孤贫无告今犹昔，十叩朱门九不开。

好一个“十叩朱门九不开”！人到黄昏，忧国忧民的心事，活现纸上。此老不服老，令我辈汗颜；此老八十六岁初度时赋诗曰：

暮年夸父犹追日，皓首丹青勉自强。

但是时光不饶人，不免生出一点点忧伤：

千秋怀抱萦痴梦，长路漫漫已白头。

碧月清霄抬望眼，繁星点点思悠悠。

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啊！他没有死，他活在人间，他仍然活在我们心里。

“ 默默观史变，萧萧壮士心 ”
——读《潘汉年诗文选》

这两句诗是潘汉年在战争中写的，很冷，没有浪漫派诗人那种潇洒；难道诗能透视未来么？

今年是潘汉年九十寿辰，默默地过去了。《潘汉年诗文选》是去年年底出版的。有夏公的题签。这部有五百多页的书，收录了作为作家的潘汉年大部分文学作品，包括早期的创作和解放战争时期在白区写的杂文；也收录了解放后作为行政首长的报告。但最感人的恐怕是他的诗作，特别是作为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党的“敌人”，失去自由后的情诗（原谅我竟用了这样不合气氛的字眼）；集中最引起人们遐想的则是附录——潘汉年在莫斯科与国民党武官邓文仪的谈话记录：时在1936年，探寻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如何才能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以便有效地抗击日本的侵略。

人说潘汉年一生是一部传奇。也许不如说他的一生是一个觉悟了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一个悲剧时代所演出的社会悲剧：不满二十岁便参加了进步的文学运动，然后入党；在看不见的战线上驰骋了几十载，时而上海，时而香港，时而苏区，时而莫斯科，时而沦陷区（日本占领区），时而延安。革命三十年，一天也没有歇息过；然后是牢房，自己人设立的牢房：真正的牢房和不是牢房的牢房，从1955至1977年，总共二十二年。革命三十年，坐牢（自己人设立的而不是敌人的牢房）二十二载。为什么？为什么？怎样才能让后人理解和信服这一切？也许简单地归纳为社会悲剧，也许说这是大时代不能避免的悲剧中的插曲。也许是的吧。但是能不能告诉后人，是什么人告的密？或者换句话说，是根据何处提供的可疑材料或当时认为是确凿材料，作出如此重大决策的。人们往往推到谁谁批准的，却忽略了谁谁建议的（或如上文说的谁提供的材料）。后者很重要，尤其在悲剧过去几十年以后。冤案平反了，当事人的交代材料（是抗拒认罪还是被迫认罪）对后人却是极有教益的，也许将来有一天会看见这样的集子。

《诗文选》收载诗歌六十篇，其中有十篇系进了冤狱所作，都是我上文说的“情诗”，或署寄妻，或署无题，都是感怀而作，除了写寄他的战友妻子董慧，他又能写什么呢？或者说，还能留下什么呢？最末一首当是粉碎了“四人帮”后的抒怀，但豪情已很少了。后人在这五言古诗中听到了一个“赤胆忠魂”的声音，

倘有千般罪，当有风先闻；

堪叹莫须有，一脉贯古今！

古今冤狱，如出一辙。有什么好说呢。但是后人还听到微弱的欢喜声：

沉冤二十载，欣闻四害平；

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

可怜这样一个赤胆忠魂，来不及重新同他的忠贞的妻子一起回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便与世长辞了。

千古奇冤，万古遗恨！

情诗

年幼时读古诗十九首，老师说，这不是情诗，这是思君之作，说是被流放的忠臣，日夜想念他所崇拜的君主而写下的咏叹调。也许老师说得有理，但我还是不怎样相信，总以为其中若干首，必定是思念亲人的忧伤之作。那时我不知道民间有大量的情诗，而我又没有恋爱过，更没有流放过，只好把自己的幼稚的想法埋在心底。

人长大了，爱过，也被爱过，又学会一点外文，读到过一些言情的诗歌，因而确信世间有情诗。流放而又写情诗，则这些诗作之纯真，天地间无物可比拟。

《潘汉年诗文选》所收冤狱中怀念妻子、战友董慧的诗，真是千古绝唱！千古奇冤，千古绝唱！

纵死不辞称所爱，此生何时复相亲。

天摇地动倒流水，但愿冬寒化异春。

二十二年冤狱。年年岁岁思念无已。“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下场如此只天知”。世间尽有无数的情诗，无论如何比不上这十首那么真，那么纯，那么使后人心惊肉跳，那么激情又那么凄凉。

当诗人还是自由人时，为他的被下冤狱的好友杨帆的狱中诗作写的赠诗，正好为诗人自己后日在冤狱中写的这十首情诗作献词：

同为天涯客，飘零梦亦空。

楚囚吟鹤唳，细雨泣寒风。

面壁居圜圉，杀身何碍忠。

寄余诗一卷，读罢泪眼红。

就是这个杨帆，又因潘事第二次被囚在自己人的冤狱命运真是作恶呀！

《短裤党》

蒋光赤写的小说《短裤党》，是1927年11月出版的，据说书名是瞿秋白起的；短裤党是瞿联系法国大革命那一个激进党派而借用来写共产党的。其实短裤党应翻译成无短裤党才对——法国贵族当时都穿华丽的短裤，而穷人穿不起，故贵族讥笑他们是无短裤可穿的人。据说这部小说写的就是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自然也写到党内斗争。据说小说的人物都有原型，甚至不仅是原型，而且就是这些人的实事。主角即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有人说这是蒋最好的一部小说。《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收了蒋其他几篇小说，却没有收此编，也许因为它太长，也许认为艺术水平不高。

据说书中人物都有所指。杨直之和秋华夫妇就是杨之华瞿秋白夫妇；老头子郑仲德就是陈独秀。此外，书里人物都可一一对照：如鲁德甫（彭述之），史兆炎（赵世炎），柯乐佛（罗亦农），林鹤生（何今亮），易宽（尹宽），曹雨林（郑超麟）。书中还写了孙传芳（称沈船舫），张宗昌称张仲长，青年党的曾琦作郑启，李璜作李明皇，左舜生作左天宝，却是很像的。如果都有所指，这篇小说竟是近来所谓的纪实文学的先驱了。

以上云云，是托派闻人郑超麟在《怀旧集》中所说的，不知确否。晚近的读者对作者大概已很陌生，至于“托派”一词，语义也很模糊了。

托派的“托”就是托洛茨基（1879—1940），列宁死后在联共（布）内与斯大林抗衡的反对派首领，1929年被放逐出境，二次大战中在墨西哥寓所被刺身亡。按照前苏联党的传统说法，托派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杀手，无恶不作，前苏联30年代大清洗时，所有被称为搞颠覆活动的反革命组织，都贯以托派称号。我们这里也一直认为托派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只是到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才改用了对这个政治派别的新的说法。

第二版第二卷第516页注9说：“抗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郑书331页也引了这注文，并加以发挥，说托派只不过是“不同政见者”云云。

高尚的美丽的“天鹅”

3月13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天鹅”不老》。

啊！久违了！还有共青团，还有真理报，还有……“天鹅”，还记得乌兰诺娃！

跳天鹅的乌兰诺娃，跳朱莉叶的乌兰诺娃，在普希金的诗剧《喷泉》中千姿百态舞蹈着的乌兰诺娃。我们，中国的观众没有忘记她——她到过中国，也许不止一次，记得有一次还跟我们文化界的朋友欢聚在一起。

报导说，今年八十六岁的“天鹅”，拒绝莫斯科大剧院为她安排的祝寿盛会；她不喜欢虚荣。她甚至不喜欢记者们给她拍照。她不喜欢出风头。她早已过了登台的年龄，但她没有退出舞台；不是历史舞台，是芭蕾舞舞台。她与芭蕾舞融为一体。她继续为培养下一代或下两代艺术家操劳。她常常做对她这个年纪显得困难的示范动作，她甚至示范朱莉叶这个多情少女的舞姿。她是列宁格勒培养出来的“天鹅”，在基洛夫芭蕾舞团，然后在波尔赛芭蕾舞团跳。多少桂冠落在她头上，她爱她的艺术，毕生不衰。

文章说：

她有一张带着两个弹孔的“天鹅”剧照——这是卫国战争时期，“军人们清理战场时从一幢房子里摘下了这张被打穿了的剧照带回掩体挂起来，值日兵经常在剧照前献花。后来把剧照寄给了她。”

文章又说：

“还有一位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士兵见到乌兰诺娃时，从贴身处取出三张照片，分别是母亲，未婚妻，乌兰诺娃……”

难道还需要再说什么吗？

只有活在人民心里的艺术，才是真正的活着。

《爱罗先珂选集》六卷（世界语版）

爱罗先珂是二三十年代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作家，也是战前日本读者熟悉的“诗人”，人称“俄罗斯盲诗人”的，就是他；虽称诗人，所作的诗却不多，而以其带着理想和幻想的童话和散文，感动着东方的许多读者。由于鲁迅和胡愈之的翻译、由于蔡元培掌北大时经鲁迅的推荐聘他为教师，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在解放前的中国曾经有过颇大的知名度，特别是在世界语的圈子里。解放后则只能在《鲁迅全集》中读到《桃色的云》和其他童话了。

爱罗先珂的作品多半用日文写成；只有少数直接用世界语写，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间，则用盲文世界语写作，后来才被人翻译成世界语的。我不知道他曾否用他的母语俄文写作，据说有的，但是他20年代中期回到苏维埃俄罗斯后，兵荒马乱，“人民公敌”的帽子满天飞，就算用俄文写出什么来，照当时的情况，也是不能刊出的，何况他回国以后，似乎并没有加入作家队伍，那时的苏联人根本不承认他是一个作家，何况他又是一个不显赫的盲人，何况又是那时犯忌的世界语者。

爱罗先珂的日文版全集，三卷本，早在1957出版，是日本学者兼世界语者的高杉一郎编辑的，东京密苏组（MISIZU）书房（出版社）版。又，《作品集》二卷，也是高杉编的，1974年版。我1973年在东京见到高杉一郎先生，谈起过爱罗先珂，说他的日文版全集出了，中文虽没有全集或选集，总算有几部作品幸赖鲁迅翁得以在印，我们两人那时都惋惜没有机会能印行世界语版的爱罗先珂集。

一直到1979年8月，靠了日本世界语活动家峰芳隆（MINE YOSITAKA）的努力，在日本关西世界语同盟的著名世界语学者宫本正男协助下，才出版了《爱罗先珂选集》世界语版第一卷《光与影》，大部分是在中国时期用世界语写成的散文或“成人的童话”，包括中国读者永远不会忘记的《枯叶杂记》和《为跌下而造的塔》，这两篇都有胡愈之的译文，前者连同其他几篇东西以《枯叶杂记及其他》为书名，作为《东方文库》的一种由中国当时最有影响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刊行。

世界语版选集的第二卷《冻土在呻吟》，副标题是《楚克查人生活散记》，1980年出版。这一卷收了诗人1929—1930年在北极圈内西伯利亚楚克查人居住地生活时用世界语写成，其中一篇《三步棋局》是一篇惊心动魄的所谓“纪实文学”，如果我能把它归入这一类文学样式的话。就我所知，在那个时代——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的“大清洗”即对大批革命者和无辜者肆意屠杀的时代——能留下这样的记载的，真是不可多得。作者自注，初稿成于1933年，遗失了；重写于1938年。也许是托辞，也许是真的，都一样，30年代是个不祥的代名词。

1981年出版第三卷《狭的笼》，是宫本正男由日文翻译成世界语的。《狭的笼》有鲁迅的翻译，那是爱氏用日文出版的第一本创作集《夜明前之歌》中的一篇。秋田雨雀（1883—1962）曾为这部集子出版写过一篇序言，作于1921年6月25日。应当是爱氏被日本当局勒令出境之前夜。序言不长，但情感丰富，很动人的。序言末段云：

人类总是作着无数美丽的梦，尽管它在受难，在悲愁，这梦将来恐怕还要继续作的。你写出来并且留给我们的十几个梦，将会比跟你见面长谈时，更加在我们的心中激荡。亲爱的爱罗君！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永远不要失掉你的梦啊！

这几句简短的话语，同秋田半年后为爱氏的童话剧本《桃色的云》所写的短序结尾是一样感人的：

你叫喊说，“不要失望吧，因为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东西。”的确，春天是决不灭亡的。

《选集》第四卷是《古怪的猫》，收原文为日文的创作六篇，包括鲁迅翁译过的《雕的心》，另外两篇到日本不久（1916）用世界语发表的演讲稿，其中一篇题目叫做《现在是播种的时候而不是收获的时候》，在这篇短短的讲话中，爱罗先珂那种热情、梦幻、理想的光芒，使后人亲切地感受到了。他说，“是的，我们的工作是为着未来的，我们的工作是为着后人的，总的说，我们现在确实无利可图，”他说，“现在需要的不是空谈家而是实践家，不是昏睡者而是清醒者，因为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收获而是战斗的时候，不是取而是与的时候，不是收赠而是奉献的时候。”这就是典型的爱罗先珂式的幻梦似的语言。一个伟大的哲人说过，人们时刻都需要幻想，没有幻想就没有世界的未来。

卷五《聪明的坛子》收录了爱罗先珂最后日子里创作的四篇民间故事：印度的，非洲的，朝鲜的，土克曼的（盲诗人最后的日子是在这个地区度过的）。四篇故事都是用世界语写成的。这几篇东西作于1952年，只是在三十年后才被发现的！它们躺在一个叫做莎米娜的盲音乐教师个人档案里。据说这是爱罗先珂专门供她消遣而写的。莎米娜是爱罗先珂在莫斯科的女友，后来爱氏到土克曼定居，曾邀请她到他的住地帮助他建设盲人学校。

这两卷的出版时间相隔十二年，卷四出版于1983年，卷五则在1995年。可见出书（特别是世界语书）的难！但是今年（1996）继续出了第六卷：《爱字的疮》，包含《小鸡的悲剧》，《时光老人》，《爱字的疮》和那篇有名的《红的花》。这是中国世界语学者石成泰和胡国柱作的贡献。

世界语六卷本不是爱罗先珂创作的全部，但是收录了这位盲诗人最后的作品，当然是很宝贵的。六年前，适逢盲诗人百年华诞，我给北京《读书》和香港《大公报》各写了一篇散文，本想给南京《译林》写一篇论述爱罗先珂文学创作的论文，却始终没有如愿。此刻，收到译者给我寄来的世界语《选集》第六卷，不久前日本朋友即《选集》主编给我寄来第五卷，重读了鲁迅翁和胡愈老的几本翻译，好像还有一些话要说，先把这《选集》介绍如上。

据说盲诗人的故土俄罗斯也出了他的作品选集俄文版，作者1923年回到祖国，直到他去世（1952）后约四十年才被他的同胞所重新发现，多漫长的日子啊！

石在，火是不会灭的。春天总会到来的。

《瓮中杂俎》——一部用血和泪写成的古往今来罕见的文集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书。这是一部亘古未见的奇书。“三家村”第三号主角廖沫沙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检查，交代，汇报思想以及坐“喷气式”前或后、在“监护”处所，在流放地吟咏的诗词汇编；这样构成369页的奇异文存。书的后面部分是四十几页的《劫后文存》，那写于“四人帮”覆灭以后，只好算做这部奇书的附录了。

文如其人。确实是文如其人。不认识廖沫沙其人的读者，读完这部奇书，便可知这个大名鼎鼎的“三家村”三老板是个什么“反革命”。一个最老实的人，最天真的人，最虔诚的人；一个搞了大半辈子政治而又根本不懂政治的文人——文人者，是以作文看文改文卖文为业的知识分子。老廖天真憨直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书中所有材料（不好把它称作“文章”，只好名之曰“材料”！），都重现了作者那副天真憨直相：我住在同一家医院里所见的那个从流放地回京的廖沫沙，或者前几年我在他的会客室里所见的廖沫沙，就是这么一副天真憨直相。当专案组去流放地以三大罪名（三次被捕，攻击鲁迅，参加三家村）逼他在结论上签字时，此老拒不肯签，一再受逼，则写上“上述结论我完全不同意，回北京陈述。廖沫沙。”这十八个字，字字掷地有声！天真憨直的硬汉子。1976年元旦所作无题诗之一，描绘出这个令后人敬佩和怀念不已的硬汉：

八载身藏瓮，十年如坠冰。
玄冥而独化，草木供枯荣。

不过我特别喜欢此老1967年夏与吴晗同台演出（挨斗）时默念的《嘲吴晗并自嘲》：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自古真正的勇者无所惧，真正的智者亦无所惧。此所云耶？

曾被斗过的，曾斗过人的，未曾斗过人的，听说过斗人之事的娃娃，请都来读读这部奇书吧，正所谓“温故而知新”。

《卢梭：明信片画传》

历史老人从来不走直路。他往往作弄人，他扮成命运，总是跟不幸的人开玩笑。

卢梭好容易成为“日内瓦公民”，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被剥夺了公民的称号，经过时间的折磨，他又被请回去做他的日内瓦公民；他定居巴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被驱逐出境，经过时间的折磨，他死后被安葬先贤祠，享受到法国公民最高的荣誉。瑞士热烈地纪念这位伟人；法兰西也热诚地纪念这位伟人。后人称他是法国革命的催生者，法国革命的思想先导；后人又称他是绿色战士，因为他酷爱大自然，他呼吁世人“回到自然”去。所有的“学衔”都加在他头上：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植物学家、法学家、教育学家……甚至是新派的伦理学家。他是恋爱迷：他爱过多少女性啊，然而他的爱是真诚的，他并非一杯水主义者。他爱比他年纪大得多的“妈妈”，他爱比他小得多的小妹妹，他也爱同年的女伴。他是十八世纪的奇才（生于1712，死于1778）。他的《社会契约论》震撼了十八世纪的欧洲，当然也以译本《民约论》震撼过十九世纪末的中华古国。

“人，生而平等！”

“人，生而自由！”

但是世界充满了不平等，不自由。于是他去探索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的《爱弥儿》触犯了当权的教会，这本书两百年前被勒令焚毁。两百年后，在欧洲、法国、瑞士、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这本书被认为是教育界的经典。

历史老人走的是曲曲折折的道路！

《让·雅克·卢梭——明信片画传：他的生平与著作》是用明信片组成，并加上简短说明文字的有趣的书。情节说明大体上根据他的名作《忏悔录》写成的。历史老人又一次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开玩笑：《忏悔录》曾被列为禁书，说是大逆不道的淫书，现在又成为所有文明人的必读书。

瑞士作者编写的小书，译成中文，印得出乎想象的好。书价有点贵，三十六元！也不算贵：在北京，听一场普普通通的音乐会，最低票价也相当于或高于这个数。

书是三联书店出版的。

“凤凰”的宽宏大度

去年今年，上海出版了两辑“火凤凰”丛书，其中不乏精品。与此同时，英国也出了一套“凤凰”丛书，我陆续收到了好几十本，东西辉映，甚是有趣。“火凤凰”包罗的内容够广泛的了，而“凤凰”则更显出令人赞叹的宽宏大度。

“凤凰”丛书自称为“凤凰六十页平装本”，薄薄的小本子（大六十四开），随便塞在任何一个衣袋里都可以，看完扔掉也不可惜，每册在加拿大的价钱不到两加元，所以香港只售八港元——还不及一个汉堡包。一本小册子，一个“巨无霸”！

都是古典或当代的名著，封面彩色图，或作者像，或与内容有关的美丽图片。例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用的是尼采像；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用的是罗马斗兽场摄影。封底则是对作者和对本书的简要介绍。薄薄六十页当然不能容纳全书，只选取其精华或最吸引人的一章或两章。如果选得好，介绍得恰当，这样的小册子可以成为普及名著的入门书。确实是一种引导读者进一步接近文化遗产的好方法。

我说它宽容，说它大度，是很实在的。我收到的几十册书中，赫然有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在内，而且是全文。共产党宣言的全文！资本家不怕这个幽灵！封底的介绍也还公允。说这里收的是《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全文，这部著作蕴藏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基本原理，说它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有过深刻的影响。

我还发现这套书收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莫尔的《乌托邦》，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里盖的《人类起源》，和荷伯斯曼的《法国革命》……文学作品就更多，不必一一列举了。

对于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任何社会都应当能够宽宏大度对待，资产者有这样的风度，无产者更应该有这样的风度。你说是吗？

《回忆与怀念》

伍修权将军的《回忆与怀念》，大部分篇幅记录了这位将军在外交战线上的见闻和观感，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忠实记录。叙述朴素，读来很感亲切。

书中记述了将军作为第一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时，对铁托周围有争议的风云人物的印象——尽管是个人印象，但这是近距离观察所得的，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笔下的铁托与我在欧洲听到的不全对得上，可是我很大程度上相信将军的记述。

据这书所写，当时即50年代中，铁托在国内的威信很高。“但是在我国常见的那一套搞法却很少见。”他的称呼就是“铁托同志”，在必要的场合是“铁托总统”；没有什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之类的头衔，也不叫“万岁万万岁”。也不是到处挂他的画像。他的意见和讲话，也不叫“指示”，只说是建议或倡议。开大会时，不是他作报告，他就不坐在主席台上，同普通人一样坐在台下听。有时在广场上开大会，他就同群众一样，坐在下面。他只抓全局的方针政策，具体问题由主管的部门去做，“铁托比较注意发扬民主和实行集体领导，自己该休息就休息，反而轻松自在。所以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康。”

据作者说，铁托的思想相当活跃，而且他的思想也体现在党和国家的制度和政策上。“他认为党的作用应当是领导，而不能是统治。党只管确定方针和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干涉行政事务。”

说得多有启发！领导不是统治。领导同统治不是同义语。恰恰在这最关键的一点上，有许多时候，在许多地方，两者都给混合了。

但铁托领导下（不是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却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他去世后，这个国家就在一种国际性的大潮流中，分崩离析了。为什么？书里自然没有解答，只好留给读者去思考了。

《庐山会议实录》

这是一本惊心动魄的书。增订本收录了一些平常不易见到真正文本的讲话和发言纪要，如果不说更加惊心动魄的话，至少可以说增加了某些动人情节的份量。作者李锐，在当时——庐山会议的当时——是一个特殊人物：他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不过是被欣赏的“特约”秘书，一个秀才，一个在庐山会议这样的“机制”中微不足道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在山中，又不在山中，也许这样的身份，更便于他日后看事物看得更清楚些，或者说，更客观些，更接近实际些。

所有的文字记录，都表明庐山会议是一场社会性的悲剧。三十几年以后，回头一看，更加看到它的悲剧性。彭黄张周，这四个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反党集团”头目，都作了日后他们自己和旁人认为的“违心”检查，自己上纲上线，自己把自己臭骂一通，骂得连自己都不相信，而听众怎么能相信呢？难道都发了疯？一个人说违心的话可以理解，几个人都说同样违心的话，已经不大能理解了；而整个会议，上上下下，明白的不明白的，老的少的，少数几个有野心的以及绝大多数没有野心的，都一窝蜂说着同样的分明违心的话，而又大家都认为是发自肺腑之言，不要说后人，就是我们在山外经历了这场斗争的同时代人，几乎也不能理解。所以称之为社会性的悲剧吧。“要向世界宣战！”这是庐山会议结束当日发出的最强音。宣什么战？为何宣战？难道当时的人们都知道答案吗？不不。这使人想起了伟大的文学家西万提斯和安徒生来——他们笔下的典型人物：向风车开战的唐·吉诃德和穿了“新衣”的皇帝，不是在嘲笑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勇士们么？

书中记述了若干善良的与会者（即不是那些怀着野心的伪君子）的发言，乃至在庐山会议末期大唱要树立领袖的个人权威的发言者，都逃不脱仅仅七年后那场“浩劫”的磨难。这是为什么？

作者在 334 页即临近结尾时的一段话发人深省：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 1959 年至 1961 年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英雄形象的“纯洁性”

保尔·柯察金是世界闻名的英雄形象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知教育了多少英雄儿女。近年彼邦的出版社，翻查了往年的书稿档案，找出当年印本删去的或改过的字句段落，作为附注印在新版的小说中，也有几处明显的笔误或疏漏，则在正文中改正了。这种处理是可以接受的。如同原文集编者所说，“在作者去世之后，随意改动正文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梅益同志的译本新版，也补译了附注，这使我们读者有机会读到被删节的字句。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当年编辑部有好些改动是为了保护英雄的“纯洁性”，特别是描写爱情和政治上的动摇的字句。有时连作者自己已经写得够纯洁（但那是经过抵挡了“诱惑”而得到的）的段落也删去了，真不可解。当保尔对新经济政策不理解而大发其无产阶级理论的那一大段，当然不能让它存在。难道能让保尔说这样的话么：

我弄不懂那些高深的理论，我只晓得一点：新经济政策是对我们事业的背叛。我们为之奋斗的并不是这个，我们工人不答应，我们要对这种做法全力进行斗争。至于你们，既然甘愿充当资产阶级走狗，悉听尊便。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的英雄说出口么？一千个不，一万个不！（这也是一种“英雄”的语言！）当年的编辑部删去这些话，真是天经地义。

我们太理解了；因为我们都走过同样的历程。说好则一切皆好，说坏则一切皆坏。没有折中的路可走。到了“顶峰”就是四人帮那一套“三突出”。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公开了一些从未为人知的档案材料，揭示了这个大学者最后二十年的生活和心境，当然也同时暴露了那个悲剧性的时代。应当说，这是一部可读的书；而且是对近年来东抄西袭地滥写人物的当头一棒。这部书最大的优点是它发掘了历史材料——没有真实的原始材料，是写不出真正的人物志来的。

如果书中没有充塞着过多的廉价感叹，那该多好啊。一切廉价的感情都是不需要的，都是苍白无力的；读者会从引用的材料和朴素的叙述和分析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才是坚实的，深刻的，达到著书人目的的结论。一切廉价的感叹，褒贬，都是多余的。

试举一例。书中揭露三年困难时期这位老学者受到照顾，只因为一个管事务的同志多说了一句话，引起老学者的不快，由此拒绝接受照顾而引起一场风波：沾染着“左”的情绪的管理者们，爆发了一场痛骂此老的闹剧。“陈寅恪有什么了不起？他能生产出一亿斤粮食来给他什么都可以。”多么无知，多么刻毒，多么“左”啊，而这就够了。多说一个字都不必要。作者发了一段议论：

矛盾的焦点就在这里，人们无法理解，对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为何要有这样的特殊照顾！

也许这已经多余了。可是，接下去又是一段独白：

质朴的人们似乎没有错，一个什么也不能生产的“包袱”，最好的命运应该是处理出去而不是特殊照顾。在那个文化遭践踏的年代，人们有这样的气愤丝毫也不奇怪。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当年的知情者已不愿详谈那场据说是很激烈的讨论会。

可惜这样还不够。接下去又是一段抒述这位老而迂的大学者的心情和以后的行动。

再举一例。

有一阵“整风”，纠正“左”的做法；于是组织中某些“左”公作了检查。事实叙述得够明白了。可惜又是一段廉价的叹息：

历史留下的就是这样触目惊心的文字。没有看过一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人，却在局部范围内领导了一系列打着马列旗号，视马列片言只语为紧箍咒的政治运动。相形之下，四十多年前已在欧洲看过马克思《资本论》原版著作的陈寅恪，显得很可怜。当然，这同样是中国历史的可怜。

够了？还不够。接着又是一段独白：

无知者很多时候不必等到吞吃恶果的那一天，而在当时就要付出人生代价。

难道还不能说明，很多时候，一段真实的材料，往往比段廉价的议论或赞叹更能打动人么？

独立与自由

1929年，陈寅恪为清华大学立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写的碑铭中有这样的几句：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后约三十年，作者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中云：

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由此可知，陈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三十年不变。

民族不独立，无从讲自由；民族独立之后，没有思想自由，则无从发展。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书无全书，人无全人

……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这是鲁迅六十多年前写下的话。

过不多久，林语堂声言“一部论语治天下”；说说而已，谁也不会相信。大约连他自己也不相信。

十年大灾难期间，说是拥有一部红宝书，就无敌于天下。读书的人不信，不读的人有信的，也有不信的。那时节，书店里什么书也没有了，只剩下一部红宝书，后来也许觉得太寂寞，加上几部样板戏。

不是绝无，而是仅有。天下太平了？大治了？怕未必，只不过暗潮看不见罢了。

于是又有读书读得愈多，人就愈蠢之说。这句话可能在某种场合是对的，例如读书读到迂夫子的程度，人可能就变蠢了。但不幸这句名言又被利用来证明只要一部红宝书就威力无穷一说。

书这东西也真可怜。有时被说成无用，有时又被证明只需一部书，天下就得救了。

由是又产生了书籍恐惧症：这是一种传染病。一部论语治天下既然不可能，一部红宝书也证明并非万能，那么，难道一部书就能搞得天下大乱么？

读书人都会记得，十几年前，“读书无禁区”吹皱了一池春水：原来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禁区。

别怕书。书不是妖怪。书也非上帝。书就是书。你爱它，它就给你所要的养料，也许还带一点杂质，甚至微量毒素。你有抵抗力么？

山水·人物·思想

客问：给普通人看的地理书，怎样才能受读者欢迎？

答曰：山水，人物，思想。

客不解。

开释：山水就是地形地貌，讲地理环境；凡是一山一水，一城一镇，无不关系到或牵涉到人，名人或普通人，这就是人物，讲山水而不讲人物，哪能讲得活？怎样讲，这就是思想——没有思想（比方说，爱国主义思想，国际主义思想），则山水人物都是僵化的概念，谁愿意读？更不必说爱读了。

我劝客人重读鲁迅翻译的《思想·山水·人物》，日本人作的小品文集。这时，客人才知道我脱口而出的“山水，人物，思想”是脱胎于这部书名。我说，我故意要把“思想”一词调到末位，是想说明不要主观事先设定一些框框，然后将山水人物套上去；必须先有山水和人物，然后才产生思想。

不过，我说，我一直喜欢这部随笔集，虽则我不大了解原作者鹤见祐辅是什么人，更不知他代表着哪种倾向。只知道鲁迅翁说此人的专业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但书中颇多精辟的论断。

音乐沙皇

三月里看到《纽约时报》的报导，说那个叫做赫连尼科夫的作曲家还健在，而且恬不知耻地大谈他自己在前苏联时期——更准确地说，是在斯大林时期——“是清白的”。

我记得此人。我不会忘记此人。40年代此人红得发紫。尤其在卫国战争后期和以后，他是当时苏联音乐家协会主席，《苏维埃音乐》杂志主编，作过不少音乐作品，从小歌曲到大歌剧，从弦乐曲到交响曲，充塞于市。说实在的，这些东西只能说充塞于市，却没有人喜欢，没有人欣赏。但他有权。他是“音乐官”。他对音乐界操生杀予夺之权。他是意识形态沙皇日丹诺夫的应声虫。不止应声虫，不不，他是日丹诺夫在音乐领域的执行官，说得刻毒点，是日丹诺夫的“杀手”。《纽约时报》说得够损人的，它说，“虽然他谱写的作品成百上千，形式也多种多样”，“但是赫连尼科夫更有可能以1948年他发表的那篇著名讲话而留名青史。”

在那篇著名的讲话中，他祭起日丹诺夫的暴君符咒“形式主义”，将当时乐坛的明星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狠狠地击倒在地，几乎还要踏上一只脚。但他没有成功。这两个真正的大音乐家在几次猛遭打击之后，却都翻了身，他们的作品在其后以及身后受世人的喜爱。

时代前进了。世界变了。我不怀疑好些人们在往日的气氛中和往日的淫威下，说过言不由衷的话，甚至做过压制同僚的工具。可怜的是，这位叫做赫连尼科夫的音乐官，却不去反思。他认为他自己是清白的，没有压制过别人。他说他尽他所能帮助他的同行们摆脱高压，因此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忘记了过去，但是人们却没有忘记过去。他说他现在“终于达到了绝对的自由”了。他当然达到了自由，他从来没有过不自由的日子。于是，近期他由美国一家跨国公司的资助，在克里姆林宫剧院上演了他的新芭蕾舞剧《拿破仑·波拿巴》。

上帝保佑这位过去的音乐官心里能够平衡！

我爱林则徐

我爱林则徐。

他是近代史上面对强敌而毫无惧色的知识分子。

他敢于同入侵者斗——而不是热衷于跟自己营垒里的同僚斗。

他对于他所不熟悉的敌人展开调查研究，深刻的持久的调查研究。他不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

我写过一篇《林则徐译书》，说的就是调查研究的事。

他得罪了皇帝，他不会看皇帝的脸色行事。——皇帝是“春天”，是“后母”，俗语说，“春天后母面，一日三时变”。皇帝让他去收拾“夷人”，他去了，好好地整治了一番。皇帝却变了，说变就变，皇帝听从投降派的意见，嫌他整治夷人，将他流放到新疆。

他去了。他人还在，心不死。那时没有五七干校，也许林则徐过的日子比五七干校好些，也许坏些。他还是忧国忧民。知识分子就是这副德性。几乎是不可改悔。因为他自以为没有错，自以为他整治夷人的举措没有错。

不过那时他有点悲观。他抚摸着杀敌的长剑，感叹自己的命运不佳，壮志未酬，却已无可作为，只好将“荏苒余生付逝川”了。

后来皇帝恕免了他——不过皇帝治下没有平反冤假错案一说，只是委派他去平乱，他去了，以后就不必说了。

林则徐壮年时有两句诗是很豪迈的：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也许这个老人以为让他去平乱也是有利于国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旧时的知识分子）有时是很糊涂的，他常常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他没有意识到所谓平乱是教他去杀老百姓，他做的是不利于国家的事，倒以为是尽了“忠”。

悲剧就在于此。

林的可爱也部分地在此。

汤因比眼中的文明和现实社会

我注意汤因比，不是由于他那部辉煌的历史学著作十卷本《历史研究》，而是因为惊讶于这位历史学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进入皇家（即英国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为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如果人们知道他是教古希腊史出身的，那就更加迷惑了。但凡研究国际问题有重大成就的，不是那些满足于能够归纳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学人——也许这中间不乏著名的新闻记者；或者换句话说，这些学者会成为显赫一时的新闻分析家。而只有对人类社会观察或研究得更深入（比方说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学人，才能“洞察一切”，预示事态的未来发展，这发展，可能经过若干年，甚至经过一个或两个世代才实现。历史学家进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是一条会取得战略性成果的路。

多少年来左派评论家抨击汤因比的历史观，集中在一点上，即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过程，不外是各种各色的文明生成，兴旺，衰亡过程的具体表现。而左派，不论在哪一种左派，都认为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和政治的作用。汤因比不吃这一套。他认为那样的历史研究是一种错误。他强调不把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单位来考察。他考察的出发点是文化，或文化圈。他心目中认为对社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学家所确认的二十一种文化，加上五个文化“化石”或“石化”了的文化。他在战后主编的《欧洲的重组》（1939—1946）是以他的文明决定论的观点编成的——说者谓这部书所预言的许多热点或困扰点，在其后的几十年间竟一一变成现实，例如波罗的海三国，南斯拉夫的分崩，等等。可见他的观点有其合理的地方。

别的不说，例如民族问题就是最困扰现今社会进程的问题之一。而民族问题包括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习惯，民族文化传统……等等，都不可能不影响到国家的政策，甚至会引发种种动乱或不安。人们在分析战后的发展过程时，过分强调了经济和政治因素而忽略了文明的文化的民族的传统因素（例如我在战后研究国际问题时写的两部书《变革中的东方》和《世界政治经济地理》，1947），就只见当前，不见过去与未来，陷入很大的片面性。我想起一句名言，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即阶级斗争问题。也许是。但说不到“底”的时候，民族问题往往不完全是阶级斗争问题。把一切的一切都还原或归结为阶级斗争，未免把社会活动简单化了。社会进展或发展的过程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不能说只是阶级斗争决定一切。现今的国际现象和国际争端不能不注视民族的因素。

从茵梦湖到莫愁湖

德国小说家施笃谟的小说《茵梦湖》，解放前有四个译本，每个译本的印次都不少，累计印数恐怕比它在本国也不相上下。最早的一本是郭沫若译的，1921年初版，取名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茵梦湖》，初由泰东图书局初版，后来创造社出版部、光华书局、大新书局、群益出版社、群海社都印过。其后，有唐性天译本，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取名《意门湖》；开明书店1927年出了朱契译本，名为《漪溟湖》；施瑛译本《茵梦湖》，则是1936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

茵梦，意门，漪溟，都是音译。我喜欢“茵梦”这两个汉字的组合，有点罗曼蒂克味道，而原作者也是浪漫派作家。这两个汉字引发某些联想，虽则这两个汉字合成一个词，并没有神秘意思，但从字面上却诱导读者去想什么。汉字的“特异功能”就在于此。

重读郭老译本时，却收到朋友来信，信封上写着“寄自莫愁湖”。不是茵梦湖，而是莫愁湖。茵梦无解，莫愁却有解。

好一个莫愁湖！我去过，去时年青，只觉得世间万物都在滋长，心中充满阳光，确实没带着什么愁；应当说，到了莫愁湖，有愁也变得没愁了才是。

莫愁湖，莫愁湖，世间多少个美丽的湖名，也比不上莫愁。哪一个湖比得上莫愁湖那么潇洒，那么豁达，那么开朗，真那么傲然，视一切艰难痛苦为无物。命运？命运怎么样？不被命运压倒，不向命运低头，何愁之有？

然而能不愁吗？大而至国事天下事，小则生老病死，哪一件事不令你犯愁？

人若能不向命运低头，大约就可以不愁了罢。

《杨绛散文》

出版者介绍说，这部书包容了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散文创作的基本面貌”，一点也不错。散文写得如此平淡，如此隽永，还带着几分幽默，却不知不觉道出了使人掩卷沉思的哲理。作者笔下的人物，个个都是活生生的，太可爱了。写她的父亲（杨荫杭），一个正直的学人，一个爱国的士绅，多么可爱可亲的一个老头啊！写她的才华横溢而又过早离开这个世界的妹妹（杨必），读的不能不唏嘘者再。写她那“有名的”姑母（杨荫榆），有点顽固，却那么顽强，在日寇侵占苏州时“骂敌遇害”，令人起敬。至于写她的亲人钱钟书与《围城》的文章，则尽人皆知，无需多说了。

尤其使人动情的，我以为是写“文化大革命”的几篇；比如《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确确实实是那个疯狂年代的最好的证言。更加难得的是，这场世纪的悲剧或世纪的闹剧，在作者的笔下，显得那么逼真，虽则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却一点也没有哀怨，更没有绝望，深刻地揭露了历史的本质，揭示了历史的规律。不是逻辑的说理，而是形象的描绘。值得所有同时代人和青年一代甚至未来世纪的年轻娃娃读几遍。历史是不能遗忘的，是不应忘记的。谢谢作者了。

“傲慢与偏见”——读报有感

《音乐周报》今年第十二期报导说，某旅居海外的华人小提琴家在北京音乐厅某一场演奏时，几次“失手”，令听众“惊叹”不已。

报纸说，这位演奏家

——“两次出场时均因忘带当垫肩用的白巾而重返后台取之”；

——“演出中间边拉琴边朝台下说：‘请安静一点！’”

——“两次演返场曲目时在同一个地方中断，随即向观众表示：‘不演了，就这样了。’”

——“最后一次返场曲目演奏结束时，手中弓子不慎脱离于地。”

以上云云，多次作了非音乐表演，真可谓盛况空前。遗憾得很，未能躬逢其盛。如果传媒说的是真的，我只想哭。

京城另有传媒说，北京音乐厅因为听众有意见，故从给这位“玩”音乐的名家数以万计的酬金中扣去五百元（区区五百元！），名家对记者表示不愉快。

又有传媒说，好些个京都著名音乐家盛赞这场演技之好，认为所有“失误”都是小节，不必计较；唯有表演之精美，可以盖过一切。

对这些报导，我也无从一一查证，如果是真的，我还是想哭。

我以为这些都不是什么演奏失误——奏错了一个音符或半个音符，甚至脱漏了一个或半个小节，那叫做失误，当然可以原谅。但是，作为一个观众，我如果遇到这些现象，心里只觉得气闷，好像被人愚弄了一番。这是演艺者对观众尊严的侮辱，是对观众感情的伤害。

我只能想起英国有一部小说，书名叫《傲慢与偏见》——不是想它的内容，是想起书名那两个语词：傲慢，偏见！

一切解释，推理，宽容，厚爱，……通通都是多余的。我记住这位天才演奏家的名字，我发誓不去受那傲慢与偏见的折磨。

尼采：法西斯哲学家乎？

二战后读书界有一个时期对尼采不太“感冒”。有人说，尼采是法西斯哲学家；说纳粹奉尼采为他们的智慧之神。后来又有人反驳说，尼采不但不是他们的神，而且早就看不起像纳粹那样的东西。但是，例如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连尼采的书都难以看得懂，所以不能加以判断；于是按照过去几十年的“处世哲学”，宁愿信其为一种异类，说不得，看不得。

近日忽然买得尼采的一部笔记《哲学与真理》——当然还是大部分看不懂，可是偶然在《艰难时代的哲学》一篇中的第46节，发现了奥秘（对我来说是奥秘，对别的饱学之士来说，可能是常识了），大喜。

尼采说：

在国家中，个人的幸福被置于普遍的幸福之下，这意味着什么？

不是少数人的幸福服从多数人的幸福，而是个人服从最高个人的幸福，服从最高典型的幸福。最高个人是创造性的人，他们或者道德上是最好的，或者在某些更大的意义上是有用的。因此，他们是最纯粹的典范和人类的改进者。

哎哟，这不就是希特勒之徒的法西斯言论吗？——服从一个人，最高一个人，尼采还在上面一句中的“最高个人”一语下加了重点符号。而主观“领袖”又是类似超人的人，最纯粹的人，最典型的人，道德最高的人，也是“有创造性”的人。

我以为解决了我的难题；但读下去，却又有新发现。且听尼采说：

……只是他们（芸芸众生——引用者）常常看不出谁是真正的最高个人，……：往往是征服者、帝王等等被当作最高个人，如果维护国家存在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让伟大的个人在其中生活，那么就会产生可悲的恐怖国家，产生最有力的个人取代最优秀的个人的海盗国家。

尼采在“最有力的”和“最优秀的”人那里也加了重点符号，仿佛他预先见到后人的评说，表明这个哲学家不是纳粹党徒那一类。

因此，在讨论哲学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时，可要慎重呵。

简洁不易

尼采说，

“简洁地写作”。

或者这句话可以了解为：写作要简洁。

这也许是中外文的结构不同，通常我们说话不那么用副词。

他又引用一个艺术史家的话说：写得简洁不易，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请看他怎样理解简洁：

“不多愁善感”。文章全是廉价的感叹符号或自我怨艾的调料，绝对不能打动人。

“几乎没有句号。没有疑问名。很少形象。一切都非常简练。平静。没有反语。不用渐进法。强调逻辑原理，但非常简洁。”

这几句话是典型的尼采语言。也许过于简洁了。

他是不是说，要说明一个真理，非得不动感情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多用一个标点，不多说一句废话？

尼采写得太简洁，句句话都成了警句，而警句常常是说了一半，另外一半要读者你自己去说；所以不好懂。例如他好些地方说到哲学家是医生，是文化医生，可读者很不容易理解哲学家为什么是一个医生，是怎样的一个医生。

但时下的弊病却是太不简洁，有用的信息淹没在拖泥带水的混合物里了。

专门和专门以外

七十二年前，即 1924 年，作家鹤见祐辅在他的《思想·山水·人物》的序言中，写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

然而也有纵使一生用力，终于不能将真的事业，作为自己的职业的人。不，这样的人倒是多的。……于是人们便开始了专门以外的工作。

在确当的意义上说，则唯这专门以外的工作，却正是他的真专门。是他受之于天的天职。

他接着说：

所以古来的大事业，大抵是成于并非所谓的专门家之手的。在现今似的社会制度之下，那是不得已的事。

作者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本国——日本——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军国主义的日本还未进入发达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所以有如上的立论。这立论恰恰此时我们觉得很面熟了。

古往今来的许多专门家的遭遇，也为这论点提供了证据。

恩格斯描绘的共产主义世界，说，那时候，一个人早上绘画，中午做工，晚上弹琴，随心所欲，没有所谓谋生的职业和钟爱的事业之间的距离——人们梦想那个境界。有时甚至觉得那样的境界已经近在眼前了。但是这美梦很快被打破：现实还是现实。我怀疑一万年后的境界是否会到来。

生在现实社会的人，或者说，其中有着某种理想或兴趣或甚至专长的人，只好过着两重生活，无需自怨自艾的。因为这是人间！

《卡夫卡随笔》

《卡夫卡随笔》中译本几年间印了三版，销了近两万册。在所谓“严肃”作品销售不佳的那几年，这本小书竟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稍稍有点出人意外。正如这位作者，二战后最初几年，在西方世界忽然走红，很多文学读本选本都没有放过他。那时也稍稍出人意外。

卡夫卡是一个短命的奥地利作家，他只活了四十一年。人说这是天才。他的同国人，音乐家苏伯特也是短命的，只活到三十一岁，却留下了那么多的迷人的歌曲。难道真的天才都是短命的吗？苏伯特逝于十九世纪初（1828年），卡夫卡歿于本世纪初（1924年），相距约一百年。一翻阅卡夫卡的随笔，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苏伯特。一样的迷人，不过一个是用文字，一个是用音符。

卡夫卡从不满意他自己的作品；他在遗言里嘱咐他的好朋友布洛德把他手稿以及出版过的书，“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作家布洛德没有按照他的挚友的意愿去做，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他亡友的书稿整理问世，这样后人才有机会读到他的全部作品。人们说，卡夫卡的作品充满忧伤，悲郁，甚至绝望（我想，是否还得加上一点“神秘”？）；但有些批评家说，卡夫卡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就如同但丁、莎士比亚、哥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一样。这是说，他表现了一个时代，或者说，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两个世纪交叉的充满苦难和不平的时代。

这本随笔集也许能反映他的某些侧面。集子是由长长短短的散文，随感，寓言，小小说组成的；可以说是哲学的思考多于文学的描绘。也不全是难解的，比如这样的一段对话，颇引人入胜：

“你在那里会发现一些怪人！想想吧，他们从来不睡觉！”

“为什么不睡觉呢？”

“因为他们从来不疲倦。”

“为什么不疲倦呢？”

“因为他们是傻子。”

“傻子就不疲倦吗？”

“傻子怎么能疲倦呢！”

这段对话不是一篇寓言么？

书前有绿原的长序，书后有冬妮的译后记。版权页误为冬妮著。漓江出版社出版的。

《北京的魅力》

这是七十四年前日本作家鹤见祐辅写的一篇旅行记的题目；有鲁迅的译文，所以一翻就找着。重读了，觉得很有趣——因为作者笔下的“魅力”，好像已经消失了；然而这个古都却出现了不少新的魅力，可惜没有大作家留下一点痕迹。

那篇旅行记说，在古老的中国，只有在中国，动物和人在城市里是平起平坐的，他举的例子是驴子和骆驼。七十年前，驴子拖着长长的耳朵，慢条斯理地在长安街北京饭店门前悠然走过。这景象我没有机会见到过，我是解放初进入北京的，我的记忆里没有这种柔和的街景。骆驼却见过的，骆驼连同那铃声，叮叮当，叮叮当，把人带入一个远古的世界，一个神秘的世界，一个平和而又唤起冥思的情景。如今，通通没有了。代之以高层建筑，立交桥，难看的黄色的甲虫（面的）到处爬行着。有一阵狗和人在大街上并排地走着，现在狗被管制起来了，它们也在街景中消失了。

七十多年前作者描绘的四合院也几乎消失了，剩下的也多半变成大杂院，不那么可爱了——剩下来不多的有魅力的四合院，则是高不可攀的建筑物了。至于作者文章中描述的，离城三十里外便打起仗来的局面，当然也一去不复返了。内战——军阀混战和对苏区的“围剿”——消失了，新的魅力也随之而生成。

作者说，古老的文明的中国人有着非凡的魅力，那是生活美的魅力。他说，蒙古人征服了中国，却终于被汉人的生活的美所征服了；他说，满人也征服过中国，后来也被汉人的美所征服了。这种论调那时（本世纪初二三十年）很流行，但我以为对于文明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足以消磨民族壮志的歪理。

应当有人写一篇北京的新的魅力了；也就是文明民族在当今这个世界上的新的魅力。

立体派或点彩派汉语奇观

汉语可能有立体派或点彩派的写法么？

有的。请看：

“我想我们实在可以学学画家们尝试一些较新的形式及与众不同的色彩与形状譬如就拿毕加索秀拉或夏加尔先来试一试。”

五十一个字。

“毕加索那种立体主义风格我们倒是在阿保里奈尔的诗中见过了因为那些诗所呈现的图像面貌就是一种文字上的立体主义。”

五十二个字。

当然这也是一种风格，一种文风；不过你看起来不觉得太累么？

上面两个句子采自西西的《画/话本》里面的《实验》一文。就像立体派诗一样，立体派的文也算一种奇观。

西西是香港有名的女作家，很有才华的女作家。前几年她的小说《哀悼乳房》征服了众多的读者，其中一个是我。文章写得很美，没有芜词，很干净，没有某些女作家那种娇滴滴的风气。

她做了以上所说的实验；幸而只见这一次，否则读起来太费劲了。一面图，一面文字，这就是《画/话本》的格局，极逗人喜欢的。

《几度樱桃红》

报纸发表了一篇巴黎纪事，题目就是《几度樱桃红》，是目睹了巴黎市民纪念巴黎公社一百二十五周年的感言，沈大力先生写的。文章不长，却很有感染力。我被它拉到三十几年前那“火红的年月”。激动人心的，若有若无、若实若虚的“大跃进”后，我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得到了一本波兰人编的《巴黎公社》画册，篇幅不多，通俗版，给普通群众看的。我写过一篇短文，题为《三月十八日》，也发表在今天看到的这张报纸上。我写道：

“凡是手上有火药痕迹的人即被扼杀”。你看那幅画吧，反动派军队捉着一个老头子的手，在那里查验有没有火药的痕迹，一个小孩十分愤激而又无望地紧挨在那老人的身边。

二十年后，我到了巴黎，在巴黎公社墓前真的见到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我在一篇散文中写道：

一个工人装束的巴黎老人，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穿得很简朴的小男孩，在这碑前站立着。老人向孩子用手比划着，低声地在讲着什么：那孩子频频点头，时时低声地询问着，有时带着焦虑，有时带着悲愤的眼神。……此情此景，他只能讲公社。我找不见浮雕，却遇见了活的工人的巴黎，遇见了公社的子孙。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

去年，在上面提到过的同一张报纸上，又有一篇巴黎纪事，描绘了巴黎人怎样怀念去世九十周年的公社战士路易莎。巴黎人在这位女英雄墓前献了一束一束的红石竹花，献给公社墓前。他们高唱国际歌，在场的中国女子，应邀用汉语唱出了这首悲歌——“群情激昂，振臂和声。人们竞相挤将过去，拥抱这位中国女子。”一月份，巴黎举行巴黎公社电影周，放映了二十部以巴黎公社为题材的电影片。作者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这种热烈气氛表明，一又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巴黎公社要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秩序的理想，并未随时间泯灭，而恰在当今世界何去何从的形势下，愈显其自混沌谱中别开天地的动力。”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尽管我不很喜欢这个书名，坦率地说，甚至很不喜欢这个书名，可是我被书中丰富的材料所吸引，一口气读完全书。感谢作者（邹振还）花了多年的精力，查考了一百多年来的报刊，引证了许多学人的著述，写成这样一部著作，给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和涉猎者提供可靠的有关资料和线索。虽然它远不是一部现代中国翻译史，但在很大程度上给这门学科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不喜欢这书名。是由于它显得太商业化；取这样的—个书名，显然是学前几年美国流行的一部什么《影响世界的十四本书》——那是市场经济中出版商人的“噱头”，也许可以促使它多销几万册。不过说“十四本书”也许还能多少站得住：本数愈少愈能服人。比如说在基督世界中最有影响的一本书就是《圣经》；在穆斯林世界最有影响的一本书就是《可兰经》；在共产主义世界最有影响的一本书就是《资本论》；在疯狂的岁月里对中国最有影响的一本书，不能不是“小红书”，即《毛主席语录》。举出的书愈多，则愈不好定，也愈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所以，这部有重大资料价值的书，还不如取个朴素的书名，更切合实际。否则，例如书中第18种《造洋饭书》——介绍西餐做法的书——考证起来是很有趣的，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但人们很难想象此书对中国近代社会发生过什么重大影响。

翻阅完全书，发现一点“奥秘”。那就是一百部书中，有四十二本是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或印成单行本的；如果把最初的三十本（大抵出版于这个世纪以前）除外，则列举的七十本书中竟然有四十二本由这家出版社印行。这是现实。于此可见商务印书馆在我国近代文化发展中上所占的地位。

所列一百种，除了个别书外，都可以认为是对中国人有过影响的，这倒不错；当然可以举出不止一百本来。书中每篇都加了论断性的标题，有些标题不免落入俗套，有些标题是很朴素的（例如《赛珍珠“大地”的翻译及其引起的争议》）；多数标题带有倾向性，正是这倾向性大可商榷（例如《西行漫记》的标题是：《让世界发现中国和让中国发现自己》）。各篇都老老实实用原书名，让读者自己从介绍和论述中去得到自己的论断，岂不更好些？

读《三省堂自序》

近来文坛上隐隐约约有一种争论：有人说冯友兰投靠了“四人帮”，对于大学者，这是可耻的；有人说，不然，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风气下面，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学者，他没有办法不去屈从“党”的指示，更无法抗拒神化了的领袖的“最高指示”，这不叫投靠。

看来，我们的社会条件的确进了一大步，对于人和事都不是挥舞大棍，更不至于一棍子打死，大家可以实事求是地，平心静气地加以具体分析了。

至于这个关系到一个大学者的个人品格问题的具体问题，其实在这位大学者晚年写的《三省堂自序》中，已经把事情的本质说得够明白了；已经不是单纯的依附不依附的问题，是“诚”与“伪”的问题了。

作者写道：

我不知道，这是走群众路线，还是哗众取宠。这中间必定有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诚、伪之分。……我们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自己的见解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写。这就叫立其“诚”。……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藏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对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照上面说的，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难道还有比这更深刻的自我批评吗？

他自己已经给自己作了鉴定。

奇书摘句

《我的自白录》，副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一部奇书，奇在它以一个标题——仅仅一个标题，还没有写出一个字——就被“拍卖”，并且以一百零八万元成交。书居然写出来了，买了标题（当然也买到全书）的那位“大款”把出版权让给上海文艺出版社，于是，这部我称之为奇书的书，去年（1996）十月问世，头一版印四十六万册。奇不奇？不能不拍案惊奇！

这个当代中国的著名影星，写了一部自传式的奇书。世间自传都或真或假，真真假假，也许所写都是真的，也许不都是，读者不可也不必苛求。就作为小说来读，又有何不可？文笔很好，很流畅，很少拖泥带水，带一点幽默或甚至辛辣的讽刺，有些段落却写得十分激动人心。难得一个不是以写作为职业的写手能有这样的文笔。或曰，是别人写的；或曰，是经过别人修改的。这些都无关重要。她为什么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她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她又为什么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问题一大堆都是多余的：有书便读，读就是。

书中有一段写巴黎剧场里观众对艺术家如何尊重，尽管演出者水平不太高，但是观众既然到场了，则无不热诚地对待。“每当我不由自主打个哈欠便有人怒目相向，凡是我们的交头接耳哪怕是说一句话，旁边总有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嘘——！’演出完全场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谢幕十三次！”

是这样。一点没有夸张。这是对人的起码的尊重。这就是文明，这就是文化。

书中写到她与香港或内地某些个记者争吵时抒发的一段话，也是极有兴趣的。她写道：

国家是我妈。她打我可以，你打她就不行。她打我打得再狠，我最多发几句牢骚或是东躲西藏，你要打她我就会跳起来打你，打你个狗血喷头，体无完肤。

460页又云：

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祖国对我来说不是陈国军（正在与她闹离婚——引用者），不是四川那位记者，不是青岛税务局的张处长，而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一亿人民，是我的父母、外婆，是我的家。

说得是，说得好。但愿人人如此。

《连城诀》

三十多年前，查大侠（金庸）写了一部《连城诀》，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武侠小说，读罢寻思，心中泛出了一个一个为追寻和争夺一部“连城诀”而互相厮杀的师傅、徒弟、徒孙的钩心斗角形象，同时也不得不引发无限的沉思。

大侠们争夺的“连城诀”，表面上说是争夺一部剑谱——侠客追寻剑谱，天经地义，无可非议。但是这东西其实不是什么剑谱，而是藏宝图，或曰宝藏图。一千人等日思夜梦的不是要修炼剑术，却是想发财。一旦找到这名义上是剑谱实际上是藏宝图的东西，登时变了百万富翁。古往今来的凡人（侠客也不例外），有谁不想钱呢？

为了这“连城诀”，三个徒弟杀了师傅；然后三个徒弟谁都不想别人分享将要得到的神秘的发财指南，于是互相斗个你死我活，没一天停息过，正所谓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谁也不让谁，谁也不跟谁“结盟”。每个徒弟教徒孙时，都留一手绝技，生怕徒弟的徒弟造自己的反。你斗我，我斗你，没完没了，直到全书结束。至于斗争方式，则应有尽有，真刀真枪，你来我往，杀得个痛快，热闹，淋漓尽致！

原来侠士们也争宝藏！——原先我天真地认为侠士们都长得有一身侠骨，其实不然，侠士们也显然受到凡人世界的污染。

书成于公元一九六三年——那一年，凡人世界也是斗得厉害，不亚于书中的侠客们。全世界范围内战士们掀起了“反修”斗争，好多个党发生了分裂，分裂出来的战士们往往指斥原来的群体为“修了”，他们义正词严地为“真理”而斗争，也是斗得你死我活，好不热闹！这是那几年的历史。现实历史与侠客世界无关，自然更与《连城诀》这部武侠小说无关；不过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所以顺便提一提。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一篇没有起头没有结尾的读书随想录

(1)人是一根苇草。

人是什么？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再脆弱不过了。不需要费很大的劲，随便一点什么就可以把他摧毁。不过，人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由于有了思想，人就好比摧毁他的任何东西甚至整个宇宙都高贵得多；因此，人就能吞掉一个宇宙。

这是十七世纪的巨人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3）在他的遗作《思想录》中所揭出的一个命题。原文是：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备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347页）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348页）有了思想，便有了一切，有了整个宇宙。人的尊严就在于此。

(2)“没有脑底美的脸算什么呀”？

30年代初在知识界中流行的一句话（是从那时的翻译书上摘出来的话）：“没有脑底美的脸算什么呀！”（那时人们习惯套用西方语法造出一个“底”字表领有格，的一底一地，分别表语法上的三种不同属性。）这句话意思是说，一张美丽的脸孔，如果没有大脑，没有大脑在思维——即没有思想，算哪一号人呀？

然而现实生活中却长期存在许许多多“没有脑底美的（或丑的）脸”——芸芸众生都没有“脑”，即没有思想。不，不是没有思想；准确地说，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一群木偶人。在神权时代，以神的思想为自己唯一的思想。若果不以神的思想作为唯一的思想，那就是异端；异端要被烧死的。在有皇帝的时代，皇上的思想，或皇上宠臣的思想，就成为芸芸众生的思想——换句话说，子民不必用脑子去想，他只需把头儿的思想拿来就行。简单，方便，实惠。随处尽是“没有脑底美的（或丑的）脸”。于是真的变成一大堆苇草了！

我曾经是这样一根没有思想的苇草；不，更准确地说，我曾经是一根以神的思想为思想的苇草，一根可怜的脆弱的苇草。（3）一句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

几十年来，我们喜欢引用马克思一句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思想。”据说这句话译得不够妥贴。

其实就算翻译得非常妥贴了，马克思的文章有时也有许多不好懂的地方。这是因为，一来时代远了；二来东西方思维方法不一样；三来他受旧时代德国文风的影响，有点晦涩。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能怪译者，更不能怪自己。比如上引的话，什么叫做一个阶级的思想？是一个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

还是别的什么？三几句话说不清楚；你以为说清楚了，而听的人还觉得不甚了了。可悲的是，长时期我们习惯于不思想；嘴上说，凡事多用脑子去想一想。实际上如果真地去想，糟了，惹麻烦了——不思想，倒平安无事。

不思想，倒有尊严；去思想，失去尊严。这是时代的逆流吗？

(4)但丁

有趣的是，比帕斯卡尔早多少年的但丁，在他生前没有出版的著作《俗语论》中，也表达了关于人贵在能思想的类似论点。不过，他的表述是从语言出发的。

但丁说——不是原话，是我按照但丁的意思引申出来的——：天使不用语言，天使无须用语言来表达他所想或所作的一切，因为天使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甚至无所不能，根本不必思想。

但丁又说，禽兽也没有语言，因为禽兽无须表达思想；禽兽只有本能，它根本没有思想。

于是但丁说，唯有人，才有语言，因为只有人才有思想，所以人要用语言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

那么，照但丁的说法，不思想的人就无须语言。可也是，不思想的人只不过是一只“能言鸟”，它只会重复有思想的人的话语。

(5)木偶葛佩利雅

忽然想到那个著名的芭蕾舞剧《葛佩利雅》。这是现代意义的芭蕾舞剧的最初一个，或者至少是第一批中的著名的一个。木偶葛佩利雅，一个美丽的姑娘，被施了魔法，变成会恋爱的少女了；这就是说，她有了思想了，她变成“人”了，这样她才能去爱恋。

没有思想，就没有爱。没有爱，这人间会变成什么样呀？

(6)《思想录》：书和人

西方人称十七世纪是“天才的世纪”。

帕斯卡尔则是这个世纪的“巨人”。他留给后世的残稿——《思想录》，直到十年前才有了完整的中译本（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一九八六）。

那一年夏秋之交，一个学人在我家作客，我们一起倾听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说，听，听那揪人心弦的几响特强 sfz 音，这是俄罗斯思想的火花呀！我记得清清楚楚，“揪人心弦”这四个单字是从他的嘴里一个一个字跳出来的。我把刚印出的一册《思想录》全译本送给他，我说，瞧，这里面也出现有不少特强音，真够得上叫做思想的火花。

这位学人太高兴了，他说他多年来一直十分喜爱这部书。我知道这位智者那时正热衷于研究宗教，研究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与文明，这册书无疑“击中”了他。

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这学人身处异国，不知他身边是否带着这册书？……唉唉，我的笔走到哪里去了？还是讲帕斯卡尔吧……

《思想录》（Les Pensées），这“思想”一词，在原文用的是复数。抽象名词也能用复数么？这是一个可笑的语法问题，迹近迂腐。思想，思想，思想难道不能有复数？我们习惯于迂腐的头脑，乍一看去，连书名也觉得有点别扭。日本有译做《冥想录》的（据铃木信太郎），倒也有创见，因为原书的全名为《关于宗教及其他若干主题的随想录》（Les Pensées sur la religion et sur quelques autres sujets），既然有关宗教，“冥想”这

个语词就比较确切了。

我发觉我刚才写了“随想”两字。那是一种时兴的表达法。总而言之：思想，冥想，随想，断想……所有这些语词，在这里（在这特定的语境里）全表达差不多同一个意思，语言这个东西有时真“反斗”（粤语），即真淘气，真调皮。

说者谓帕斯卡尔用的“思想”一词，相当于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那个“思”。笛卡儿说过，“我所谓的思想，是指我们意识到在自己心中活动着的全部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仅是理智，意志，想象；而且还有感情，在这里和思想是同一回事。”

思想，不但是理智，意志，想象，还是感情！怪么？不。没有感情，葛佩利雅哪能恋爱？

(7)未完成的杰作

《思想录》以书的形式初次印行，是在1670年——离开作者逝世已八年，不消说不是作者自己命名的。作者是否说过或写过要用这个名字来出书，我没有去考证。一般说法是，帕斯卡尔从三十三岁起（1656年）若干年间，甚至一直到他离开人世，用大张大张的纸记下近一千条长短不一的“断想”。后来他把这些记录文字裁成小纸条，分类排比，原打算编成一本书，据说取名《为基督宗教辩护》（L'apologie de la religion chretienne）；但四年之后书没有编成，他就辞世了。

他记录下来的这些断想，有时只一句话一行字，有时又长篇大论，俨然是整篇大文章，如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究竟作者想就这个样子问世呢，还是要把那些短句或断句敷衍成文呢，我们不得而知。传统的说法是，作者本人来不及把书稿完善就离开人世。但现今看到的断句，有些（不是全部）其实已经是完善的命题，不必写成长文就能表达作者的思想。我把这称为“思想的火花”。以前我曾把摘编（从作者的文章中摘取其中某些句子或段落）的名言称为“语言结晶”，也是与此相类似的意思。如果翻看当代大学者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这部书全由分段的“警句”所组成，也许上面提到的那种传统说法就会站不住。后人编成的《思想录》有种种版本，大致分为十四章，九百多条（条数各种版本不相同）。有些句子确实不好解，不好懂，甚至某些条条作者还未定稿。年轻时读英国“万人文库”的译本，苦极了，虽然据说这个译本真的颇有一些误译，但主要是我自己修养太差，知识和智慧都达不到读懂这部书的水平。现在人到黄昏，读到中文本，好像比年轻时懂得多了一点。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书中某些论点，它的深邃意义似乎有点体会了。

(8)比如说……

比如说，关于国王，权力，愚昧，聪明之类的命题，如果没有多年复杂的社会生活，是难于读通更难于接受的。帕斯卡尔说：“国王的权力是以理智并以人民的愚蠢为基础的，而尤其是以人民的愚蠢为基础。”（330页）作者论断说，这基础实在太脆弱了（为什么？这需要冥想或沉思！）。后人编书时加注说，请参看320页。320页这一条说：

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事，可以由于人们之不讲规矩而变成为最有道理的事。还有什么事能比选择一位王后的长子来治理国家更加没有道理的呢？我们是不会选择一个出身于最高门第的旅客来管理一条船的。（320页）

说得多明白；多轻松；多幽默……多刻毒呀！

不幸几个世纪以后，世人还热衷于这样的选择。

帕斯卡尔这句话：“尤其是以人民的愚蠢为基础”，使我们想起一句熟知的箴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唉唉，“不可使知之”！资本主义的兴起，摧毁了这种“基础”，振兴教育，开发民智——这八个字我们也听得耳朵起茧了，可是实行起来却仍然困难重重……莫非真有那么一种如帕斯卡尔说的国王哲学在作祟？然而到了当今的信息社会，“不可使知之”却也太困难了，有时适得其反。

又比如，帕斯卡尔有名的一组二律背反（见 230 页），其中第一款：

上帝存在是不可思议的，
上帝不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

试比较 60 页：

人没有上帝时的可悲，
人有了上帝时的幸福。

这 60 页当然不是二律背反。但是，这揭示出：非甲即乙，非乙即甲；不是朋友，即是敌人；不是革命，便是反革命……

诸如此类的命题曾经困扰过我们，而现实生活已经把这种非甲即乙的简单化论断摧毁了。还有大片的中间地带。

《思想录》是什么书？一言以蔽之，是一本启发思想的书。是让人找回自己思想的书。

(9)天才+狂人+疯子

仿佛法国一个哲人说过：帕斯卡尔固然是个天才，但他同时是个疯子或狂人。

也许天才与狂人只差一线——但这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只活到三十九岁的天才或狂人，一生被恶疾缠身，却给我们这个世界留下了那么多了不起的科学成就，这就够了。不论怎么说，帕斯卡尔总是一个非凡的人：非凡的毅力，非凡的勤奋，非凡的战斗精神——与病魔斗争，与经院宗教斗争，与墨守权威的传统陋习斗争！正如他说的：“我们今天对古人的崇拜……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竟致把古人的全部思想和神话当成了神谕，竟致敢于提出新的创见来就不能没有危险，竟致一个作家的条文就足以摧毁最坚强有力的依据。”（原文版注者说，这里“作家”一词指亚里士多德，当时经院派奉之为无上的权威云云。）

时在十七世纪，一个半瘫痪的青年学人，竟说出这样大逆不道、大言不惭、离经叛道的话来，可谓“狂妄”之至了——这使人想起了上面引用过的评语：天才或狂人；天才加疯子……

有趣的是，世俗的凡人却不管他是天才或是狂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巴黎一直把这个科学家或狂人的头像，印在公共汽车票上。那是纪念这个科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三十九岁），竟然为巴黎的公共交通（公共马车）作了科学的运行方案，这个方案通过试验得到成功，不但轰动了巴黎全城，还轰动了欧洲大陆——可惜我在战前没到过巴黎，没能拥有一张这样有趣而又富有启发意义的车票！

帕斯卡尔生于 1623，卒于 1663。他的短暂的充实的战斗的一生，还不到四十岁就结束了。父亲是一个官员，但同时是一个博学的学者，因此帕斯卡尔从小就在学术圈子里长大，幼年时就表现出对数学和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和

卓绝才能。十一岁完成一篇声学论文；十六岁写了著名的《圆锥曲线论》，以至笛卡儿武断地认为这是他父亲代笔的；十八岁开始设计数学计算机（这不能不说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二十五岁时成功地进行了气压实验（有人认为这是科学史上最动人心弦的实验！）；在这前后写成《真空论》——可惜原稿已佚，今只存序文——，宣称科学只能依靠实验和推理得到结论，一切权威都无济于事。此时青年帕斯卡尔因中风而半身不遂，但他仍战斗不息。三十一岁研究概率论（给科学家费玛写了三封著名的讨论概率论的信），成为近世概率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生活的最后十年左右时间内，他提出了多篇科学研究著作，使他成为近世流体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者。

千万不要忘记十七世纪的法国，宗教势力还是鼎盛时期。帕斯卡尔在紧张的科学研究的的同时，也虔诚地信仰宗教。他真正作哲学沉思和宗教沉思。他为他所信仰的教派的圣洁辩护。在这当中，名传千古的是他在三十三岁那一年开始，每隔一周或更长时间，用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前后一年余，共得十八封，后匿名（用俗人名义）以《给外省人的信》为题印行；因为他的教派（冉森派）受当权教派（耶稣会）的迫害，他不得不如此故弄玄虚，甚至在《思想录》中他也写上这样一条：

没有人会提到笛卡儿派，除非他本人就是笛卡儿派；

提到学究的，除非是学究；提到外省人的，除非是外省人；我敢打赌一定是出版商才给加上《给外省人的信》这个书名的。（52页）

他这十八封信，以辛辣的笔锋，尖锐地抨击耶稣会神父如何道德败坏，如何欺世盗名，如何依附权贵，如何操纵政治。一时间道貌岸然的耶稣会教士表里不一的丑闻，喧传社会各个角落。这十八封信不但是法国乃至欧洲宗教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是法国乃至欧洲前资本主义时代思想斗争史上的辉煌文献。后人或者说，《思想录》和《给外省人的信》这两部书，就是帕斯卡尔思想的代表作。

(10) 多余的话：超语言效应

《思想录》是由许许多多警句组成的，时人编名言集或警句集摘引帕斯卡尔的警句并没有很大的困难，也不容易导致片面的理解；要是从另一些作者的专书或文章来摘取警句，那就困难得多了。在特定条件下，把某个被万民尊敬甚至崇拜的作者的名言，摘编成书（用我们传统文化习用的说法就是“语录”），那就会发生人们预期不到的超语言效应。一本小小的红宝书，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确实起到过编书时估计不及的作用。

我们叫“红宝书”的《语录》，那时在外国叫“小红书”。——说起来也怪有趣，本世纪初，美国出版过一种叫做“小蓝书”（Little Blue Book）的，销路也不坏；出了好几千种，也是像小红书那样的小开本。不过小蓝书是资产阶级的，而小红书则是无产阶级的。我小时候读的是资产阶级学校，很喜欢这种薄薄的小蓝书：那是知识性的读物，一本小书讲一个人物，一种现象，一门技巧，一段历史……但它们不是名言，不是警句，不是摘录，只传播知识，因此从来没有超语言力量或效应。小红书却不同。不能说内容不好，也不能说编得不好，里面确实也闪烁着思想的火花，直到现在，思想的火花也还能激发人的精神。问题出自它的超语言效应，这在社会语言学上称为“语言拜物教”或者“语言灵物崇拜”，这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

恐怕世界上在短期内（充其量不过十年）印得最多的名言录，不能不数这本小红书了。印数究竟多少，无可统计；除了中文版本之外，还有各种文

字版本；除了正式出版社印行的以外，还有各个社会群体印行的；除了单纯收载语录的本子外，还有所谓二合一（加上“老三篇”，或“老五篇”，或诗词，或其他什么），三合一，四合一，五合一的本子；此外还有国外造反派印行的外文本……简直无法算清。

作为警句集的《语录》，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夜印行的；它本为并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只是在运动开始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像章的兴起，也就是随着个人崇拜的升级，这部红宝书才被赋予超语言的力量或超语言效应。

“语录随身带，随时学（用）起来！”人人手中挥舞红宝书，造反派如此，被斗争的“黑帮”或“三反分子”亦如此。上街不带红宝书，比现时不带身份证，情况严重得多。开会先念其中某一段或某几段；斗人也得选某段一齐朗诵，声音洪亮，气吞山河。打派仗也念红宝书，各派摘取其中对自己有利的段落，高声大吼，仿佛要靠这声音来压倒对方。遇事必先念有关的章节，然后才动手去做，即使救人救火那样的万急事物，也不例外。现在看起来，或者今天回想起来，真教人笑崩了牙齿！但那十年却没有人笑，因为没有人敢笑。1966年12月16日，发表了这部红宝书的《再版前言》，前言是林彪“写”的，预示这部小书顿时被提到一个十分独特的地位。不言而喻，超语言的力量或效应到达了当代历史从所未有的顶峰。

(11)一段插曲：真实的故事

十年前——那已经是那场浩劫之后的十年——我有机会访问意大利。到米兰时一位教授请我吃完晚饭，他建议走路送我回大学宾馆。已是夜深时分，路上行人稀少，教授忽然小声地对我说，十几年前，就是1968年夏天，我真不敢这时分走过这里。他不等我问原因，便继续告诉我说，那时意大利的红色旅发现到我这样的“老顽固”，必定高举小红书，口中念念有词，对我采取某种行动。——教授生活在西方，他不会说我们惯用的政治术语，诸如“斗争”呀，“斗倒”、“斗臭”呀之类。他着重地说，是你们那本小红书呀，你明白不？我欲说无言。但我得说，我明白。我太明白了。我尝过这部小红书的超语言效应。现在轮到我问他：超语言效应，你明白不？他点点头。他难道真明白了？未必。

第二天，教授指派他的一个博士研究生——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陪我去看法·文西的名画《最后的晚餐》。路上我问那姑娘，您听说过红色旅和小红书吗？她笑笑，说她那时年纪太小，没印象；她说听她妈妈（她说是个退休的化学教授）说起过，说时还带有一点惊恐。我打岔说，大约像童话里的小红帽那样吧。我们用笑声结束了这段谈话。

又十年。到了今日。我重读《思想录》，又重读小红书，我想到了许多。我想，是不是“思想的火花”迸发过了头，就会产生一种神秘的超语言力量呢？如果说欧洲的文艺复兴，“人”找到了他自己；是不是可以说，现时代的我们，正在（或已经）寻回久已失去的思想——以及全部的尊严呢？

1995年11月11日

图腾，塔布，力必多……

——一篇杂乱无章令专门家笑破肚皮的潜意识非线性随感残稿

[1]《图腾与塔布》

写完这个题目，飘飘然好像到了大洋洲外某个叽哩咕噜国，那里住着一批原始部落，说着部落以外的人听不懂的话。想着想着，简直有点想入非非了。

想起了名叫《图腾与塔布》这部书。

这是弗洛伊德的一部名作。其所以有名，是因为作者创立了叫做精神分析学的科学体系；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把这体系应用到人类学和文化史的研究上。书成于1913年，作者五十七岁，他最初提出精神分析学的科学体系是在四十岁那年。这时，他已誉满欧洲了；而这“誉”，却是建筑在强大的反对力量上的。即如这本《图腾与塔布》，当年就遭到人类学家的激烈反对。反对图腾？反对塔布？不不，反对的是弗洛伊德用他的学说来解释图腾和塔布。

这本书，没讲力必多，或情欲；没讲意识，前意识，潜意识；没讲情意综，或情结；没讲伊底帕斯情结；但它诠释的图腾塔布用的武器却是性的原动力。

性？这是个禁区！——性爱的禁区。我们熟知这个禁区。近三四十年间，有过弗洛伊德禁区，有过马尔萨斯禁区，有过其他禁区。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把它称做敏感区，极度敏感区。

古人“谈虎色变”，今人则“谈性色变”。尽管圣人早就说过：食色性也，仁内也，义外也——但是一两千年来，圣人的子子孙孙却不听圣人的教导，始终千方百计不敢正视“色”或“性”这个可怕的字眼。色？性？尽管有些人三妻四妾，甚至男盗女娼，但却害怕说出一个‘色’字或一个“性”字。

食色性也，我们的圣人在文字世界争得了第一，世界第一！此话说过一千几百年后，西洋才出了个叫做蔼理士的，在他那本也叫君子不敢正视的《性心理学》中揭示了同样的真理。他写道：“人生以及一般动物的两大基本冲动是食与性，或食与色，或饮食与男女，或饥饿与恋爱。”（潘光旦译文）

说是这么说，其实古今中外，色呀，性呀，男女呀，都是说不得的。这是禁区！别以为西方就没有禁区。这个弗洛伊德一生就在禁区里打滚，以至他的同国人，大作家茨威格也不能不慨叹说：

他毫不动摇地、勇敢直前地向至今无人涉足却胆怯回避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正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进军。——自由世界无意之中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其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自由世界的通过“理智”和“进步”逐渐抑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以其无情揭开面纱的手法，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问题的研究岌岌可危。

茨威格说，正人君子们驳不倒他，就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的关于梦的理论。（见《昨日的世界》）

[2]图腾，塔布

“图腾”，“塔布”这两个似汉语又不是汉语却被收进现代汉语词汇库的名词，耳熟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前者源出美洲印第安人，后者来自大洋洲

的原始部落。

在《图腾与塔布》一书中，作者有一段文字解释图腾是什么。他说，原始部落各各拥有一个图腾为民族、氏族、家族的名字。他说：

它多半是一种动物，也许是可吃的或无害的，也有可能是危险而且可怕的。较少见的图腾，可以是一种植物，或一种自然力量（雨，水），它与整个宗族有着某种奇特的关系。大抵说来，图腾总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它的守护者；它发布神示，虽然令人敬畏，但图腾却能怜悯它的子民。同一图腾的人有着不得杀害或破坏其图腾的神圣义务，不得吃它的肉或用任何方法以它来取乐。任何违背禁令者，都将得到报应。（见第一章《乱伦的畏惧》，杨庸一译文）

在同一本书的第二章（《塔布和矛盾情欲》）中，也有一小段解释“塔布（禁忌）”：

塔布（禁忌）在我们看来，它代表了两个不同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崇高的，神圣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塔布即指某种含有被限制或被禁止而不可触摸等性质的东西。

图腾是一种符号，一种代码，一种神物，因而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塔布（禁忌）更是一种无形的法律。有图腾便有塔布；甚至可以简单地说，图腾与塔布是共生的。中年的读书人可能还会记得，四十年前一个作家在私人通信中把一部历史性的伟大著作称为“图腾”，由是有图腾崇拜，引发了一场牵连到成千人的灾难。说者谓那场灾难并不单纯由于使用了图腾和图腾崇拜这样一种合适的或不合适的、妥贴的或不妥贴的讽喻；是的，不单纯由于，但剖析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底层意识（或深层意识），未始不是由某种塔布所引发的。我说是“引发”，而不是“导致”。那位作家如果明白人类学或民俗学上有图腾就必有禁忌，他就不会运用文学家美丽的想像力来使用这个讽喻了。这段故事已成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忘记——也是忘记不了的。

但是弗洛伊德《图腾与塔布》这部书，并不因为这两个本身有点神秘感的词儿才在过去一段不短的时间内本身成了“塔布”的对象。这样的书是不能随便看的——连想也不要随便想，因为作者是一个禁区的闯入者和破坏者，因为这部书把图腾和塔布现象通通归结到性压抑上。谈性色变，何况又是毕生在这禁区打滚并且全力要冲破禁区的性学鼻祖！

[3]力必多

我今天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准备谨慎地把这些理论粉饰一下，把“性欲”说成“情爱”，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不要总是毫不留情地明说那些最后结论，而仅仅作出暗示，那么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而能把自己的五分之四的理论发表出来。

这是弗洛伊德同时代人——朋友，犹太人，作家——茨威格说的。说得真好，如见其人；不，仿佛他活在我们现在的世界，活在我们当中。

上面引句中的“性欲”就是本文题目里的“力必多”。这个怪字是弗洛伊德创造的字。力必多！利必多！里比多！汉语有多种写法，都是由拉丁文转来的 libido 的音译。究竟它是什么东西呀？

这个词的词义从它出生之日起，各有各的说法，一天比一天扩大，各有各的理解。一般地说，就是“性欲”，就是“情欲”，就是“性冲动”。据说这是人的原动力，是一切一切行动的推动力。四十年代潘光旦索性把它译

作“欲”。

这位科学家发现了力必多。于是迷上了力必多，然后把一切精神病的起因都归结到力必多受压抑上，然后他，他的门徒，推而广之，把一切的一切几乎都还原为性冲动，归结到与生俱来的性压抑。这一点很难为人接受，甚至引起科学同道的抨击。但是后来的普通人，很容易接受这位迷上了力必多的科学家所发现的“潜意识”。世间许多本来不易解释的现象和过程都可以用潜意识来说明。不幸的是，潜意识与性冲动联在一起，使这位严肃的认真的科学家形象——至少在世俗社会中——被扭曲了。他所迷上的“力必多”，挽救他的“力”却“不多”，绝对很少。他几乎被目为禁区中的怪人——几乎被认为是不科学家，是个狂人，性狂人。然而他本人却几乎像个苦行僧。一个心理学史家(D.Schultz)说，“弗洛伊德虽然这样热烈地强调性在我们情绪生活中的作用，但是他个人对于性则坚持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他一贯提及性的危险，甚至对非神经病者来说也是这样，他劝告人们必须努力克服一般动物的需要。”他甚至说，“性的行动是会使人堕落的；会污损精神和肉体的。”这就是严肃的科学家弗洛伊德。

[4]弗洛伊德与命运搏斗

弗洛伊德生于1856年——今年是一百四十年华诞。命运捉弄他，但他却勇猛地、毫不畏缩地向命运挑战。他给这个世界揭示了人世间某些潜在的奥秘，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至少是可供研究的财富，但他在每一个阶段都被人误解，被人歧视，被人嘲讽，被人抨击。完全可以不接受他的学说，可以批评他这种或那种论点，可以惋惜这个“迂夫子”那份执着，那份迷恋——迷恋他所“发现”（或他所“创造”）的力必多，他迷失并被困在片面性的迷宫——可以笑他迹近“迂腐”，但是决不能无视这个科学家，不能轻视他，漠视他，蔑视他，更不能敌视他。

命运捉弄他：有时那么宽洪大量，有时又那么残酷无情。弗洛伊德的名字流传各大洲；自从上个世纪末，他四十岁时（1896）开始把他所创立的心理学—神经医学—病理学的交叉学科，命名为“精神分析学”以来，许多追随者，真心的或半心半意的，甚至冒牌的心理学家/医生，都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他的或改造他的精神分析法，或挂着他的名而贩卖自己的疗法，到处（特别是在新大陆）开设心理诊所，替由于社会生活日益繁杂而引起心理失调（甚至失控）的男男女女治疗，难道有比这样无形的荣誉更美好的命运么？然而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受到命运的折磨。当他的理论逐渐形成体系时，很多真诚的学者跟他一起工作，依附他，称赞他，但不久，由于理论观点上的分歧，一部分他最信赖的学者和合作者与他分手，另立门户；世纪交叉之际（1900）他发表了《释梦》，将潜意识上升为理论，对诠释正常心理和变态心理都很有裨益时，又有一部分追随者骇于这“潜意识”的怪影，离开了他；十三年后（1913），当他第一次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人类学和文化史学的研究，发表了上面提到过的《图腾与塔布》时，又招惹了许多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抵制和抨击——他们斥他为荒诞无稽，但几十年后，这些学科的后来者却又不能不部分或全部承认他为这个领域的先行者。为了把精神分析学应用于更广阔的文化领域，他创办了《意象》杂志（Imago），这又导致与他的一些合作学者的矛盾。他应邀赴美讲学，是与他的合作者容格同行的（1909），但四年后与容格发生学术观点的不可调和的冲突（1913），于是发表了《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1914），尖锐地批

评容格。容格与他分手了。其时，弗洛伊德其人及其学说几乎陷入一种四面楚歌的地步。以致国际上一些善良的，与他的观点相同的学者成立了一个叫做“委员会”的机构，来“保卫”这个被命运冲击的科学家及其事业，在这些学者中有兰克和琼斯——当他七十岁时（1926），兰克“背叛”了他，走开了；而琼斯这位英国科学家却在危急时候设法从纳粹魔爪下营救他出险，流亡英国。（琼斯为弗氏作了三卷本的评传，读书界认为这是一部最可信的权威著作——今日过份忙碌的读者，可以看同一作者战后为美国百科全书所写的词条《弗洛伊德》，这一条不到万字的词条，正是那三大卷评传的浓缩版，要言不繁，没半句废话，史实是可靠的，剖析是比较客观的——当然是站在弗氏及其学说这一边。）

六十岁以后，弗洛伊德仍然接二连三地向命运挑战；或者反过来说，命运接二连三地捉弄他。此时，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基本已成型，他的《精神分析学引论》和《精神分析学引论新讲》相继出版，他的学说渐渐被人接受，或部分地接受，或利用其中某些部分疗病，他在人世间不再是魔影了，但是他又向“死亡学”进军。他提出了新的论点，那就是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一书中提出的“死亡的本能”——说性的欲望和死亡欲望，是人类心理状态的两大对抗力量。这又是一场悲剧性的演出。琼斯说，这是“心理方面的一种革命性新理论，使他的门徒感到吃惊”。人的一生只有性欲和死亡！活着就是性欲在作怪，要不就把生命化成无生命！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恩格斯不是说过吗？“今天，不把死亡看作重要的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不管怎样，在20年代发表死亡本能说，是够震撼世界的，难怪那时人们以为这个老人发疯了。（时至今日，还有人说这个学说是某些邪教集体自杀的理论根据。不知是弗氏荒唐呢，还是今人荒唐呢。）

七十岁（1926）那年，他声明从精神分析运动引退。他没有“退”，他换了方向，他向文明，文学，文化和宗教进军。然而命运仍然跟他过不去。七十三岁，发表了《文明和对文明的不满》，向今日的文明，今日人类的文明提出挑战。琼斯说得很正确，他这篇论文已经不是要解决什么心理学的问题，而是提出一种哲学性质的结论。看来，那时他跟罗曼·罗兰讨论过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如何能达到这个问题的。罗兰说，要靠宗教；弗洛伊德说，不！宗教始终是“一种精神麻醉的典型代表”。他说——在这篇论文里——要靠恋爱！人生最终追求的是欢乐和幸福，而幸福乃是暂时的，是过渡性的，“用宗教来追求幸福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恋爱能解决这个难题。多么可爱的老人的青春的心啊！而难道这能让人人接受吗？我看不。

然而悲剧性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在他最后的日子，他写下那部唯一使他懊悔不已的著作：《摩西和一神教》。正如茨威格说的，他以丝毫站不住脚的论证企图证明摩西乃是埃及人，而非犹太人。这样，他既大大地伤害了那些虔诚的犹太教徒，同时又大大地伤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那本书恰恰又是在法西斯党徒全力迫害犹太人的关键时刻出版的，他伤心地失去了他同族人的同情和关注。他为此十分自疚。他对人说，“现在有人夺走了犹太人的一切，我又把他们的最优秀者夺走了”。

悲剧收场了。他活了八十三个春秋。

[5]《昨日的世界》

如果说琼斯写的传记是对弗洛伊德这个伟大的科学家进行理智的分析和解剖，那么茨威格笔下的弗洛伊德则是活生生的可爱的充满高尚感情的凡人，有血，有肉，有笑，有哭，有苦恼，有懊悔，有傲慢，有愤怒，有坚强意志，有克制能力。《昨日的世界》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些段落，是多么动人啊。他写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弗洛伊德，同时也通过他的带着深厚感情的笔，写出了他的学说。琼斯写他的理论，而字里行间却写了他的为人；茨威格则着重写人，而凭着他的敏感和直觉描述了他的学说。真是妙不可言！在茨威格笔下，这个科学家是执着己见的，是自律甚严的，一丝不苟的，狂热的真理追求者。

当弗洛伊德挣脱纳粹的铁蹄，流亡到英国，定居伦敦一年便接受死神的召唤那一段日子里，茨威格曾不止一次与他相聚：两个犹太人，两个闻名世界的大学者，两个逃脱纳粹迫害流亡他乡的欧洲文明代表，有着说不完的话，那是可想而知的。书中记叙了弗洛伊德最后的时刻，记叙了这巨人从不屈服的那股精神：

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阴影越来越清楚地投在他面上，死神使他的面颊枯瘦干瘦，使太阳穴从额角绽出来；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无法说话；可是死神对他的眼睛却无能为力，那是一座无法破坏的灯塔，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从这里观看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最后时还是那样明亮与清醒。

书中还记述了茨威格同达里往访弗洛伊德的动人往事。达里是超现实主义画家，那年（1939）三十五岁，却已在欧洲大陆红极一时；他崇拜弗洛伊德，他信服《释梦》的理论，和所有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样，都是以潜意识活动作为构思的根据的。达里1931年作的油画《记忆的永恒》（记忆的残骸？），与精神分析理论上可说异曲同工：达里认为精神病患者在某种状态下的言行，是感情与愿望最坦白最真诚的流露，最适宜于作艺术的表面。——这幅画，我看不懂；确实看不懂；但是看着画面上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却也唤起许许多多的联想，想什么，恐怕因人而异，也许这正是艺术的奥秘之处，因为它能召唤失去了的记忆。

这是一次难忘的会面。一个科学家，一个作家，在热烈的地交谈；一个画家什么也没有说，他在一旁为弗洛伊德作速写像。“他已经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出来了，”茨威格这样说。他画了什么？他画了弗洛伊的头像，那头盖骨是一只蜗牛的残骸！已经把死神画出来了，难道不是吗？可惜我的一本达里画集在那疯狂的十年间消失了，不记得那里面有没有这幅死神附身的名画。

这次会面给达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自不待言，因为年轻的画家早就迷醉于这位年纪比他大几乎半个世纪的大师；想不到这次会面也给弗洛伊德很大的愉快。会面的第二天，弗洛伊德给茨威格去了信，感谢他把这个年轻画家带来见面，信中写道：“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些把我当成偶像崇拜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是道地的傻瓜（我可以说他们起码像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那样，百分之九十五是傻瓜！），但那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以其敏锐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技巧改变了我以往的看法。如果仔细地研究他的构思和绘制那幅素描的过程，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昨天我看了看达里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绘制的《内战的预示》，如同看毕加索描绘同一题材的《格尔尼卡》一样，

似懂非懂，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联想，不能说完全唤不起一点感情来。唉唉，超现实主义！唉唉，潜意识！

顺便说一下，《昨日的世界》这本书，有个副标题：《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这是茨威格流亡南美洲自杀前完成的最后一本重要著作，是在没有一点参考材料的情况下写成的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写的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文化史或欧洲文明史；记述了这些年代欧洲许多文化大师的言行，真是一本动人心弦的力作。

[6]图腾与文明人

北京有个很可观的图腾岛。有好心人在圆明园里面的小岛上设了一个图腾陈列场地。图腾柱，刻在柱上的图腾，刻在面具上的图腾，还有原始人艺术造像和上面刻着的图腾。美洲的，大洋洲的，亚洲的，非洲的。好像没有欧洲的。欧洲没有图腾？不知道。——图腾柱，造像等等树立在小丘上，在矮树丛里，有着夸张的男性性器的造像，遍地都是。值得文明人去游一游。

我确实没找到欧洲的。我想起了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书中说澳洲原始部落说的“可朋”就是美洲印第安人说的“图腾”。作者说，

澳洲人的勇士和他的可朋动物的关系和欧洲骑士与纹章上的猛兽的关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纹章上的猛兽，并不像后来合理化的推测，它的原意并不是美德的标志，却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是一种保佑的力量或种族的祖先之意。这些观念的最接近而最自然的结论，就是把家族的动物放在武器上，作为一种灵物崇拜或保佑的力量；所以欧洲战士把熊或鹰画在盾牌上，澳洲人也把袋鼠或蛇皮的图形装饰在盾牌上。

（见第六章）

绝妙的对比！第二国际的卓越战士罗莎·卢森堡在她死后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导言》（1925）中曾尖锐地批评格罗塞这部著作，说作者把家族类型和原始文化类型跟经济类型相联系和类比，是一种机械论。我以为不一定。而且这是一部第一次对艺术与社会相互关系进行剖析的艺术史著作，不能求全责备；后人不是也批评卢森堡的经济理论是一种机械论吗？

反正，无论如何，《艺术的起源》是值得一读的好书。读后再判断罢。

此书有蔡慕晖译本，编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令人惊奇的是，原译在抗战前出版的，六十年了，而行文仍极可读。难得！

[7]蔼理士，潘光旦

上文云云，并非企图介绍或评论或批判这个“禁区”，或禁区中打滚的学问；不，我没有这个本领。无论是精神分析学，还是性心理学，还是性学，我都一窍不通，我花了那么多篇幅。只不过想抒发一下我关于禁区的压抑感情，其实与学说无关。

思想是长了翅膀的。既然讲到弗洛伊德闯禁区，就不免联想到英国的蔼理士；一讲到蔼理士，就不能不联想到潘光旦。蔼理士与弗洛伊德同一年在英伦去世（1939），他比弗洛伊德小三岁。蔼理士那七卷本《性心理学研究录》，曾不得不在德国出版——世俗的英国人大都是“君子”人也，他们看不得这部大逆不道的书，这样的书英国出不得！是个禁区！我上面屡屡提到过，古今中外都会设置种种禁区的，大家切莫少见多怪。直到1933年，蔼理士七十四岁时才出版了一本通俗科学著作：《性心理学》。说来也巧，潘光旦移译此书却是从作者去世那一年开始的。蔼氏书原序中有一段说到弗洛伊德，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没翻译出来（译序所云怕不是真实缘由），四十几

年后重新出版这书，才由别的学者补上。删去的这段话是很重要的，足见两个大学者的品格和观点。蔼说，他从头就敬重弗洛伊德其人及其学说，而且率先把这学说介绍给英国读者，但他声明，“我对精神分析学说一向采取同情的态度，但又从来不是这个学派的同调的信徒。”更有令读者折服的是，他虽声明不是“同调的信徒”，可是他却诚心诚意地把弗氏的《精神分析引论演讲录》推荐给读者，他甚至说：

即使是对精神分析学说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人，要想把这部书里出自睿智卓识和丰富经验的研究成果搁过一边，完全无动于衷，事实上也是很难办到的。

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说的真诚的话。我们就正缺少这样的话。

潘译《性心理学》1945年（费老说1946，待考）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那时，这家老字号，好像没怎么考虑禁区问题——蔼氏说的弗氏那本《引论》，是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行的，其时商务还未遭难。综观商务的历史，似乎张元济也好，王云五也好，都不怎样注意到禁区的问题——他们倒是很重视现实政治问题的。比如在天下大乱时，张就不愿或不想或不敢出版孙中山的《孙文学说》；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时期，王就不想印行马克思的书，后来至少也不热心出版《鲁迅全集》。

学术问题要和政治问题分开，说是说过几十年了，可是——哪里分得开？一则两者确实难分难解，或者说，有时确实难分难解：有时人们往往想把它们拧在一起。唉，这也是古今中外如此，人们遇到这种事不必太过伤心或灰心，不会总是下雨天的。想想看：《引论》初版重版相隔五十四年，《性心理学》两版相隔四十二年，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老人从来不走直路，是之谓乎？我这一段文字叫做非线性联想。

序《中华姓氏大辞典》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有两个科学机关差不多同时对汉民族的姓氏作抽样统计，测定汉民族姓氏的数量结构和地理分布。这两个科学机关就是中国科学院的遗传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简称“语用所”）。

遗传所从遗传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作为“生物学标记”的群体遗传学特征；语用所从应用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作为社会成员“父系标记”的姓氏用字状况。两个研究所都得出了很有价值的的数据，并且都写成专文刊载在我主编的《现代汉语数量分析》（1989）一书中。我认为，全部测量数据应当从速印行，因为这两项数据虽略有不同——这是由于抽样方法和样本规模不同引起的——但它的意义和作用，显然已大大超过原定目标，它对于各个有关学科（例如人口学、优生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史学、社会语言学、文化史学等学科）和有关部门（例如民政、公安、邮电、人事、信息统计等部门）都有实用价值和一定程度的理论价值。

可以指出，这两项数据是我国第一次用科学方法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汉民族姓氏频率和姓氏分布的成果，其历史意义自不待言。

这些成果在很多方面打破了原来的传统观念，例如现在还使用着的姓氏不止一百家，而是在一千家上下（遗传所在样本为537429人中发现了1066个姓氏；语用所在样本为175000人中发现了737个姓氏）。又例如姓氏的地理分布和姓氏所占比例，也同传统观念不尽相同（遗传所测定包括李、王、张三大姓在内的19个大姓，累计频率达55.5%；语用所测定包括王、陈、李、张、刘五大姓在内的14个大姓，累计频率达49.48%）。两个测定数据不约而同地向社会提出一同姓率问题。更严重的现象是当代人名用字偏少而导致的同姓同名率问题——像这样的问题是国家行政机关应当注意并且要采取符合社会心理的方法予以妥善解决的。

如果将上述两项研究成果放在历史的大框架中加以考察和论证，那就肯定会得出更有影响或者说更有意义的结果。所以遗传所两位专家在完成上述课题的基础上，用大力气搜集了古往今来的汉族和其它民族用汉字表达的姓氏资料，编成这部词典，使我们对姓氏的探索扩大了视野。从纵向看，它收罗了自汉民族形成后曾经出现过的姓氏（其中当然包括了现代已湮没了的姓氏，从外族移植过来的姓氏，因政治原因改了写法的姓氏等等）；从横向看，它蒐集了大陆以外各大洲华人即炎黄子孙所曾使用过的姓氏。可以说，呈献给读者的这部词典，是汉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所能收集到的姓氏大全。我说的“大全”，不过就其主观意图上说的，我想编者决不敢自夸这部词典就没有一点遗漏。但即使如此，出版这样的工具书，也确实很有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虽然没有定量分析（对历史上的资料很难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样的资料也是各个有关学科、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所盼望已久的。

我不想也不能评论这部词典的长短，我只知道编者的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至于这成果究竟达到如何的学术水平，我更不想置论，但有一点却不可不提：它是充分利用了海内外学者们的成果编成的。真正的科学成就都有继承性，当然还有创新性，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编者在自序中提出的建议是否可行，是否符合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用字的发展倾向，那就有赖于海内外读者诸君的研讨和判断了。

(袁义达杜若甫编著，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1年5月于北京

《赵元任年谱》手稿读后
——给商务印书馆柳凤运的信

小柳：

谢谢你借给我《赵元任年谱》手稿，使我在节日中尽情享受——我日以继夜地把全稿三百多页读完。真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享受”。这位语言学大师的一生活活动，那充满着生命力的、不知疲倦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使我深深地感动了。太感谢你让我能在节日中得到这样的愉快。赵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一个跨学科的人文学者：语言学家、文艺学家、翻译家、音乐家，同时又是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令人高兴的是，他最能接受新的事物，他十分敏感，很早他就接触控制论和信息论，他还接受了60年代兴起的符号学，并且将这些学科的某些精髓，导入语言学。在当代的中国语言学家中，无出其右；即在世界上恐怕也没有第二个。年谱记录了这位学者的九十年活动，读完使我对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曾经说过，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超越了党派，超越了世俗的政治——而今我又看到第二个超越党派和世俗政治的学人，证明我的立论还不是只有孤证。这位学人存在的九十年，是平稳的，安静的，淡泊的，虽然在学术领域是很显赫的。也许在激烈的斗争生活中会产生另外一种学人，但是，在平静的生活中确实也能产生学人。哎哟，我扯到哪里去了……

《年谱》手稿，就事论事，与传统习惯的年谱不尽相同。套用我的常用语言来说，这是一部不是年谱的年谱。任何一个编辑，包括你在内，都无法改造，也就是说，无法加工。如果按通常意义上的编辑加工，把不符合通常所谓的年谱格式来改造，就会把原稿变得索然无味。这是一部不熟悉父亲专业的女儿写下的编年纪事。这是一个女儿心目中的父亲形象（不能说是一个女儿眼中的父亲形象，因为父女已阔别三十年然后重逢），无论是项目取舍或附加的注文，都表达了女儿的一片真情。如果问我如何处理，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值得印行。如果问我编辑工作应做些什么，我会说：

——保全手稿原貌，改个书名《赵元任年谱长编》，《赵元任生平编年纪事》，不改亦可；

——删去不必要的或多余的话，例如：“根据日记记载”，“毕业证书即毕业文凭”，“第一次乘坐747飞机”之类；

——引用日记英文，要加中译，最好英中并列；

——前后重复的地方可删去后出者；

——明显的错漏可加修正，文字可作适当润色。

当然，这部稿子最大的弱点是没有阐明这位学人的学术观点，因为编者不熟悉专业。那么，值得出书么？值得。至少可以给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给后人编写年谱打下一个结实的基础。

又，稿中提到赵元任一生写过五封《绿信》（广为印发，写自己的生活 and 观点的书信）——第六封未完成——，算来总共有一百多页，有十万字了。这应当是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建议你看看（原文为英文）。

专此布达，即颂

编安！

陈原
1997.2.10

读《胡愈之文集》 ——给三联书店董秀玉的信

董总：

谢谢你给我带来五卷《胡集》，使我彻夜不眠，并且发展而为日以继夜，花了几十小时，把几百万字浏览了一遍，算是我在春节期间的一大“享受”。谢谢你，出了这样好的一本书，也谢谢编校同志们，让我作了一次十分愉快的心境旅行。

从第二卷的时期开始，可以说我就走上了人生的道路；或者说，从那时起，我就朝着先行者们指引的目标前进，先行者中自然也包括胡愈老。

我原先没有想到胡愈老一生还写了这么多。我说过，在思想家·出版家的行列中，张元济不以文传世，却以他的业绩告诉世人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他的憧憬；而邹韬奋则以尖锐的政论闻名于时。胡愈老呢，我说过，他是社会活动家，他也写政论写文章，但他也不以文传世。我错了。居然有六卷之多，况且还有很多文章未收在内。如果把他作为“官员”的讲话和报告都收集起来，恐怕还有至少多一倍的文字。

我在这里遨游了几十小时，这个对政治十分敏感而同时有着动人文采的思想家，使我受到很多教益。从50年代到他辞世，前后凡三十有六年，断断续续听到他的教诲，但是只有像这次的浏览，才使我获得一个完全的印象，使我更加深刻地领略这位文化巨人的精髓。读着读着，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真有高山仰止之慨。

我写过一篇短文说三个读书人构成一部中国现代出版的社会史：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首先是思想家，然后才是出版家。出版家没有思想，则只能是世俗的出版商。

请看他早在1924年，就写下这样的句子：“在今日，帝国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世界平民阶级的斗争已愈迫愈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了东风。”（1—437）写得多么超前，多么的潇洒啊！

胡愈老一生做了四个方面的事：政治活动（包括统战工作，民主党派工作），出版工作（包括报刊书籍），语文运动（包括世界语、拉丁化新文字、文字改革），人民外交活动。看来这六卷书对这些方面都有所反映，也许党派活动（早期的救国会活动和后期的民盟）和外事活动反映得不够一点，可也无关大局。读完六卷书，我对此老的认识比从前更深入和全面，我真想写一部传记——他的传记已有多种，我认为都没能深入理解此老，只见外表，不见内心；不过我自知志大才疏，即使写也未必能写好的。

浏览之余，似乎集中缺名篇《怎羊（样）打倒方块字》（载《太白》创刊号，1934年8月），这是轰动一时之作，提倡以同音的简字或别字代替正字，也是响应鲁迅呼喊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一种具体做法。若收，应在第三卷；也许我匆匆浏览，看漏了也说不定。

此外，书的装璜、用纸、印制均佳，索引亦好，但稍嫌分类太宽。此书应当有很好的介绍文章，即使是内容简述，也是必要的。

顺祝
近安！

陈原
1997.2.11

吴国盛著《科学的历程》

《科学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世界科学史；它是一部面向非专业读者的通俗科学历史。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科学史著作，其中也不乏通俗性的读物，但是大部分著者都以欧洲科学的发展为中心来论述，很少能够兼顾西方和东方科学的发展，甚至常常表露出赞美文明的西方而鄙视“未开化的”东方。即使有善良的科学家，企图对东西方科学发展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往往因为文字上和资料上的困难，这样的善良愿望很不容易达成。

《科学的历程》一书的作者，力排此议，将东西方科学的发展合为人类文明的统一体加以考察，用非凡的毅力挖掘东西方的文献资料，写成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科学史，虽则出版家不以这样庄严的称谓来命名这部七十七万言的巨著，却宁愿采用了一个简朴的书名：《科学的历程》。

《科学的历程》不只是一部科学技术发明的单纯记录，当然也不是科学发展的编年纪事。从本质上说，这是一部世界科学的社会史。所谓科学的社会史，就是要阐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决不是某些出类拔萃的发明家，由于一时灵感冲动，随心所欲产生的结果；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同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西方某些“纯粹的”科学史家往往忽略了科学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只有科学发展的社会史，或者简称为科学的社会史，才能正确地处理科学与社会的命题，揭开科学发展的奥秘。这部巨著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科学社会史预期的目标；因此它不是一般的科学普及著作，而是在这个学科中进行新的探索的成果。既然是新的探索，允许有种种不足，自然也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和谅解。

作为一部科学的社会史，它展示了科学作为生产力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它也力图阐明科学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得到发展，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萎缩甚至灭亡。读者从中会得到很有意义的启发。诸如希腊文明的兴起，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形成，文艺复兴的诞生，古代东方——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对世界科学发展的贡献，英国产业革命的实践要求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导，带来了辉煌的十九世纪，然后是二十世纪特别是它的下半期包括信息革命在内的高科技年代。所有这些，都是现代化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所要知道和必须知道的。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部巨著又是一部科学家的受难史——特别是在人类失去理性的时代，例如欧洲的“黑暗时代”，或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这是人类的悲剧；但是这悲剧却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接二连三地重复发生，愚蠢的当权者粗暴地对待走在时代前面的科学家，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生命，造成科学史上无可补偿的损失，这不能不说是文明人类的耻辱。这部著作忠实地记录了许多许多这样的令后人心酸的事迹；不是让后人去叹息，去凭吊，而是发人深省：科学发展的道路决非平坦的，而科学家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敬可佩的。科学家的奉献，受难，牺牲精神，永远给后人极大的鼓舞。科学家受难史的积极意义在于此。

读者在这部书里看到的，当然不只是科学家的受难，更重要的是，人们深刻地体会到古往今来所有的真正科学家，都有着捍卫真理的决心和勇气，都有着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科学成果都是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奋斗才能得到的。

几百张可贵的插图，给这部大著增添了极大的趣味和启迪。没有形象的

历史叙述和分析，尽管内容很充实，却不能引人入胜，特别是通俗著作更需要形象。有了这几百张插图——人物，环境，过程，甚至同时代的漫画，这部大书就显示出无比的吸引力。为此，读者得深深感谢作者和编者花那么多心血去寻找适当的图片。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件小事，其实这正是一部真正的创造性著作所应具备的有机组成部分；可惜今日的出版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未来之路》中的寓言

在数字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可以理解或者很难理解的深层意义。比如电台有一次说，目下我们国家有三千五百万下岗人员：稍为想一想，就会隐约看到一幅揪人心弦的图景。提起数字，我总是想到少年时读过的一则寓言——我最初读到这则寓言，好像是在英国出版的《万人文库》里的一本《世界寓言大全》（不知什么原故，这本书没有重版，战后怎样也找不到了），后来在很多讲哲理的书中也都从各种角度引用这则寓言。新近看到盖茨的《未来之路》，第42—43页就有。据说——

“印度的舍汉姆国王对一位大臣发明了象棋感到非常欣慰，因此他允许这位臣子请求任何奖赏。”

这句话有点外国腔；说得顺一些，就是：一个大臣发明了象棋，国王对这很高兴，他吩咐大臣说，你要什么奖赏，我都给。

大臣要求的东西听起来微不足道。他只不过请求国王赐给他排满棋盘上八排六十四个方格的麦子——不过麦子的摆法却有点特别：他要求第一格放一颗麦子，第二格放的麦子为第一格的二倍，即两颗麦子，第三格放的麦子为第二格的二倍，即四颗麦子。……如此类推，成倍成倍地增长，直到摆满六十四格。

国王毫不迟疑便答应了大臣的谦逊的要求，心里却说，这个人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有奖不会拿。于是掌管粮食的大臣便调来一斗麦子，照那位“傻瓜”大臣的请求摆麦子。

第一排摆满了，一共放上255颗麦子，摆一颗麦子花一秒钟，因此花了不到五分钟。摆满第二排，连同第一排一起算，总共摆了65535颗麦子，花了约十八小时！到第三排摆完时，已花了194天。天呀，一共数了16 800 000颗麦子。然而还有四十格空着呢。

作者说，“可以断言国王收回了他对大臣的诺言。”照盖茨的书，“在棋盘的最后一个方格上将要摆放18 446 744 073 709 551 615颗麦子，按摆一颗麦子要一秒钟，则需要5840亿年（作者说地球的年龄大约是45亿年！），作者又说，聪明的国王立刻省悟到他一定被那“傻瓜”大臣愚弄了，“于是他把那位聪明的大臣斩首了”。

这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寓言。

数字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奥秘。小心被愚弄了！

一个无私的科学家的名字——读一本《哀思录》

钱志道！一个现今很少有人知道的名字，但这是一个无私的科学家的名字；一个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民革命事业的名字。若不是偶然看见一本并非正式出版的小册子，一本悼念亲人的《哀思录》，我也从未注意过这个名字。

30年代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延安去为国效力；得到了允许，去了，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宝贝——搞化学工业，搞炸药，搞军工。然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需举出一个头衔就足以说明一切：他是共和国首任导弹局局长。谁料到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1960年，正当共和国迫切需要这样的实干家时，这个钱志道竟被调离他开创并坚持了二十五年之久的军工领域。不必往下说，他调了工作。他开辟了新的领域，然后又进了“牛棚”。

为什么把这个忠贞不移的战士撤离迫切需要他的战场呢？因为忽然发现他的配偶有“特嫌”。说忽然发现，一点没有错。他的妻子冯斐，浙江大学同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本来要同那位科学家一同去延安的，因为战争和家庭拖累，没有去成。当浙大在贵州开学时，冯斐为了跟钱志道通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由浙大校长、可敬的科学家竺可桢保释回校。抗战胜利后派往美国留学。1950年她不顾身体有病，立即返回祖国，任教军事工程学院。她当年已把这一段历史（后来变成罪行！）交代清楚，组织上也做了结论。谁知她这一段坎坷经历，二十年后却成为她的亲人不能参与军工的理由。

后人不能理解：爱国青年成了“特嫌”分子，交代过并做了结论的“问题”几十年后又被上纲上线，关系人那时还健在，调查不费一点功夫，却悬之为“嫌疑”犯……说不清，理还乱。左啊，左啊，左到经常不肯相信自己人。悲剧的时代。悲剧的人物。悲剧性的命运。

但这个科学家是多么可敬啊，这对爱国者夫妻是多么可敬啊。他们多少日子默默地忍受这命运的折磨。他们仍然为祖国的事业生活着，奋斗着。人说这是愚忠；也许是的。但愿多一点愚忠，少一点随风倒。

如果不是那本薄薄的《哀思录》，可怜同时代的我也一点也不知道这段悲剧时代的插曲。

科学普及读物的新路

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了一部“奇书”，书名叫做《哥德尔、艾舍尔、巴赫》；接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又出了一部《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前者是原名，后者原称《真与美》，中译本取其中一篇的篇名为书名。两书齐齐摆在书摊上，煞是奇观——真是南北辉映成趣。

科学与艺术，科学家与艺术家，同台演出；也可以说，讲科学和艺术这样表面看来互相对立或至少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放在人间的大熔炉里加以考察。也许这是科学普及读物的新写法或新趋势。

我赞成。原因是，人间社会本来是很错综复杂的，万般事物大抵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糅在一起论述，研究，可能更接近真理。

哥德尔是科学家，艾舍尔是美术家，巴赫是音乐家；莎士比亚是诗人、戏剧家，牛顿是科学家，贝多芬是音乐家。前一部书的作者是一个奇人，他学过中文，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侯世达，为中译本写了一篇很长又很有趣的序。后一本书的作者是美籍印度学者，天体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钱德拉塞卡。译文都很好读，而且译者都是科学家，懂行，很可信。

但愿多出一些这样的科普读物，功德无量！

人过六十就……

英国一个科学家（赫胥黎）说过一句很难听的话：但凡科学家过了六十，就害多利少。

另外一个英国科学家（瑞利）当被问到他对这句话有何评论时，补充说：如果这位年过六十的科学家喜欢对青年人的成就指手画脚，那很可能害多益少。但是，如果你只做你理解的事，那情况就可能不相同了。

这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在他的一次演讲中引用的例子。同一个演讲中，他还说过如下一段寓意深刻的话：

1817年，贝多芬47岁时，当一个较长的几乎没有写出什么作品的沉思时期快要结束时，他对波特说出了他肺腑之言：“现在，我知道如何创作了。”我不相信任何科学家过了40岁才说，“我现在知道如何研究了。”在我看来这正是不同的根源和核心。随着科学家的成长和成熟，他的才能也就越明显。

他要阐明的是，艺术家跟科学家不同，有不少艺术家“人到中年”甚至步入黄昏时分才能创作出成熟的优美的作品；科学家则往往在青年时代就探索到某些科学的奥秘，到老年时倒没什么进展。

可以举出很多支持这个论点的例子，但同时也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外。短命的艺术家有的是。例如舒伯特，只活了三十一岁，却留下那么多的音乐宝库；科学家到晚年才获得最可贵的成就，例如说这一段话的钱德拉塞卡。

两个科学家奇怪的遭遇战

美国《科学》杂志（1982年9月）有一篇文章记叙了当代两个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一次奇怪的“遭遇战”；这段发生在1935年间的轶事，已经过去了六十年，两个当事人都已经离开人世，却仍然令后人读了不止饶有兴味，而且极受启发。

二十四岁的青年印度科学家钱德拉塞卡到了伦敦，跟当时最负盛名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过从，每周两次讨论问题，那时爱丁顿已五十二岁。由于爱丁顿的赏识和推荐，钱德拉塞卡得以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宣读论文。开会的前一天，节目单发下来了，却有两个科学家的名字，一个自然是钱，一个却是钱所敬重的爱丁顿。可是钱很纳闷，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他所敬重的这位老科学家也在研究他所选定的课题，而爱丁顿也从来没有透露过他对这个课题发现过什么新观念。青年科学家想问，却不敢问，虽则他们两人在开会前还一起喝茶。

青年科学家宣读了论文，怡然自得。因为他相信他在黑洞方面的研究确实有独到的见解。然后是爱丁顿发言。这位老科学家断然驳斥了钱的全部理论——更确切地说，他没有逐一推翻钱的逻辑和计算，但他以他的声望，他的经验，他的学问，从根本上否定了青年科学家关于黑洞的“神话”。他说，这东西根本不存在！他的“权威性”的发言，引起会众一阵阵笑声：青年科学家彻底失败了。他不知所从。心情当然是很沮丧的。后来他回忆道：

我原以为我将在会上宣布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结果爱丁顿让我出足了洋相。我心情乱极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继续研究这个课题。那天我回到剑桥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我走进一间同事们经常聚会的房间，这时当然不会有人还留在那儿，但炉子里的火还燃烧着。我记得，我站在炉火前自言自语地重复着一句话：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他没有气馁。他自信他的发现是对的，他自信他的理论没有错。两年后他把这几乎被否定（实际上已被否定了）的新发现写成一本书，然后他把它暂时搁下。他从事另外的课题研究。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多少年后他又重新研究他的黑洞；这时他有了更多方面的实践，更多的理论归纳。他终于使这个世界承认这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他不后悔，他甚至认为第一次的否定，使他能够更加深入、更加周全地阐明他的划时代的理论。为此，他在七十二岁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谁是控制论的创始者？

听到柳凤运和蒋本良译的《协调心理学与控制论》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消息，很高兴。著者是罗马尼亚学者奥多布莱扎，书是一部争辩控制论创始权的论辩性著作，内容很有意思，而且是论辩性的，颇能引人入胜。此书是我十三年前带回国的，那年我只能发表很短的一篇简介，是从此书所附的英文说明译出的，我不懂罗马尼亚文，只能等别人翻译出来，才能真正了解这一国际间的学术争端。

那是 1983 年，我应邀到比利时那慕尔参加第十届国际控制论大会，结识了一个罗马尼亚核能研究所的控制论学者巴茹列亚努，他跟我以及参加会议的许多学者大都住在圣心大学信息学院的宿舍里，早晚在一起。他编在第一组，普通控制论即控制论理论组，我编在第十二组即语言控制论组。他在小组里作了关于奥多布莱扎与控制论的发言，那天我跟比、德、意、美、法诸国的控制论学者都去听了。会上讨论气氛很热烈，提问不少，但因为没有一个人读过奥氏的著作，许多人（例如我）连奥氏的姓名都没有听说过。巴氏在发言开始时说，西方一般认为美国学者维纳是控制论的创始人，其实这个学说的创始者应当是罗马尼亚学者奥多布莱扎。他说，就内容而论，维纳只发现控制论的一个规律——即反馈规律，而奥氏却早就发现了有关控制论的九个规律；就发表的年月而论，奥氏的书（取名为《协调心理学》）是 1938 年在巴黎出版的，维纳的书则在其后十年即 1948 年才在巴黎印行。所以控制论的创始权应当归于奥多布莱扎。会上大家只能就巴氏发言的若干论点提出意见，至于创始权问题，因为与会者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未能加以肯定或否定。第二天早餐时，巴氏非常激动，他找到我，大约因为我是从社会主义的国家来的，非常严肃又非常激动地对我抱怨说，昨天他的发言没有受到重视，西方来的学者根本不听他所说的。须知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在所谓东西方的学者之间也受到冷战的影响，情绪往往是容易偏激的。他说，西方只知道维纳，只知道美国人维纳，硬说维纳是控制论的创始人；他说他在会议上提出控制论的首创权应当属于奥氏，他抱怨与会者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平心而论，我参加的那次会上并没有人带着偏见反对他提出的意见，但是直到那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人，都是第一次知道奥多布莱扎的名字，更没有人读过他早在 1938 年出版的著作，而这部书法译本流传不广，因为巴黎出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兵荒马乱，参加会议的学者谁都没有见过这部书，而罗马尼亚文的原著，更没有人能读懂。而维纳的《控制论》则是在大战后最初用法文、其后用英文发行的，读到的人很多，连中国也在 60 年代便有了译本。奥氏的《协调心理学》直到那时还没有西方通用的语言文字译本，那次会上只看到此书英译本即将出版的广告——两年后，即 1985 年我到布达佩斯参加一次信息论会议时，才有机会看到刚刚出版的英译本。所以不能怪大家怀着偏见不支持他提出的首创权问题。

然而这位罗马尼亚工程师学者的心情，作为中国学人的我，是完全能理解的，而且深表同情。中罗都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在近两三个世纪中都受到列强的压迫，我们的学人受到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少数带有民族偏见的学者们的忽视甚至歧视，我们的文明成果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常常受到损害，甚至我们国家的主权也多时被国际社会所漠视。这些现象在过去的时代所谓“弱小民族”学人心中投下了阴影。所以

那位罗马尼亚学者提出控制论的创始权问题，在我是非常理解的；不过那个会议上学者们不表态，只是由于不了解，而不是偏见。随后这位工程师学者送给我一本书，并且用英文写上“致以良好的祝愿，祈望将来的合作”，就是这本《协调心理学与控制论》，书是用罗马尼亚文写的，初版于1978年，也许这就是学者奥多布莱扎最后的也是最动情的著作。1984年商务印书馆在北京香山召开一次有很多著名学者参加的长期选题规划会议，我在会上讲了介绍新科学的重大任务，并且建议翻译出版各派学说的中译本，其中也提到希望能从罗文译出这部书。会后，我把书交给刚从罗马尼亚回国的柳凤运和她的爱人蒋本良。我希望他们能很快完成这项额外的任务，我相信他们能够胜任愉快；柳凤运上大学时是读数学系的，在罗马尼亚住了几年，在那里学会罗文，而她的外子蒋本良则是国内有数的罗文专家。我有幸看完他们的译稿，使我大开眼界，在学术园地中，确实不能囿于一家之言，而学术领域也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布达佩斯的信息论会议，送书给我的那位罗马尼亚工程师没有参加，但是参加过比利时会议的许多学者又碰在一起，自然而然提到奥氏的协调心理学和控制论的创始权问题。几个不同国籍的与会者都说，一种新创立的学说，分别在不同的事件和地点产生，一点也不奇怪，科学家在不同的环境中独立研究，互不知道，却同时或差不多同时发现或发明相似的或甚至相同的规律，在科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大家对首创权一事都不怎样看重，却对奥氏的论述大感兴趣。不记得是谁提出维纳看见过奥氏的书没有（如今我才知道，奥氏在这部著作中，坚持维纳确实看到过他的书，可是维纳在《控制论》一书中却只字不提奥《协调心理学》，奥氏认为这是剽窃）？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后来我访问德国帕特玻恩控制论研究所时，曾就此事请教过研究所所长弗兰克教授。他是我的外国学术界朋友中唯一同维纳一起开过会的学者。据他的见解，维纳可能未读过奥氏的书，也可能浏览过，但认为同他的控制论无直接联系，不予重视。维纳最亲密的合作者是墨西哥神经生理学家罗森勃吕特，他是生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坎农（《躯体的智慧》的作者）的学生和同事，维纳对他们都很器重。值得注意的是维纳还从坎农那里借用了“内稳态”（homeostasis）一词，可能维纳所提到的心理学不是一般的心理学，而是跟神经生理学有关联的学科。也许维纳看过书，却不怎样瞧得起这位罗马尼亚学者，这也说不定。他说，这种公案实在不必多管。我想，他这话可能是对的，而且很难有一致的结论；但“弱小民族”的自尊和自豪感，我是很理解的，德国教授却很难理解。

奥多布莱扎生于1902年，学医，专攻神经学、神经生理学。后来转入心理学领域。三十六岁那一年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协调心理学》第一卷，旋即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作为军医度过了整个战争。战后第二年（1946），他提前退休，隐居在偏僻的乡下，潜心研究他的学问，他着了魔似的迷上心理现象，把所有社会现象和自然界发生的某些现象，都跟心理现象挂了钩，但似乎对他原先发表的协调心理学没有什么发展或提高，有学者说，他几乎过着隐居生活。但是到60年代，维纳逝世（1964）后，奥多布莱扎对控制论“创始者”是谁（是维纳还是奥多布莱扎）的问题耿耿于怀，不断写文章论辩，几乎可以说，在这位学者六十岁以后直到他七十六岁（1978）辞世，他都为“捍卫”罗马尼亚学者的“创始权”进行论辩，最后写成这部《协调心理学与控制论》，他生前来不及看到此书的出版，据说他只看到过校样——

书是在这位学者辞世后一个月问世的。由于这是一部论辩性的著作，所以观点鲜明，材料充实，甚至可以认为此书提纲契领地阐明了这一学科的精粹。

许多罗马尼亚学者都支持《协调心理学与控制论》“指控”维纳的论点。许多学者断言，维纳在创始他的“控制论”时，肯定读过奥氏的书，理由有三：一是1937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国际军事医学大会时，美国海军部派了贾布利治参加，此人接触过协调心理学的内容，哈佛学人不可能不知道；二是1941年美国心理学界最有名的月刊《心理学文摘》刊登了S·M·斯特朗写的《协调心理学》书评，维纳绝对看到，因为维纳在构思控制论时，对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是很重视的，维纳在他的《控制论》一书中说到，“吸收一些心理学家的必要性，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既然这样，已经有评介的《协调心理学》就不能不在维纳的视野之内；三是，维纳论述反馈原理的内容跟奥氏论述可逆性原理的说法，有着很多相似甚至雷同的地方。人们认为如果奥氏不是在他的晚年写出一些论辩性的学术文章以及这部论辩性著作来，可能科学界根本不知道奥氏的存在，更不必说这部《协调心理学》了。但学者们也公正地指出，奥氏晚年热衷于捍卫他对控制论的创始权，却没有能够在新的科学条件下——比如没有吸收信息论的成果来发展和丰富他的控制论原理，只把自己禁闭在心理学的范围中，竟然认为控制论尽在此书中，未免有点可惜。不过学术界都认为，《协调心理学》和《协调心理学与控制论》两书都有很充实的内容，值得后人去钻研和评价的。

不管控制论的始祖是什么人，译介此书，对中国读书界是大有裨益的。对控制论的理论研究，同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首要的一点是开阔眼界，吸收不同的观点，加以消化，然后能够进一步将学科推向高峰。

一个智者的成长 ——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

胡愈之三次进入商务印书馆。头一次从1914年到1927年，即从这位智者十八岁到三十一岁，共历十三个春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愈之为形势所逼逃亡法国，在那里度过了1928年到1930年，这三年胡虽不在商务上班，但他的生活主要是靠为商务的杂志写通信所得稿费维持的。第二次进馆是在1931年1月回国后到1932年“一·二八”之役，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把商务印书馆整个摧毁了——本来这家出版社是可以改弦更张的，只因为当时的主持人有意将商务强大的工会解散，所以采取停业措施，把所有员工都解雇，胡愈之被迫失业了。

是年8月商务复业，胡愈之第三次进馆，主编《东方杂志》；用现在的术语说，他“承包”了这个杂志，从第29卷第4号（1932年10月）起，这个可称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和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和政府性杂志，在胡愈之主持下，面目一新，鼓吹抗日救亡，宣传进步思想。在复刊号上，他振臂高呼：“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

可惜因为胡愈之在新年号上搞了一个特辑：《新年的梦想》，发表了一百几十个名人关于中国的梦和关于个人生活的梦，这二百四十四梦，有不少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作了无情的鞭挞，于是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商务主持人害怕了，胡愈之只好挂冠而去，前后只五个月，仅仅出了九期，但影响之大，连胡愈之本人也没有想到。

这样，胡愈之三次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前后共十五年左右，也就是这位智者进入社会到三十七岁（1933）。1933年3月，编完《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六个月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是在这家出版机构的实际工作中和自学环境中，取得了古今中外的有用知识，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不断摸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摸索一条进步知识分子要走的道路，然后参加到党组织来的。而在摸索过程中，他经历了动人心魄的历史事件，并且以他的热情和毅力和胆识，卓越地通过了严峻的考验，作为一个成熟的进步知识分子，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来。

他经历了并且积极参加了“五卅”反帝运动，写了举世闻名的《五卅事件纪实》，作为《东方杂志》的增刊，把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如实地公之于世。他，作为一个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完完全全站在工人群众的一边。他还跟商务印书馆其他爱国者一起，自费创办了《公理日报》，宣传反帝，鼓吹正义和公理，虽则报纸只存在了二十二天，但那是光荣的二十二个日日夜夜！他经历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当然也经历了反革命政变，奋而发表了向反动当局的抗议信，一时震惊中外，而他本人只得流亡法国。1932年秋，他还由鲁迅推荐，参加了蔡元培、宋庆龄等先进人士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事拯救被反动当局囚禁的进步分子的活动。这些活动中很多都是在这家老店工作时进行的。由此可见一个智者，确实是在弥漫着爱国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机构里，在弥漫着正义、公平、进步、向上的氛围气中成长起来的。胡愈之晚年，还津津乐道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那些年，怎样追求知识，怎样利用编辑部只工作六小时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有一个很好的补习夜校的方便，充实自己。知识分子是通过知

识的追求和真理的检验而自觉地参加革命的。在商务印书馆，一代智者的成长，不止胡愈之一人。

记罗竹风

多年不去上海，想会见的老朋友、老战友愈来愈少了。八月间，有个国际会议在上海举行，非要我去参加；一想，正好趁机去见几个熟人。行前联系，才知道巴老（巴金）去了杭州，见不着了；但罗老（罗竹风）却仍然住在医院里。于是在会议中间，抽半天功夫，由上海社联一位同志引导，拉了世界语协会的小谭（谭秀珠）一道，到华东医院去看望这位毕生驰骋在语文战线上的不疲倦的老战士。

路上我想起罗老今年春节寄我一个贺年片，上面有他刚健的亲笔签名；旁边还有一行小字，问我可有什么新作面世，这行字却不像他的笔迹，估计是他让陪他的亲人写上去的。我看了有点凄然：可能我们的老朋友连写字也不那么顺当了。可是一见面，路上的忧虑一扫而空，罗老还是罗老，还是笑口吟吟，还是那么乐观，还是山东人那份豪爽，最令人欢慰的是，思想还是那么敏捷——真有点出乎意外，自然是喜出望外了。

我首先把小谭介绍给他，我说，你不是常说，我们人老了，要培养接班人吗？瞧！我把世界语运动的接班人带来了。罗老听着开心地笑了；他向小谭问长问短，小谭的活泼和机智，显然使老人很高兴，以至于不时打断她，捋出一两句带着风趣的、辛辣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插话。我们从世界语和这次国际会议（第一届亚洲世界语大会）谈起，谈到文字改革和语文现代化，继而谈论我们熟悉的朋友。过去的和健在的，当然也不免谈论当前的社会生活，光明面和黑暗面。谈话简短，活跃，激情。尽管罗老日常生活已经需要亲人和护士的照料，但是对祖国和祖国语言的热爱，对我们神圣事业的信念，对人间的眷恋，都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哪里知道这样愉快的（即使带着几分凄凉）会面，竟成为我与罗老的永诀。

这次会面后还不到三个月，一个电话传来噩耗，罗老十一月四日离开了人间。一个勇猛的战士，走完了他那充满战斗激情（却不时颇为坎坷）的八十五个春秋。从30年代到90年代，整整六十年，上海这个文化精英会聚之地，语文战线上至少三位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怀念的战士，在最近的八年间相继离开了我们：倪海曙，叶籁士，罗竹风，罗老走在最后。他们做过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在许多方面留下不少的业绩，但是他们，这三位智者，毕生追求的和毫不吝惜地献出全部精力的，却是祖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现代化，即平常所谓的文字改革。前十多年，当罗老听到我将被调去文改会和社科院的语用所工作时，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力劝我不要推辞，他说这正好“一箭双雕”，而“事在人为”，他说，“如果走‘群众路线’，把工作推向‘深入’，是能够做出成绩来的。只限于在专家圈子里转悠，那就无异于‘纸上谈兵’或者‘茶杯里的风波’。”句中的引号都是他自己加的；我知道他的深意，他说的是“只限于”，他丝毫没有排斥专家的意思——这一点，他主持修订《辞海》和编纂《汉语大词典》的漫长岁月中，团结了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就是明证。他念念不忘的则是“群众”。我知道，这是我们这些30年代从事过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老兵们所眷恋的情景。文字改革，到群众中去，群众性的运动，同当时的人民运动浑成一体：这就是30年代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精髓。用时髦的语言说，我们老前辈的文字改革战士，直到80年代还怀着新文字运动的“情结”，或者可以说是革命豪情的延续。收到罗老的信时，我深深地感动了。好一个自强不息的老兵呀！那时我的心情和理

性认识同这老兵完全一致。只是到了80年代后半期，当我有了好几年的在新的条件下实践的经验，加上多次在国外实地考察和跟意大利、土耳其和德国学者的探索，我的观念才稍稍有改变，因为在新的社会条件和技术装备下，我们的文改工作应当有新的工作方法；现时代一方面有着强大的信息传播工具（广播、电视、电影），它的覆盖面之广是过去想象不出来的；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已从火红的革命情趣转到深入持久的文明建设。需要新的举措，自不待言。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机会跟我们这位老兵细细探讨了。

在这封长信中，罗老为着说服我一定投身这项他日夜不能忘怀的工作，他甚至写道：“我们这辈人，似乎要多为子孙后代着想，即使做出牺牲（如个人爱好等），也是值得的。”

他，罗竹风同志，为了信念，为了人民，为了后代，确实是甘心做出牺牲。难怪80年代初，在罗老主持的一次《汉语大词典》扩大的编委会上，他激赏我说的做词典工作的人都要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自我牺牲精神。也许他正是在牺牲和奉献的精神鼓舞下，成为“杂家”的。

罗老是著名的“杂家”。之所以著名，不是由于他是多面手，不是由于他曾在多条战线上奋战过，也不是由于他写得一手好杂文，而是由于他“文革”前夜，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杂文，阐明编辑是杂家的道理，从而倡导编辑要甘心当杂家的观点。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却招来了“四人帮”形成前就是凶狠打手的姚文元的“恶攻”（借用“四人帮”的臭名远扬的“术语”）。硬是把“杂家”无限上纲，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代名词：这就是打手姚文元在某“权威”的怂恿下放出的奇谈怪论。这是“四人帮”的逻辑，野蛮的逻辑，兽性的思维！于是罗老同我们在文化部的干部一样，提前两年进入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他，罗老，因为是杂家，不能不受到比别人更多的灾难。浩劫的事人人皆知，那就不去说罢了。

好容易春回大地。罗老不知年迈，像往昔那样日以继夜地奋战。1982年，三联书店在上海举行的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罗老说他是出版战线上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兵，“在上海，有两界我是比较熟悉的，一是宗教界，朋友很多；二是出版界，朋友更多。”大约在50年代前半期，罗老在上海市宗教局工作。宗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既不能视而不见，又不能用一纸公文把它处理掉。在我国，宗教工作带有统战、民族、意识形态、国际活动等等多重性，只有像罗老这样坚定、诚恳、开朗、泼辣而又谨慎的工作作风，才能处理好。我相信他在宗教界得到许多朋友，就是因为他能处理好这方面十分复杂而微妙的问题。

50年代后半期，他转到出版界，也并没有完全割断有关宗教方面的研究，正因为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又加上其后多年的钻研，他才能胜任愉快地参与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编辑工作。他做得很认真，很细致，但也很累人。他曾写信给我说，“这些日子忙于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基督教分支定稿工作，我是头头（也许是自奉的），到了关键时刻，只好抽出更多时间审稿。几十万字集中突击，不仅要逐句逐字看，而且还要提出意见来，突击了几天，脑袋都胀大了。好在是‘有期徒刑’，日内即可告一段落。”

这时他已七十四五，可他是战士，名副其实的战士，他仍然带头冲锋陷阵；劳累压不垮他，瞧，他还有心思说什么“有期徒刑”那样的笑话呢！

从他搞出版工作开始，我跟他的接触就更密切了，因为其时我也在文化部搞出版。这段合作是愉快的，确实是少有的愉快，因为罗老没有私心，他

从不算计人，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真话。能遇到这样的“官员”，有福了！所以我们很合得来。那时北京和上海的出版界不是没有争端，但是许多分歧都化解了，罗老在这上头出了很大的力气；至于有些协调方案不能兑现，那多半是当时的客观现实造成的，不能怪哪一个人。

大地回春的前夜，1975年在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关怀下，出版界居然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长期规划会议，罗老没能与会；他还在受折磨，还在“战天斗地”，他还没有“解放”，但是参加会议的真正出版家，心中都记得他，因为在60年代“文革”前那一段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他居然完成了《辞海》的修订工作，他是头头，他受多少累，受多少罪，可想而知。“四人帮”溃灭后，罗老复出了，巨型辞书的组织和编纂工作自然而然落在他的肩上。首先是《辞海》的再次修订，这在他是驾轻就熟的；接着是十二卷本《汉语大词典》的组织编纂，由华东五省一市共同负责，“司令员”是老兵罗竹风！天知道这个任务有多重，有多繁。罗老以他大无畏的战士精神，一往无前，灵活应变，团结了许许多多学者，也带出一批决心投身词典工作火海的“圣人”。他会同吕老（吕叔湘）和陈翰伯（当时国家出版局代局长），排除万难，两次上书中央，及时解决了组织上和学术上的重大难题。于是编纂处，出版社，经费，地方合作，语言学专家组成的学术顾问团，乃至编纂人员的职称、升级等等，芝麻绿豆西瓜，大大小小的事，以及有时发生的莫名其妙的麻烦，在罗老的巧妙安排下，迎刃而解。如今看起来，好像理应如此解决，却不知当日花费罗老多少心血呢。

《汉语大词典》经历了十九个年头（1975—1994）终于问世，结束了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竟然没有一部可与牛津或甚至诸桥媲美的汉语权威词典的可怜局面。大词典庆祝会或庆功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我在那里看见罗老时，他已坐轮椅赴会了。岁月不饶人，病魔不饶人，加上老伴先逝，他只得拖着孱弱的病躯，坐着轮椅来了。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他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相对无言；用不着说话，彼此都知道要说什么。十九年！人生有几个十九年？十九年里有多少甜酸苦辣！他知道，我也知道。何况他跟所有同时代人一样，都无缘无故白白损失了整整十年！

然而战士罗老充分利用了他所能掌握的每一分钟去奋战，他永远是一个战士，战士的精神是永远不被压倒的。

1996.11.20

王城，韩中民和《读书》……

我这里说的《读书》，不是现在海内外读书界注视着的那份《读书》，而是50年代到60年代初存在的那份出版行政机关主办的杂志。先是出版总署办，到1954年出版总署并入文化部，就由文化部出版局接着办下去。无论前一个时期，还是后一个时期，我记得主编或实际上的主编都是王城。出版总署时期的《读书》，我只是读者；后一个时期，因为我自己也到文化部出版局工作了，接触得很多——这个时期除了王城外，主要的编辑是韩中民。

这个《读书》，原先是月刊，后来到了“大跃进”时奉命改为半月刊，再后来，到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书读不成了，于是寿终正寝，这倒是很自然的，我是说，它消失得很自然，一点也不勉强，是在意料之中，不感到意外。

这个杂志脱胎于《光明日报》的副刊《图书评论》——这副刊好像一成立就由出版总署主办。《光明日报》不是党报，但《图书评论》却有很大的“威慑”力量：因为那时党的威信高，政府机关的威信也很高，大家知道这份副刊是出版行政机关主办的，它就具有权威的性质。《图书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那就是把一些投机商出版的乌七八糟的“书”批得体无完肤，用不着时下那样动员许多力量去清扫，一批判，书店自然拒绝销售，那些废物就不能招摇过市。不过，建国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图书评论》还是免不了“左”得可爱，因此也伤害了一些很好的书和它的写作者——例如它批评过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说这本书提倡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没有共同之处。这样一批判，书店就把书都收起来了，令人啼笑皆非。

《图书评论》停刊以后，改出的《读书》杂志，却没有这样的威力；虽则人们知道正是《读书》接替了《图书评论》副刊。这个杂志原来的宗旨也是批评坏书，推荐好书，但不知是权威性少了呢，还是读者的鉴别力强了，或者竟是政治运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读者已经没有什么兴趣读书了，总之是刊物的销路总是打不开，有点奄奄一息的样子。50年代末期，主管的部长建议，把《读书》办成图书出版信息大集会，要把全国报纸上的书评都收集起来加以转载，让书店的店员同读者一样，都知道哪些是好书，哪些是坏书，哪些书有什么优点，有些什么缺点……，并且还运用行政力量，规定全国书店每家都必须订一份《读书》，除了供书店店员阅读外，还应放在门市，让读者随时翻阅。可是采取这些措施，也无济于事——因为杂志编得不能吸引人。为什么不吸引人呢？首先是全国的报纸，根本没有什么书评，即有，也不过介绍干部必读那样的书，当然那些书都是好书，但是凡是干部都人手一册，用不着介绍。其次是书出得不多，能评介的更少，《读书》只好按照主观意图找人去介绍编辑部认为值得介绍的书籍，书店自然更不感兴趣，县级书店的店员常被机关抽调去搞“中心工作”，订了《读书》也无人看，或有人而无心看。

做编辑工作的王城和韩中民是很苦的。他们日思夜想，总想把刊物办得更好，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他们常常深夜还在办公室里做着“无米之炊”。他们有时也来向我问计，而我，我能有什么比他们更聪明的妙计呢？没法，只能报以苦笑。

这份杂志的编辑部其实就是出版局的出版一处（管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类

书)，人很少，因此他们除了编杂志外，还要处理许多行政事务。后来胡愈之来了，他老人家主编《知识丛书》，具体任务也落在这几个青年人肩上。王城是出版一处的处长，他手下没几个人，1958年“大跃进”后文化部精简机构，人就更少了。韩中民就是王城的“大将”，还有一个骨干是任际奉，任原来是搞人事工作的，笔头不如韩，所以韩中民这笔杆子就更加忙碌了。王城和韩中民，成了“圣三一”：小小的出版行政“官员”；《读书》杂志编辑；《知识丛书》办公室干部。如果我记得不错，包含大约两千个名目的《知识丛书》选题计划，是韩中民花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炮制”出来的。由于这样的三位一体，王城和韩中民跟我的接触更加频繁：这两个人总是笑嘻嘻地来找我，从不叫苦，也从不怨人。真是诚诚恳恳的好干部，而且是笔头很快的又能起草公文，又能写文章，又能跑跑颠颠去办杂事的好干部。这样的人，现在很少见了。任际奉则曾跟我到山西去“办案”，也很能干，不过不如王、韩那样会写文章。遗憾的是，这三位青年人都先后被癌细胞夺去生命。王城去得早些，是在“文革”前夜或“文革”初；任好像是在那场浩劫中去世的。而韩中民走时，“四人帮”已经垮灭了，他看见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也做了更多的工作，可是我和他已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彼此接触少了。三位都是很勤奋工作的干部，去世时年纪也不大，韩中民辞世时，恐怕还没有过足六十岁。极可惜的。今日竟由我这个比他们年长得多的后死者来纪念他们，真不是滋味，上苍有时是很残酷的。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胡愈之主编的《知识丛书》，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印上培根这句箴言。那是在1961年，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正默默地吞嚼着“大跃进”孕育出的苦果。此刻我已记不得这句箴言是胡老自己提出要加在每本书上的呢，还是我或者王城（文化部出版局一处处长）向他建议的；但无论如何，这个决定是胡老作出的。这也符合胡老当时的想法；甚至可以说，完全符合胡老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愿望，是这位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智者毕生最大的愿望。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我们搞出版的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最广大的群众传播知识。他特别叮嘱我，在发展学术著作的同时，不要忘记普及读物。在他掌管出版工作的两个时期（即在出版总署和文化部担任领导工作的两个时期），他跟我或跟我们几个人闲谈时，总是说，发展学术著作当然很重要，但是出版家在这个时候更要注意组织传播知识的普及性读物；他说，学术著作除了传播机关去组织之外，还有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去督促，可是普及读物却只能靠出版机关去组织。他还提出要鼓励专门家去写通俗性的普及作品，他说，已经获得一定知识的人，他就有义务去传播知识，普及知识；达到高水平的专门家，更加要把他所掌握的专门知识传播给群众，正因为作者水平高，普及作品才能做到深入浅出。在编辑《知识丛书》的时候，他亲自动员大科学家为这套丛书写作，据我所知，他动员过十几个大科学家写通俗作品，其中包括数学家华罗庚，地理学家竺可桢，桥梁学家茅以升，生物学家童第周等等。只有竺可桢写的一部《物候学》，编入《知识丛书》出版了，很得好评。茅以升写的《中国的桥梁》，也许成稿时这个丛书已经“收”了，没有印行；在十年浩劫的后期，我提议外文出版社出版此书（似乎只出了日文本），也许就是以最初的稿本为基础改写的。普及知识，传播文化，可以说是胡老一贯的主张。这个主张的终极目标是拯救中华，即开发民智以挽救这个被内外反动势力欺压的古国和它的经历着多难的人民。这是那个艰难时代所产生的理想，也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梦寐以求的理想。

胡老是自学成才的。时人说他知识渊博，这渊博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博览群书得来的。十八岁那一年（1914），因为家道衰落，便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此前他只读过初中（鲁迅是他的校长），也专门学过国文，英文，世界语。他自己说过，“我只有中学二年级的学历，我读书都是在‘商务’读的。”正因为这样，胡老深知出版工作是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介，在一定时期，甚至是唯一的媒介；所以他毕生都没有忘记通过出版来普及文化。

胡老从他1914年参加《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开始，就以传播新知识为己任。起初也许是不自觉的，后来则渐渐自觉地这样做了。看来他在为拯救中华和开发民智的理想奋斗的半个世纪中，计划、倡议、设计或主持过传播知识的大规模出版活动，前后有五次或六次。最初的一次是在他当《东方杂志》编辑（后来成为这个杂志的实际主编，虽然真正当主编是在“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毁后复业时）。粗略一算，胡老在《东方杂志》工作前后凡十余年，就是在这段时间，是他筹划了编印介绍新知识为主要任务的《东方文库》。

照现在见到的资料，《东方文库》在大约十年间一共出过八十二种，一

百册。六十四开本，五号字直排，灰色封面，很朴素的“包装”；很像那个时期美国出版的《小蓝书》 Little Blue Book 和德国出版的《莱克拉姆文库》 Reclam Biblio - thek——两者均在 20 年代中后期出版，后者出得更晚些。两套书都是六十四开本，灰色或浅蓝色封面。这两套书既有专题介绍某种知识项目，又有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的选本。《东方文库》的内容也兼收专题介绍和作品选本，例如《国际语运动》是胡愈老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介绍世界语的论文汇编，而《枯叶杂记》则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这恐怕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巧合，胡愈老未必看见过这两套书；但东西方的智者的想法竟那么相近，连开本和封面都相似，后人看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五四”运动发生后两年，商务印书馆和它的主心骨张元济锐意革新（因为这个机构已经显得在好些方面不能适应新文化运动的形势和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曾邀请胡适出任编译所长，进行全面革新；胡适考察了商务印书馆之后，不愿意进馆，举荐了王云五。据现在看到的材料，胡适向张元济提过一份选题计划，准备编辑一套《常识丛书》。这个计划提出时，《东方文库》已经出了很多种了。这是 1921 年的事。没有查到胡适建议的这套《常识丛书》是否实现了的记录，按照汪原放的回忆录所载，《常识丛书》共拟出版 25 种，介绍五个国家（日，英，美，俄，德），四个历史人物（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华盛顿），四个政法项目外加一个主义（法律，法庭，律师，国会，过激主义[按即布尔什维主义]），五种新事物（飞机，电报，无线电报，银行，交易所），六种动植矿物原材料（煤，盐，棉，茶，蚕，蜂）。《东方文库》的思路与此不一样。它所介绍的东西，除了基础知识外，还有一些带有很现实意义的题材，例如《华盛顿会议》，《欧战发生史》，《辛亥革命史》，《俄国大革命记略》，《战后新兴国》，等等。《东方文库》着重介绍的科学知识包括当时最新的知识《镭锭》，《相对性原理》，《飞行学要义》，以及对当时读者来说，很有意义的《迷信与科学》（读者会记起那个时期科学与玄学的论争）。这套《东方文库》的出版对当时教育界，思想界和文化界发生过多大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才能判断。无论如何，《东方文库》的编印，可以说是胡老在传播知识事业上最初的尝试。

如果说胡老筹划知识读物的第一次尝试没有得到显著的成功的话，那么，他的第二次尝试，就雄辩地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箴言。这是在 1936—1937 年，即抗日战争前夜，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年代，胡老参与生活书店设计的《青年自学丛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满足了那个时期广大青年的急迫需要，解决了他们对祖国的前途和自己的出路的疑虑，而且真正诱发出力量，使广大青年认识了自己的责任，为拯救中华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后人应当正确地评估这套书对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启蒙作用和宣传效果。

后人只需看看《青年自学丛书》最早传播的书目，联系到当时的形势，就可以觉察到这套书为什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言以蔽之，这套书“击中要害”，能够正确地解答在苦闷忧虑中的广大青年读者的疑难问题。

下面是这套丛书最受欢迎的最初一批书目（至于各书印了多少版次，总共印过多少册，现在都不可考了）：

- 钱亦石：《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
- 艾思奇：《思想方法论》
- 汉夫：《政治常识讲话》

茅盾：《创作的准备》
胡风：《文学与生活》
钱俊瑞：《怎样研究中国经济》
张弼：《现代外交的基本知识》（作者即张明养）
思慕：《世界经济地理讲话》
徐懋庸：《文艺思潮小史》
沈志远：《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孙起孟：《写作方法入门》
吴清友：《民族问题讲话》
平心：《社会科学研究法》
沈起予：《怎样阅读文艺作品》

以上各书都在1936年出版。次年，即1937年，在全面抗战之前，这套书还继续出了好些种，其中包括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柳湜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王纪元的《日本政治研究》，胡仲持的《关于报纸的基本知识》，张健甫的《近六十年来来的中日关系》，以及何干之的两本总结论战的入门书（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任何一个有文化知识和历史知识的后来人，只要细看一下上面的书目，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套书深受当时青年读者的欢迎。后人可以看到，所有选题都切中时弊；所有作者都是当年沪上第一流的专家学者。胡老最善于出题目，最善于选作者。这是胡老一贯的作风。那时，张仲实从苏联回国，胡老即请他进入生活书店当总编辑，所以后人记录这套书的主编为张仲实——这也符合胡老一贯的作风：他在生活书店不担任任何职务或名义，但他协助邹韬奋把《生活周刊》编成抗日救亡运动的喉舌（韬奋被迫流亡国外时，实际上是胡自己来编，刊物上却不露痕迹）；他亲自起草合作社章程，协助邹（韬奋）徐（伯昕）将生活书店办成一个先进的进步的经济实体。胡老在幕后参与设计的这套《青年自学丛书》，无疑是他为传播知识而进行的出版活动的第二次尝试。这次尝试成功了。这次尝试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万千青年读者掌握了理论，于是取得了勇气，参加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

解放后，在文化、学术、出版、教育圈子里，曾有多次提到有没有可能重印或修订重印这套书，但都未能实现。胡老有一回对我说，这套书已完成历史使命，恐怕很难修订，因为写的题材和写的方法太结合实际了。他说，不如组织新的东西吧。——于是有后来的《知识丛书》。

1939年10月，胡老经过种种努力，在桂林创办了一家新的出版社：文化供应社。第一个计划就是出版一套叫做《国民必读》的知识普及文库。胡老后来说：

开始文化供应社就计划编出一套二百多种通俗百科知识的《国民必读》小型书库，内容既密切配合抗战宣传，又能推进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我们还为这套书设计了专门书箱，配以挂图和地图，供给全省基层图书室。打开书箱就是书架，即可展览阅读。

这套书编印时，我已离开桂林，不能作感性的叙述，现在我手头也没有关于这套丛书的资料，我只记得这套书每本约一两万字，类似解放后出版的历史小丛书。也许在那个时候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没有像《青年自学丛书》所引起的轰动。形势变了，这是一；第二，也许没有摸准那时基层读者的迫切需要；再则，也许作者队伍新人较多，还写不出成熟的深入浅出的作品。

胡老要为基层读者编印基础知识读物的意愿，一直延续到解放后。60年代初，他进一步极力为农村读者和农民群众提供知识读物。当他第二次（1959年后）主管出版工作时，他多次提起要设计为农村读者设置一个类似的书箱。特别在三年困难期间，即在“大跃进”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引起严重后果时，他认为提高基层干部和青年的知识水平是最重要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我们出版工作者来说，出版一些旨在向他们传播知识的读物，是责不容辞的大事。我几次陪他下农村调查时，他反复强调要让出版社编印一套一百来种的知识读物，并且设计一个书箱，把一套套的农村读物送下乡。这就是编印《国民必读》想法的延续。但是当时的情况是，老农民文盲很多，况且他们肚子填不饱，没有读书的能力和兴趣。至于农村青年，他们很苦闷，觉得没什么前途，而且同样吃不饱，他们对这样的读物，没有表示热烈的欢迎；基层干部天天搞运动，一个接一个，他们对读书不感多大的兴趣，即使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加上基层很穷，就算书箱连书半卖半送，他们也买不起。除了陪胡老下乡外，我还不止一次带调查组到农村去作实际调查。有一次在湖南和广东一些富裕县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农村还不是那么迫切要书。这事议论过多次，出版社也不太热心，故做个书箱送书下乡的设想，始终没能实现。所以后来胡老改变计划，编一套较高水平的《知识丛书》，对象是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当《知识丛书》编不下去时，他决定自己来干。他亲自计划编辑一部包罗万有的知识娱乐实用各种内容的读物；那就是《东方红》。与此同时，胡老计划开始编辑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百科全书，他说，编印百科全书，既可以传播知识，又可以培养合格的编辑干部，这事也没有能实现。

《知识丛书》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这不是他个人或六个合作的出版社不努力，主要是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开头就注定要失败，甚至可以说，在最初的一回合胡老的设想就被击败了。胡愈老最初要出的第一批书，是要解答当时困扰广大干部包括基层干部的疑难，例如为什么粮食短缺，为什么会浮夸虚报，等等。当时能接触这些问题么？能用文字解答或解释这些疑难么？显然不能。所以在第一次会上（四川饭店的聚会），胡老的这个意图就立刻被否决了。那天饭后回家，我同他一起走，他很不愉快，一言不发。我知道为什么。后来他问过我，为什么《青年自学丛书》能抓住读者最迫切的疑难选题编写，而现在我们反而不能了？我没能回答他的问题，他也不认为我能回答，他也不奢望我能作出回答，他不过提示我思考罢了。

我大前年写《记胡愈之》有关知识丛书那几节（7，8，9）时，没有能够找到一份1962年6月编印的《知识丛书选题计划》；昨天，由于人民出版社几位同志的协助，我手头已经有了一份这样的计划。这份计划是王城和韩中民（当时文化部出版局一处干部，具体兼管知识丛书的协调工作）在六个出版社报送的选题计划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付印前我看过，提出过一些意见，胡愈老和齐燕铭（当时是文化部党组书记，也是这套丛书的热心支持者）也都看过。我记得胡愈之看后不甚满意，主要是说现实性的题材太少了。这份计划是在当年早些时候北戴河会议前几个月编成的，否则连这个材料也不会编印的。

这份计划前面有《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的《说明》。说明共四点，简明扼要。第一点讲明丛书的宗旨和组织：

为了提高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干部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我们准备在三

五年内，陆续编印一套《知识丛书》。这套丛书的具体编辑出版任务，目前暂由三联书店（那时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作家出版社（那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另一个招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分工负责。

第二点说明选题计划分为八个门类，即哲学、经济、政治、历史、地理、国际问题、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共列入选题 1575 种。

第三点说明这只是“一种设想，一个轮廓”，实行时可以灵活掌握，不受限制；第四点说明年度计划由各出版社另拟。

要在三五年内出版一千五百多种书，虽有六个出版社共同承担，在 60 年代也是十分艰难的事。这 1575 个选题，按类别分，由多到少排列，有如下表：

历史 369
科技 301
文艺 244
哲学 211
国际 169
经济 155
地理 91
政治 35

国际问题之所以多，是当时决定每个国家写一本。历史选题之所以多，是不敢多接触现实之故。这应当是后人都能理解的。

这些选题，如按出版社分，则有下面的统计数字：

中华 395
三联 313
商务 262
科普 246
世知 191
作家 168

各家分担的数字有多有少，多半是与这个出版社所担任的科目选题多少有关，也在某种程度上同主持人的热心程度有关。当时热心人士有金灿然，丁树奇，王子野，范用，陈翰伯，冯宾符，楼适夷，孟超等等，如今在这八位热心同志中，已有五位（金，王，陈，冯，孟）作古了。

实际上《知识丛书》两年多只出了三十多种，出版的书中，最受欢迎的是王力为这套书赶写出来的《诗词格律》。王冶秋也赶成一本《琉璃厂史话》，不知为什么说它不合这套丛书的体例，由范用以单行本给出版了。两位王老如今都已西归，书还在。

综观这份选题计划，颇有百科全书之感——而百科全书本来也是胡老多年筹划的项目，只可惜当时的气氛不对，并不是作者或编者的条件不具备，所以计划都成泡影。

胡愈老毕生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他毕生尝试用种种方法传播知识，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效果不那么显著的，但是他这个意愿始终不渝。

至于上面提到的三件事，《知识丛书》，《东方红》，百科全书，我在《记胡愈之》一书分别写过，即 7，8，9，16，17，24 这几节，那里面写过的我就不重复了。

1996.5.8

《书的故事》的故事

胡愈之在他辞世前一年，留下了一份《自述》，中间有云：

这样 1936 年 4 月间，我和潘汉年又（从莫斯科）经法国坐船回香港。在旅途中无事可做，我还从法文版转译了苏联作家伊林著的少年读物《书的故事》，后来在生活书店出版，这也算是一个额外的收获。

这部书于 1937 年 1 月由生活书店初版，5 月再版，半年之后，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在这之前，此书已有两个译本：一是董纯才译的《白纸黑字》，1933 年 4 月上海良友版，后转到开明 1936 年 8 月印行，改名《黑白》；另一部是张允和译的，1936 年上海中华版，也叫《书的故事》。于是有胡愈之 1936 年 11 月 7 日（注意：11 月 7 日，十月革命十九周年纪念日，那时我国的进步人士无不为此节日欢呼！）写的《译者后记》。后记里说，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此书已有两个中译本，却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后记又说，经他对照以后，发现英译本删去了原书最后一章最末几段文字，“另外却又在上篇第三章后面，加上了一个故事，是嘲笑黑人的愚蠢的。”

后记接着写道：

当初我就怀疑法文本不忠实，就请张仲实先生用俄文原本核对，才知道法文译本是比较忠实的，英译本却把原作增删了许多地方。

我现在手头没有其他两个中译本，不能揭出英译者恶毒地增加的那个种族歧视故事来；但无论如何 30 年代初的苏联作家绝对不会写出那样的故事；即使写出，出版社的编辑也会把它删去。六十年过去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对出版界的后来者启发很大：这应当是出版的社会史中重要的一节。

作者伊林，1895 年生于圣比得堡；正好是胡愈之的同时代人（只比胡大一岁）。伊林是三四十年代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作家。他的作品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吸引过无数爱好科学的进步青年，直到解放初期，他的作品在新中国还是走红的。多数读者不知道这“伊林”是马尔夏克的笔名——也幸好不知，否则人们又会误会他就是那个写了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的诗人 S·马尔夏克了。伊林是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个应用化学家，他的哥哥就是那个著名的诗人——儿童文学家（他的著名儿童诗《密斯脱特威斯脱》恰好是讽刺美国歧视黑人的，我曾在 1947 年译登在开明书店的杂志上，听说 1949 年曾出过单行本，不过不是开明出的）；他的妹妹伊林娜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她的小说《第四高度》有任溶溶的中译本，改名为《古丽雅的道路》，此书印过多次，有过多少中国少年儿童为这第四高度而奋斗呀！）。伊林读完高等技术学校后，就专门从事科普创作，他的作品，时人称之为“科学文艺”。

《五年计划的故事》（原名是《一个伟大计划的故事》）不是这位作家的第一部科普作品，却使他名传四海，并且使他在世界进步文艺界享得盛誉。也许这是靠他把文学跟科学结合起来，并且结合得那么优美，那么动人的才能；也许是靠他能把最复杂的科学技术用最简明、易懂和扣人心弦的技巧表达出来；——所有这些，当时的大作家如高尔基，如罗曼·罗兰都称赞过了。也许还不止此。这部《五年计划的故事》也许还靠那时激动人心的“新事物”：一个新的社会，或者说，一个新理想的试验场地，一群新人物，古老的科技在崭新的社会条件下，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改造成为一个富强的理想国——至少那时是这样想的，所以伊林这部描写当时被全世界注视的苏联第一

个五年计划的心态和科学设想的通俗读物，受到左的和右的读者群的极大关注；何况其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陷入悲惨的经济恐慌（1929 以还），这就使这部科学与文学，科学与社会，科学与理想巧妙结合的小书，风行全球。这就是我上文提及的出版社会史。

伊林其后写了一连串同《五年计划的故事》相类似的作品，其中包括《十万个为什么》，《山和人》（中译本作《人和山》），《人怎样变成巨人》……以及本书《黑和白——书的故事》。所有这些读物，可以说，开辟了科普读物的一个新纪元，它们不只受到了少年儿童欢迎，同时也受到大人的欢迎，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在我们中国也不例外。

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头一种译本是 1931 年 12 月在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译者是吴朗西。在这四个月前（1931 年 8 月），这家书局刚出版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初版一下就卖光了，接着再版，然后才出这部《五年计划的故事》。这都是 1931 年“九·一八”前后的事。

新生命书局本来是一家国民党右派政客周佛海、陶希圣和右派文人樊仲云主持的出版社，后来在抗战中这些头脑都变成汉奸。但是 30 年代初，进步文化界却巧妙地利用了这家书局出版了一些好书。五十多年后，胡愈之回忆说，樊仲云原来也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做过编辑，与胡愈之同过事。他后来脱离了商务，依靠汪精卫派的势力办了新生命书局，还出版一个杂志：《社会与教育》。为了杂志打开销路，樊仲云不得不找一些进步文化人写稿子，这样，胡愈之通过世界语游历莫斯科（1931 年 1 月）——也是胡愈之第一次到苏联——所写的散文纪事，就先在《社会与教育》连载，其后出了单行本。胡愈之回忆道：

这本书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查禁各种进步书刊的情况下得以出版，可说是件侥幸的事。这是因为文章最初是在樊仲云编的杂志上发表的，书也是在他办的书店出版的，所以没有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但后来就不得了，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从 1931 年 8 月到 1932 年 10 月，书就再版了五次。……国民党终于注意了，书就遭到了禁止，但在香港、南洋翻印出版的还很多。

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却没有被查禁。这也是一页很有意思，也很有趣的出版社会史。

《书的故事》讲的是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从文字的历史开始，讲到发明纸张和印刷术。更准确点说，是信息革命以前信息传播的故事。确实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使读者一点不费劲地获得了几千年来人类如何靠文字，图画，印刷来积累知识，传播知识，普及知识的历史。书的最后一章讲“书的命运”。最后一段被英文本删节的是讲人和书同时被焚烧的故事。

故事说，十六世纪法国里昂排字工人大罢工（作者说，“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次排字工人罢工罢！”），这次罢工持续两年之久。有一个印刷所老板名叫陀莱的，“背叛了他的同行的老板，帮了工人许多的忙”。工潮结束了，那些老板们没有忘记这一回事。五年以后，印刷业的老板们联名控告陀莱，罪名是印刷反宗教的书籍。作者说：

这案子很快就判决了。陀莱被判处死刑。他和他所印刷的书，一起在巴黎摩贝尔广场，被架着柴火焚烧掉了。

书写得较早，纳粹还未上台，否则作者肯定会写出纳粹焚书然后焚人的故事，而且肯定会写得有声有色。

书的故事是从找寻世界上第一本书的故事开始的。

从前有一个人，作者说他是个好事的人，我则说他是个书迷；他发誓要找寻世界上第一本书。他从这里找到那里，从一个图书馆找到另外一个图书馆；一年一年过去了，他没有找着，反而有一天大概是疲劳过度，从一个图书馆的书架上摔下来摔死了。

“但是就算他能再活上一百岁也休想达到他原来的目的。因为世界上开头第一本书，在他出世前几千年，早就变成泥土，埋没在地底下了。”

伊林这样说。

原来——作者说——世界上第一本书，不是印刷品，而是人。是活人。最初的书就是能说话的人！知识和信息几千年前，是靠了活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如果伊林今天还活着，他会写下去，他会说，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书，也将不是印刷品，而是——电子书！电子传播的书。通过电子计算机，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国际互联网络的“书”！

这也是出版社会史的一页。

无论如何，重温一下伊林的《书的故事》，特别是重读一下把整个生命跟书，跟出版，跟印刷联结在一起的胡愈之翻译的《书的故事》，还是很有趣味，很有启发和很有教益的。

1996.6.3

重读《尼罗河传》

半个多世纪前，当我热衷于研究地理，并且写出我的第一本书，或者说写出我的第一本地理学著作时，我就读过当时出版不久的《尼罗河传》。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作家的存在——路德维希·爱弥儿·路德维希。看姓氏的拼法，我估计这是德国人，或者奥国人，却不知道他那时早已成为一个瑞士公民。我不记得我读的英文译本有没有译者的前记或后记介绍路德维希，我只记得我完全被这部大河传记吸引着了。一条大河！一条河也能像一个人那样被写成“传记”！我才觉悟到一条大河就是一个伟人，既然许多作家为伟人写传记，为什么不能为一条河写传记？何况人去了，而河还在；伟人去了，大河还在。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曾给人间留下业绩，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而江河何尝没有给人间留下可歌可泣或者可诅咒的痕迹呢。

路德维希把大河看作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人，然后他把地理融化在历史中，把自然现象跟社会现象交织在一起；当然这是很危险的创造，但一个灵魂的工程师宁肯去冒这个险。他成功地写了尼罗河。他甚至说过，他把这条河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是写一部通常意义的历史书或地理书，更不是要写一部旅游指南，而是要“讲述一个伟大生命的故事”。为此，他三次考察尼罗河，去过它的源头，去过它的中游，去过它的出海口，去过流经的沙漠、沃土、乡村、城市，接触过许许多多河边的居民，黑人，白人，土生土长的人，外来的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人来了，人去了，而河却不断地流，流；正如作者说的：“朝代来了，使用了它，又过去了。但是河，那土地之父却留了下来。”

路德维希对尼罗河倾注了无限的感情，他用色彩代替了线条，他用形象代替了统计数字，总之，他像写伟人似的写活了一条河。在这位作家笔下，尼罗河好像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条最可爱的河，最有生命力的河，甚至是地球上无与伦比的河。作者这样说，因为他爱上尼罗河，因为他深深地爱上这条河。爱常常使人昏头昏脑。这不能怪他。而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河，都有着感人的经历：每一条大河，都经历了盛与衰，都记录了人间的欢乐与苦难。每一条大河都是一部人类奋斗的历史，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都是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史。

记得年轻时看到《尼罗河传》，立刻想起了我们的黄河。如果有人写出一部《黄河传》，它会给我们多少欢乐和忧伤啊。后来，在战争中，冼星海用音符写了黄河，乐音感染了即使从没有到过黄河的听众：这是中华民族魂啊！《黄河传》——如果写出来的话——也许会被称为史诗般的作品，它将表达了整个民族从童年到少年到中年到成熟的风貌。人会消失，伟人也过去，唯独一个民族不会死亡。一条河，一条大河，千秋万代都在那里不断地流着，流着，流着，直到永远。也许这话符合路德维希写的一系列传记的精神：人说他的传记是一种“人情化的传记”（humanized biography），或者可以译作“人性化的传记”；而西方的文论有时又称他的传记是当代新闻记者写的古代或过去的旧新闻。他写古人，也写今人；他写政治家（如拿破仑和埃及女皇），也写艺术家（如哥德和贝多芬）。人情化了的尼罗河也是他的描写对象；据云他还写过一部《地中海》，未见。他这部《尼罗河传》的写法也很特别，他自己也说故意用这样特别的结构来写的。书分五章：冒险篇，野生篇，斗争篇，征服篇，出海篇。

1931年他到过苏联，见过斯大林，有谈话录传世——简单地说，斯大林不会同意他的观点，如果他是苏联人，也许他就被消灭了。但他是德国人，或者说，是瑞士公民，他好端端地活下来了。他持的观点是很古老的观点，个人是主宰历史进展的决定因素。他强调人的因素，也许强调得太过分了，而他描写的人又是提高了的超现实的人情化了的人，所以后人称他为唯心史观的新派传记家。

但《尼罗河传》是河的传记，不是人的传记。这里面人，兽，史，地，自然和社会，过去和现在，熔冶于一炉，是一种新的探索。他是上个世纪生的（1881），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直到冷战快开始的时候（1948）才辞世的。不知什么道理，微软公司今年推出的光盘百科全书《Engarta 96》竟没有收他的传记——传记家的传记反而没有了，很怪，辞书的编辑有时的思路是捉摸不透的。

下编

《苏联名歌集》前记

俄罗斯！从二十世纪30年代起，这个名字曾经给人们多少鼓舞，多少激动，多少憧憬！在这新生的国土上面，人类在创造着他们的新生活。新的社会中，是新的人物，新的工具，和新的艺术。

俄罗斯——这“无知”农民的北国，在仅仅二十三年中间，变成文化的，愉快的，艺术的国土，这是多么值得惊异呵。

这新生国土上面的新生艺术，引诱着我们年轻的一群。

从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就被一首叫做《伏尔加船夫曲》的民谣感动到落泪。那沉毅的歌声，那雄健的音响，那生活在高压下苦痛的呻吟，那确信自己力量的呼声，是世界艺术家都要赞佩的。

而那正是一首俄罗斯的民谣——俄罗斯音乐的源泉，苏维埃音乐的基础。

于是不记得是在那一年了，靠了世界语，苏联远东区教育学院的一个女生M君寄来了迷人的两个小曲。其后列宁格勒的工程师G君夫妇也给我们寄来了好些著名的同时是流行的短歌。我们贪婪地唱着。音响感动着我们的心灵。一定有许多人也热望着这些音符的罢。于是我们决心要编译一本北国的歌集，从那时起我们到处收集材料。

椿芳君翻译的《祖国进行曲》，给我们以极大的鼓励。这个小曲，在那晦暗的不愉快的日子里，带来了对祖国的热爱。这首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国土，在歌唱者的血液中灌注了新的力量，那是保卫祖国的力量，反对侵略的力量，那是争取自由解放的力量。

民族解放战争终于爆发了！

我们在战地，在后方奔走着。我们编完了一本《新歌初集》，我们又记起编一本北国的新歌曲的事情了。责任推在我的身上。

一年来，若断若续的，在炎热得连狗也懒出门的夏日，在冷得鼻子通红的严冬，我挤出了睡眠的时间，译着译着。为白天繁重的工作弄得疲倦了的身躯，往往要支持到午夜以后。然而那具有新生命力的歌曲在鼓舞着我们的灵魂。在这些翻译的日子里，歌中描写悲郁的旧俄生活的苦恼的情绪，使我联想起祖国苦难的人群，我激动，痛苦积压着我的心，我忍受着，同时幻想起我们光辉的未来。于是描写新的生活的愉快的旋律出现了，它使我欢欣，它使我喜悦，它使我竟至歇斯底里地狂叫起来。

情感是在起伏着。夜间的的生活有好几个月是这样过的。

歌曲大体在本年六月间就译完了。这之后便是和余荻同志再三的朗唱和修改。我们自己的贫乏的语言，往往使我们苦恼。西洋诗歌的整齐的节奏，八个音节一行的歌词，常常使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推敲译句的字眼。但偶而得到确切的表现时，那种欢喜足以抵偿一百倍的苦恼的。

译诗的困难，已是尽人皆知；而译歌的困难，还要加上配合音乐的因素。而我们对于译歌的意见，是主张非万不得已时，不改动乐谱（如一拍拆成两个半拍音符之类）的。我们尽量使歌词与乐曲配合；自然因为人力和时间的

不足，更有因为重译的关系，也许很多地方还不免要待修改的。但我们坦白告诉读者：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最上善了。

歌曲的选择，读者只要看曲目就可以了然的。大体上苏联声乐各家的各派曲子都有作品选进去。从简单的民谣曲一直到复杂的交响音诗，从独唱到合唱，鼻音合唱，和唱，都大体具备了。这许多歌曲中，除了一些民谣曲之外，只有柴可夫斯基的一个曲子属于旧俄的范畴。

为了帮助自己记忆，我随译随记下了二万言的解曲。我一并发表在这里，也许它能多少帮助读者的了解。

文字部分，我们称之为《苏联音乐常识》。其中《俄罗斯音乐的发展》，是比较长的一段。这之中的材料大多采自 V.Feman 教授、M.Grinberg, S.Shlifstein, 徐迟，安娥，A.Aleksandrov 教授诸家的著作。《苏联民族音乐》采自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通信部的稿子，而《天才青年的音乐学校》则据莫斯科国立音乐院院长 A.B.Goldenweiser 的文章。大概这几篇文章合在一起，可能绘出了一个苏维埃乐坛各方面的形象吧。

写到这里，似乎要说的话都已说完。歌集什么时候印得出来，那是完全不能预料的，一转眼就是半年！预料得到的也许会有一些不着边际的谰言。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新生的音乐决不会在无谓的谰言下死灭。正相反，这个国家的革命，早已给人类带来新的憧憬。而在这基础上产生的战斗的音乐艺术，也将给世界乐坛带来一些新的希望罢。

假如这本集子对于在战斗中的中国人民，或者艺术战士，能尽一点鼓舞作用，那么，我的努力不算白费。

(1940年初冬)

《地主之家》中译本初版序

—

记得高尔基曾在一篇文章里，举出一些世界性的文学作品时，提到了萨尔蒂珂夫·谢德林笔下的普尔辉莱·犹独式加——这就是本书的主人翁。克鲁泡特金在他那一组著名的关于俄国文学的演讲里，曾把本书的名字，作《戈罗维略夫的绅士们》，这些演讲，后来收集起来用《俄国文学：理想与现实》的名字出了单行本，有两种中译本，可以参考。1931年出版的一个英译本，是出自达丁顿夫人（Mrs. Duddington）的手笔，题名作《戈罗维略夫家族》（The Golov-lyov Family）。两个不同的译名，都是出自原文

é?? 的。我的译本把那用汉字写出来就变得非常冗长的名字，改成现在的样子。

这部作品，是十九世纪中叶所谓“倾向派”作家M·E·萨尔蒂珂夫·谢德林的名篇。它写成于1872年至1876年，可以说是谢德林后半生的力作，把农奴制度开始崩溃和崩溃以后的地主家庭的必然命运，写得极其深刻。在这之旁，十九世纪时代的俄国农村生活——特别是没落的贵族地主生活，活跃纸上。这部作品所创造的典型——犹独式加，在一般的评坛上面，是被称为“莎士比亚式”的典型的。

二

作者萨尔蒂珂夫，或者更为人所知道的笔名谢德林，他的全名是米哈依尔·叶夫格拉弗维支·萨尔蒂珂夫（1826—1889），谢德林是他的笔名，在好些册籍里，现在的人们常把他的笔名联在一起，唤做萨尔蒂珂夫·谢德林，即是《死魂灵》的译者用了许遐的笔名，在《译文》最初的几期内介绍了他的《饥馑》的那个萨尔蒂珂夫·锡且特林。

萨尔蒂珂夫出身于富有的地主之家，但他从年青时代开始就献身于那些年代俄国觉醒的知识阶级的事业里。他最初在文坛出现，是用了翻译拜伦和海涅的诗人的姿态的。在1841年他也印过一本自己的诗作。但从1847年起，他就开始写小说。他用聂巴诺夫（Nepanov）的笔名，发表了最初的长篇《繁复的物事》；为了这，他被贬到维雅特加这个僻静的乡下八年（1848—1856年）。他的工作是在当时的边区官府里做一个小官。这几年的生活，供给他丰富的材料，使他写成了另一部《乡镇见闻》，这是1857年的事。这部书，连同他以前的讽刺作品，暴露了同时代俄国各个阶层的真实。这都是用了谢德林的笔名，发表在诗人尼克拉索夫主编的杂志上面的。当它刊出的时候，读者用了欢喜的声音，向它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代的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部作品非常赏识，认为它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应该算到俄国生活的历史事实里面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用了比这更苛刻的言词来诛罚过我们的社会罪恶，也没有人用了比这更无情的态度把社会的病毒给我们暴露。但《乡镇见闻》决不是以揭发恶官吏为目的的，它只是社会环境的忠实底艺术的再现……

一切社会成分中的腐败臭气，在他的尖锐的笔锋下面，暴露出它们的丑恶的本质。他的以讽刺为基调的作品，虽然常常惹读者发笑，但同时，从内容的本质看来，却是无比的阴郁，这恰如戈果里的笔锋一样的惹人发笑，一样的辛辣。

1868年他辞退了他在小官职，献身于写作。其后的两年间（1869—1870），他从事制作另一个名篇《一个市镇的历史》——这里边的一两节，已经由许遐先生介绍了给我们。——1872年他写了《塔什干族的人们》，其后的四年间他创造了这部作品《戈罗维略夫绅士们》。到1880年起的五年间，他写了许多小故事，或者称做寓言，后来集而成《故事集》，英译本作Fables。这些小作品最为人所熟知，连在我们这边，也早就有过三五篇的翻译了。到1887年为止的三年内，他写了《普舍干尼耶的往昔》。

他揭发了旧世界的暴虐、无耻和怯懦；然而他的艺术手腕，却把尖锐的讽刺藏在艺术的形象当中，使他的作品不致于陷入应景的浅薄的泥沼里。他创造了只要人类社会的不平存在一天，就永远不会灭亡的鲜明的典型和性格。因此他的作品使同时代的知识青年，确信旧的将近崩溃，新的必然产生的真理。

卢那却尔斯基把他称为“真正的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乌里雅诺夫和约瑟夫也经常提起他的名字和他所创造的典型。

三

但在目前的这部作品里，你将看不见《寓言集》那样的笔调。它勿宁是一本沉重的巨构，沉重得最后那一节使你不能呼吸。但也并非说它的情节离奇，不，他的故事勿宁说是简单的。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惊人的艺术手腕，可以看出作品的伟大的艺术成就。

书里的主题是写县里的一个地主的家族，在农奴制度正在灭亡的时代，怎样升起和怎样迅速地毁灭。这里面的人物都是些卑鄙的，自私到不可想象，如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地方所常见到的一些家伙：但是他们却深深地吸住了读者，得到读者的同情；并同时把他们以及他们的那个时代必然没落和衰亡的理由，清楚地告诉了读者。

这个家族悲剧，在丈夫乌拉第米尔·米哈依里支和妻子婀莲娜·彼得罗芙娜的各走极端的开初，就预示出来了。在他这方面是憎恨和害怕，在她这方面是欲望。这整个的不和，就预兆了四个孩子——斯蒂潘、安娜、普尔辉莱和巴佛尔的不幸，他们都被母亲当作一个负累。母亲——女主人翁婀莲娜·彼得罗芙娜是一个生意经十足的女人，她把全部精力用来增加她的庄园和财产，虽然有时她也问自己，“我把这一切财产积蓄起来，忘饥失眠的，是为了谁呢？”她的无情的心，在一连串的优秀描写里表现得很清楚。她对她的长子“呆子斯蒂潘”的态度，是她的不可想象的程序的一部分。他简直被当作一种障碍。四十岁的时候他就无路可走，只能回转戈罗维略伏来，他被指定在庄园办事处的一个房间里，给他吃不饱饿不死，接着——简直忘掉他。斯蒂潘已经消失了希望和计划，为了度过那漫长而单调的冬天，他发现

烧酒是他唯一的救星，外边是灰暗可怕的日子，而他的内心却是死一样的空虚。这几页优秀的描述，真实得极其可怖！在一种喝醉了的疯狂情况下，他跑掉了，可是后来给找了回来，但他的心神已经空无所有，他从此就变得一声不响了。

斯蒂潘这样默默地死去。十年之后，是他的弟弟巴佛尔的死。在这些插曲的处理上，绝无半点枯燥。正相反，作者以其无比的丰富语词，编织了一个尖锐的对照。

七十岁的彼得罗芙娜，早已解除了她的专制支配权，把庄园分给了两个儿子，这之后又被犹独式加的不可忍受的锱铢计较的卑劣赶出了戈罗维略伏，变成巴佛尔的杜布罗维诺庄园的一个食客了。在这情形之下，彼得罗芙娜的晚年是绝望地寂寞的，她发现她一生劳碌，是为了“一个不存在的家族”工作着。两个兄弟互相憎恨；他们也从来没有理由要爱他们的母亲。她把自己消磨一世，结果只是为了一个幻影。

巴佛尔死了，那是凄寂的死亡。现在进到小说的核心。犹独式加这典型一节比一节地更其活现了。他是可以称为俄国式的假好人的，但作者在这上头写了一两千字的申辩。他到处嗅着他可以得到的利益，他用双手把它抢回来，于是用了无涯的话语海洋，苦恼着别人和自己。甚至当他把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一个地赶到死亡线上，他也从不曾想到过他自己要负责任。只有她的管家妇——叶芙柏拉克西雅是他的天罚。在描写犹独式加的儿子彼盾加最后回家的一节，和彼得罗芙娜的死的一节里，这部作品进入了极大的深度。

安娜的生命在小说很早的发展中就完结了，但她遗留下来的两个孤儿安宁加和卢宾加，终于出走，去做女优伶去了。她俩的不幸的一生，卢宾加的自杀，安宁加的回来，处处和犹独式加这典型的发展交织着。在彼得罗芙娜死后，安宁加是回到过舅舅家里一次的，其时她播下了种子，使叶芙柏拉克西雅成为毒害犹独式加的生存的因素。接着是描写这个不幸的管家妇如何向她的“主人”犹独式加复仇。犹独式加为了自卫，就完全退入他的书室里了。当安宁加最后回来的时候，悲剧就发展到顶点。唯一的逃避是烧酒。而在这发展当中，犹独式加的天良一天天发现了，终于在大风雪里冻死路旁。

在一个地方，作者这样地写道：

有好些家族，好像已经不容易逃过灭亡的命运了。特别是在俄国星罗棋布的小地主阶级里，更可以瞧见。他们没有事情做，和社会生活没有接触，没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有一个时期是由农奴制度所掩护的，可是现在呢，没有掩护他们的物事了，他们正在把生命底残余，花费在塌壤了的乡下屋子里面。

四

这本书，是去年在一个偏僻的寂寞的地方开始翻译的，不幸敌人的炸弹，竟毁去了我的一切，连同好些原稿。今年春天，由于一个出版家的极力怂恿，好容易借来了英译本，把它重新弄了出来，翻译中虽得原文节本，但又因为节得太短，无法对照，也就等于专门靠的英译。日以继夜地赶了出来，谁知时迁境变，这个出版家大约是以以为出世界名著，不如《水浒》、《红楼梦》之类来得赚钱，竟把他的约言，忘得一干二净了。于是译稿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我也并不在心急，因为我已着手另一本书的译作，但偶尔也记起：犹独

式加这个典型的创造，是值得介绍给这个古国的读者的。如今居然有人肯把它印出，我如释重负，就写了以上的几千字，作为介绍，战争中屡遭变故，材料失的失，炸的炸，详尽的介绍，就只能等将来了。

临末，感谢一个朋友：在我心情恶劣的时候，他用了那样的热情激励了我，对于这本书的出版，他又做了媒婆的工作。

（1943年中秋节）

《科学与日常生活》 译者序

这里翻译的四十四篇科学小品，是从英国有名的进步科学家 J·B·S·海登氏的论文集《科学与日常生活》选出来的；原文每一篇都曾发表在《工人日报》上，作者说：

“每一篇东西，我竭力要做到两点。

“首先，我竭力讲出一些至今在教科书里还找不到的事实，而且是那些得到学位离开大学的学生不会知道的事实。”之外，我竭力把这些事实跟每天的生活联系起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普通教员认为最困难的事。”

海登教授每星期在《工人日报》发表一篇这样的科学小品，几年来没有间断过。其中，首七十篇早已结成集子出版，就是上面提到的《科学与日常生活》，其后写的，似乎还没有结集，但是中国的读者倒是有福气的，因为这些论文的另一部分，最近有了中译本的专集了。

作者海登教授，生于 1891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服兵役，被派到法国和伊拉克去，两次受伤。他是当代有名的生物学家，现任伦敦大学的“生物数学”教授——生物数学是他创始的一门学问，照他的解释，即是高等数学应用于生物学上的学问。1932 年起，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皇家学会是英国最高的科学组织，皇家学会会员 (F·R·S) 的头衔是比之什么博士、教授之类光荣得多的。1940 年起，又被选为皇家学会的评议会委员。

他不但是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斗争的战士。西班牙内战的时候，他曾亲到西班牙去为自由民主而战。其后他又担任英国《工人日报》的编委会主席。

除这些通俗论文之外，有专门的著作：《动物生物学》（与 J·赫胥黎合著，1927 版。），《遗传与政治》（1938），《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1938）等。

这里辑译的四十四篇论文，我把它分成五组，第一组是讲食物的，第二组讲居住——即所谓环境的问题。主要是讲空气，传染，等等。第三组讲自然界和一般的科学论，而以《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作结束。——这篇文章是他的上述文集最后一篇，在这里，他指出“没有一种事物是只有一个因素的。”他举例：

“正如我们说房子起火是因为有人丢下一根香烟头，而不是因为空气里有百分之二十一氧气。但是木头在只含百分之十五氧气的空气中，是烧不着的；这一点也满对。”

所以，他指出了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可是你想知道所有原因之后才去思想或行动，这就不是科学，而是迂腐。如果你拒绝承认我们能够控制的一个新原因，或者甚至可以预言它的变化的原因，这就是依附古老教条的象征。”

“所以，”他结论说，“我们科学家改变我们的理论，是不必烦恼的。这是一种健康的象征。”

至于最后的两组，讲的是进化与遗传，这是作者所得意并且是作者所专门的学问。

《科学与日常生活》，英国海登 (J.B.S.Haldane) 著；中译本上海生活书店 1947 年版。

《科学新话》，林曦、李亚合译，新知书店 1946 年版。

这些译文的一半，是去年六七月间在重庆译出的，另一半则是今年年初到了上海之后陆续译出的。因为篇幅太大，同时对于有些中国的读者不十分有兴味或已熟知的，共抽去二十六篇。这里的四十四篇中，也有所删节，译者认为失了时效或对此地的读者不甚合适的，都给删掉了，这一点，正合乎作者所说：

我们必须向外国的读者告罪，因为我所举的例子，大多数是英国的例子，但我希望我可以鼓励对当地情形很熟悉的作家们，在外国照我的样子写。

读了这几句话，我起先是准备根据他的书改写的，后来还是照样译出，译出之后再略加删节，因为改写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事。

最后，对于所有关心和帮忙这本书的出版的朋友们，我寄以无限的谢意。

（1946年7月，上海。）

《平民世纪的开拓者》后记

这里所收集的十三篇（其实是十四篇，其中有两篇拼做一篇）文章，是我这两年间所写的关于人物的述评的结集。最早的一篇写于1945年2月，最晚的一篇写于1946年10月。在这个期间里面，除了一些短稿及虽已发表但现在已无从收集的之外，我的关于传记之类的东西，大抵都收在里面了。我不把它们称做传记，是因为在这许多篇当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和通常的所谓“传记”相像；大部分形式既各不相同，内容也大抵只写一个时期或一个事件，因此有的变成特写，有的只是发抒感想，有的倒是长篇大论，泛谈一群人了。所以如此的原因，现在回忆起来，是有好几个的：——

第一，这些文章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写出来的，最初也没有打算每篇写得一律，好让后来收集成书。而写作的两年间，又是世事变化得最厉害的日子；别的不去说它，单就我自己而论，这两年就迫使我由南跑到北，由北跑回南，又由南跳向东。生活既然变化得这样厉害，文章的体例也就不能强其相同了。

其次，这许多篇可以说是我对于传记这一部门的尝试。既是尝试，也就大胆的写，并且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写。

方式虽然不同，可是这十三篇的中心，却只有一点：写人。青年们对于“人”往往有美丽的憧憬。一个学音乐的，他的心中总有一系列的“神”：巴赫，莫扎特，贝多芬，一个爱文学的，他的心目中也另外有一系列：荷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对于各自心目中的神祇，他们寄以无穷的追慕。在追慕之余，也常常惊骇于他们的“神奇”，这就是说，因为时间与空间的阻隔，使他们不能透澈了解这些英雄们的成长是积聚了无数的艰辛斗争而得的结果，往往以为英雄们都具有“神奇”的力量，登高一呼而天下平。时下的所谓“传记”家们，便利用了这种心理，总是把人们心目中的伟人们，描写成一些离开人间的神。要写革命家，就连他两岁时候的啼哭，也合乎革命的规律。我曾不止一次地厌恶把人变做神的看法。我相信一定也有不少的青年朋友和我一样地厌恶。所以当我一有机会来作写人的尝试时，我就努力将巨人还原做一个人。不论我的尝试只有百分之几的成功，我还执着地要这样做。

英雄的事业就是一连串的苦斗：——与命运的搏斗，与恶势力的搏斗，与传统的搏斗。在这艰难而孤寂的战斗中，时时有痛苦，有错失，有迂回，但自然也有欢欣，……于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战胜了！这就是英雄。这中间，依我来看，没有一点奇迹，没有一点侥幸。如果你了解这苦斗的过程，那么你就能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倘使我们太弱”，罗曼罗兰这样写道，“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

多少年来，A·莫洛亚（Andre Maurois），E·路德威希（Emil Ludwig）吸引着我，S·茨维格（Stefan Zweig）吸引着我，而罗曼罗兰尤其吸引着我。贝多芬，托尔斯泰，米克朗琪罗，柏辽兹，哪一个不在罗兰的笔下放出光辉？这不是上界的光圈，这是人间味的光辉。这里最初几篇，就是在罗兰的影响下面写成的。——《罗兰》（第十），《斯大林》（第四），《罗斯福》（第一和第二）都有这样的倾向。住在重庆时候，我又读到了美国的新进传记小说作家法斯特（Howard Fast）的几部作品，集子里有两篇是受他的影响写成的。

这十三篇文章分成四辑。第一辑是关于伟大的罗斯福。他的死，现在已经证明，是全世界无可补偿的巨大损失之一。谁也不能说人可以扭转历史的行程；但是一个英雄却能够加速历史的进展。罗斯福就是这些英雄当中的一个。如果在战争中换了一个杜鲁门做美国总统，如果贝尔纳斯代替了赫尔做战时美国内阁的国务卿，那么，美苏英就断不能像在过去几年间地合作，因此胜利也就不能这样快到临。——虽然人民都知道法西斯蒂是终有一天会垮台的。

当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传到山城时，每一个人心情的沉重，真是不能描写的。悲哀而惋惜的浓雾，顿时遮盖住这个战时中国的首都。连对于政治的感觉最迟钝的人们，也免不了叹一口长气。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写下了第三篇的 1。第一，第二两篇却是此后一月写成的。一年之后，中国由合而分，怀着比去年更沉重的心情，我写了第三篇之 2。又因为这篇的对象是更年轻的读者，我又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只重复了一次罗斯福生前所指导的几个原则。

第二辑的第一篇所记关于斯大林的故事，是根据苏联几本传记书写的，其中有一本是雅罗斯拉夫斯基 (Yaroslavsky) 的《斯大林的学生时代》。篇前所引的歌，是名诗人因纽希金 (Iniushkin) 写的，曾由十多个音乐家分别谱成曲子，得奖的哈察吐兰 (Khachatryan) 的大合唱，也是谱这首歌的。我译的《苏联名歌集》(1941) 里面就收有同一首歌的三种谱。

第六篇关于苏联科学和科学家，是根据好些专书的材料写成的。我特别爱好巴夫洛夫给青年的那一封信，所以也译在最后一节里。这一篇不是讲苏联的科学家怎样生活，而是泛论科学与科学家在这个新世界里面的预见，组织，工作与发展的。

有一个时期，我曾打算写一系列的民主战士的传记。这当中包括美国的杰菲逊，法兰克林，林肯，潘恩，法国的卢骚，伏尔泰，英国的米尔顿，俄国的罗蒙诺梭夫，赫尔岑，……但是我只写了其中的两个(法兰克林和潘恩)，即第三辑中的第七第八篇，就没有写下去了。甚至可以说，仅仅第七篇是我原来的计划里要写的，第八篇只是记录了《人的权利》一书诞生前后的潘恩。——潘恩的下半生是凄凉的，因为他离开了人民，甚至连他的骸骨葬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

同一的情形见诸于收在同一辑里的第九篇的主人翁——即尼赫鲁身上。这一篇原题为《尼赫鲁·监狱·家庭》，现在改了，并且加了一个副标题：《J·尼赫鲁的前半生》。我所谓“前半生”就是他背叛了印度人民，和英国统治者妥协之前的那一段光荣的日子。

关于潘恩，采自法斯特(美国左翼小说家)所作的《Citizen Tom Paine》，甚至好几处连行文的口气也是他的。尼赫鲁的自传：《Toward Freedom: An Autobiography》提供了第九篇的主要材料。

第四辑是文化部门的先知者。其中罗曼罗兰是 1944 年最后一天死在解放了的法国土地上的，在这之前，曾几次地谣传他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受难而死的消息。这个老人在巴黎的住宅好像曾被侵略者所占领，他迁居到乡下，晚年曾写了《巴该传》(Paguy)。关于他病死的详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很清楚。罗兰死后两个月，即 1945 年 2 月，A·托尔斯泰也突然病死了，留下了未完成的杰作《彼得大帝》。A·托尔斯泰死后一年有半，H·G·威尔斯也病歿于英伦。这三个伟大的思想家，在近代欧洲文化史上是占着重要的地位

的。这三个年龄已经不小的文化战士，代表着三种类型：A·托尔斯泰从旧俄转入新社会，马上就成为新社会的坚强的斗士之一，直到他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为止，他的努力没有一刻停歇过。罗曼罗兰在上次世界大战之前，只能算是一个有良心，富于正义感的艺术家，可是在大战之后，他发现了战争的真正原因，也就成为不屈的斗士。反对法西斯，保卫文化的国际组织，是在他的倡导下结成的。与所谓转向的 A·纪德不同，罗兰具有一种对于进步的事物底执拗的热爱。在这一点上 H·G·威尔斯和罗兰大不相同。无论威尔斯对于自由与民主如何拥戴，可是他始终不能了解苏联。他对于自由与民主的理解，可就变成空空洞洞的理解了。

收在这一辑里面的第十二篇，讲的是鲁迅先生。关于这一巨人，我想不必多说，大家也都知道的。去年（1945）的春天，我逃难到重庆，闲居无事，把《三十年集》重读了一半，写了几本笔记，很想写一本七八万字的小说体的传记，书名就叫做《黑暗中国的明灯》。明知以我来写，是决计写不好的，况且又有许多不曾公开的材料，我既不熟，而且那时连问人也无从去问，但秋初终于写了第一，第二两章，第一章写童年，交给《开明少年》。第二章写离乡之前，给《中学生》发表。可是那时是原稿先要给审查官审查的，而这两个杂志即都在成都编辑，送审，所以稿子也就寄到成都去，——谁知头一章到现在也还没有收到，只剩下第二章，登在十月号的《中学生》上，——就是现在的这一篇。

为增加读者的兴趣起见，选用了好些插图。——这些图画是从不同的来源采下来的，这里也不打算逐一注明，只一古脑儿向作者们致谢。此外，开明书店肯把它印出来，也是我所衷心感谢的。

（1946年12月5日，上海。）

《世界民主运动史纲》 译者序

随着民主运动的展开，一般的读者需要一种不太专门的读物，这一读物提供世界各重要国家的人民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和讨论有关民主运动与社会革命的诸问题。一本纯粹的理论书，正如一本单纯的世界史，都不能满足这一需要。

现在译出的这一本著作，大体上是属于这一类的，它或者多少能够满足这一需要。就整个而论——诚如作者所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纲要（Historical Summary），可是同时，这部著作又讨论了现代民主传统的发展，和在这发展中新哲学的兴起，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有机的联系。它不是一部现代世界史，因为它只触到——或者说它强调了现代民主运动的一面；它也不是各国革命史，虽然要讲民主运动，就不能不触到各国革命，但这本书显然着重于检讨每一次革命的民主要求和成果，而不着重于把每一次革命作史实的叙述。

然而，毫无疑问，这部著作绘出了从资本主义的兴起到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段历史的发展轮廓，使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段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它将走向怎样的逻辑结局；从而了解：民主运动是沿着怎样的方向发展的，什么是其中最坚定的力量……等等。

这部著作的对象是一般读者，因此，它可以说是一种比较通俗的读物。它在写作上有一个特点，即往往就整个世界形势来分析民主潮流的发展；在分析某一国家的民主运动时，也从不忽略它从外间和对外间世界所接受和所给予的影响。这一点说来容易，做起来困难；作者显然是花了相当气力的。

作者自己也提到了最后的一章过于简略，变成一个提纲了，这无疑地是本书唯一的缺点。但虽然是简略的提纲，却也把百年来民主运动发展的线索给指点出来了。

译本付排时，译者接到原作者关于本书内容的一些修改和补正——这些修正有一两处是很重要的，有些却使原著更加完整——，在第三章以下都已——照原作者意思改正，但一二两章已打纸型，来不及改了，只好把重要的几点订正附在译序之后。

出版者和原作者对译本的出版，都给予可感激的协助和关心，我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1947年9月）

这是美国一个进步学者兰地（A.Landy）的著作，原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Marxism and Democracy），译本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由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字眼在旧中国是犯禁的，因此出版者建议改用这样一个晦混的书名。译本用章怡的笔名付梓。解放后没有重印过。（1996年注）

《我的音乐生活》中译本初版前记

一 书名的来由

在音乐史上，确曾有过几个作曲家，能够用文字来表达他们的音乐生活的；这稀有的几个，或者写回忆录（如法国的柏辽兹 Hector Berlioz），或者写论文（如德国的苏曼 Robert Schumann），或者写专书（如瓦格纳 Richard Wagner）。就这一点而论，柴可夫斯基是不属于这一类型的。实际上在 1876 年以后，他就不曾写过一篇论文，这时离开他的死还有漫长的十七个年头。然而柴可夫斯基却留给我们丰富的信札和日记。从这些信札和日记看起来，他是能够用文字来表达他的乐想的。他的一部分信札和日记已经由苏联科学院集成专书出版。印成单本的，是他和梅克夫人的通讯集。他和同时代人的通讯，有许多还未发表；最近在《苏联音乐论文集》（第三卷 1945 年）曾发表了他和卡土亚尔（G.L. Katuar 1861—1926）的通讯七篇，和格拉宋诺夫（A.K. Glazunov 1865—1936）的通讯十三篇，和里姆斯基·柯萨可夫（Rimsky Korsakov 1844—1908）的通讯三十二篇，即是一例。

在英语世界当中，有两本这一类的书：一本是《柴可夫斯基日记》，一本是《挚爱的朋友》（Reloved Friend）。前一本的内容如书名所示，后一本则是梅克夫人（Madame von Meck）的孙媳妇（Barbara von Meck）和 C. Bowen 根据学院版两卷本柴·梅通讯集编成的，其间加插了事实的叙述，和同时代人其他通讯的选择，首尾连贯，俨然一部专讲柴可夫斯基音乐生活的专书，甚至俨然是柴可夫斯基自己写成的讲他自己的音乐生活的专书，所加的说明正好是一种加深后人了解的诠释。因此，当出版者仿照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著《我的艺术生活》，想把这部书的译本定名为《我的音乐生活》时，译者经过一阵踌躇，也觉得相当恰切；不过因为不是柴可夫斯基亲自有意写成的专书，因此译者提议上下加一个引号，即《“我的音乐生活”》表示这不过是借用来表达书中的内容的。后来我们就这样定下来了。

书名的来由就是如此。

二 柴可夫斯基的一生

这本书主要是关于柴可夫斯基音乐生活的描述和内心的自白。关于他的生平，这里是不详的。甚至他生于哪一年，也没有记叙。读者当然很有理由要求一个小传。我想，1944 年的《苏维埃日历》（Soviet Calendar）里面的小传的头一段，可以补足这个缺陷。现在把它摘译在下面：——

音乐天才柴可夫基于 1840 年生于维亚特加县（Viatka）。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音乐，那样小的年纪，他就表露出极大的音乐才能和深深的爱好。但是 1850 年他被送入圣·彼得堡法学院念书，1859 年毕业，入了司法部做小官员。

可是这一部门的工作没有使他满足，1862 年他进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1865 年在音乐学院毕业，因为给席勒（Schiller）的《快乐颂》（Ode to Joy）作的康塔塔（大合唱），获得银奖章。

第二年莫斯科音乐学院开办（1866），柴可夫斯基就应聘到那里去

担任和声学教授。他教了十一个年头。

在这一段生涯里面，他的创造性底天才表现出充分的发展了。

在这里我们还得加上几句话：在司法部做事的时候，柴可夫斯基的业余时间完全花在歌剧院、跳舞会和晚会里。进了音乐院之后，他从 N·卢宾斯坦 (Nikolas Rubinstein) 习作曲法，从萨林巴 (Zaremba) 习理论。N·卢宾斯坦是他的老师和挚友，但是庸俗的卢宾斯坦却不能了解柴可夫斯基。这中间的冲突，在本书里面表现得无遗。但是通过 N·卢宾斯坦，他才得到终生没有见面的梅克夫人的赞助 (金钱的津贴和精神的鼓励)。

现在回头来说柴可夫斯基到莫斯科音乐院任教的情形：——

那是 1866 年旧历 9 月 1 日，一群音乐家集拢在俄罗斯帝国风的老式两层屋子里；莫斯科音乐院开办了。接待来宾的是一个眼睛活泼而有光彩的，头发乱蓬蓬地向后梳着的人。那是 N·卢宾斯坦呀——著名的钢琴家兼指挥，同时又是年青的俄罗斯音乐底名教师。这个音乐院十足是他的血肉底一部分；他是一个把全部生命浸淫到音乐艺术生活里去的人。

在这种场合免不了的互相道贺之后，一个年青人——教授里面最年青的一个——出现了，他坐到钢琴前面。莫斯科的人对于这位先生是不大知道的，只知道那是卢宾斯坦从圣·彼得堡请来的，刚从彼得堡音乐院毕业的小伙子。这个年青人的衣服很不华丽，这一点说明了他的出身寒伦。据说他到莫斯科来，所穿的旧熊皮大衣，还是诗人阿普赫丁 (A. Apukhtin) 借给他的。这一位新教授弹了格林卡的歌剧《路斯兰与卢德米拉》(Ruslan and Ludmila) 底序曲；演奏得实在太好了！这个人就是柴可夫斯基，对于莫斯科音乐院的生长和进展，他是最有功绩的第二人。其后的十一个年头里面，他在那里教音乐理论，写下了俄国第一本的《和声学》。他成名之后，还不断与音乐院接触。第一次排演他的歌剧《欧根·奥尼金》(Eugene Onegin) 的，也就是音乐院的学生。这一次历史性的演出，是 1879 年 3 月 17 日的事。(见《苏维埃文学》Soviet Literature 1946 年 10 月号第 71 页)

革命后，这个莫斯科音乐院已改名为柴可夫斯基莫斯科音乐院。建筑物已在十九世纪 90 年代重修，现在能容两千学生，学院本部共分五系，附设了一所音乐学校，一所中央儿童音乐学校，和一个歌剧研究部。音乐院里面有一个可容两千人的大礼堂，这大礼堂的音响之好，据说是很难得的：坐在最顶的楼上连舞台划一根火柴的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

音乐院曾出了不少卓绝人才。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兼畏友，并且后来接替和声学教席，最后又任院长的伟大音乐家泰涅耶夫 (Sergei Taneyeff 1856—1915) 就是 1875 年毕业的。现任院长舍巴林 (V. Shebalin) 是 1918 年的毕业生。

他一边教书，一边作曲。“在不断紧张工作之中，他常常受到苦闷、不安和绝望的袭击。这里的原因有个人的，有家庭的，也有社会的：70 年代莫斯科生活空气之窒息腐化，对于作家的多情善感的性格不能不起影响。精神的危机驱使他离开了音乐院。”(西尼亚维尔：《俄罗斯音乐史纲》，梁香

译，33页）。

这一段内心生活的痛苦，和在痛苦中产生的作品，都仔细记录在本书里面了。离开音乐院后，靠了梅克夫人的资助，他把全部精力放到创作上头，同时到欧洲各地去旅行。直到1890年9至10月（还有三年的日子就结束了他的一生），梅克夫人突然诿称破产停止了她对他的资助，并且对他断绝了书信的往来——这给了晚年的他很大的痛苦，但他在那最后的几年间也还创作出极其辉煌的作品（《第六交响乐》）。

他死于1893年。

三 柴可夫斯基博物馆

柴可夫斯基晚年居留的地方，是离开莫斯科不远的克林（Klin）。经历了无数困苦与内心搏斗而达到了人生的暮年的他，在这风景纯朴美丽的田园中，作出了他最后的伟大作品。

克林的寓所，在革命后改为柴可夫斯基博物馆。至今访问克林的人，还可以看见那大门上依然钉着柴可夫斯基所写的牌子：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寓
星期一、四下午三至五时见客。
现已外出。 请勿按铃。

经历了无垠的苦难底柴可夫斯基，晚年极希望能有一个恬静的田园，让他静静地安住下来创作。例如他曾在莫斯科的一张报纸上登了这样广告：

独身男子征租乡下住宅一幢。

如果我们在本书中所读到的，他起先住在迈伊丹诺伏（Maidanovo），离克林仅二公里。他在那里住到1887年年底。1888年4月他又到弗罗洛夫斯柯耶（Frolovskoy）村去，这里也是离克林不远的。到1892年5月他才搬入克林。

关于克林和柴可夫斯基的寓所，史涅尔生（G. Shneerson）曾写过一篇战后的访问记，载《苏联音乐纪事》（Soviet Music Chronicle）第八期（1945年8月莫斯科版），下面就是其中几段的移译：——

克林是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铁路线上一个小站。都是些小屋子，花园，一条上了柏油的公路从左边通入这里。三点钟火车，或者点半钟汽车，就把你从莫斯科带到克林。……

……我们登上一道狭窄的台阶，就走进柴可夫斯基生活和写作的地方。一个很大的光线充足的房间，家私简单而有味道——柴可夫斯基的书房，挂着家族的远亲近亲的褪了色的照片。书架上放满柴可夫斯基的书，乐谱、礼物……这里有着许多俄罗斯作曲家和外国作曲家的集子，也有许多民歌集。莫扎特的全集共七十二卷，这是著名的乐谱出版商犹根孙送给他的。在许多乐谱和书籍的空白处和字里行间，还有柴可夫斯基亲笔写下的若干断想。……

……《第六交响乐》的草稿，用铅笔写在三张五线谱上。他的思想比他

的笔跑得快，因此他只好用缩写。柴可夫斯基就是根据这差不多是速记的草稿，写出了他的那部交响乐来的。

这个博物馆现在由本书将近末了的时候提到的 B·达维多夫（外甥）保管，他已是七十内外的老人了。法西斯侵略军到这里的时候，他收拾了重要的手稿及品物，运到乌拉尔去，德军于 1941 年冬天占领了克林，住了二十三天，几乎把这屋子烧去。

四 围绕柴可夫斯基的人们

柴可夫斯基的两个兄弟（阿纳托和摩德斯特）和一个妹妹（达维多夫）跟柴可夫斯基都很要好；妹妹的庄园——卡明卡更是他常去之地。到了晚年，妹妹去世了，他就疼爱他的外甥。这些关系，我们在本书中是可以看见的。

然而本书展开了另外两种特殊的关系——其一就是偶然的（出乎意料的）结婚，由结婚而起的不能忍受的痛苦，终于几乎断送了他的性命（他不止一次想过自杀，但是知识分子的懦弱，使他不能执行）。另一就是他和梅克夫人底多少有点神秘的关系。她是一个富有的，非常懂得音乐的寡妇。她非常欢喜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藉着 N·卢宾斯坦的介绍，她按月送钱给他，使他不愁生活的困难，可以安心从事他的创作。

但这两种关系显然结局都很不完满。结婚不久，他就诉说他的妻不能了解他；而到晚年，梅克夫人突然断绝通讯及资助，他更不能了解她。他和妻子的闹翻，常为世人所诟病；梅克夫人的突然离开，常为世人所不解。关于前者，在本书中已有足够的资料，看出柴可夫斯基内心的矛盾，也许是那个妇人庸俗的想法，使这个伟大的心灵容忍不住。关于后者，本书只收了柴可夫斯基的两封信，一封给梅克夫人而永远得不到回信，一封给梅克夫人的女婿巴胡尔斯基，回信是有的，但客气而且空洞，不能从那里面看出什么。可能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梅克夫人受不住外来的打击，才决然断绝一切关系的；本书的英文版编者，曾企图用心理的转变解释梅克夫人突然决绝，这在译者是不能同意的。

除了以上这些关系之外，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界师友，也值得提一下。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之神是莫扎特（W.Mozart 1759—1791）。这个短命的天才那种乐观的气派，是在柴可夫斯基的身上重现而且深化了。在外国音乐家中，他佩服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他欢喜比才（Bizet 1838—1875）和他的《卡门》（Carmen），他讨厌瓦格纳（R.Wagner 1813—1883）。在俄国音乐家里面，他称赞格林卡（Glinka）的作品，但是不佩服他的为人，称之为“两重人格”。他的音乐老师 N·卢宾斯坦对他很苛刻，在这本书中，N·卢宾斯坦是以一个庸俗而恶毒的角色登场的，但是 N·卢宾斯坦不仅仅从最初起就认识了柴可夫斯基的天才，而且柴可夫斯基的重要作品（到 N·卢宾斯坦逝世为止）都是由 N·卢宾斯坦亲自指挥或亲自演奏（他本身是一个优秀的音乐教育家、组织家、指挥者和钢琴家）的。N·卢宾斯坦的哥哥 A·卢宾斯坦在本书中也偶而登场，不过他的活动场所是在彼得堡，与柴可夫斯基没有太密切的关系。

柴可夫斯基和音乐五人团的关系是很值得注意的。当时五人团以“为人生而艺术”做口号，抨击 N·卢宾斯坦等一派为艺术而艺术底唯美倾向；最初他们本来把柴可夫斯基归入唯美派里面，后来在一次偶然的会里，柴可

夫斯基所表现的无比崇高的正义感，感动了五人团（这在本书里面是有叙述的）；由是才开始了五人团和柴可夫斯基的并不十分密切的关系。柴可夫斯基这善良的灵魂，首先欢喜了坦率的巴拉启列夫（Balakirev 1836—1910），有几部重要的作品是写明献给巴拉启列夫的。然后，里姆斯基·柯萨柯夫（Rimsky—Kor-sakov）——五人团中最有天才的作曲家——从柴可夫斯基的理论课本中学取了很多。

然而在同时代音乐家里面，跟柴可夫斯基来往最密切，而为柴可夫斯基最钦佩，视为畏友的，则是泰涅耶夫。

五 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

关于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的关系，当泰涅耶夫三十周年祭的时候，苏联科学院院士音乐学者阿沙菲耶夫（BorisAsafiev）所写的论文，第七节里面讲得恰到好处。他说：

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是师生关系，他们两个都有同样的特性：爱艰苦的工作，受工作的基本规律所限制。他们两个都能够很完满地驾驭所谓“自己的想象底技术”，同时也都发展了创造性思想的准确性，而这是和他们所习惯的创作态度密切连结着的。柴可夫斯基是两人中比较冲动的一个，乐想在他的心中比在较理智的泰涅耶夫心中，施以更大的压力，因此柴可夫斯基在作曲的时候，往往是神经质地写得极快的。……

他们之间的通讯，是一些无价的文件，它证明了这两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底思想如何作创造性的交换——而他们两个在性格上是那么相异，但他们被献身于音乐的那副精神联结起来了。在他们两人的作品中，“莫扎特”式的性质是主，“沙里爱里”（Salieri）的性质是从。这一点是不难了解的。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都崇拜莫扎特；他们之所以崇拜他，不是从风格家的观点，而是把他的音乐当作充满着理性，光明和生命的快乐的东西。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观念显然对泰涅耶夫的作品极有影响。但这些乐想并不以静态的僵硬的形式出现；可以简单地说，在泰涅耶夫的作品中，柴可夫斯基的抒情主

义所产生的自发性底印象发生了一种诗化的、哲学化的抽象过程。既不能排除柴可夫斯基的乐想，唯一的办法——在泰涅耶夫——就是把它们沿着更高水准发展。像这样子，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的友谊，就恰如歌德（Goethe）和席勒（Schiller）的友谊似的，使两个人互相得到好处。

六俄罗斯音乐之路

如上面所说，泰涅耶夫受过柴可夫斯基的教益，又影响过柴可夫斯基；同时，泰涅耶夫比柴可夫斯基更为冷静、理智。所以泰涅耶夫对于俄国作曲家的路线的看法，也许大部分也就是柴可夫斯基的看法，虽然柴可夫斯基从来没有把它系统化写出来。

因此，我们在这里引用一节泰涅耶夫的笔记，那是对于了解柴可夫斯基会有相当的帮助的。这一节笔记是1879年2月写的：这时柴可夫斯基刚离开音乐院不久，是创作欲最旺盛的年头（他已经写了《第四交响乐》和歌剧《欧根·奥尼金》），而泰涅耶夫则已从音乐院毕业了四年，留在那里继续担任

柴可夫斯基的助教了。这一节笔记见莫斯科 1925 年印行的《泰涅耶夫 :其人, 其作品及文献》(73—74 页)。

他这样写道：

西欧的乐式(奏鸣曲、交响乐等)逐渐地出现了。它们是从赋格曲(Fugue)发展而来的,而赋格曲则是由民歌和宗教音乐的复调音乐演变而成的。绝对没有一种乐式是突然发生的,所有的乐式都承袭着在它前面的乐式发展而来。因此,可以说,民歌和教堂音乐是所有欧洲音乐的基础。多少世纪以来,多少人在这些乐式上作了多少的劳动,他们的劳动结果却可以在西欧音乐的近代乐式中看得见。照这样子,民歌潜藏着欧洲近代的一切音乐。只需加上人类的智慧,就可以把它们转化为丰富的乐式。脑袋就是力量。如果把力量加到一件物体,必然得一个结果,这结果一方面是由所加的力量底性质而定,另一方面则是由加了力量的物体底性质而定。

当俄国的音乐家研究西欧音乐的时候,他们所碰见的已经是弄得好端端的,完美的欧洲风格了。他们只要照着欧洲风格来作曲,否则就把俄罗斯民歌硬往欧洲乐式那里套上去;他们倒忘记了俄罗斯民歌是和欧洲音乐不同的两件物事。作品的式样是和它的原料有密切关系的。比如说一座建筑物的式样,要看它的原料是木头还是石头而定。尽管每一种材料都潜藏了无限数量的形式,但对这一切形式却也有若干必要的限制。

俄国的音乐家就像一个建筑师,他看见了一座木头房子,就打算用石头来仿造一座,他想把石头砌得像木头那样,有凹凸,有曲线。显然,很快他就会明白他的企图是什么结果都不会有的。

俄国音乐家在本能上也明白这一点的……欧洲乐式不是我们所习见的形式。我们还没有我们自己的乐式。我们还没有民族音乐。优秀的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写了一部《和声学教程》。但这是什么和声学?这是欧洲的和声学。我们还没有我们自己的和声系统……

每一个俄罗斯的音乐家,他的任务就在于推进这种民族音乐的产生。西欧音乐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应该作怎样的努力?必须像对西欧民歌所曾作过的努力一样,我们要对俄罗斯民歌作同样的努力,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有民族音乐……。

让我们精通古代的复调音乐吧,让我们担负起这艰辛可是光荣的任务吧,谁说得定,也许我们下个世代就会有新的乐式,新的音乐呢,也许在下个世纪开头,俄罗斯乐式就会出现,它们究竟在什么时候出现,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于:它们是一定出现的……。它们是一定出现的!这句豪语仅仅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后就实现了。

同样的精神,洋溢在这本书的主人翁身上。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向着泰涅耶夫所指出的目标奋斗的。

七 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精神

柴可夫斯基一生完成了六部交响乐,八部歌剧,七部交响音诗,三部舞剧,几部交响组曲、幻想序曲、三部钢琴协奏曲和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和其他无数的器乐曲与声乐曲。靠了这丰富的作品,柴可夫斯基给全世界表现了他的崭新的创造力。他的作品本质上是俄罗斯的,虽然这并没有妨碍它们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热爱。他切实把握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努力寻求音乐

的民族形式。他的现实主义的原则是“诗的、人性的、单纯的”。

柴可夫斯基靠着天才的笔触，到达了气质和感情最繁复的结合，并且表现了生活的诸种矛盾。可是除此之外，在他的全部音乐中，主要的母题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烈的爱，和不倦的对幸福的追求。他的即使是最悲剧性的作品，也被斗争的精神所挽救了，也被一种克制命运的意志所解救了。举个例子说，这就是他的《第四交响乐》——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在本书中有很详尽的剖解。——从第一章那惨淡幽暗的场面出发，这部交响乐到了第四乐章，就引出了生命的凯旋。伟大的《第六交响乐》亦复如此。如柴可夫斯基自己所说，这部交响乐他是把整个灵魂埋了进去的。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曲《暴风雨》和《法兰西斯加·达·里米尼》的主题，是爱的主题，虽然那是悲剧性的，但它却是为了克服障碍而斗争的。

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由于它们的内容的深度，戏剧性的紧张，和乐想发展的丰富，是贝多芬逝世以后，全世界交响乐最伟大的里程碑。

他把交响乐这样式估计得很高。他认为人类的全部感情都可以用交响乐表现出来。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品的灵魂，是在于：横扫千钧的旋律、清晰、明快、表现力丰富、美丽、音色富丽、易懂。他的曲调的渊源是在俄罗斯民歌里。他常常把民歌的主题引用在他的作品中，把它发展，使它丰富。

柴可夫斯基热爱俄罗斯。他的庄严的《1812年序曲》，他的康塔塔《莫斯科》，他的《斯拉夫进行曲》都是献给他祖国的英雄事业的。

一个批评家说：

“柴可夫斯基的全部音乐底本质，就在于：他深刻地了解人民底精神，而且和人民一起呼吸。”

这些评论见于1945年的《苏维埃日历》和《简明苏维埃百科全书》和别的论文，上面是从这些论文摘译出来的。（下略）

（1948年）

《苏联新地理》译者前记

苏联的青年地理学者兼著作家 N·米海洛夫 (Mikhailov) 在战后五年计划开始那一年 (1946)，写了一本关于苏联的地理环境的通俗读物；在十月革命三十周年那一年 (1947)，他又写成一本综论苏联经济地理的通俗读物。这两本书写作的年代不同，但相距大致不久；其最大的差异是在于：前一本是横的叙述，把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全苏联各区的自然环境与经济政治建设，作明确而生动的叙述描写；后一本却是就经济地理的各个成份 (土地、矿产、领土、人民、工业、农业、交通、社会主义复兴建设)，作纵的和概括的论述。然而在写法上是有一点相似的：作者领着读者作“地图上的旅行”，因为是旅行，所以生动；但同时这旅行不是真正的地面上的旅行，而只是地图上的旅行，因此不受时空的限制，能够做到有系统和简明确切。这两本书合起来看，将打破了读者对经济地理“枯燥无味”的这种传统的印象，同时将大大地帮助读者了解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底全貌；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两本书将不仅帮助读者了解苏联的地理环境，而且更主要地让读者知道，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面，人们如何变革了自然环境，使大自然为人类社会服务，使人类得到更舒服而美好的生活。

这两本书中的第一本，就是现在呈献给读者面前的一本《苏联新地理》，第二本叫做《在祖国地图上》，得过 1947 年斯大林文学奖金，西蒙诺夫称誉为优秀的散文作品。这部书译者也打算把它介绍给读者。

试比较一下这两本书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们是如何的相互补足，各个着重了哪一些方面，作出如何的叙述和描写了。

下面就是这两本书的对照目录：

《苏联新地理》	《在祖国地图上》
1. 莫斯科及其周围〔苏俄〕	1. 历史的概观〔历史地理〕
2. 沿伏尔加河直下高加索 〔伏尔加河；阿塞拜然；阿美尼亚；乔治亚〕	2. 在苏联国旗下〔领土〕
3. 越过西南部草原 〔乌克兰、摩尔达维亚〕	3. 旧版图上的新土地〔新土地〕
4. 西北部的海〔白俄罗斯；立陶宛， 拉特维亚，爱沙尼亚，卡累利亚芬兰〕	4. 新的地下富源〔矿产〕
5. 从北部林地到乌拉尔	5. 社会主义工业的新堡垒〔工业〕
6. 中央亚细亚的绿洲、沙漠和市镇 〔乌兹别克、塔吉克、土耳其门、启尔吉兹〕	6. 新的农村〔农业〕
7. 横跨西伯利亚到太平洋〔远东区〕	7. 新的道路〔交通〕
8. 1950 年的苏联	8. 伟大的再生〔复兴〕

从上面这个内容一览表看起来，我们可以知道，这两本书都是帮助我们认识苏联的重要读物，而它们两者之间却又没有重复的。

上面说过，这本书是纸上的旅行。它不同旧式的地理教科书，尽是地名的堆砌；它所提出的每一个重要地名，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山峰，都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当然不仅仅关联到作者写作的技术问题：这就

是说，在这本书当中，每一条河流或每一个矿山，都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联结起来，都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只有如此，河名或地名才不会是孤立的名称，而是有血有肉，与现实生活有关联的实体。

这本书既然是纸上的旅行，它就不同于一般的实地旅行记——那些旅行记当然也是活生生的，也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但是实地的旅行记，往往只描绘出一时、一地或一方面的印象，部分的实录；这里的纸上旅行，却可以做到有计划、有系统地全面描叙，能给读者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然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全面印象。

我们的纸上旅行从莫斯科出发。我们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看到了莫斯科的街景，看到了莫斯科的郊区；然后作者让我们站在这联邦的首都，来观察整个联邦的地理环境（第一篇之五），我们从这里首先获得一个印象：苏联在与时间一起前进着；苏维埃人们正在为改造他们的自然环境，为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而斗争。

第二段行程是沿着伏尔加河进发的。我们经过工业的城市高尔基，到了萨玛拉的“牛轭”，到了英雄的城斯大林格勒，然后到达世界最大的湖——里海。我们渡过里海到了石油城巴库，巴库进入群山之间的阿塞拜然和阿美尼亚、然后走进乔治亚，到达南俄的里海岸边。这样子结束了我们第二段的行程。

我们又回到莫斯科。这一回向西南跨过大草原，到了煤斤和谷物的故乡——乌克兰。我们看到了古老而崭新的基辅城，看到德尼泊水电厂如何建设，如何被德军破坏，战后又如何重建。过此，我们更到达了摩尔达维亚，这样，我们重又到达了黑海岸边，结束了第三段的旅行。

第四段行程是在莫斯科的西北部。我们由莫斯科动身，沿着驱逐德国侵略者出国的道路，由斯摩棱斯克而明斯克，而立陶宛，而拉特维亚，而爱沙尼亚，而入列宁格勒。我们巡礼了苏联的第二大城，视察了列宁格勒的工业区，重温了列城被围时为打开生路而斗争的一幅图画。由是向北进入湖沼的国土——卡累利亚，便进而入北极圈。

由北冰洋海岸进入乌拉尔，是我们的第五次行程。我们看到了木材城彼楚拉，北方的大港阿尔亨格尔；我们在乌拉尔区花了不少时光，看见了铁城玛格尼托哥尔斯克，知道了乌拉尔伟大的矿藏，及其如何开发。第五次行程就这样结束了。

第六次行程是在中央亚细亚。我们到过中国西北及北部所邻接的地方；我们看见了丰饶的城塔什干，我们看见了缺水的沙漠地带，到过帕米尔高原——大陆的“心脏”。

我们第七次的行程，是到苏维埃远东区去的。我们首先考察了西伯利亚过去的历史，然后横跨过它，到达太平洋岸。

最后我们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假想了1950年的旅行。我们将看到许多地方起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四年——五年的劳作，这个伟大的国家更显得丰饶和强盛了。

***贯穿着这许多生动的描绘的，是两根线。

一根线是人类在那样的社会里面改造着自然。另一根线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苏维埃人）在建设、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新的爱国主义和新的英雄主义。苏维埃人如何征服自然，改变自然环境，在本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地方，都给以生动的描绘。由于自然环境的改造，新的生活就很自然

地涌现出来。

拿中央亚细亚做个例子罢：

最大的变革是卡萨赫人的生活。二十年前这一区和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时代相差不远。卡萨赫人把皮帐幕放在骆驼背上，从这里搬到那里去，全部生命消磨在鞍子上，一个字也不认得，唯一的医生就是巫师。今天却已有许多医生、教授、演员和诗人，而且在全苏联闻名了，……这个国家已有长远的历史；人民也存在了好几千年。新的卡萨赫斯坦才只有二十五岁，但是这二十五年却等于多少个世纪呵！（本书 397 页）。然而这改变不是从天掉下来的。那是多少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呵。

你看远东的共青城罢（康梭摩尔斯克）：

十三年前泰加的树木被拔去，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机器制造中心——康梭摩尔斯克（Komsomolsk）的基础。这个城是为了奖励共产主义青年团（Komsomols）而命名的，那时他们负担起在莽林中建设一个新的工业城底艰巨任务。

在古老的渔村上面，现在已有成座成座的大砖屋。其间屹立着巨大的钢铁构造底厂房。过此，则新建的木房子一直伸展到辽远的群山去。地面给开掘了，铁轨给敷设了，到处都在不断地建设着。只有从飞机上才可以看见这个年青的城市底轮廓。

康梭摩尔斯克有着伟大的景色。每一椿事情都表现了力量、美和大规模的建设。……

年青的苏维埃男女认为在此地工作是一种光荣。这个城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给建立在辽远的阿穆尔河上的，这是工业的英雄主义底化身——在几次五年计划时期，是这英雄主义变革了苏联的面貌，尤其是苏维埃远东区的面貌。……（本书 431—432 页）

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洋溢着新的爱国主义与新的英雄主义，读者在上面所引的一小段当中：难道没有感到这伟大的气息么？

且看作者怎样描写拉多加湖在爱国战争中的任务吧。

就在这堡垒附近，极目远眺，可以看见巨大的湖，湖面一直消失在辽远的地方。……

在列宁格勒被围时，这个湖所起的作用是很值得惦记的。当包围圈缩紧的时候列城唯一的出路就是渡过拉多加湖。列城的人民曾必须咬紧牙根，整紧裤带，等待冬天湖水结冰，然后在那上头造成一条足供载重汽车行走的道路。这条路成功了列宁格勒的生命线。尽管这条冰路离开前线很近，尽管德国空军用高度爆炸弹炸碎冰块，但是整个冬天仍经常有无数的载重汽车，驶过这个湖面。来的时候，卡车装的是守城用的炮弹，汽油，面粉，肉，罐头食品，和其他宝贵的供应，这些东西量虽不大，但分发给留在城里的人们维持生命；去的时候，卡车装的是伤者和病者，以及在包团时来不及离城的妇孺，他们现在使用了最后的一点力气，走上这条“生路”，然而对于若干人，这“生路”却不啻是一条“死路”。关于这条冰路的组织，差不多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了。凡是炸弹炸成的窟窿，立刻用旗帜标明，接着马上在它的附近开辟一条新路。路上的制空权是几经争夺的；这战斗结果是苏维埃的空军胜利了，由是保证了这条冰路的相对的安全。交通管制员是穿了灰白制服的兵士，天气无论怎样恶劣，他们也在那里给卡车司机指点道路。日日夜夜，风霜雨雪，这两股交通不断地继续着，恰如任何忙迫的街道似的。……（本书

280—281 页)。

这是在战争中。在平时呢？

拉多加湖是联结波罗的海和内地的一切人工水道的开端。斯维尔河流入奥尼加湖，而波罗的海白海运河，则由此通至白海；玛里英斯克水系（维特格拉河，玛里英斯克运河，柯夫札河，贝洛耶湖，和石克斯纳河）通至伏尔加河。……由拉多加湖直通伏尔加河，还有另外两条旧运河，即维希涅伏洛茨基水系和蒂赫汶水系，今天看来，这两个水系已失去重要性了。……（本书 281—282 页）。

可以说，随便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地理的描述是交织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气息的。在列宁格勒如是，在斯大林格勒如是，在塞瓦斯托普如是，在德尼泊河也如是……

因此，这本书并非给你绘出一个板滞的静态的苏联十六国版图，而是给你绘出一张活生生的图画，有血有肉地表现出伟大的人民的英雄劳动和伟大的理想的实现。

苏联的地名，国内还没有统一的译法；除了常用的一些依照常译的名字之外，都是译者根据自己定下的几条简单的音译规则（例如 lo 译“洛”，ro 译“罗”；vo 译“伏”，等）来译的，但常用地名有些却和这规则不合的，碰到这样的场合，译者也不强其统一，因为用惯了总比较容易联想起来。

这本书是 1948 年春在上海译的，中间因为黑暗统治的迫害和威胁，曾停顿两次，因此原稿也分三部分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一直到最近才能够把它们集拢起来，从头匆匆校改了一次。

临末，应该谢谢翰笙兄、锡嘉兄和鸿模兄在出版上的帮忙。

（1949 年 3 月，在香港。）

《金元文化山梦游记》 译者序

替独占资本服务的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目前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危机，而这危机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密切不可分的。这种文化在思想内容上是反动而且腐烂的。这种文化运动依循着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向着广大的劳动人民，用腐烂的作品来毒害劳动人民的心灵，使他们麻痹，使他们堕落，使他们失去信心，使他们离开斗争。另一条路线则向着“特选”的文化圈子，即知识分子，使他们沉醉在幻想的世界里，使他们脱离政治斗争，失掉他们所能起的启蒙作用。

这本用幻想小说的体裁写成的论文，就是把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第一条路线（向着群众的路线）所进行的“斗争”，赤裸裸地加以揭破，无情地加以批判的。如作者所说，“这里所记的全部事实的数字，都有文件佐证。那全是美国杂志书籍上的资料。我的报告是一种不用摄影机拍成的新闻片。”

在这部新闻片里面，美帝的代言人及其所谓“文化”，完全一丝不挂地裸露在读者面前。你不但知道美国有五十万“作家”，不但看见了袋中书（Pocket book）如何征服了广大的读者，而且看见了并且理解了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各种倾向。比如说，广告的倾向（娜娜式胸衣，罗密欧吊袜带，朱丽叶护肩），混和了人性的堕落（杀人 Murder！妻子杀丈夫！）——又混和了反苏反民主的意图（纳粹间谍的反苏“著作”成为畅销书）。

惊奇的事情一幕跟着一幕的展开在你面前。为着适应“大量生产”起见，美帝的“学者”们竟发明了“文学生产合理化”的做法（见本书第七章）。

本书的最后一章指出了美国进步作家是“不会出卖他们的脑袋的”；他们的事业和人民解放斗争事业联结在一起。

这部小册子是从1948年5月号的“苏维埃文学”译出的，其中有若干章曾在《世界知识》上连载过，现在把连载时所节译的，都一一查对原文补上；至于原文所举许多人名书名，因为译者即将离港，来不及加注了。

（1949年4月在香港）

再版付印后偶得1948年柏林SWA-VERLAG印行的德译本（书名是Der Amerikanische Parnass，由L. Nebenzahl译成德文），查对英译，略有出入，只好待三版时设法补正。

（译者再记 1950年2月）

开明书店和我

1 接触

我同开明书店开始接触，是在初中读书的时候。

那时我们班的国文教师是吕星云先生——他那时在教会办的岭南大学附中教书，却带着一种信念和热情到我们这个新办的并不著名的中学来兼课。吕先生为人正直，有学问，教得很认真，但更重要的是他思想新，接受新事物快。他教国文采用开明书店的活叶文选——这样，我受全班同学的委托，每周要同开明书店“接触”一次（现在叫做“采购”）。我不但采办了吕先生指定的《活叶文选》，而且买了不少没有指定的篇章。通过这些文章，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鲁迅，胡适，周作人，朱自清，司马迁，屈原，李后主……诗，赋，词，散文，小说，论文……《活叶文选》唤起了我的泛读兴趣，我在成长后的漫长岁月里，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习惯。也是吕先生介绍我们订阅新创刊的《中学生》，这个杂志从创刊号起我便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后来我进入社会以后又不时为它写点文章。我同开明书店天天“接触”，——因为书店的门市部就设在我家附近。我每天晚饭后总要去开明转一转，在那强烈吸引我这个少年读者的“书林”中，流连忘返，也许正因为开明书店的店员们都和蔼可亲，从不厌弃我这个“小弟弟”（我那时只有十一二岁），而且从不曾干涉过我自由翻阅所有我想“偷”看的书，有时，像负责人似的“店主”，还同我聊天，用他有点滑稽的广州话问长问短；当然，绝对没有一个店员对我这个每天在那里翻看一两小时的“顽童”产生过怀疑（怀疑偷书）。如果没有这种空气，我是决计不敢每天到那里去猎取知识的。也许正因为同开明书店这样一段接触，奠定了我一生同书籍打交道，直到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而爱书的心情始终没有变。我从心里感谢这家书店和它的从业员们。

2 《中学生》

《中学生》给我的是什么？是知识。可不仅是知识，它以自己默默地认真地传播知识、鼓励进步的那种朴实无华的态度，给我启示，要做一个甘默默无闻地、认真读书认真工作的人。《中学生》对于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我，是一座知识的宝库。我爱语言，我爱文学，我爱历史，我爱地理；我特喜欢数学，我为理化的天地迷了心窍；同时我喜欢音乐——我学唱，我弹琴，我甚至学着“作曲”！我对美术入了迷，以至于我在初中三时每个星期天都泡在野外写生里。所有这一切，《中学生》都能够启发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而且往往诱导我朝着健康的路前进。《中学生》从不装腔作势，也从不摆出教师的架子。平易近人，实事求是：可以说这就是《中学生》杂志和办《中学生》杂志的教育家们的观念。1947年我在一个杂志上评介过《中学生》，我写道：

有的人说，《中学生》是一种平淡无奇的杂志。是的，你想从这里找寻刺激，而你尽会失望。不消说，这里边一定没有“眼睛吃冰淇淋”之类的东西，甚至连慷慨激昂的政治号召性的文字也不常有的。然而平淡不等于衰萎。《中学生》对于一般青年读者，也恰如对于中

学生似的，它可能成为每一个人的恳切而善良的教师、朋友和同志。当你不知不觉地从它那里学会了呼吸正义、诅咒黑暗的时候，才会惊讶于一种平淡的刊物竟也会在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力量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对《中学生》的评价仍没有变。

3 《文心》

《文心》各篇发表时，给我学作文很大帮助——不，我说，不仅学作文，而且学做人，做一个平凡的、认真的人。可以认为，在这之前没有人能像夏老（丐尊）和叶老（圣陶）写过那样动人心弦的作文指导和读书指导。有的“好为人师”，板起面孔“教”人，“填鸭”式“输入”——而学的人不是电子计算机，往往“填”不进去。有的心地好，而动力不足，难于那么恰中要害地循循善诱。只有《文心》的两位作者，心地善良，学问深，却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所以能写出这部抓住人心的书来。出单行本时，朱自清先生说它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这恐怕就是我上文所说的融作文指导与读书指导于一炉的意思。世间没有不读书而能作文者，世间更没有不善读书而善作文者。不妨说，我从二老的这一组文章中学到的，比作文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读书，如何能善于读书。《文心》是出版史上一件有意义的事，将来有人写近代中国出版史，请不要忘记提它一笔，这组文章似小说而非小说；似“指南”而胜于“指南”。完全可以说，两老的德行，都融化到这部小书里，因此它能深深地感动人。书中所写的几个小主人翁也很可爱，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常常在我脑海中展现。十年浩劫中我因挨了姚文痞的棍子而发愤读字典、写札记时，脑中常常泛起了《文心》中关于语感的一篇，大意是说做人不怕穷，但在存储语汇上却要奋力做个富翁。说得真好呀。

4 外国语

我学过《开明英文读本》，也教过这部书——这部书的编者是林语堂，如果把林氏的后半生的活动暂不论列，那么，这部课本的确给人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我幼时在家读过商务版《华英初阶》，是带着哭声死啃的。少年时在初一读商务版《模范英语》，也引不起学外语的兴趣。唯有后来（大约从初二起）读开明的课本，这才诱发了我学外语的“潜”意识。要问这部课本“突破”了什么？我想大约有两点：一点是内容多彩，不呆板；另一点是插图美，编排新，注音用宽式国际音标，使人不觉得要哭。应当说，这部课本的编辑是同传统的翻译教学法决裂的。

后来我又读了英文本《开明英文文法》，也是林语堂编的——那时这部文法也是“新”的，处理的是活的（living）英语，而且着重在约定俗成的表现法——我少时虽然死背了古老的纳氏（Nesfield）文法三、四两卷，但得到实际效果的还在于开明这部文法加上开明版加注的英语读物（如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

从活生生的社会交际去学外语，这恐怕是开明版英文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也许当时还不是很自觉的。40年代金公（仲华）在重庆为开明编的英文学习杂志，也是循着这条“活的”路线的。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学外文，这

是个好传统，看来是值得记的。

我知道世界语（Esperanto）也是从索非的一篇文章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最初几期《中学生》杂志上。我读完十分兴奋：啊！原来世界上竟有这么一种语言。我那时只觉得世界语是寻求知识的极好的工具。这篇文章诱导我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主办的函授学校，其后又报名参加广州市立世界语讲习所。讲习所是晚上上课的，教师是前清时首批留法的许论博老先生。我读完6个月，毕业考试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得了一张市教育厅颁发的毕业证书。开明版盛国成编《世界语全程》和周庄萍编《汉译世界语小字典》，对30年代我国世界语的传播起过很大作用。《全程》虽古板一点，但体系严谨，是很有用的——我学过，也用这课本教过人，至今还记得有一课说到久雨初晴，人们欢呼“O! Suno!”（“啊！太阳！”），这样的句子用不着主语，谓语，甚至多一个字都是多余的。几十年后，当我研究语言与社会生活，语言与信息量时，这个例子还经常闪现在我的脑际。我在世界语园地持续不断地踟蹰了53年，最初的启发是从开明书店来的，应当感谢它。

5 艺术

我少年时迷醉于音乐和绘画，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开明书店诱导的——具体地说，是由于开明的一位热心普及音乐和美术教育的作家丰子恺先生。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的一个叔公（岭南大学文字学教授）让他的女儿给我捎来“生日礼物”，就是开明版《给孩子们的音乐》（日本著名音乐理论家田边尚雄著）。这部书是毛边的，封面画有点印象派的味，内容却是打动人心的。这部小书连同丰先生所编著的音乐书，指引我几乎走上了搞音乐的道路上。只有一本书使我很恼火，那就是开明出的一部风琴曲集。那时我家有一座很大的风琴，它有两个增音器，十一个音色栓，不过这是簧风琴，不是管风琴。我买了开明这部曲集，简直望洋兴叹——因为那里收的主要是巴哈的管风琴加农曲或赋格曲，在簧风琴上是很难弹的，这使我很失望，觉得它不如商务版肖友梅编的《风琴教科书》，里面有很多改编的曲子，可以在小小的（甚至是三组半的）簧风琴上演奏，我初次接触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就是这部教科书改编的谱子。

不过开明版黄涵秋编的《口琴吹奏法》，却是很实用的，比当时上海各书店出版的同类书有用得多。我用这部书苦练，居然后来还教会了很多人，还指挥过口琴队。可见出版社出了好书，会发生很大的社会效果的。

无论如何，在普及音乐教育方面，开明作了很多启蒙工作，可以说是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别的出版家也作，如商务和中华，但常带有更多的学院气。比方王光祈先生的一套音乐丛刊，中华书局出的，内容也很精辟，但读者对象就狭窄得多了——这套丛刊中有一本是各国国歌述评，附有钢琴谱，我初弹《国际歌》（作为那时的苏联国歌），就是根据这本书的琴谱的。

讲到美术，开明也出过不少启蒙书——其中丰子恺先生的《西洋画派十二讲》给我打开了眼界，原来外国的美术思潮竟有这么些名堂。我至今知道的西洋画知识，多半也是从丰子恺先生几部书得来的——其中有一幅未来派绘画，跑动着的马有十二三条腿，那时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印象很深；我第一次意会到“动”的观念引起了形象变化。

6 西诺曹和吉诃德

如果说我童年因为读了一大堆中华、商务版的各国童话故事，使我知道有大人国，小人国，白雪公主，七个矮人等等童话世界，那么，到少年时代，开明的两本书《木偶奇遇记》（徐调孚译）和《吉诃德先生传》（节本）则开始诱导我进入外国文学的现实世界。那时脍炙人口的《爱的教育》（夏丏尊译）和《宝岛》（顾均正译），我也读了，但不如前面两本对我那么有启发。《木偶奇遇记》是和我同龄的堂姑姑送给我的，她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者，她觉悟得早，而且很早参加革命，我至今仍非常想念她——柳无垢同志从香港撤退到东江根据地时遇见过她，跟她谈起我来，才知道我们很小的时候分了手，都参加了革命，正是殊途同归了。后来我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跟这两部启蒙的小书不能不说是有点关系的。开明千方百计出版各方面的启蒙读物，对开发那一代的少年儿童智力是有贡献的，这是开明主持人的美好的设想，可以说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一种很好的传统。

7 人

此刻，我写着写着，脑海中时时闪现出开明的人来，特别是想起了几位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的人来。我不能自己地想起了范洗人，顾均正，傅彬然这几个名字。都是那么热诚，那么朴实，都是数十年如一日地认真从事他们的事业，尽管他们各有所长。范是搞经理工作的，却没有一点市侩气；顾、傅两公学术上各有千秋，但为启蒙工作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却是同样的。他们同你接触时，话不多，却使你感到真心都掏给你了。也许这就是爱国者的性格？也许这是真诚的中国知识界人士的性格？也许这是被称为“开明人”的那种平凡而实事求是的性格？我说不清。但我怀念他们。我这些年从他们那赤诚的，执著的，始终如一的，向着目标不断前进的性格中，汲取到力量。

1984年12月15日

三联书店的杂志和我

从前，大出版社都拥有一份或几份代表性杂志，例如生活书店有《生活周刊》，新知书店有《中国农村》，读书出版社有《读书生活》；正如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开明书店的《中学生》一样，都表达了和宣传了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同时也起着传播信息，扩大影响，招徕读者，培养作家的多种作用。

我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接触，也是从杂志开始的。我从念初中时起，就是《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我随着《生活周刊》成长的过程而成长——这个周刊原先着重在“修身”之道，然而内忧外患的中国，迫使它一步一步走向找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作为读者，我受它的熏陶和启发，也逐渐开扩了视野，而《中国农村》则正好引导我注视这个对我这个在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所不熟悉然而却必须熟悉的“新天地”。正好《读书生活》教我如何思考，如何去正确认识我自己和周围世界。除了这三个“启蒙”性质的杂志之外，还有两个比较“专门”的刊物，可以说对我进入社会甚至对我的一生，都起着一种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是《世界知识》，胡愈之创办的；一个是《语文》，叶籁士主编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胡愈之在杂志发刊词中这样说——是这个杂志给我展开了一个中国在世界那错综复杂的图景。从修身到救国，从中国到世界；甚至我的世界观也年复一年在这个杂志的诱导下逐渐形成。它的先后几任主编，胡愈之，金仲华，冯宾符，言传身教，使我毕生难忘。后来，我立志参加它的编辑工作，并且有机会接触到更为广泛的驰骋在国际斗争场地的志士们，也使我更加明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交织的意义——虽则我在《世界知识》工作时，这个刊物已脱离生活书店而独立经营了，但这无关宏旨。

至于《语文》，我说不清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我年青时正是30年代中期，这是个伟大的时代，苦难多于欢乐的时代，愤激代替沉思的时代，语文运动（包括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和世界语运动）同救亡运动密切联结在一起，杨沫《青春之歌》有一章写到拉丁化和世界语学习班的情景，正是年青时期的我所遇到的情景。探索语言文字本身的奥秘，从而寻求如何使语言文字不再披着神秘的外衣，更好地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我和我的同志们那时急切要解决的问题——《语文》杂志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语文》是个“划时代”的刊物，说它是“划时代”，一则因为它坚持语文统一战线，团结各种学派的语文工作者去研究解决语言与社会的难题，结束了那时统治文坛的“左”的教条主义；二则因为它的排印格式，冲破了古板呆滞的传统框框，字体字号和版面的变化，实在吸引人，令人耳目一新，而在当时落后的排版条件下，这样的革新意味着编辑与排字工人打成一片，付出加倍的劳动才能成功。

《语文》出版到上海沦陷时为止——从创刊号到终刊号，每期都给我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帮助。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断了我的语言工作，而全份《语文》也都在撤退中失掉了。后来我在桂林帮新知书店邮购科和新华日报办事处答复一部分读者来信——有一位读者问到30年代中期语文运动的某些理论问题，我跟他通了几次信后，当他知道我非常怀念这个刊物时，他竟把全部一期不漏寄赠我，使我有机会在那样阴霾四伏的日子里重温我曾经涉猎过的语言学诸问题，以至于四十多年后还能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位

读者多么可感激呵，可惜我连他的姓名也记不住。

有意思的是，我同新知书店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从语文杂志开始的。那是1937年底1938年初，王益从上海来到广州，在教育路一条小街里挂起了新知书店的招牌，同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英文排字架，连同一个月志《国际英文选》，英文名字为International Herald，汉译可以是“国际导报”。这个刊物本是在上海出版的，由绿川英子的丈夫刘仁编辑，那时刘仁夫妇去了武汉，而书店还想继续刊行，王益就问我有没有适合的人选可以接办。我那时还在大学上学，我的同班学友洪桥（字宜扬），小时候在香港学英文，水平还不错，我知道他是地下党员，我向他试探有没有兴趣和精力做这项工作。不料他很感兴趣，并且怂恿我由我们两人合作，用“余虹似”的笔名主编。王益同意后，我们把刊物改成很特别的开本，便于印插图和注释，选取英语世界进步报刊的报道和文章，主要是反对侵略，反对法西斯的内容，加上不少漫画，每篇都加上汉文注释——特别是字典中查不到的新字，都给加注，材料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大学图书馆，国际反侵略会，世界学联，以及英美报刊——值得一记的是，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西书部一位姓杨的朋友，给我们很多帮忙，例如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简称“Inprecor”）英文版，美国的《新群众》，英国的《劳工月刊》等。此外还有我的外国朋友寄来的剪报。我们接办后，刊物的销路很好，读者来信也很多，给我们两人很多鼓励——编辑和校对工作都由我们两人分担，每月一期，工作量也不少，这个刊物出到广州沦陷时，才停办。上面提到的洪桥，以后失去联系，听说解放后在我铁道部门做工程师，好像还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多少年来我始终没能跟他取得联系，不知还健在不。

1939年春，我在桂林正式参加新知书店工作。书店出版一个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少年战线》杂志，陆洛（静山）主编，也许我也是编委之一，每期撰写一篇科普文章。这个杂志算是抗战前期“大后方”唯一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少年刊物。

那时书店还出过一个极为别致的刊物——封面的刊名为《工作与学习》，封底的刊名却是《漫画与木刻》。说它别致，因为这是“二合一”的杂志，恐怕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确实是两个杂志“合”成的“一”个杂志。原先我们接触到桂林文化界有几个人要办一个政治思想综合杂志，另外几个人要办一个能刊载漫画和木刻的美术杂志。书店领导认为都可以接受，只因为那时印刷条件差，纸张也很困难，不知是谁建议，把两个杂志“并”作一个。几方面谈妥后，《工作与学习》就由季平（刘季平）主编，《漫画与木刻》就由刘建庵、黄新波主编，好像还有余所亚，也参加工作。书店责成我来做“二合一”——于是我定期向两处主编取回来稿子，经我剪裁编排，再同两处主编商定，便由我负责发稿。我记得这“二合一”的工作也不好做，比单纯编一个杂志伤脑筋多了。总共出了几期，记不得了。

40年代初，读书出版社在桂林出版《新音乐》月刊，由李凌、林路主编。因为我在抗战前后搞过歌咏运动，又在新知书店出过一部销行甚广的《新歌初集》，一部介绍苏联音乐的《苏联名歌集》，所以我也被李凌、林路“拉”去帮手。正所谓“滥竽充数”，但为了抗战，也顾不得许多了，我给《新音乐》写过好些稿子。读书出版社还在重庆出版一个《文学月报》，我投去一篇《高尔基论文学语言》，主编孔罗荪说不错，就登出来了，我计划还写有关鲁迅、曹雪芹的语言问题文章，做了好些笔记，却因杂事纷繁，没有成文。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办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综合杂志，由史枚主编。后来史枚调往香港，由我接办。这个杂志的编委会共5人，有周建人、杜国庠、戈宝权、陈翰伯和我。每月聚会一次，定选题，分任务，直坚持到1948年冬，政治环境更加恶化，只得停刊。回头一望，这个小小的刊物在那正所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起到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为缔造一个新的中国而奋斗那样的作用——特别是第一线的刊物如《民主》，《周报》，《消息》，《文萃》等都相继被迫停办之后，更受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

屈指一算，我同三家书店的杂志打交道长达半个世纪。三家书店的刊物都是按着“时代的脉搏”办的，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达到宣传政策，传播知识，团结读者，培养作家的目的，历史就是这样证明了的。我自己也是这些杂志的培育成人的，因此我一生都感谢它们。

1992年8月

图书馆和我

当我在中山大学高中部读书的时候，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大学图书馆——那时高中和大学都在文明路校园里，而我们的课程都排在上午，因此我差不多每天下午都溜进大学图书馆去。我不记得那装满洋书的参考室是不是与书库同在一个小楼，我只记得要上好几级阶梯才能到那里。记忆中的参考室很大，很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脚下铺着吸音的地毯（也许我把外国一些图书馆的参考阅览室在记忆里跟它搞混了），书架是敞开的，它们如同魔术师一样，给我展开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曾贪婪地翻阅这部或那部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幸而我自幼学英文，使得我在这无边的书海中浮沉自如。我在高中乙部，学的是理科——但我爱一切门类的知识，因此，那些综合的或专门的百科全书，满足了我少年时期天真而傻态可掬的愿望。我记得格罗夫（Grove）的六卷本音乐大百科，曾给我打开了通向西洋音乐之门——例如贝多芬那一条（后来作为专书出版）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曾摘采了一些史实和警句，甚至想把它翻译出来，其实那时我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是童年的梦幻。参考室里有很多外国作家的全集，我记得有几个诗人的，例如拜伦、雪莱，还有史温朋——史温朋集有十几大册，绿色封面，装帧得太迷人了，正如他的诗一样。我胡乱翻读诗人全集，这些韵文把我带到一个高尚的精神世界，以致我过去、现在都把诗、语言、现实、数学符号、公式混和在一起。由于我一个姑姑在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因此我得以“走后门”常常进入书库。爱看什么，就看什么。所存的书都平等地向我招手，我可以读了一章就放在一边，也可以读完一本。除了英文外，那时我在学日文和世界语，偶尔也翻看一些其他文字的书，中文书自然是占多数的。我几乎一类书一类书在读，恨不得把这蕴藏人类所有进步的或无用的知识，通通吞到肚子里去。

高中三年的图书馆“生涯”，使我懂得很多很多，我在群书中寻找到真理，朦胧地铸成了我的人生道路。也许我“浪费”了精力最旺盛的时光；也许我把那许多有用和无用的“知识”塞满我的脑海竟是一种过错。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不得不在茫茫书海中独立地去寻求我要走的道路。后来，我在那疯狂的浩劫年代中，曾经“检查”过我的“修正主义”思想根源——就在于这几年的书海浮沉——但“检查”归检查，即使那时也没有后悔。甚至我在“牛棚”中还迷惘地怀疑过，光靠读几部“指南”、“导读”、“解说”、“语录”就能精通一门学问吗？生活是多彩的，生活是复杂的，也许只有图书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开这多彩而复杂的图景。

知识来自实践，这是真理；但人——现代人——获得知识，很大一部分通过传媒，其中书报应该占很大的比重。在离开那个宝库之后近五十年，不意在巴西的故都里约热内卢街上散步时，竟然惊讶地发现，我的这个想法是现实的。那条街是普普通通的一条街，走过一间并不巍峨的建筑物时，抬头一望，是公众图书馆。我走进去，面积不大，仿佛我记忆中那个参考室那样大。书是敞开的，有各色各样百科全书，还有很多地图，有一壁是文学的和科学的册籍，书不多，却是可以随手“摸”到，并且抽出来阅读的。管理员微笑着同我打招呼，当他知道我从遥远的中国来时，他到里面一个房间（也许是善本室）捧出了一部大书，说这是多少年前某一位旅行家的游记，有图，有文，图是线条画（也许那时还没有照相）。这部大书顿时缩短了我和他的

距离，来此读书的人们都围拢着来看这部大书，七嘴八话，好像开什么学术讨论会——而这是真正的、普通人的、洲际讨论会。可惜，他们说葡萄牙文，我只能听懂几个与西班牙文语根相同的单字。还是管理员给我们解了围——他会说英文，也能说西班牙语，这样我就有了“翻译”。原来这是区里办的民众图书馆，普通市民碰到问题，大都到此查字典词书百科全书解决，也有闲人（包括失业的、半失业的、做计时工的以及下了班的职工和主持家务偷闲来此的主妇们），一有空就来这里读书，寻求知识是他们的乐趣，他们的享受，就像上茶馆聊天一样。巴西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巴西人——至少是他们中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者——努力改善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提高自己的科学水平。我和这个街角图书馆的管理员以及那一群普通读者告别时，深深地感动了。我仿佛又找回我失去了的少年时代，仿佛回到了文明路校园那幢大学图书馆参考室里——恰巧现在中山图书馆新馆就是在文明路那可爱的校园里崛起。

1992年

林则徐译书

林则徐译书，是中国近代史一段很有意义的插曲。林则徐在一百二十多年前（1839）被派到广东去跟西方国家的鸦片贩子作斗争，他译书完全是从实际斗争的需要出发的。林则徐不会外文，人们说他译书，就是组织翻译和审订加工的意思。那时译书是一桩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原来那时封建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已失掉信心，所以很不愿意中国的百姓跟外间世界发生密切接触。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大规模翻译外国经籍的时候，但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夜，译书却成为大逆不道了。不用说，那时的“翻译家”很少，他们的工作是替做生意的人当通译，社会地位也很低。像林则徐那样明了译书的作用，一到广东便在自己的衙门里组织翻译，后来竟然还将材料汇编成辑，附在奏章中送给皇帝去看，这见识和胆量着实是罕见的。林则徐自己也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不过他是少数派：人家要开放鸦片贸易，他却极力主张禁烟；人家害怕洋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却针锋相对地跟外国殖民主义者作斗争；人家不敢打开“天朝”的窗户，他却敢于张开眼睛正视周围的世界。

译洋书，知洋事，然后才能够跟外国打交道。——林则徐始终相信这一条。经过了一年多的尖锐斗争，他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这少数派在内外敌人夹击下，后来还是站不住，被革了职，最后还被流放。尽管如此，他始终相信外国侵略者可以打败，而了解敌情和翻译洋书则是十分重要的。林则徐对那位只会向英国侵略者投降的奕山提出的六条意见，最后一条也就是译书。他这主张自然不会被奕山这些民族败类听进去，只是后来经过魏源反复宣传，总算有很多人觉得颇有道理了。

林则徐译书既然从斗争的需要出发，那就不能不引起外国人的注意和惊讶。例如，当时一家英国人办的周报说，中国大官都是不问世界大事的，愚蠢不计，只有林钦差例外，他手下有人能翻译，而且广为搜罗西书，派人刺探消息。美国人那时在广东办的月刊，也不胜惊叹地报道林钦差的译书情况。英国有个侵略分子叫德庇时（J.F.Davis），在1852年出版了一部《战时和缔和后的中国》，第一卷有个附录就专门讲林钦差“关于西方各国的专著”——这里讲的其实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过魏书大部分也确实是根据林译的《四洲志》扩充的。德庇时又说，林则徐叫人译了大炮瞄准法的书，并且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实际应用。

当时译书既然服务于实际斗争，所以主要精力集中在翻译外人报刊有关时事政策的反映、报道和评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们在《海国图志》看到的林译《澳门月报》五辑，便属于这一类。拿这五辑文字跟现存的《澳门新闻纸》钞本比较，完全有理由可以说，《澳门新闻纸》就是当时译出的材料集。这些材料经过林则徐加工，便变成《澳门月报》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这五辑。这五个论题无疑都是那时对斗争有很重大的参考价值的。

被称为《澳门月报》或《澳门新闻纸》的材料，一般都说是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Bridgman）办的《中国丛报》（月报，旧译《澳门月报》）译出来的。其实，拿现存中文材料跟原文对照一下，很难同意这一点。那时在广州商馆内还出了两个周刊，一个是鸦片商人马地臣（James Matheson）办的《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逢星期四出版；另一个是英国“自由

贸易派”，即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Canton Press），逢星期六出版。现存《澳门新闻纸》钞本 1839 年全系译自星期六的报纸，可见这是从《广州周报》译的。英国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威里（Waley）在他的近著里也这样说，不过他没有说出理由。《广州周报》在 1839 年 7 月因为局势紧张，迁到澳门去了，不知怎样一弄，林手下的人便把它署为《澳门月报》了。明白这些翻译材料的出处，对于研究当时政策的反应是很有用的（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说可能译自葡文的《澳门月刊》，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那个刊物当时早已停刊了）。

收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的《华事夷言》录要，也署林则徐译。这份材料是外国人对中国事情的零星意见，但不像前面说的《澳门月报》那样强烈地反映时事政策。有人认为也是从西洋报刊转译的，但也有人认为译自一本英文书。1839 年晋谒过林则徐的英国医生喜尔（Dr.Hill）在《广州周报》上写过一篇印象记。那篇文章说林则徐给他看两本英文书，书中都已作了若干摘译，其中一本已缺封扉，据他猜想是德庇时的《中国人》。《中国人》一书出版于 1836 年，讲中国文化艺术、风土人情，一直到政治经济。我猜想《华事夷言》可能就是摘译此书的。

和西方侵略者作斗争，除了需要时事政策性的翻译之外，显然还需要有关各国的基本知识。林译《四洲志》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翻译的。原文是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作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 年才在伦敦出版，作者和东印度公司有关系。毫无疑问，此书在当时是一本新书，也算是林则徐唯一新颖的《世界知识手册》了。《四洲志》比前此西洋传教士所写译的地理书新颖得多，比 1840 年上半年在广东出版的《海录》更有参考价值——《海录》是杨炳南根据一个出国十四年的水手谢清高 1820 年时的口述写成的，着重在所见所闻的风土人情，而《四洲志》则有点像现在的世界地理了。

极为有意义的是林则徐选择了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一书的几节。原书出版于 1758 年，作者是瑞士人。此书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维护民族国家独立的。现保存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的两份译文，一署米利坚医生伯驾译，一署袁德辉译，两种译文有一节是重复的。袁是衙门中的一个翻译；这个伯驾医生是美国传教士，在广州以开设眼科医院为名进行侵略活动。此人写的医院年报中记有六五五号病案，说：“小肠疝气。林钦差，人未见。”从职业观点来看，这个病案没有什么可记；但与这样显赫的人物交往，记录其若干经过，未始不是很有意义的。与他初次来往是在（1839 年）7 月间，不是治病，而是他叫行商送来滑达尔的《各国律例》若干段，要求译成中文，这几段谈到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可见现今保存的一份译文，确是这个后来当过美国驻华使节的伯驾再译的。两种译文虽只有寥寥几条，但其内容却很重要，看来对当时的斗争很有益处。例如，那时英国水兵在尖沙咀杀害了中国农民林维喜，义律拒不交凶，还私设法庭审判五个印度水兵。林则徐对义律的狡辩始终理直气壮地加以驳斥，这是和他了解外国律例不无关系的。

林则徐收买到的西书，一定比他译出的多得多。例如上面提到的喜尔医生说，林则徐 1839 年 11 月便已看到同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即地尔汪（A.S.Thelwall）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而且译了其中几段。这确实令人很敬佩。这本小册子作者是英国僧侣，从“宗教”和“道德”的立场攻击鸦片贸易，其实在客观上也不过反映了“自由贸易”派棉织资本家的意见

罢了——他们原来是要向这神秘的天朝推销棉布的。这复杂的情况，林则徐那时不可能理解，但他至少知道：英国国内也有人反对鸦片贸易的，这个矛盾可以利用。

《澳门新闻纸》钞本里有一条译文说澳门出版了一本禁烟文献，此条末尾有批语说：“此书应向澳门寻觅”，一般认为这批语是林的意见。他要找的这本书，是美国传教士沙克（Shuck）编的《中国政书》（Portfolio Chinese），1840年在澳门印行，收七个中国官方禁烟文件，中英对照，另有附录，即当时广东当局出的捕捉英船英“酋”立即给奖的“赏格”。这个文件在中文册籍中没有看到，英美侵略者当时即以此攻击林则徐是用“暗杀”方法对付外国人，甚是“野蛮”云云，其实那时对付这批“文明的野蛮人”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什么野蛮可言呢？

由于不断在斗争中扩大眼界，总结经验，林则徐的国际知识和策略思想，一天比一天丰富，比如说，他把当对的主要敌人英国与美、法、荷、葡分开，从而孤立了敌人，连澳门的葡人总督也不肯直接帮英国侵略者，这就是一个胜利。他又把英国女王与在华代表义律分开，把英国官方与商人分开，把正当商人与鸦片贩子分开，把一般鸦片商与走私头子分开，把肯具结的商船与不肯具结的商船分开……这些都是富有策略意义的，现在看来，大致上也是对的。

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打破了统治阶级的胆，却激起了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腐朽压迫者的雄心。至于地主阶级中少数觉醒人物，面对这样新的形势，也在寻找“富国强兵”的道路。凡此，都促使知识界要认真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局势。这样就给中国近代书籍的出版历史开辟了新的门路：“了解夷情”的书籍在这以后像雨后春笋似地相继出版，其中较著名的有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萧令裕的《英吉利记》（1842），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夏燮的《中西纪事》（1850）等等。

林则徐译书，为中国近代书史开辟了光辉的一页。至于他所译的书，由于时势所迫，当日大部分是内部参考性质，对斗争确实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们并没有能够在国内知识界中燃点起思想的烽火。这个时代所赋与的任务，后来是由林的朋友魏源通过他的《海国图志》来完成了。

1961年5月4日

关于裨治文和《中国丛报》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是美国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家报刊；这是美国殖民主义者和传教士推销美国式的“善意”和“友谊”的一份忠实纪录。今天离开它创刊之日，已经足足有一百三十年了。

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是《中国丛报》的创办人和主编。裨治文于1830年2月被美国教会派到广州；他到广州后，住在美国商人的“行馆”里，学习中文，跟那时英国侵略者的谋士、“中国通”马礼逊鬼混。不久裨治文和马礼逊向美国教会建议派一个印刷所来。1831年，果然运来了一整套印刷设备。这样，他们就决定办一个刊物，尽管那时英国鸦片贩子马地臣(Matheson)已经在广州出版了一个周刊——1827年创刊的《中国纪事报》。1832年5月，《中国丛报》出了第一期，这样一直到1851年，共出二十卷(每月一期，每年一卷)。《中国丛报》的经费起先据说是由广州的一个由英、美人组织的宗教团体出的，但裨治文的野心很大，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生怕出钱的机关不能切实执行美国的政策，一年之后，美国一个商人叫奥利芬(Olyphant)的就掏腰包，做《丛报》的后台老板。所以这个刊物正如一个美国人所说，“主要不谈宗教的内容”。再过一年，又来了一个卫三畏(S.WellsWilliams)负责印刷所——此人立即成为《中国丛报》的合作者，后来回到美国还写了几卷《中国通论》，当了教授。传教士、商人、“学者”，一套人马齐全了，殖民主义的“班底”也快完善了，但是还缺一位医生。裨治文写信回国呼吁道：

“我们这里急需这样的一个人(医生)来工作。”(1833年12月26日函)

这样，1834年10月就召来了一个既修完医学又修完神学课程的“慈善家”巴驾(Rev.Parker)，此人到广州后就成为裨治文、奥利芬、卫三畏一伙人的合作者。巴驾于1835年在广州的一个行商的协助下开设了眼科医院，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回到美国去游说美国当局，请他们务必步英国的后尘插手到中国来——这可以想见也是裨治文这一伙人共同参谋出来的主意。巴驾后来正如裨治文一样，成为美国侵华的急先锋。

裨治文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之后，由《中国丛报》的主编而成为美国驻华官员的翻译、参谋、顾问，很受主子的器重，这和他长期办报，刺探了满肚子情报有关。1858年美国公使列卫廉给国务卿的公函中这样表扬过裨治文：

裨治文博士在1853年之于马沙利(H.Marshall)，在1854年之于麦连(McLane)，于一应公务上都是主要的助手，现在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他不时的帮助和经常可贵的画谋献策，我得借此机会向他表示谢意，实深欣幸。

至于裨治文所主编的《中国丛报》，也得到美国侵略者的很高评价。例如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也这样说过：

的确，从《中国丛报》和望厦条约的仔细比较之中，可以看出顾盛(C.Cushing——按：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的代表——引用者注)在1844年的交涉中不但多亏裨治文的翻译工作，而且多亏有他作为顾问。条约中有一些条款似乎都是直接出诸《中国丛报》的先期讨论的。

《中国丛报》每卷开头几乎都要给自己打气，要求“更多的”、“更准确的”、“更详尽的”情报资料。在它存在的二十年中，公开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政治、经济、语言、文字、风俗……一切方面的调查研究，其中也包括一些当时很有军事价值的材料。这仅是可以在刊物上看到的，至于它搞了多少秘密情报，那就无法查明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丛报》更明目张胆地提出，要以 1840 年 5 月英军当局给侵华远征军制定的“调查要点”（Hints）作为自己发表文章的“选题”。它除了按照“要点”所规定的项目（山川、城乡、岛屿、海流、风向、气温、雨量、矿物、植物、动物等）进行调查之外，还特别着重有关人事的材料。

试看看 1843 年的《中国丛报》的主要文章目录，就可以明白美国传教士和官员们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兴趣来办这份刊物了。这一年从 1 月号到 9 月号依次发表了下面的主要论文：

《北京官员录》
《广东地貌》
《厦门港测量志》
《厦门及其居民志》
《广东通志摘要》
《香港史》
《中国沿海由厦门到长江口航行指南》
《福建至交趾支那沿海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刊物很少直接宣传华盛顿的观点，它总是把自己装扮成为“公正”和“客观”的杂志。它发表对时局的评论，一般地说也是很“谨慎”的。所以英美资产阶级后来总是将它说成“不偏不倚”的“学术”刊物。例如另一个“中国通”，在中国海关长期工作过的美国人马士（Morse），就说裨治文“完全了解当时的情况，而由于他是一个美国人，所以对于当时在争执中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是完全没有偏见的。”（！！）不过裨治文的狐狸尾巴仍然不时在这个“没有偏见的”刊物中露出来。例如 1839 年 5 月号有一篇很长的社论，题目是《关于当前鸦片贸易引起的危机的若干意见》，其中第三点大意是说：西方各国利害相关，对中国人的不满，大家都是同样的，对中国人提出的原则或要求的权利，要联合起来共同议定才好。“不应当再各行其是，只着眼于狭隘的利益了。应当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付中国，或者勿宁说是整个西方世界为了中国。”——整个西方对付中国，这是实话，但美其名曰“为了中国”，或者如后来所说的“加深对中国的友谊”，这是糖衣。裨治文的衣钵一直传到当今的美国冒险家身上。

相传林则徐曾命人从这个刊物译过材料，其实林译并不出自《中国丛报》（也有人把这个刊物叫做《澳门月报》），我在《林则徐译书》一文中已经说过了。现在没有材料说明林的幕僚参加过这个刊物没有；不过这是个月刊，又常脱期，当时斗争激烈，恐怕参考作用不是太大的。林则徐当时对美国传教士所采取的方针是和对英国鸦片贩子不同的，所以在 1840 年 6 月虎门烧烟时，林则徐曾在现场接见过裨治文。《林则徐日记》载（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七日）：“今日已刻，夷带其女眷与啤、咬、等，同驾小船，由师船带至虎门，在池上看视化烟，并至厂前，以夷礼摘帽见，令员弁传谕训戒，犒赏食物而去。”其中所记“夷”是美国当时在广州的商人金氏（King），

“啤 叻就是《中国丛报》的主编 Bridgman。那时中国文书上写洋人的译名都加“口”旁的。

《中国丛报》创刊时印四百份，四年后增到一千份以上，以后增加到多少，没有材料可查。发行地区主要是英美、南洋、广东（广州、澳门）。这个发行量当时是算多的。英国人办的《广州纪事报》只有二百八十个订户（1836年），《广州周报》的订户更少些。这些英美侵略分子躲在“行馆”里鬼鬼祟祟地办报，有时也不能事事打“如意算盘”。裨治文曾经大发牢骚，说在那里办报有“九大困难”——其中一点是：“一出门便被中国人称为番鬼，到处都碰到敌视的眼色”。这倒如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憎恨情绪。

1962年

书的生命……

在广州旧书摊买到一本《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著），是1931年8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那时正是“九·一八”的前夜，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形势非常紧张，人们引领北望，憧憬着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最可靠的朋友——苏联。这本书曾在一个周刊上连载。印成单行本的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人，彼此争相走告。书虽不大，而且也仅仅记载了作者1931年1月间靠世界语的关系在莫斯科游历七天的印象，但是给那时的读书界颇大的影响。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在我国宣传苏联的几本影响较大的专著之一。小册子的作者在出书两年后的一篇文章里说：此书“竟有人当作关于苏联的宝贵读物，在两年中间行销了数版”。确实如此。昨日偶在旧书铺中又得到此书的第二版，记明是1932年1月20日出的，那时正是“九·一八”后四个月，“一·二八”前几天，形势是更为紧张了，而读者愈加想了解这个新生的国家。“大众不但要从研究苏联中，找寻客观的事实，而且也想从这社会主义的‘雏形国家’的描写中，找寻他们的未来生活的憧憬。”（胡愈之：《苏联大观》序言）作者用了最大的同情和热情，来描写他在莫斯科的见闻。那时候，我们处在白色恐怖下面，由于层层封锁，读者难于得到关于这个国度的正确消息。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的青年，对于苏联是具有无穷的信念的，但是也不容易说出我们的苏维埃兄弟是怎样生活着和斗争着。这本小册子恰巧用作者亲身的经历，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作者写到那艰难的岁月，写到和生产劳动打成一片的学校，写到集体农庄，写到红场，写到列宁墓……也写到一些困难。所有这些，在那时看来都是十分新鲜的“奇闻”，简直像太阳光透过层层浓雾，射到人间一样，吸引着万千的男女。

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前，在我们的国家里，追求光明的年轻人，连读这样的书也不得不躲躲闪闪。在我买到的那一册旧书上，写着好几行字，虽然墨水已经氧化褪色了，可是字是工整的，还很清楚，那是一封信：

你的学校寒假期中所指定应读的这本书，我替你买着了，特邮寄给你，希望你一心一德的去读，不要辜负了我买这本书的意思。此致
映霞妹

兄彬购于芜湖

1月31日

如遇不懂的名词，例如：苏维埃、普罗和布尔乔等名词，可以查看新术语辞典，便可明了意义了。

我不知道这写信的和受信的是谁，他们是否健在；我更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样的兄妹。如果有，这位哥哥的拳拳之心是可以感激的。但我疑心那是一种假托，那时未必有一所如此进步的学校，竟会指定这本书当作学生的假期必读书。我猜想，那是一位进步的青年故弄玄虚，想骗过那时的邮政检查官，把这本好书寄给他的同道的。遍翻此书，页页都崭新得很，没有一点读过的痕迹，因此我又怀疑在邮寄的途中，被国民党的检查官所检扣，直到解放后才能重见天日。

这些都是遐想，没有什么根据，但那时反动派尽管如此摧残文化，封锁新闻，群众却一点也不肯低头。鲁迅先生说得好，无论国民党反动派要跟苏

联“绝交”还是“复交”，“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因为“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有些书底子过分单薄，本来不该生存在这世界；有些书虽也有它生存的意义，或者还起过一时的作用，但不久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些书却在它出世的时候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教育他们，带引他们走上人类解放的道路，而它本身也确实记录了一个时期的历史真实，几十年后虽则时迁景变，广大的读者自然无需乎再去亲近它了，然而这样的书却还有自己的生命。

《莫斯科印象记》属于最后这一种：它在黑暗的王国内给万千青年投过一线光明，它在两大民族的友谊的生长中起过促进的作用。它记述了那时苏维埃国土的欢乐和痛苦；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它反映了过去走过的足迹，并且照亮了未来的道路。

1959年

《东方红》

不记得是在去南京的火车上，还是在上海的饭店里，胡愈老跟我说，他流亡印尼时，看见过一部年历，那不啻是民间日用的百科全书——不，是万宝全书，他说。书名叫做《欧家全》——欧家全是广东一个企业家的名字，他开了一间药厂，他这药厂出产的“广药”，大量推销到南洋去。为了推销药品，每年印出一部“皇历”，趁机登了很多产品（药品）广告；书里还有很多家庭日用常识。那时除了“月份牌”——即现在附有月历的年画——之外，人人都争着买这么一部万宝全书。因此，《欧家全》变成家喻户晓的名字，也成为华侨必备的“皇历”了。胡愈老问我：你看到过《欧家全》吗？

我说，我幼年时家里有过这么一本《欧家全》，我们都管它叫“通胜”——就是“通书”。

胡愈老问：为什么你们把“通书”叫作“通胜”？

我说，广东人也怪，有时说话都是文绉绉的，我们从不称“皇历”，却像《红楼梦》所写的，贾琏还是什么人要查好日子，就捧过“通书”来，书中有禁，有宜，有吉，有凶，一查便得。广州话“书”与“输”同音，犯忌，怎么能去“输”呢？所以不称“输”而改称“胜”，取其吉利之意，正如广州人把“猪肝”称为“猪润”一样，忌“干”字，口袋里没钱就“干”，不如说湿润一点，图个吉利。

胡愈老说，他也想编一部“欧家全”，即编一部包罗万有的“通书”，发行到农村去，成为农民的万宝全书。

胡愈老在60年代老是想农村，想农民，想农村文化，想怎样在农村中扫除文盲，如何向农民灌输科学知识文化知识。他又想到农村里很穷，很难抽出多少钱买书，最好一年买一本包罗万有，既实用又可以作文娱活动材料的书。

这就是1964—1965年胡愈老亲自到农村读物出版社去搞《东方红》的前奏。胡愈老说，他想了很久，才想出一个《东方红》做书名，因为毛主席威信很高，而“东方红”这首小曲确实是人人都会唱，书名定为“东方红”，那就最通俗不过了。他问我的意见，我说我非常欣赏为农民大众编印一部包罗万有的农历，但是我不主张用“东方红”作书名。胡愈老问为什么？我说，“东方红”象征毛主席，人家一唱起“东方红”，眼前就出现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你编一本农历，一本百科全书，怎好滥用这崇高的类比？——当然，我是个教条主义者，而胡愈老却能时时刻刻冲破教条的束缚。胡愈老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据胡愈老的设想，这部《东方红》有日历，有日用知识，例如卫生知识，医药知识，编毛线的花样，沼气制造法，等等，也可以登很多很多广告，比方——他举例说——卖胶鞋的广告，卖各种药品的广告，收买农村废品的广告等等。登广告可以收广告费，因为这部书发行量大——他说，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村人口，一家一户买一本那就不得了——所以广告费特别高，收了很多广告费，书价就可以大大降低，这就适合农村人口的购买力，也就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他还说，登的广告都要详细审查，货真价实才让它登出来，绝对不能骗读者。编辑部要时时刻刻为农村读者着想。

他——胡愈老，真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者，他真能想象：按他后来的想法，这部书（《东方红》）的编辑部，将来发展成为替农村群众解决问题的服务

部，不但一般意义的服务，而且还要逐步发展为“权威”的机构。凡是农村里不能解决或不肯解决而又应当解决的问题，只要告到编辑部，编辑部都乐于为他解决，小到买一双胶鞋，代办什么联系——为联系专门大夫或找寻失散的亲人朋友——，大至闹离婚，告发贪污和欺压群众等违法乱纪的事，只要下面不解决，告到编辑部，编辑部就给他去设法解决。我说，你的设想像傅利叶们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现在的体制下是决计不能实现的。他说，只要我们有强烈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事情就好办。我说，你这样做不是凌驾各级政府和党委之上么？他说，这是实现主人翁的监督作用，不是凌驾，编辑部不能执行，只能催促，联系，监督。我说，你真这样做要犯错误的。胡愈老一听很生气，他说，你就是怕犯错误。你不干，我来干。

胡愈老亲自带农村读物出版社的编辑下乡调查研究，亲自定选题，亲自设计内容，亲自审改稿件，后来，甚至亲自下印刷厂。《东方红》的书名确定下来了，《东方红》上马了。

当时没有一个人不佩服胡愈老的毅力，胆力，勇气，以及为农民群众做好事的高尚品格；没有一个人不敬仰他以将近七十岁高龄亲力亲为的这种事业家的精神。我劝不住他老人家，那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那正是风暴即将来临前的低气压日子，我已经被安排到预演“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粉墨登场”了，但可悲的是我仍不能置身事外，我在那苦闷的日日夜夜里同胡愈老竟然发生了悲剧性的冲突了！

1991年8月

在“企鹅”书店

距今四十五年前，英语世界出现了第一套用一只企鹅为标志的平装本书，它立即吸引了读书界的注意。首先，它定价便宜——那时只售六便士一本（在上海只卖几角钱）；其次，内容比较有吸引力。这个以第一套共十本书起家的出版社，最初资本只有一百镑，现在已发展成为国际性企业。它的办公楼坐落在伦敦最大的国际机场的对面。说也奇怪，这个建筑物面对着每几分钟起飞或降落一架飞机的噪音，因为装有隔音玻璃，却没有感到噪音的厌烦。这座占地很大的建筑物，除了办公楼以外，还新建了一个全部用电子装备管理的仓库——七个工作人员用七部运载工具，就可以每年搬进搬出一千八百多万册书。

“企鹅”丛书诞生那一年，即1935年，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危机，我们的民族也经历着一场危难。在欧洲，也是光明与黑暗搏斗的一年：希特勒和莫索里尼都已上台，那时欧洲诸国的政治家大都目光短浅，他们以为用讨好的办法（后来叫做“绥靖”）就可以填满法西斯主义的贪欲，而结果适得其反，诱发了四年之后的大灾难——“企鹅”的创办人阿伦·棱（Allen Lane）是有抱负的，他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开创了平装本的出版事业。他要冲破欧洲古老国家硬面精装书的束缚，用低廉的定价来“夺取”市场。他宣传用“买一包十支装香烟”的价钱，来买一本书，以便适应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过后刚刚复苏的社会购买力。他成功了。不过他那第一套十本书，全是挑选出来的重版书，他向作者购买出平装本的版权。在这十本书中，大都是当时很受读者欢迎的小说，例如法国莫洛亚（Andre Maurois）的《阿丽尔》（Ariel），美国海明威（E. Hemingway）的《与武器告别》（Farewell to Arms），还有现在很红的女小说家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一部侦探小说《The Murder on the Links》——现在，大约在国内此时已看过她的《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那部电影了罢？但30年代时这个女作家只是初露头角呢。

我昨夜想了一想，“企鹅”书店之所以能生存，不但生存，而且发展，到今成为拥有巨大资金的国际出版公司，那道理怕有三条：

第一条，是上面说过的，它适应了读者的购买力，以一包十支装香烟的价钱买书一册，打破了西方“硬皮书”几百年的老传统，开辟了一代“平装书”的新纪元。六便士一本书！在3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顺便告诉你，现在一本普通的“企鹅”小册子，定价不是六便士了；一般售九十便士到一镑（每一英镑合一百便士）左右，同香烟比较，伦敦一般廿支装的香烟涨到七十便士一包，这就是说，一本“企鹅”平装书，比一包廿支装香烟稍稍贵一点。当然比30年代它初出之时“涨”了价了。之所以定价便宜，是靠节约用纸，精打细算，用小号字，天地留得很少，行距也很密。说来也很可笑，“企鹅”现在也出版大型插图本的平装书，那天去访问时，它刚出版了插图本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蒂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售价也只三镑半，有很多彩色插图，三百七十几页，如果这样大小的硬面精装学术著作，怕要卖十多二十镑呢。更可笑的是，“企鹅”以打破精装推广平装起家，现在它也开始出硬面的精装本了。从精装到平装，又从平装到精装，这是说明西方世界的购买力发生变化呢，还是说明什么社会因素呢？

其次一条，不能不认为“企鹅”的主持人是有见地的——他能紧紧抓住读者当时关心的问题，出了好些所谓“畅销书”。我们叫做“配合中心”——

——他也配合读者心理和时局的。有价值的著作，不一定是畅销书，这是对的；可是不受读者欢迎的书，一般地说是没有生命力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书卖不出去，出版社就必然倒闭。当然，“读者”也有广泛的、部分的、专门的之分，书按销路说也有畅销的、常销的和适应少数专门人员使用的销数不多的书。总之，你知道，出书没有人要，那么，这个出版社就没有生存权利。“企鹅”在30年代确实出过几本轰动一时的书，例如那时法国名记者塔布依夫人(Mme Tabuis)的《黑幕还是战争》(Blackmail or War?)，揭露当时欧洲政界的肮脏交易，指出战争不可避免，很受人欢迎。据说这位记者有不少“内幕”新闻，是她利用各种场合“刺探”得来的。此书我们在1940年前后有中译本，是新知书店出版的，书名我已记不清了，当时也受国内读书界的欢迎。“企鹅”有一部“特稿”(Penguin Special)是英国记者莫勒(Edgar Mowrer)写的“非小说”(non-fiction)，——西方通常把书籍简单分为“小说”与“非小说”——叫做《德国把时钟扭转》(Germany Puts to Clock Back)，是时论性读物，抨击希特勒主义的一部书，当时也很受读者欢迎。

这次访问，特别注意到“企鹅”有一个样本室，占了很大的半层楼。主人告诉我们，他们30年代的样书，因为战争，已散失不少，现在正出高价搜购。据说30年代出的版本，原价六便士，现在出一百三十镑买一本也干。因为出了高价，他们确实搜集了不少样本。我原想到那层楼上去浏览一番，只是行色匆匆，没有如愿。我记得30年代有个英国生物学家，皇家学会会员(FRS)，叫做海登(F.B. S. Haldane)，他担任过英国《工人日报》主笔，写过很多通俗的科学文章，合编为《科学与日常生活》(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编入“企鹅”丛书，销行颇广。1946年有朋自外国来，送了我一本，曾译为中文，编入生活书店的“生活丛书”，印过几版，可见读者是欢迎的。此人好像因为不赞成李森科的学说(但那时苏联“批准”李氏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的”，而禁止摩尔根学说，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后来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现在不知是否过世了。那天匆匆忙忙，问了一问主人，却没打听出结果来，也算是憾事。

据我看，“企鹅”站得住脚还有第三条即最后一条“诀窍”——那就是翻印古典作品。古典作品经过千锤百炼，是常销书，即如我们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之类，一不需付稿费，二保证有读者。按照英国版权法，作家死后二十五年，版权就归社会公有，出版社出版这种书，可以不付分文稿费。莎士比亚，狄更斯，史各脱，都已死去何止百年，所以出版商各出奇计，印行各种能吸引人的版本——“企鹅”则以廉价来吸引读者，这也是它能保证持久利润的窍门之一罢。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企鹅”的生活史上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原来，1960年时“企鹅”主人异想天开，要把劳伦斯(D.H. Lawrence 1885—1930)的小说《查脱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s)不加删节地公开印行。这是大胆的设想，这部小说初版于1928年，里面有多处对这位夫人同一个看林人发生性关系的露骨描写，历来是禁书。英国正式禁止过，认为它是色情文学(Porno)，欧洲很多国家却偷偷影印，运回英国销行，因为是禁书，更显得“洛阳纸贵”——记得我在《书林漫步》中一篇短文里引用“雪夜闭门读禁书，乃人生一大乐事”，就是出自30年代北平影印此书的广告。出书几十年来，世界闻名，争论颇多，倒是毁誉参半，有人以为诲淫，归入黄色小说一类，有人则以为是上乘的艺术创作。“企鹅”要公开印，胆子是

够大的了(如果问为什么 1960 年忽发奇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到那时作者逝世已逾廿五年,版权自动消失了,印书不必付稿费了)。果然不出所料,书一出,“企鹅”公司便以触犯出版“淫书”的条例被控于官,于是引起英国朝野议论纷纷——无非两种意见,反对者斥之为黄色,赞许者誉之为艺术,知识界头面人物也纷纷表态(我猜,有不少人可能是这个出版公司“动员”他出来表态的),最后英国司法当局撤销这个控告,宣判此书不触犯法律,也就是承认这部小说不是黄色小说——这样一来,一场冒险带来了更大的名声。这部几十年偷偷摸摸影印出版,秘密发行,高价发售的“禁书”,当天即售完它所印出的二十万册,一时身份百倍,立即成为畅销书,时至今日,十几二十年了,在“企鹅”畅销书单中,这部小书还是名列前茅。昨夜我在旅馆附近散步,一个兼卖文具的书店网(斯密司联号 W. H. Smith)书架上赫然陈列了这部一度“雪夜闭门”才敢读的“禁书”,售价只九十五便士,等于三瓶汽水的价钱。

“企鹅”确实得到很多当代作家的支持,此中奥秘,一时无法弄清。比方萧伯纳就很欣赏这家出版社,当“企鹅”公司某一年拟编印一套“塘鹅”(Pelican)丛书时,萧伯纳欣然同意把他的著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编为第一本,并且增补了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个部分,改名为《知识界妇女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指南》(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Capitalism, Sovietism and Fascism)。萧是当代最红的作家之一,他心甘情愿将自己的著作编入廉价本,用小字体,排得密麻麻的,也是颇有意义的。萧把这个版本戏称为“萧氏六便士初版书”。这样一来,这套丛书名声大振。此书近来没见重版,否则真想再来看一遍。

我们去访问时,这位创办人(后来封为爵士)梭先生已病故多年(1970年逝世),这个人的“发达”史,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一侧面缩影。这个出版社从创办到现在已四十余年,出书四千种,每年行销四千多万册——其中一半是在英国本土销售,一半是在英语世界其他国家销售的。

我们在编辑部转了一转,又到仓库看它的现代化设备,花了大半天,颇有感受,搞事业就得有胆识,而且要有创新。因循苟且打不开门路来的。不过即使它生存下来了,但最终逃脱不了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主人一死,翌年就同龙门(Longman)合并,也许可以说是并入了“龙门集团”

(Longman Group),成为这个包括出版及其他工商业的大资本中的一个子公司了——但也仍然保持着它的独立的出版方针。

1979 年

在牛津的一家书店

到牛津当晚在圣约翰学院参加夜宴，点着蜡烛，古色古香，厨师捧着烤好了的全羊出示客人，仿佛进入了史各脱小说中所描写的场面。今日清早便到镇中心的宽街去逛书店。我说“逛”书店，就是此间常用的一个字：browse——即“随便翻阅”之意。宽街48到51号是世界有名的布莱克威尔书店(B、H、Blackwell Ltd.)。这家书店多年前我曾经同它打过交道，早已耳熟能详了，今天“逛”了一个上午，果然名不虚传。——到伦敦时人家说最大的书店是“福伊士”(Foyles)书店；可是一到牛津，牛津人说，不，最大的书店在我们这里。我也懒得去考证谁是最大的书店，总之，朋友们说，到了牛津而不去“逛”这家书店，等于你没有到牛津。难怪希思也说，他每次回牛津都必到这书店来，可见这家书店在这个大学城的文化生活中有着怎样的影响了。

到这家书店门口，忽然又觉得它并不“宏伟”。三层楼加上半层阁楼的旧房子，三开间的旧店铺，这就是主要的门市部（在另外一条街还有音乐、珍本、儿童等专业门市部）。可是一进门，则里面甚为宽敞，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分门别类，到处陈列的书籍都任人取阅。这家书店刚刚庆祝过它的一百周年，从1879年三个人办的小书铺发展到今日雇用六百五十多职工，装备电子计算机的大企业。主人说，他们库存十七万种书，邮购特别发达，全球都有它的读者。英国近年每年出新书三万种，重版约一万种，品种是很多的，至于它的门市部是否有十七万种之多，那就只好相信主人的介绍了。书是按学科分类陈列的，所有书架上的书，都可以伸手抽得出来。来看书的人不少，挑选到合意的书，便拿到柜台去付款。你在这里可以无忧无虑地翻检查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比图书馆还方便。资本家开的书店全部开架，任人翻看，这一点对我们是一种“刺激”。我今天拿到一份推广品，头一页印的一段话，更使我有点惊讶。我把它抄给你看看：

当你到
布莱克威尔书店时：

谁也不会来问你打算作什么。你爱上哪里去，便到哪里去；你爱抽看那本书，便抽看那本书。简而言之，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翻阅。

本店职工只有在你需要的时候前来为你服务；但除非你叫他们，否则他们绝不干扰你。你来买书也好，或者仅仅到此翻看也好，都一样受到欢迎。这种服务方式是布莱克威尔书店九十多年来保持的传统。

你说这几句话写得多漂亮。我觉得也相当恳切。我特别喜欢其中一句话：“你来买书也好，或者仅仅到此翻看也好，都一样受到欢迎。”——我认为这才叫做书店。据我在这里“逛”了一两小时的观察，这句话他们是做到了的。这里那里都是顾客，或者更准确地说，这里那里都站满了翻看的人，不知他或她是来“买书”的或仅仅是来“翻看”的。环境是那么恬静，安静，寂静，没有说话声，更没有职工或者读者的高谈阔论，谁也不来找你麻烦，确实没有人嫌你老站在那里看书。无怪乎很多英国学人认为“逛”书店是一种享受，一种文化享受。逛书店不一定要买书，这种“哲学”是很文明的“哲

学”，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书店不单纯是做买卖的——它同时，或者更重要的，是传播知识的场所。这一点，我们过去无论在白区还是在解放区开书店，都是如此的，不过我现在却只能怀念那时的书店了。

你一定对这家书店的电子装备感到兴趣吧？在书店的终端机荧光屏上，可以找到任何一种当代出版物的资料——作者，出版者，开本，定价，是否售罄，是否修订重版，只要一按电钮，发出指令，你需要的情报就出现在荧光屏上，真好玩得很。主人说，这里存储了六十万种书的准确资料，随便你问当代的哪一种书，几秒钟就能获得答案。我们试验了，也确实如此。不过如果一本书的资料没有储存进去，可就问不出来了。

在陈列书籍的铺面上，有一个直径约一尺的地球仪似的东西在转动着，这是电子监测仪。承主人盛情，邀我们到控制室去看荧光屏，原来靠了这个电子仪器，店面的情况到处都可以受“监视”。自然就产生了一连串问题：偷书的人多吗？靠这个仪器抓贼吗？主人笑着说，这不过是“威慑”力量，其实是拿来吓唬人的。按英国法律规定，偷书者当场被抓，初犯罚款二十镑到二百镑（二百镑约等于当地最低的月薪），再犯则坐牢云云。英国是个“法”治国家，什么都有一大堆“法”的。不过丢书据说也是常有的事，“法”治也没法杜绝偷书，但是羊毛出自羊身上，资本家也并不因为偶有丢书而把书架封起来不让人看的，这是他们“明智”的地方，也许以为这样才可能多赚钱，倒不一定那么好心要传播文化的。“逛”完书店，又匆匆赶别的约会，可惜不曾“逛”个够，专业门市部也没有机会去“逛”呢。

1979年

玛雅人的世界 ——在墨西哥城的见闻

在举世闻名的国立人类学博物馆(Muze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里,买到了玛利亚·斯登(Maria Sten)的《墨西哥古文书》(Codices of Mexico);之后又在离城二十五哩的太阳金字塔(Teotihuacan)那里买到摩拉列斯(D. S. Morales)的《玛雅人世界》(The Maya World),高兴极了。不知为什么,这种通俗的学术著作,在本土以外却很难买到。两个作者都是墨西哥人,前者是艺术学博士,多年来从事墨西哥古文明的研究;后者则是玛雅文化的权威,曾二十二次深入现代玛雅人聚居的河谷考察——1959年还在内陆发现过两处玛雅人的遗址——会讲玛雅人部落的各种语言。通俗的学术著作,一定要深入浅出,这就非由专门家来写不可。这两本小册子把专门的学问讲得娓娓动听,再加上许多引人入胜的插图,简直令人爱不释手。

《玛雅人世界》有专章讲“古代玛雅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问题是关心古代玛雅文明的人们要解的谜。书中说,玛雅历史最辉煌的时期,是从四世纪到十世纪初(公元325—925);但在西班牙人入侵前几百年,这里的灿烂文明突然中断了——仿佛着了魔法似的,倏忽之间一切都停止了,有点像柴可夫斯基的舞剧《睡美人》所描写的情景。这个谜一直没有解开。书中也只好推测说,那时由于原始耕作方式耗尽地力,古玛雅人不得不放弃原来聚居之地——但这个民族既已达到如此高度的文明程度,就算是地力衰竭,何至于这样一蹶不振呢,书中无法解释。另一种说法认为那时是神权统治,阶级压迫十分厉害,剥削严重,引起奴隶们到处暴动,多年反复交替着起义和镇压,内战不断,终于无法自拔(见原书16—17页)。书中没有提到另外的推想,例如大瘟疫或大天灾(如旱灾)。

据我看,这个谜之所以解不开,是因为西班牙人入侵时把玛雅文明所有记录(“古文书”)都烧掉了,现今只存三部古文书,一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在法国的巴黎,一在德国的德累斯登,而且这三部书都不是讲历史的。所有文字记载既已付之一炬,要解谜只有待今后考古发掘了。

斯登这部《古文书》,记下了入侵者焚书的罪恶,确是触目惊心的。书中引用了当时入侵僧侣的记录,证实墨西哥人(不止玛雅人)的古文书被大规模焚烧。书中记载,1547年被任命为墨西哥首任大主教的祖玛拉甲在一封私函中“骄傲地”(恬不知耻地)宣称,他那时摧毁了五个寺庙,焚毁了二万多个神像,至于所有古文书都是异端邪说,在广场上堆成山似的一把火烧了,烧了多少,甚至不值这个大主教一提。书中还揭露,其实在入侵者到来之前,某些统治者也早在焚书了,作者举例说阿兹特克第四代皇帝伊兹戈亚特勒(1428—1478)曾下令焚书,目的是使人不知古事,只知今事(见原书23页),有点像秦始皇。——《史记》记载“有敢偶语诗书,弃市”,那就不止焚书,还杀人了。《史记》也没有记载那时究竟烧了多少书,那时印刷不便,更没有静电复印机,所以很难指望有一张焚书单子传下来,只好相信司马迁说的,除“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都烧。说也怪,幸免于火的这三类书,是保护人体,保护环境(绿化)和预测未来的书,焚得颇有点“现代”头脑,至少比玛雅人的遭遇好一些。书中又说,除了玛雅人三部古文书外,阿兹特克(Aztec)的古文书也只留下九部,麦斯特克(Mixtec)则留下十三部。

墨西哥的古文书用的是图形文字，怪有趣的，甚至引人入胜——这部小书举的例就很吸引人，一条蛇从天上挂下来——“下雨”了，语义是“雨”；一支箭射中了一条蛇——代表“干旱”；一只乌龟——“夏至”；一支箭插在庙宇里——“征服”了！书中记录了负责烧书的神父兰达（Landa）从玛雅古文书中推断出来的“字母”，这可能不那么可靠，正如当代墨西哥学者不相信异国人译解的玛雅图形文字一样（我在《社会语言学》§8.8 举出的几个“字”，是苏联学者译解的，墨西哥人不以为然）。

翻着这部小书，不禁想起古代阿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图书馆被焚的那一段历史，据说那里藏书七十万卷轴（不是册页）——从凯撒起的几个“征服者”都以焚书为“乐”，烧尽了这些东西才安心，连那时当地采用“开放政策”得来的抄本都给烧了。我写这句话是根据英国威尔斯所说，他说“每当外邦人携带一本未见过的书来到埃及，他必须把抄本交给图书馆收藏”——这个图书馆竟同我们的版本图书馆相类似了。至于1933年5月10日希特勒党徒在德国大规模焚书的事，我们这一代人是绝对不会忘记的。最有意义的和最带讽刺味的是，那时在巴黎的进步人士开设一个“焚书图书馆”，那边烧一本，这边藏一本，可惜法兰西的软骨头政客后来在纳粹淫威下，竟然将这个图书馆封闭，连书也送给纳粹了——这样，我们这一代人也得不着一张法西斯党焚书单子了。

想着想着，竟想到如果有人写一部世界范围的焚书史话，该多么发人深省呵；书虽焚毁，人还在，文明的脚步也还是前进的——玛雅文明中断了，但在这泥土上成长的墨西哥，现今不也在迈步前进，以至于今年平均国民收入竟达二千三百美元呢。

1984年3月17日，墨西哥城

忆冯伊湄

很难相信这是半个世纪前的事。

“九·一八”过后不久，在我们理科高一B班上国文课时，突然出现了一位穿得很朴素，落落大方的女教师。女教师居然来教高中的国文课，当时在我们城里就够不寻常了。军阀陈济棠那时正提倡尊孔读经，提倡男女授受不亲……而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位年轻女教师来教高中的国文！

也许是在第一次上课，或者是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刚好要读孟子的课文，而我们那位年轻女教师发挥了那时十分新鲜的见解。她说，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却认为人性恶；其实从唯物史观看来，他们两个都没说对，人性本无善恶，受到社会上善的教育，他就变善，受到恶的教育，人就变恶。唯物史观这四个字她特别说得重些，这使我大吃一惊——居然公开宣传“唯物史观”！当然，我的多数同学们恐怕也吃了一惊，因为当时还很少有人讲唯物史观呢……

这样，我完全被这位女教师吸引住了。她讲话有一股动人的力量，而且列举了不能驳倒的例证。我庆幸我离开了初中时代的老国文教师吕星云先生（他为我打开了社会的奥秘）之后，现今我又遇到一个能指引我走上正路的好人了。

她就是冯伊湄。

我们班里有些同学消息很灵通，马上就传开这个年轻女教师刚从法国回来，是画家司徒乔的新婚妻子。不久之后，她果然怀着孕、步履维艰地来上课了，并且在课堂上常常给我们讲美术作品，这就证实了传闻之不误。除了听课，我还在假日单独到她家去过几次，是不是遇见过画家司徒乔，我可完全忘记了；我所记得的是她永远挂在嘴角的微笑，她那诲人不倦的态度，她那滔滔不绝的辩才，她那渊博的文学艺术知识，以及她那明确而又单纯、充满着希望的一种进步立场：这些都吸引着我，使我坚信要做个“善”人，为我们的“明天”奋斗——至于这“善”，这“明天”，确切地是什么内容，我那时其实是不很清楚的。然而我至今还感激她，当一个少年正在成长的时候，一个启蒙者的指引，对他未来的发展是多么有意义呵。

头一回上作文课，这位女教师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是《冬日的黄昏》。——顿时又吓了我们一跳。当时，在充满着封建思想的城市里，谁见过在高中国文课出这样的作文题？！那时教高中国文课的多半是吃古不化的卫道士，老一点的作文题是《孟子见梁惠王论》，迂一点的则是《非礼莫视说》，新一点的无非《双十节感言》，打破陈规的也不过是《春日郊游记》——尽管时届冬令，也还是让你写“春日”郊游。而我们的年轻女教师竟出了一条小说的题目，一篇散文或一首诗的作文题！有的同学大约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嗡嗡地交头接耳谈起来了，有的大声嚷嚷：“先生，这道题怎么作呀？”这可是真的，我们多数同学还没有作过这种抒发自己感情的文章，不，连题目也没遇见过。于是在吵吵嚷嚷中，我们的年轻女教师微笑着，不慌不忙地启发我们：这不正好到了冬天么？冬天的黄昏你经历过么？在这样的时刻，又冷又饿，会发生什么事情？她说，你记忆中的东西，写下来不就是一篇作文了；你认为要抒发什么感情，那么，你也坦率地写下来，不就是一篇作文了？有些同学免不了还在咕哝着，但我却喜欢这个作文题。我记得儿时有一个冬天的傍晚在家乡的路上看到的情景：一个八九岁的农家女被人“买”走

时，小女孩凄凉的叫声，“妈呀，妈呀，我不走呀！”这情景甚至现在还清楚地展现在我眼前。我写了一篇“作文”，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散文”——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我的习作得到冯先生的欣赏，加了很多圈圈，还有一条激发人心的批语。我不记得这条批语了，但她找我单独谈话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回旋。她说，你写的感情很幼稚，但很真挚；感情要真挚，别装假，千万不要装假，装假就是无病呻吟——她强调的无病呻吟这四个字，我至今还记得清楚。昨夜，我重读冯伊湄去世以后才能有机会出版的《未完成的画》时，我吃惊于这部纯朴的散文作品，洋溢着的就是这真挚的感情。这样纯朴的美，又这样地动人。你看她写司徒乔这个不畏贫贱不畏强权的画家，是多么可爱呀。“人们称乔为‘有血性的画家’，还光荣地称他为‘人民的画家’，所有这些出自群众心坎深处的诚挚声音，光荣称号，都是对画家劳动的最高奖赏，可惜画家听不见了。”多么纯朴，一个多余的形容词都没有，这正是这位纯朴的女教师的文风。“可惜画家听不见了”——这句话多么简单，而又多么真挚呵，这句话使人想起了很多很多，无言中的语言，无歌词的乐曲！这正是我们年轻女教师教给我们的呵。

大约“一·二八”之后不久，她不来了。传说她分娩去了。但她以后就没有露过面。我那幼小的心曾经惋惜过：为什么不回来呢？我那时懂得很少，但却怀疑是我们的主任迫走她的。主任也是一个刚从法国回来的，他是公费留学生，光着头，说得好听像个大教授，说得难听像个耍猴子的老“油条”。为人很顽固，守旧，见到新兴的东西无不加以攻击，对那时的学生救亡运动是不怀好意的。而此人又很笨，逗人可怜。我怀疑他是在法国认得司徒乔和冯伊湄的，也怀疑他知道她的进步倾向所以把她解雇。我那时的怀疑也许是由这位大主任干涉学生运动而引起的，但却全无根据。不料昨夜读了冯伊湄这部遗作，才证实我的推测。这部作品中赫然写着：

这时候，中山大学校长换成邹鲁，自教务长、教员以至门房被撤换的一共二百多人，我这个没有后台的人，当然是在被撤之列。

一点不错。那位大主任是国民党学阀邹鲁的“门生”（这在当时我们就知道），为了实施他们那一套反动教育纲领，当然要迫走像冯伊湄这样宣传唯物史观的青年女教师了，何况她又“没有后台”。

她不来了。代替她来上课的；不出所料是个酸秀才——刮光了头，穿一件不甚称身的长衫（总算还没穿马褂），满口“之乎者也”，其实什么也说不清楚的三家村老学究。人们传说这人前清时当过吴淞炮台司令，也不知是真是假，但我们这班同学就从炮台司令这里做文章了。他一来上课，就嚷开了：

“先生，讲讲吴淞炮台呀！”

“先生，日本鬼打上海，你怎么不守炮台，却来教书呀？”

“先生，你会不会开大炮呀？”

“先生，之乎者也能开大炮么？”

嚷呀嚷的，弄得这位酸秀才讲不上两句子曰诗云，就只好在人声嘈杂中溜出教室——其实也可怜，这个酸秀才不知失业了多久，还不是为了糊口才天天来受我们的闲气嘛。可是我们的年轻女教师来上课时，却从来没有人嚷嚷过，虽则有些同学也不一定赞成她的主张，这又是为什么呢？

打从那时以后，我就没有再看到过她。直到 60 年代的艰难日子刚刚过去时，也许是在 1962 年，或者在 1963 年，忽然有两位高中同年级的同学到北京来，找到了我，并且邀我同去看望我们的老师冯伊湄先生——我才发现原来她就住在离我寓所不远的一条小街上。

那个晚上过得很高兴。老师看见她几十年前教过的“小”同学，一个个成长了，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几个“小”同学也很高兴，古语说得不对，“乐莫乐兮新相知”，其实最快乐的是几十年分手之后的重逢。至于我，则因为突然再见到最初指引我踏上人生“正”路的师长而格外高兴。我们叽叽咕咕地七嘴八舌说了很多话。她在那间平房里，在那间杂乱无章地放着书和画的小小起居室里，她还是那么——怎么说呢？还是那么落落大方，怡然自信，岁月并没有使她失去童心，五六年前失去了亲人司徒乔并没有使她颓然，她还是像教我们课时那样，带着同样的微笑，戴着同样的近视眼镜，同样清晰而动人的语调，是的，她就是用这微笑，这眼神，这语调，播送过进步的种子。到这时，我才知道她——更准确地说，他们俩——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到过美国，到过南洋，到过重庆、汉口、西北、西南，经历了艰难的岁月——但是她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她还是那么乐观，那么诲人不倦。到这时，我很想告诉她，我感激她指引过我走上人生的长途，但不知怎样，我平时的口才一下子都消失了，变得讷讷不能言。在真挚的师长面前是不能也不应当说感谢的话的。我们那个晚上，无论是女教师，无论是“小”同学，都沉醉在如梦的回忆中——真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因为我们那时每一个人都工作得很起劲，有理想，有抱负，有雄心，当然还有曲折，困难，险阻……

在那之后，我很想把我的习作再送给我那可敬的老师改一改，但是霹雳一声，我和我们文化系统的同事们一样，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降临前两年，就提早受到这个社会性悲剧的冲击。接着是一场风暴带来了十年浩劫。我那愿望当然不能实现，写交代材料是用不着老师帮着改的。我不知道伊湄先生这十年是怎样过来的，我也完全不知道她是否也同样受到过暴风雨的洗礼。我想，那是避不开的罢。直到 1976 年春她逝世，也根本不知道她的下落，不，连我自己的“下落”都几乎不知道，哪能知道这可敬的、一生受了多少苦而没有失掉信心的老师的遭遇呢？不过我确信她不会被腥风恶雨吓住的。她是散布幸福种子的人。她不怕强暴，更不怕苦难。但毕竟是很遗憾的，因为她没有等到晴天就离开人世了。今夜我捧读老师的遗文，想着想着，不免记起她的几行诗：

漠漠春魂泣野烟，乱蓬残碧委荒田；
哀黎涕泪英雄血，洒作千山红杜鹃！
好一个“洒作千山红杜鹃”呵！

1980 年 5 月于上海

怀新波

一转眼，新波离开我们一年多了。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正如他的挚友所说：“露浓春暮，献恨供愁，故人何处？”新波毕竟不在人间了。去年三月，当我接到噩耗时，我久久不能平静，我发了封电报给他家：新波虽则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好人是不会死的，他将与人民同在，他将永驻人间。当天夜晚，他的也是我的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一封短筒，也提出了同一个幼稚而天真的问题：好人为什么会死呢？像新波这样的好人，难道会死么？……《他并没有死去》，四十年前新波用这个画题来悼念江南的死难烈士。今天，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借用同一的词句来悼念我的挚友——新波这个好人。

凡是认得新波的，凡是接触过这个艺术家的，无不称赞他是个好人。他为理想奋斗了半个世纪，他为人民事业操劳了五十多年，他为文化艺术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当他正在庆幸“万里长空赛白璧，银光遍抹好山河”的时候，当他正要“突云破浪，壮岁重生”的时候，他突然不得不放下了他的画笔和刻刀，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人间——不，他并没有死去，他将永驻人间，因为他爱这人间，在这人间，他爱过，他也被爱过，他为人间创造幸福，但他暮年却被妖魔折磨，被病魔缠绕，然而他始终没有失掉对人间的信念。“我们热爱人间，我们表现的都属于这人间的一切”，这是新波在40年代为人间画会写的宣言书的信念，这是新波办人间画会，办人间书屋所持的信念，也必然是他到最后最后一息所保持的信念罢。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同新波开始交往。我只知道几十年如一日，我们一见面就要大嚷大笑。即使在苦难的日子里，一见面，说不上两句话，就不得不又笑又嚷。1939年在桂林办《漫画与木刻》时，他和刘建庵是主将，而我则负责这个奇怪杂志的“总体设计”，因为这个杂志从封底开始看是《漫画与木刻》，从封面开始看是《工作与学习》。那时我们还年轻，他，建庵，和我都不过二十岁出头，一见面，说不上几句话，就笑开了，真开心，什么妖魔鬼怪，什么艰难困苦，镇不住我们；在这笑声中都给驱散了，压倒了。正如常言所说，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有时不过是阿Q式的胜利。我不知道新波同别人在一起时是不是那么乐观，记得我们两个在1975—1976年那窒息的日子里，也还是一碰面就笑开了。有时是他讲一两句尖刻而幽默的讽刺“四人帮”的笑话，有时是我提出一两个辛辣而诡秘的问题，大家都不能用正常的逻辑思维来回答，于是，我们只能借助于大笑来结束我们的谈话。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在那笑声中，竟是甜酸苦辣的味道一应俱全呢。

但在50年代初，我们的笑声却是爽朗的，也许没有这么复杂的味道。1954年冬，我是解放后第一次回到少年时代离开的广州，住在爱群大厦。那天晚上，刚从杜老（国庠）家里回来。还带着杜老的拳拳之心——他亲自用纸包起来一定要我带回去品尝的潮州点心，两个小伙子忽然嚷着笑着闯进来了，一个是泰仔（梁永泰），还有一个就是他——我们亲昵地叫做波仔的黄新波。他们两个，一人拽着我一只胳膊，“去，到大同酒家去饮夜茶去！”于是我们三个人，在那里欢乐地度过一个冬日的夜晚。如果说人间有欢乐的夜晚，这个夜晚应当就是。也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也不知谁打断了谁的话，谁又接过去讲新的话题，也不知对话被笑声和因大笑而引起的咳嗽声淹没了多少次，也不知饮干了多少壶茶，那一夜，天南地北，讲旧城市的

新生，讲新人的成长，讲生活，讲爱情，讲理想，讲诗，讲音乐，讲木刻，讲罗曼罗兰，讲罗丹，讲毕加索，讲贝多芬，讲鲁迅，讲我们共同的挚友，……人间难得有知己，这一夜真是知己的谈心呵。我真怀念这么一个夜晚，理想的星火在召唤着我们，祖国的变化在激励着我们，艺术的冲动在吸引着我们。没料到不久以后，泰仔在小岛写生时死于非命，于是这就成为我们三个年轻人解放后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欢聚了。而现在，波仔也走了，再也听不见他们那爽朗的笑声了。

不知道多少人在怀念新波。他爱人胜于爱自己。他近年来血压高得惊人，他还是乐呵呵的。前年，在北京，我们一起吃饭，我问他：你吃东西有禁忌吗？他大笑说，没有，没有，凡是好吃的都吃。我也报之以大笑，因为我也患顽固的高血压症。而我也同他一样“百无禁忌”。但是他能体贴人，他能济人所急。朋友病了他比自己生病还着急，他用种种感人的行动使病者得到安慰。而朋友们都知道，他宁肯自己挨饿，也把仅有的口粮或钱财送给急需的友人。

他嫉恶如仇。在70年代艰难的岁月里他创作的一系列以鲁迅诗文为题材的木刻，深深地刻画了他这品格，一个革命者的品格。他鄙视敌人，他唾弃那些出卖灵魂的动物——这也是那一段日子里我们大笑的话题之一。他无所顾忌，他有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能面向敌人投射出致命的种种形式的子弹。

他坦率，真诚，他具有艺术家的品质，往往把他所喜欢的人当做艺术品，他要保持在一定距离来欣赏他所喜爱的一切。然后他塑造出好人的形象，他塑造出新人的形象，他塑造出理想的崇高的人的形象。这是艺术，不，这也不单单是艺术，这是人的品格，真正的人的品格。

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我们在香港碰面了，我那时被调到北方去，他被留在南方准备南国的解放——我们是在铜锣湾电车站握别的，两个人在电车站足足谈了两个小时，共同的憧憬，未来的愿望，挚爱的友人，还有艺术与生活……谁知道三十年后，我们在北京开文代会时作了最后的握别。那是1979年冬，我在广东代表团驻地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他精神很好，劈头就向我要书——“哈哈，你的书重版了，平反昭雪了，不送我？”然后他提议，明年春天，我到广州来，我们约请我们共同的好友，来谈个痛快，像50年代三个人畅叙那样。我十分兴奋，当然答应了。但是还没有等他约来我们共同的好友聚会时，他却先走了。不然，也许我会在南国再过一次欢乐的夜晚，在这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这些欢笑，会给每一个人增加多少力量呵！……

去年几个杂志要我为文纪念新波，我写不出。最相熟的人，最真挚的友谊，在生离死别的一刹那，连哭也哭不出来的，别说写诗文了。今年是波仔离开我们一周岁，我又想念着这个好人。今夜，新波呵，我才最后一次与你道别，没有香烛，没有果品，没有酒，没有花，只有一段美好的记忆——永远激励着我热爱人间的美好记忆，化为以上的字句，供奉在你的灵前。

热爱人间的人，将永驻人间。他并没有死去。

1981年5月之夜 北京

忆梁纯夫

他装着满肚子的学问，他怀着满腔忧国忧民的思绪，他诚诚恳恳地工作了一生，他没有留下一本足以传世的著作，他就在孤独中离开了人间。正如罗曼罗兰评论一个音乐家那样，低回咏叹“孤单——孤单——孤单”。他走向忘川的时候，正是祖国受难的年代——空气窒息的年代——那是难忘的1971年。据说他病得很厉害，因此他没有被下放到那旨在“脱胎换骨”的“五七干校”去。他临死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同事们、同志们却正在那里“战天斗地”。怕没有人去看他，也没有人有心思去看他，有些人恐怕也不愿去看他，不敢去看他。这种情景同他的性格倒是协调的：他最不爱凑热闹，他不爱随随便便附和别人，他不肯浑浑噩噩地接受他所不理想的意志，他是有名的“孤癖”派。现在，青年们知道“梁纯夫”这个名字的已经很少了；再过几年，记得他的人恐怕就更少了。然而他在我们这个求解放的伟大时代里，却真正做到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勤勤恳恳地，落落寡欢地，有时被人认为是孤高自赏地默默地为我们的事业，为我们的文明，而不是为他自己，贡献出他自己的一切。

这个人就是梁纯夫。

一个认真的国际问题研究者，一个诚恳的出版工作者，一个合格的老编辑，一个早期曾经狂热过の世界语学者——一个以研究西洋唯心主义哲学开始，以信服马克思主义哲学告终的善良的学者，本名叫做梁叔仁的，就是他。

当纯夫在中山大学念他的康德和黑格尔的时候，我碰巧在大学附中当学生。那是30年代初，纯夫初时是个世界语迷，他组织了一个后来在国际上颇有名望的世界语团体：“踏绿社”，出了一个纯学术的世界语刊物《踏绿者》——这个季刊在它生存期间也享有世界声誉。光看“踏绿”这两个字就猜到纯夫那时是个唯心主义的世界语迷，正统的人类爱主义者。我说的是那时。世界语最初是以人类之爱为标榜的，它赞成和平，用绿色来表示它的和平愿望：绿星，绿旗，绿章……然后纯夫创造了“踏绿”，其实这个名字的世界语称呼，如果倒过来译出，则是“爱绿成癖的人们的团体”。那个季刊专发表学术文章，不谈政治，但确实是学术文章，它不吹捧法西斯国民党，它不替那个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涂脂抹粉。作为主编的梁纯夫，是正直的。我刚学世界语，被这些活动所吸引。我投去了一篇用世界语写的“学术论文”，我记得它的题目是《中国古代歌谣所反映的妇女生活》——自然，我那时太幼稚了，我迷醉于文学，迷醉于诗歌，刚刚开始接触唯物主义，从一个朋友的书籍中借读了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又刚刚从英文本瞎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我瞎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有点不自量力，所引用的诗歌还得按照西洋诗律（至少按抑扬格）来译写。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我知其名而不认得的梁纯夫。——他回信说，准备用，有几处希望改一改，约我去面谈。

这是我同纯夫的第一次会面。在挂着“踏绿社”招牌的木屋中，即他的寝室兼书房中。这房间很小，一张帆布床，几个书架，一张三屉桌，两把椅子。再简朴没有了。但是那么多的外文书呵，那么多的世界语书呵，简直使人眼花缭乱。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梁纯夫招呼我坐下来——他的面部没有表情，他说话时声调没有抑扬，他的嘴唇在抖动着。我是肃然起敬的。在我面前的是个哲学家——那时我以为哲学家就应当是这样子的。但看得出他是诚

愚的，而且是善良的。我们只谈了十几分钟，然后我就告辞了，虽则我眷恋着那么多的外文书。——临走，纯夫说，你爱看书，就到这里来借，这句话对我是极大的吸引力。或者说，比之颜面的无表情来，这句话真有深度表情呀。这样，从此以后我就常到那里去，有时他锁了门出去了，但多数是白天开了床头电灯躺在床上看书。多少外文书我是从这个斗室借去啃的呵。我至今还神往于这段生活，我至今还感激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大约来往了一年。纯夫在哲学系毕业了，他要到清华研究院去，于是他把“踏绿社”的招牌、书籍，连同那间斗室（他向学校申请得来作为“社团”办公室的）都“传”给我们几个人——在那一年中“我”已经发展为“我们”了。这样，从1935到1936年，以这个团体为中心，以这间斗室为活动基地，我们在校内校外展开了世界语活动，拉丁化新文字活动，广泛团结了进步同学，参加了如火如荼的救亡工作。至于那个杂志《踏绿者》，却没有按照纯夫的原意出下去——那时，部分因为民族危机已到了紧急关头，部分因为我和我的小友们“左”得可爱，认为再也不能继续出版那样的纯学术刊物了。我们从世界语——新文字运动出发，参与了歌咏运动，戏剧运动，宣传抗日，下乡动员，总之，一切为了准备神圣的抗日战争。我们用世界语争取国际上的支持，我们用《国际团结》和《地狱通信》这样两个打字复印的小刊物，来代替那个大型的学术季刊。前年看到西德的研究者林兹博士的文章，居然还提到这两个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宣传抗日救亡的实际的小刊物，我心中是有很多感慨的——而那时纯夫已经北上了，他全然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大约不但不会反对，而且一定会支持我们或者同我们一道干的。因为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他的普遍人类爱主义在法西斯侵略者的屠刀下已被粉碎了。他一定会参加我们的战斗。后来，在抗战中他从研究院转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去工作，这一点就是旁证。

到1944年冬，战争实际已临近结束了，然而那时我并不这样清楚地意识到。我经历了湘桂大撤退，而纯夫则在重庆办起出版社来。他同东北的民主人士金长佑先生一起，脱离了某一个他们所工作而又被CC派控制的团体，创办了“五十年代出版社”。其时由于国民党的压迫，我们三联书店的三家出版机构（那时还未合并）已不大能出书了，而纯夫主持的这家新出版社却还能做一点点工作。翦老（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就是这个出版社出的。翦老住在乡下，他一进城就找到纯夫，然后纯夫就找了我，到冠生园“摆龙门阵”去，饮茶，吃饭，都由纯夫这号称“老板”兼自封“总编辑”的包了。胡风办的杂志《希望》，也是“50年代”出的，后来几年后，十几年后，人们大批这个刊物，纯夫有点悸然，也有点戚然，然而他沉着气。他有一回同我说，这刊物我看不出什么“阴谋”，但这里的一些论点是可以批的。他说话时脸孔没有表情，语调没有抑扬，一如平常似的，但我感到他不无忧虑。

然后是在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和我先后到了这十里洋场。他卖文为生，一度给《文汇报》编副刊“新闻窗”，写了不少国际问题文章。此时，一个风暴在等着他。他不知道。到他知道的时候，四面八方的骤雨向他扑过来了。那就是1947年前后的有名的争论：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同苏联呢，还是美国同英国呢？纯夫发表了一篇文章，阐明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那时还没有创造“超级大国”的术语）的斗争，是两个制度之间的矛盾。那时权威方面则认为主要的矛盾是英美争霸。一本精辟的小册子传到我心里，是论断英美争霸的。当时纯夫未必看到过这小册子。接着一场论战（企

图压服人的论战)在香港——上海之间展开了。我说论战，是按其性质来说的；我说“压倒”，是一面倒的意思。大家都认为纯夫的主张是完全错了。而有的人还有点诡秘地暗示纯夫文章有利于统治阶级，或者导致了很不好的后果。有一天，纯夫在我家里同我和另一位朋友为这个主题辩论——三个人争论了四五个小时，大家都搬出了数字，材料，事实，倾向，然后作出各自以为对的逻辑推理——争得面红耳赤，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纯夫不是风派，他在他所相信的真理被证明是谬误以前，他绝不随声附和。而我和我那位朋友却从“权威”出发，找到有利于我们自己结论的材料，企图以此说服他，当然结果并没有说服他。现在一回想，我是愚蠢的，纯夫是理智的。但后来十几年相处我们谁都没提过这一段往事。如果纯夫还在，我可要告诉他：我多么蠢呀，而你却多么聪明呀。

十七年间我们经常见面，纯夫是老练的，而且是沉着的。他并不因为某个时期得到不公平的评价而耿耿于怀，不，他总是热诚地从事分配给他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认真地工作着。他当然也没有因为曾经信仰过唯心主义而后来转到唯物主义立场而感到害羞或不快，不，他以为这是历史的必然，他皈依真理而不随便转舵。他刚正不阿，有时近于迂腐，从不吹捧人，也不附和人。他的心装满了祖国，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我们同学中的骄傲呵。

1981年3月 北京

记史枚

史枚同志，苏州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读书》杂志副主编。1914年生，1981年4月11日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四十余年，

先后在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以及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做过编辑工作；解放前曾编过《读书月报》，《新学识》，《救中国》，《读书与出版》等刊物。

他弥留时没有给家属留下一句话，没有对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说过一句话，没有为自己的身后暗示过一句话，他临终前只是用手指了指书包——他惦记着他夜里带回来的书包，装满了改过的和尚未加工的《读书》杂志下期的稿子；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这是4月11日。这一天，从凌晨到深夜，抢救经过了整整一天，然而到了当天夜里，他终于永远离开我们了。

作为一个合格的老编辑，他孜孜不倦地劳碌了四十多年；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先后被囚禁在国民党和军阀盛世才的牢笼里；作为《读书》杂志的副主编，他从筹划起就竭尽全力，有时甚至是独力支撑，把自己一切才能为读者，为作者，为信念，为理想，奋斗到最后一息；作为一个家庭生活的主要成员，他对家庭的安排考虑很少，他不愿意为某些事情奔波、走后门，因而更值得人们的怀念。

他学识广博，他旁征博引，但他不能算是书呆子，因为他早年从事过地下革命斗争，他心中没有忘记要把知识同实践结合起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在那灼热的年代，当他在上海主持《读书与出版》的编务时，他给青年读者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研习提纲，他引导读者注视现实问题。《春天——时局的关键》，《新中国宪法问题》，《中国土地问题》……一篇接着一篇。例如在土地问题一篇提纲中，他信心十足地预言：“中国的土地问题必须由耕者有其田而走向完全、彻底的解决，这是无可怀疑的。”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文学方面，他都可以算作博览群书，但他没有兼收并蓄，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见解。50年代，为了系统地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他参与了叫做“蓝皮书”的翻译选题计划起草工作（这个计划是准备由九个出版单位联合起来做的），他付出了很多心血，运用了他博古通今的学识，通过他对革命实践需要的认识，提供了他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料。这个“蓝皮书”真正的计划者就是他。现在我们值得自豪的是，虽然有十年浩劫的干扰，这个出版方面积累文化的“蓝皮书”计划毕竟一步一步接近实现了。

他是勤奋的。他没有八小时“内外”的问题。他从来不知道工作八小时之后就应当休息。他把醒着的每一分钟埋在书堆里，埋在稿件里，埋在信件里（要不，他从前怎能为杂志写《书市散步》的专栏——材料那样丰富而观点又那样鲜明的报道？）。他总是夜以继日，没有休息，没有中断，没有早，没有晚。当人家谈论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他工作；当人家适当玩乐消除疲劳的时候，他工作；当人家进入睡乡时，他工作。他什么时候休息过呢？甚至从牢里一出来，他就奔向工作。从干校一回来，虽然让他退休了，他也在找工作。那是70年代前半期，他找我要工作，我那时刚刚因肺炎引起了心脏衰弱，不能多说话，我为他不要休息只要工作的精神所感动，但我那时能帮

助他什么呢？只能苦笑着劝他多读点书，多写点笔记。那天他说了很多，他说他身体很好，还可以看稿子，还可以编词典。我永远不能忘记他的身影，这个不知疲倦、顽强奋斗的，近乎“迂腐”的“傻”知识分子的身影。

他一丝不苟。他看稿子从来不偷懒，老老实实看，从头到尾看，然后写出他的意见，蝇头小楷，密麻麻地写几大张纸，以致人家认为他抓不住要领——但他是个合格的编辑，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告诉别人，而他知道的又那么多，因而他的要领往往淹没在浩瀚的信息中。平常说这是他的缺点；如今他去了，我想着想着，这是叫人感到可爱的缺点呀。

他正直。绝不随风倒。近乎固执，有点犟。虽则他很少发脾气，但他那副锲而不舍的犟脾气也是少见的。他是个甘心做无名英雄的“一砖一瓦”，他默默地工作了一辈子，他不求名利，只要工作，他不追求世俗的桂冠，可是他永不停息地，愉快地（有时是气愤地）奋斗了一生，追求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多半是“为人作嫁衣裳”，为别人的稿子修修补补，多半是从马群中发现千里马，哺育千里马，因此他真可说是文化出版界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如今又少了一个，对我们的事业自然是一种损失，但这样的战士会多起来的，一定会。他对没有想通的问题，决不随声附和。他争论，他用不甚抑扬的（绝非演说家的）语调，平淡的陈述句，没完没了地争论。所有以上这一些，加起来就是一个十足的无名英雄。他却乐此不疲，数十年如一日。这是难能可贵的品格啊。

一周前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不短的信，仍然是一笔不苟。他为了发表一篇替外国一学派翻案的文章向我呼吁，他坦率地发表他的意见：他认为过去、现在对这个学派的抨击和否定是不公道的。他的态度很诚恳，他何尝是为自己呢。他建议我向上面反映，他表示如果上面不同意他这意见，“我虽然仍要保留我的意见，但我当然服从。”这句话多么可爱：他心目中有个组织，有个党。这是他可爱的品格：作了决定，“我当然服从”。可惜我还没有同他争辩，他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使我毕生感到遗憾。

我说，他是个战士，是出版战线的战士；凡是接触过他，读过他编的杂志，看过他写的东西的，都会说他是认真的，严肃的，虽然时时会发生僵硬情景甚至发生错误，但毕竟是个可爱的战士。他将活在我们后死者的心中，他将作为无名英雄活在万千读者的心中。

1981年4月19日

忆黄谷柳

当《虾球传》重版本送到我手中时，谷柳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他没有看到这部小说重新问世，而我也没有可能听到他那憨直的笑声，看不见他饱历沧桑，在额头留下的几道皱纹了。但终归《虾球传》还在传世，后人可以从他这留下来的唯一创作中，窥见这个一闪即逝的有才气的作家。

我和谷柳朝夕相处，几达一年之久。那是抗日战争最后一年，我们碰巧都在重庆，他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生活，我也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生活。我们同住在枣子岚垭，只不过他住坡顶，我住坡底，每天我得有一次到谷柳所寄居的“大厦”里去“方便”。因此，我和谷柳几乎每天都有机会摆一次“龙门阵”——有时也一起到茶馆去，半躺在帆布椅子上，嗑着瓜子，东拉西扯，望着墙上贴着的“莫谈国事”的警告，时时低声地互相通报所得到的政治传闻。有一个偶然的把我们变成“同事”关系——我作为一个叫做《民主世界》的杂志的总编辑，谷柳作为这个杂志的总经理：说也可笑，我虽挂个“总”字，手下却没有半个编辑；同样，谷柳这老“总”手下也没有半个经理。我们两人共同“拥有”的只是一个校对员兼发行员，记得这人也是谷柳熟悉的，可能就是他介绍的。去年看见《新文学史料》刊载谷柳《自传》，中间曾记述这桩事，不知是他记错还是故意“降低”身份，“总”经理写成了“副”经理。由此，我不禁作了些遐想。

我一次，两次，三次读这《自传》，总觉得有点凄然。不知道他是何时写的这份自传，更不知道为了何种目的写的这份自传。我颇怀疑它是一份早期的交代材料，因为字里行间略有点压抑之感，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但它决不是十年浩劫中的交代材料，一则里面还没有“自我臭骂”，二则结尾于“1953年底回到广东，即调到广州作协当专业作者”——从1953年到1976年这二十三年间的遭遇并没有记载。当然，如果把这二十几年岁月也记录了，可能使人读了更凄然的。关于这，我曾点滴听到过一些传闻，但这将永远是传闻，不能像我们在重庆时那样，半躺在帆布椅子上，嗑着瓜子来互相通报和证实这些传闻了。

就是在重庆近一年相处，我发现这个比我年长十岁的青年人（那时他不过三十余岁），很爽朗，心怀坦荡，没有什么阴暗的东西。他显得过分天真，加上时不时的自责神色，使你容易和他相处，而且容易亲近。在“摆龙门阵”时，他给我展开的就是一篇篇小说：他讲南洋的生活，他讲还没有参加上大革命，宁汉就分裂，因而被阻于香港，他讲他一家流落异乡的穷苦生活，他讲香港黑社会的种种“奇闻”——这些对我全是新鲜的，特别那“奇闻”颇使我神往。这些“奇闻”后来部分地写进了他的小说《虾球传》。我们摆龙门阵时，记得我曾毫不踌躇地怂恿他把奇闻写成小说，其实我自己那时也醉心于做“文学家”，也想写小说，但是我在城市中长大，生活平淡无奇，没有踏过艰难或险阻的道路。我那时同谷柳说过，你写呀，你有生活，而我呢，我三十岁要投笔“从戎”——当时计划到令人神往的敌后去，我们称之为“从戎”；我说，到那时，我也写，不过三十岁以前的东西，我将一律烧掉。他听了哈哈大笑，很欣赏我这“美妙的”设想。有几次他还打趣我：还有多少年才到三十岁呀？但他说这话是诚恳的。记得日本投降消息传到山城那一夜，我们都很高兴，买了一点大曲，买了一包那时流行的“芝麻杆”，买了一些花生米，在他寄居的“大厦”中或在我所住的斗室中，畅谈至深夜。这

时，他认真地同我说：你说三十岁以前写的东西全该毁掉，嘻嘻，这回可要实现了，嘻嘻，我赞成，我也把四十以前的写作全毁掉，嘻嘻，我们来从头写起。我们谈得很兴奋。我记得以三十为界的“幻想”，只同谷柳一个人谈过，因为我觉得他憨厚，不嘲弄人，不刺人，有时还真的为你的“幻想”出点傻主意。

然而我的“幻想”并没有实现，既没有“从戎”，也没有和过去的习作告别。但谷柳却在几年以后真的“投笔从戎”，而在“从戎”之前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虾球传》——在重庆他本来就可以把“奇闻”写成小说的，而且确实天天在写，也许因为虽有奇闻还没有生活的细节，不足以展开小说似的作品。记得他在重庆时天天写，写了很多，好像只在我们那个杂志上连载过他自称为中篇的《杨梅山下》。至于这篇小说写什么，我是一点也记不起了；我只记得谷柳要我问雪峰对他这作品的意见，雪峰那时每期都写一两篇杂文，而且亲自送到我的“斗室”中，雪峰一定发表过意见的，但连这一点也完全记不得了。

我和谷柳分手是在1945年秋。我南行到粤桂边的山区去寻找我失散的家人——他们在湘桂撤退后不知漂到哪里去了。谷柳呢？他好像有个什么“官职”，好像是不必上班就拿到“干”薪的，可能就是那篇《自传》中记载的中国青年剧社辅导员。他那时进退两难，他何尝不想去找他那失散了的妻儿呢？但他说，他没有决心也不知到何处才能与妻儿会合。他对局势的发展比较乐观，他说看看再说。后来我离开广州北上时，谷柳终于到了南国，并且找到了妻儿。听说他几乎掉进反动的“巢穴”，想是为了生活吧，不然，这个老实人常常带着自责的神气要冲出旧营垒是为了什么呢？

和谷柳重新见面是1949年初在香港，也许是在一个文艺界的集会上，我们这次突然见面，彼此都想不到，我是那年年初调离上海到香港转华北去的。他说，嘻嘻，没想到在这里又见面了。是呀，重庆一年相处在我们两人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须知那时在恐怖的山城，能得一知己互通心声是多么不容易呀。

谷柳那时仍然是瘦长条，穿着紧绷绷的、不合身的旧西服。这时他已经成为叫做“谷柳”的作家了，而且是拥有很多读者的《虾球传》的红作家了。我们见面时陡然记起了重庆的插曲。此时我刚过三十——谷柳兴冲冲地说，“嘻嘻，三十岁了，你不是说把三十以前的东西都烧掉重新来么？”我那时仍然是一个没有“从戎”的编辑，我还怀着谷柳问话中所指的“幻想”，但谷柳是真诚的，他提醒我要认真投入新的生活。我们在香港可能还会过一两次面，我住在香港，他住在九龙，可能饮过一两次“下午茶”，可没有太多时间摆龙门阵了——战局的发展预示着人民的胜利在望，新的战斗在吸引着我們。春三月，我离开香港北上了；谷柳是六月间入了党以后回到粤桂边游击区去的，他真的去“从戎”了，而我却没有。然后是充满着兴奋的十月。然后是抗美援朝的枪声打响了。然后是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谷柳参加了这个慰问团，我记得1951年慰问团回国时，我和另一位同志由北京奔到天津去迎接团中的好几位作家和记者，其中一位作家兼记者就是谷柳。他长得更结实。他不像摆龙门阵时那么多话了。他沉着、庄重，但仍然那么真诚、憨直。“嘻嘻，我们又见面了。”他说。我们没机会深谈，因为我忙于在许多同志中间周旋，组稿。如果知道未来多少艰辛岁月在等着谷柳，那么，我一定不肯放过这机会，拽着他，摆龙门阵摆个痛快。他再次入朝，我没见着，

那一次还立了功——这不在我意外，因为憨直和真诚一直是他的本色，这样的人在危急关头是会豁出性命去救别人的。

然后是那“不平常的夏天”。人们传说谷柳这样那样的命运。我以后多次到广州，见到很多老朋友和新朋友，特别是在粤桂渝苦斗过的同志们，每次我都打听谷柳，却每次都没见着他。说是下乡了，说是不在城里，说是躲起来赶个东西，等等。总之，没见着。我不想证实谷柳这些年走过怎样艰难的路，但我确信他是一步一步地熬过来了。他是从旧营垒杀出来的战士（他常常带着自责的神气讲述他在旧营垒中的经历），他是真诚的，要不，为什么他要杀出来？他彷徨过，他苦闷过，他想冲到“前沿阵地”过，他珍惜他的感情，他从旧的营垒艰难地却又坚实地移向新的地平线。因为从旧营垒中来，正如鲁迅先生说，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但正因为他从旧营垒中来，有些激进者就有点另眼相看。从他从不讳言从旧营垒中杀出来一点，我倒完全相信他是觉悟了的“后知后觉”，当他一旦觉悟，他就把自己全部精力献给人民的事业，这是难能可贵的，同他笔下的虾球突然参加了革命同样可亲——有人认为《虾球传》后半部，虾球突然去革命是不真实的，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写黑社会还可以，写革命生活不够真实，我从前也这样认为。但我现在却不。至少，虾球去革命是必然而不是突然，正如谷柳一入党便要求到最艰苦的游击区去，是必然而不是突然一样。谷柳塑造了虾球这个形象，又天真，又可爱，同时也易受欺骗，但最终他还是投身革命了——这个人物有点谷柳的影子。谷柳没有写完第四部，不知道在他笔下虾球以后会怎么样，什么样的考验在等待着这个青年。谷柳那时也许根本写不出来，但他用自己的生命写出来了，一直到死，他是真诚的，乐观的，自信的。据他女儿一篇回忆所讲，他看见了“四人帮”的覆灭，在1977年初才离开人世的，他临终说“我看到了我们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光明”。是呀，这就是谷柳。他写了三十万字的长篇《和平哨兵》，他没写完便在这场浩劫中把它烧毁了——但即使这样，即使只有一部《虾球传》，谷柳还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作家，他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他是真诚的。

1981年冬

忆孟超

我最初见到孟超，是抗战初期在桂林的一个戏剧团体里。我是文化战线的一个新兵，然而孟超却没有一点老将的架子，一见如故，好像旧友重逢——满脸的笑容挂在满脸刮不干净的胡子上，长而瘦的脸配着微微弓着的背，显得有点滑稽。他打开了话匣子就说个不停。我最后见到孟超，无疑是在“围湖造田”的“改造思想”的干校里——我偶而陪一个军代表到他所在的连队去洽谈什么，远远瞧见一个老头，弓着背，瘦长的脸，漠然的表情，“既无风雨也无晴”，配着好像很久没刮过的胡子，我想这人一定是孟超（直到如今我还相信这就是孟超），于是我急急跑过去，他似乎也察觉了，一转身就躲到什么屋子去了，我想这一定是他有意回避我——须知这里“人”“鬼”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呀，何况我还陪着军代表。我那时据说已被“解放”、从“鬼”域中转回“人”世；而他呢，他还是背着一大堆罪名，作为一个“鬼”挣扎在“人”间。我黯然。我只能黯然。这时，我反倒看到了孟超那善良的心——他该是怕他的“鬼”气会给我这个“人”招惹麻烦，毅然避开了我的罢。多好心人啊。可是我再也沒机会见到他，他便背着那一大箩筐捏造的罪名离开了这人世。

我这几年常常问自己，好人为什么总是受折磨呢？孟超该是个好人（自然不会是个完人，而世间哪里会有完人呢？）。一到风吹草动，投机家便望风转舵，不论航向是否违背自己的初衷，不，勿宁说投机家根本就没有航向——而好人总是有憧憬，有目的地，他就是经历万险千辛，也要驶向彼岸的。这样，他就不能不拂逆着暴风的旨意而遭殃了。可能是这样的罢。比如孟超写出了昆曲《李慧娘》，书印出后，有一夜，他忽然兴冲冲地到我住的小楼上，送给我一册，并且兴高采烈的告诉我，“康老”看了戏，认为很有深度。显然他被这种“激赏”所感动了，不然他不会那么激动，也不会夜里跑来看我，虽则我们那时住得很近。这“康老”，便是他的山东同乡，善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人物”。我听过这“康老”一次讲话，自夸在中南海里就数他最懂旧戏。因此，那天夜里，一听到是这位“大人物”，这位唯一“懂”戏的“大人物”竟然赞赏起孟超老头的昆曲来，那戏一定是“大大地好”了。我不懂戏，更加不懂昆曲，我却一口气读完了《李慧娘》，我觉得很舒畅，有戏没戏反正我不知道，但孟超笔下的李慧娘却是不畏强暴的好人，正义的化身。我爱这号人。谁知没多久，霹雳一声，大祸临头了，棍子直往孟超头上打。有一夜，他又跑到我那楼来，他还是很激动——当然一点也不兴奋了，他说他这戏被称为“反党”戏，他说他想不通，他说革了一辈子命怎么落到反党的地步呢；他向我走近一步，轻轻地告诉我：连“康老”也说这戏“反党”，他更想不通。在那一夜以前，我已知道《李慧娘》被说成是“反党”了，我而且知道不是别人，正是他所信赖的“康老”“识破”这“阴谋”的。孟超不幸遇到了这么“权威”的同乡——他是那么敏锐，一眼看出了它有深度，再一眼又看出了它“反党”。真是——怎么说呢？那时——其实早就——被指责为借古喻今的事是层出不穷的，被指责为“反党”的又何止写昆曲的一个？然而，那一夜我毕竟还是有点目瞪口呆，我开始怀疑我自己的智力。怎么我总是看不出苗头呢？我完全觉不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我这僵化的头脑，只有“纯粹理性”的逻辑：要吗是这个古人李慧娘反党，孟超写下来了；要吗是孟超这老头反党，借李慧娘的口说出来了。但

谁都知道，当李慧娘活着的时代，还没有党，那反党的就只能是孟超无疑了。可是我给弄糊涂了，这个大半生为革命奔波的老好人，怎么会反党呢？……他那夜有点颓然，话不多。我那夜也有点木然，除了几句安慰式的多余的话之外，也没能说什么。凭我的政治经验，我完全明白，这场风波是不会小的，我又能同孟超说些什么呢？

那一夜，孟超走了以后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在桂林相识以后的那一段艰难的日子，孟超参加过《野草》这个杂文杂志的编辑工作，也主持过《艺丛》杂志的编务。有一回，为了《艺丛》这个短命的杂志，孟超兴冲冲地抱了一大堆乐谱到七星岩后面我的住所，说是让我写篇文章，介绍肖斯塔可维支的歌剧《姆真斯克的马克佩斯夫人》——脚本译成中文了，乐谱马上得改写为简谱，于是我花了好几个夜晚，同我的知友们研究这份总谱，最后总算应孟超的要求，写了一篇很长的评介文章，对这个歌剧作了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剖析，还对它的音乐的独创性作了细致的描述。我把总谱和文章送到孟超在城里住着的“狭的笼”子里时，他高兴极了。他在那狭小的住所里大声的笑着，他以为（我也以为）这个杂志可以给读者介绍一个“新世界”的新歌剧了——要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那时都是这个“新世界”的盲目崇拜者。无论是他，无论是我，都以为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谁知几天后有人从重庆捎来消息说，这个戏是30年代早被批判过的，说是反党的“喧嚣”，根本不是音乐——这样，这乐谱连同我的文章当然不该刊登了。孟超马上来找我，说了一箩筐的抱歉的话，我呢，我只大大地吃了一惊，我自己怪自己如此无知和幼稚——无知，是因为30年代批判过的事我没知道；幼稚，是我竟然嗅不出这些音符中有反党的气味。他的抱歉完全是多余的，这只能怨我水平低——我这样对他说。可是这个好人还是很有点歉仄，因为他知道我那时靠卖文为生，一篇长文章宣判死刑，拿不到稿费，柴米油盐就没着落了。我感到了他这拳拳之心。我是很感激的。我说，不要紧的，我还有米。

过不了几天，孟超又来找我了。这回又是兴冲冲的。他说就在我住的木屋后边小山上，有一间公立中学，他说新到任的校长是个好人，很开明，他说校长欢迎他和我都去教几点钟书。这分明是为了补偿我的“损失”，并且陪着我找一点补助糊口的办法，多好的心呀。于是立刻就确定了，他教国文（语文），我教数学。每天去两小时，并不妨碍我的编辑写作生活。看得出，这里的学生很喜欢他们的新校长；也看得出，他们也很喜欢孟超和我。孟超上课时总是唾沫横飞地谈论时事，而我则在课外被同学所包围，要讲音乐，讲戏剧，讲科学，讲时局，往往中午下课后一小时我还逃不出同学的包围圈。有时孟超和我下课后就一同“下”山到我家里吃午饭——自然他还是那么唾沫横飞，谈笑风生。确实这也拿到几个钱，虽则七折八扣，却也对艰难的生活不无小补。孟超这好人这时也比较开心，仿佛他对我也尽到了真正的朋友的责任了。

那一夜，即孟超告诉我被指为“反党”的那一夜，我想起了上面的往事，心里闷得慌，这么好心的一个人怎么会“反党”呢？我那一夜，以及一连好几天，都被这个问题折磨着。我得不出答案。不过，折磨我的时间并不长，很快，我自己也被告知，我的工作也带有“反党”的性质了。但我比他的处境好一些，我还没有变成“分子”。批判我这不是“分子”的“反党”的会，天天下午在开着；我不记得有孟超在场——可能孟超早已成为“分子”，自顾不暇，也许没让这“分子”来批判“反党”的人了。到这时，折磨我多少

日子的难题，终于好像在黑暗王国中找到一线“光明”，有点悟道的滋味……

我想不通。犹如当初孟超想不通一样。然而我这时还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等着孟超的，等着我们这些在黑暗年月里苦斗过来的一群，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等我被卷入这场风暴，并且卷入台风眼，完全陷入“静止”状态时，我才比较地明白——这是一场社会性的悲剧，我很想找孟超去谈一谈，但是晚了，我已经不能找他了，而后来遇见的一次（如果真是他的话），又错过了——于是他走了，永远走了，他也许比我“悟”得早一点罢。

今早，我翻开了前年多半是为了“平反”而重印的《书林漫步》，第一篇《柏园夜读偶记》使我陷入沉思——这篇文章就是三十八年前被孟超编《艺丛》时“迫”出来的。重读这篇文章，还仿佛听见孟超迫稿时那爽朗的笑声，和拿到稿子后那满意的笑声。十八年前孟超的也是我的一位朋友，听说我找《艺丛》，给我抄来了这短文。我现在还是喜欢孟超拿到稿子后朗读的第一段：

我爱柏。我爱它在凛烈的寒风中那优游自得的英姿，我爱它永远青绿、在严冬中从不肯枯黄了自己的枝叶。秋风起后，要是你住在柏园中，你看到的将不是肃杀之气，而永远是春天，战斗的春天。

孟超那时呵呵的笑着，他说，是呵，真是个战斗的春天——不料这几句话在那场风暴中也成了我“反党”的证据，因为据说我等待的是复辟的春天。真是天知道什么意思。李慧娘那一码事，这才算懂了。但我今天仍然爱这一段，这几句话我写的是柏树，我歌颂的是在那艰难岁月中奋斗的许许多多无名英雄们，其中有孟超一个，他是个好人，他留下来的《李慧娘》和许多杂文，就是常青的柏树呵！

1982 年秋

记齐燕铭

有机会跟燕铭同志面对面谈话，是在我知道“齐燕铭”这三个字和中共代表团秘书长这可敬的职称之后很久很久，那时北京已经解放多年了。

那是一个晚上，在他的办公室里，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噢，我以为你是个老先生啦！”他说。

“哎，怎么以为我是个老学究呢？”我说。

“是这样的——在延安时我们印过你一部书，我经手办的，我看过这部书，心想著者该有相当年纪了……”他说。

“我收到过样本。油光纸单面印的，延安捎来过一本。那正是白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这印本给我带来过很大力量。原来是你主办的，谢谢你了。”我说。

“别谢我。这是组织的力量。可我把作者身分猜错了。解放后你没修改那部书？”

“没有。改不成了。那是年轻时胆大妄为的习作。一想到延安也印过，就有点特别的滋味……”我说。

“是呀，延安！”他说。

那个夜晚，我们谈得很多，完全不像初次见面的。我骇于他的学识渊博，我折服他的敏锐思想，我敬佩这样的一个党务活动家。他说的是纯正的、悦耳的、一板一眼的“官话”，跟我的南腔北调的“怪话”相对照，越发显出那种庄重的但是使人信服的声调来。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接触的次数就多起来了，但却没有机会作那样漫无边际的闲谈。有时是他交代什么事要办，或者要提供一个什么材料；常常是三言两语，却总是那么明快，那么斩钉截铁地——燕铭同志不是个只会画圈圈的“官”，完全不是的，他勿宁是一个会把复杂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而又能果断地作出决定来的学者。他当过大学教授，他深刻地了解知识和知识分子；他能够并且善于从党的立场出发，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而更为难得的是，他有着文人学者所常常不具备的那种行政能力，也许这使他成为总理处理很多复杂政务的一个得力助手的原因；也许正因为多年做过总理的助手，又使他不断地增加学者们所不那么擅长的行政能力。总之，我以为他正是我们所钦佩的有学识，有胆略的行政“官”。

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对燕铭同志是一种超乎寻常的磨练，或者说，超乎寻常的考验。他知道“底细”，而他不能“捅穿”这“底细”；他厌恶浮言，而他无法消灭浮夸；他重视知识，他爱“才”如命，但他得抵挡九级邪风，然后才能够扬起“知识”的帆，然后才能用巧妙的方式来“庇护”知识分子。如果不是那几年同燕铭同志频繁接触，我完全不会理解这个可敬的长者那份菩萨心肠和钢铁意志。有一次他同我说，某某单位根本不懂得某某人是个少有的专家，他们不识货，得想办法把他“调整”一下。当一批一批知识界人物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纲”上理由得不到发挥长处的机会时，他反复同我们几个人说，想办法“请”一些有用之才来——这主张，后来汇成为十年浩劫中被批判的所谓“人弃我取”那样的“口号”。人弃——我取，这四个字多轻巧，可是它积聚了燕铭同志要发扬“人尽其才”的多少心血，又遇到过多少无知而蛮横者的阻力，当然，再往深处看，这四个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会重演了。当那个“左”得出奇的“理论

家”，以俨然正统马列大师的口吻，大整知识分子，叫嚷着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什么也不能做，只配“滚一身泥”的时候，当这“大师”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猛烈抨击知识界研究某些问题是“钻牛角尖”，“脱离实际”的时候，他——燕铭同志却着重地支持传播知识的工作。他常常说，知识都是自己或别人实践的结晶，但其中有些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曾经有过用，现在用不上了。他说，这要加以细心的分析，他幽默他说，比方研究洪秀全有没有胡子，这种知识乍看似乎是没有用，他说中国这么大，几亿人口中有个把人研究洪秀全的胡子，还是允许的，当然不能提倡，至于研究出洪秀全有没有胡子，你以为完全没用？不见得。至少演戏要扮个洪秀全，就可以参考——他是精通京戏的，这个问题归结到演戏，讲者、听者都不禁哑然失笑。至于在那几年讲大话、空话、废话已成为日常习惯的环境里，他——燕铭同志在一个杂志的发刊词中，竟然明朗地标示出“崇尚实学，去绝浮言”，那该需要多少勇气和胆色呵。

在那艰难的三年中的最后日子里，我有机会跟随燕铭同志到外地去视察。住在一起，对话的机会更多了。有一个晚上，他忽然严肃地跟我说，我们这些年反封建反得太不彻底了，现在得补这一课。得大力去反。他给我讲了很多历史知识，在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两千多年封建束缚——他说——给我们留下十分顽固的习惯势力。婚姻——他说——在农村里仍然到处是买卖婚姻（我知道那天刚看了几个材料，也听了几个干部的汇报）。人与人的关系——他说——甚至也带有封建味道。你知道——他说——“五四”运动一开始反封建是很猛烈的，可是反得不彻底；这些年我们没有太强调，也许是时势所迫；可现在越来越明白封建意识的毒害。那天晚上他说的全是这个主题。我不时地发问，有时也附和几句，但主角是他唱的。老实说，我当时完全不理解他的话；甚至我那时并不以为反封建在中国革命行程中还有重大的意义。坦白地说，三年困难并没有能启发我思考这个问题。只有经过十年艰苦岁月，我才恍然大悟，是呵，燕铭同志那天夜里的话包含着多少深意。我现在才有一点“台词”可以跟燕铭同志对话（那时我一句也没有），但可惜他已不在了，找不到了。

“牛棚”百日，燕铭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的乐观主义感染了我，使我懂得一个革命者在受到挫折的时候（甚至在受委屈的时候）应当怎样操持自己。暴力和咒骂不能使他吐出一点点机密，虽则他知道的机密是很多的，这我亲身体会到。每到夜阑人静，他给我们讲现代史，还讲好些可笑的事；他甚至还笑呵呵地给我起绰号：“新会陈铁嘴”——新会是我的祖籍，“铁嘴”是旧时代算命先生的雅称。这是因为在“牛棚”中我往往煞有介事地掐指推算明天该斗谁。碰巧言中的机会很多，仿佛我会“算命”了。在我们从“牛棚”走向湖畔“干校”以前，燕铭同志就被“监护”了——直到春回大地以后，在人民大会堂的电梯中，我才又见到了他。这是大灾难后相见的第一面，也是最后的一面。

1977年9月，燕铭同志为商务印书馆八十周年纪念题词，是他留给出版界最后一段遗言。他不多写；还是那主张：“浮言之务去”；他只抄录了一句名言：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坦率地说，我收到这题词时并不理解他为什么引这一段名言。如今，大乱之后又七年，我才多少领会了些。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在到

来。为了完成这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为了找出这么一条路，我们的前人和我们自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呵——但毕竟我们是胜利的，因为我们正在走上新的路。我很想有个夜里又能跟燕铭同志聊天，听他那一板一眼的悦耳的“官话”，听他讲古今中外，听他讲戏曲，讲语言，讲生活，讲知识，然后受到另一次新的启发（也许一时也不能领会）……然而这已经只能在梦里实现了。

1983年春改作

记徐伯昕

刚从国外回来，便听到伯昕同志病情恶化的消息；我还来不及去见他最后一面，他就永远离开我们了。我知道，要写悼念徐伯昕同志的文章，我不是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是后辈，也许了解他不及同辈那么深。然而我不能自己，还是拿起了笔——前年，应申同志走了，我想写而没有写，也不知从何写起；去年，洛峰同志走了，我也没有敢动笔；今年，此刻，伯昕同志也走了，我这个由生活，新知，读书三家革命书店培育起来的后辈，顿时感到即使不相称，也得写几句话来抒发我的哀思了。

当我还是中学生时，正是这三家出版社的出版物指引我正视人生，窥探社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当抗日的烽火把我卷进拯救民族危亡的浪潮时，这三家书店的前辈先后哺育我成人。坦率地说，我年轻时对于生活书店出版物版权页上的记载“发行人徐伯昕”不如对于写了那么多发人深省的文章的宣传家邹韬奋那样敬重和崇拜。我参加进步出版事业的头一个十年，竟以为只要有一个邹韬奋，我们的出版社便可以兴旺发达了；到我参加工作第二个十年，我发现我不对，却又以为只要有一个徐伯昕，我们的出版社才能蓬勃发展；进入第三个十年——当我有了出版行政经验时，我以为一个出版机构必须有一个邹韬奋加上一个徐伯昕，然后能够有效地传播革命种子。直到我参加工作第四个十年，当我在十年动乱中接触了很多事物，从而又听到了很多前辈的讲述，我才顿时觉悟，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组织的决策和引导，即使有一个邹韬奋加上一个徐伯昕，革命种子还不能有目的地成功地传播的。

韬奋是个事业家，虽则他以政论家传世——我以前没认识到，直到1954年编《韬奋文集》时，长江同志有一晚打电话给我，说他发现了韬奋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他盛赞这本书对管理学的贡献，他要我重读这部著作，此时，我才有所体会。但韬奋毕竟是宣传鼓动家，他是事业心十分强烈的政治家，但如果没有伯昕那种十分执着顽强的事业精神，小心谨慎地去实现计划，那么，我们的革命出版事业也不能在那样恶劣的政治条件下取得战胜敌人的辉煌成就。

然而伯昕同志是谦虚的，谦虚得不能不令人感动——他常说他没有贡献什么，他只不过埋头做一些事务工作而已。凡是同伯昕共事过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是一个事业心十分强烈的人，是一个万事认真、百折不挠的人，是一个对公众利益斤斤计较，绝不马虎的人，是一个自奉甚薄克己奉公而又不发牢骚的人；甚至有时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待人有点冷，要求人过于严。是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何尝为自己谋求过什么？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却不以为他冷，而无时不想着他的严。他对手下的同志了如指掌，这个人有什么长处，有什么弱点，有什么困难，他无不记在心中，并且采取使人一时察觉不出的有效措施来“扬长避短”。有一年，我心脏病突然发作，极度的供血不足，使脑血管失去了记忆，伯昕有两天坐在我病床旁，他说着说着，我当时睁大了眼睛却不知他说什么，但我察觉到他对像我这样的青年编辑的关怀——那真挚的面容、那祝愿的面容，至今仍然固在脑际。当我康复后，他要从白区撤退到香港。他走前的一个黄昏，让我到他家里，他要我主持撤退后书店的编辑工作。他说不要搞得太红，要有步骤，我只记得他说我的计划太大，想做的事太多。他劝我编好一个杂志（我做了），团结好几个文化人让他们为出版社出主意和写东西（我做了），他说，你就在你家里同这几个

人开编委会，每月一次就够了（我做了），他要我集中力量把《世界政治手册》编好出版（我做了）。我那时显然是因为这撤退弄得黯然——他听到了我无声的话语，他笑了笑，说，你愁什么，我们要回来的。如果形势更坏，我们会让你南下的。果然，他的实实在在的不求轰轰烈烈的方案，在那种环境下是唯一有效的方案。在那“孤岛”般的上海，我们坚持了好些时候。也正如那时预料的，1948年底杂志办不下去了，条件更恶劣了，我奉命南下同伯昕同志会合，准备新中国的教科书了——这样我又赶到香港。他来接我——并且令人发笑地，竟然指挥一部卡车到码头来接我。他以为我一定带着我这个书呆子所不舍得丢掉的成箱成箱的书南行，谁知只有一肩破行李，书籍哪里能带走呢。他一个劲地让我准备编一部供初学语文和扫盲用的小字典和英语小字典，这个活动是伯昕、荃麟和我一起进行的，请教过叶老（圣陶）和许多有识之士——不久他奉命北上，我住进他在英皇道的房子，把那么多空肥皂箱堆起来当做书橱的房子，这使我乐不可支，因为从东北解放区运来了根据地大批出版物，我分类放在竖起来俨然大壁橱的肥皂箱中，真带劲——这是事业家伯昕同志那时留给我最好的“工具”房。

随后我到北平（北京），伯昕南下上海接管；然后我到上海，伯昕让我筹备一个像生活周刊那样的杂志；随后他调北京，我也调北京——然后他生病，脑痛，痛得不可开交。直到50年代下半期他稍稍康复以后，离开了出版界，不知为什么那时要借重他去搞电影发行——我记得那天他在文化部里遇到我，他问我知道不，他要离开出版界了，他补充说，他对出版有感情，而且他不懂电影。他没有去。他转而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工作，而且像对待事业那样一板一眼地做出版界、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工作。可以说他一直到最后几年，也还是在出版事业中，只不过他做的是人的工作，而不是书的工作。十年浩劫以后伯昕同志是兴奋的，他甚至劝我也从事这人的工作——虽则出书的工作缠着我，没有如他的愿。有一回开了关于三联书店革命事迹的座谈会，应申、洛峰和伯昕同志都去了，当然还有胡愈老——那时他是兴奋的，他为恢复三个书店的革命形象而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活动。我记得那一次，伯昕同志面孔上焕发了好久没有见过的光彩，他知道，默默无闻的出版工作者终于得到人民的认可，而这就够了；甚至可以说，一切都如愿以偿了。

1984年冬

记宾符

宾符，冯仲足（1914—1966）笔名，浙江省宁波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际问题专家，翻译家，出版家。半个世纪前《世界知识》杂志创办（1934）时起，即参加工作，主持编务达24年（1946—1966）。早年曾任职于商务印书馆，解放后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除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做研究工作外，还从事统战工作。

我怎样也不能相信宾符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今夜，坐在中美洲一座摩天楼上，远眺这高原城市万家灯火，我的心顿时驰往太平洋彼岸的祖国——想起二十年前宾符从加勒比海国家访问归来时的那个夜晚。我记得，那一夜北京很冷，我们饮着他从热带捎回来的咖啡，谈呀谈的谈到子夜，不仅没有感到凉意，反而觉得有点热了。还是那个夜晚，我们——宾符和我——都预感到会有一场风暴，可是我们当中谁也说不清这是怎样的一场风暴，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刮这么一场风暴；我们带着眩惑的心情试图分析这里那里的形势，预测它的前景——我们之间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我们绝不掩饰心中的忧虑，只能彼此规劝着要注意些什么。不久之后，宾符便病倒在北京医院了。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开会的新侨饭店常常步行去附近的北京医院，看宾符和灿然。我每去一次都很难过，虽则我见到他们时只好强作欢颜：因为我被告知宾符的病可能是肠癌，而灿然则可能是脑瘤——都要动大手术，都在经历着一场生死搏斗。然而两个战士却都是乐观的，或者看上去仍旧是乐呵呵的。果然开了刀。宾符和灿然都安然地从手术台上躲过了死神的袭击，先后回家休养了，我自然是很高兴的，虽则那时我和我的同事一样，已经陷入了“阶级斗争”的漩涡。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几乎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做“检查”，这些日子即后来在十年风暴中被称为“假整风”的岁月。大约在1965年5月春暖花开时节，我们才被告知“运动”已告一段落，新的领导人来了，我们这里忽然被描写成十七年来从未有的“革命化”了，充满着“新风貌”了。我被告知工作转入正常的轨道。就在这个夜里，宾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年不见，宾符好像已经休养好了，可仍带着那尚未消失的病容。他以无邪的喜悦同我紧紧握手，连声说，好了好了，我等你多时了。我知道他说的是他日夜注视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关切着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我们——宾符和我——那一夜是喜悦的，也是天真的，我虽已经好像被“解放”了，可我仍不免有点消沉，而宾符却不那样，他以为阴雨已经过去，又是晴空万里了。我们谈了一夜，我又一次感到了友谊的力量，人间的温暖。那一夜，他说得多，我说得少。其实我即使一个字也不说，宾符也会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白区经历过残酷的现实斗争，这斗争把我们的心联成一片了。临走时已是过了午夜，我哑然无语，紧握着他那微微有点颤抖的手，我感到了亲切的温暖，这是同志间珍贵的情谊，它给人以力量。谁知那一夜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此后他的病时有发作，而我自己则仍然浮沉于斗争的海洋中，没有机会同亲人述怀了……

对于我，宾符是前辈，自然，同时也是知己。宾符带给我的——以及带给其他同志、同事和朋友的，是亲切和温暖。他从不以前辈自居。他从不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他要高兴，就放声大笑，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而绝不是皮笑肉不笑的阴阳人。他待人亲切，真诚，坦率，热情，宽容。在我

心中他是编辑出版的前辈——当我学习起步时，宾符已经参加翻译《西行漫记》（斯诺），《世界政治》（杜德）和《列强军力论》（威尔纳）那几部当时为知识分子所爱读的大书了。“宾符”这个名字在我是亲切的长者，他的译作引导我去研习分析时局；但同他个人认识却已很晚了。

那是1946年初。有一天，金公（仲华）对我说——其时我刚从重庆转到上海——，你去看看宾符，他编杂志，要你写东西。金公说，他是个老实人，你会喜欢他的。金公是我尊敬的老前辈，他这样一说，我便立即照他所说的地址在爱多亚路一个并不显赫的办公楼上一间挤拥不堪的小房间中找到了宾符。一个胖胖的、矮矮的、戴着近视眼镜的圆圆的脸，常常笑嘻嘻的脸，有点近乎老太婆那么和善的脸，不是书生的脸，而是一个企业家的脸。显然宾符也得到金公的招呼，我们一见面，没说客套，就熟了。从那一天起，他编报，编杂志，办出版社——凡是他要我写译的，我都如命了。宾符不嫌弃我那时对国际问题的幼稚无知，包括对一些策略性论断的无知；反而那么热情地，像对后学一样给我暗示，给我建议，给我规劝，一直到给我修改。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写，写，写。他更不知疲倦地给作者改，改，改。那时的工作条件是现在的作家们难以想象的，政治环境恶化时他巧妙地写，噪声干扰得厉害时他能充耳不闻地写，世事纷繁使他不得不花许多精力去应酬以后，他在深夜里仍然写，写，写。

那是白色恐怖严重的一年。有一夜他找到我，以我从来不曾从他脸上看到的那种严肃表情，轻轻地告诉我：某某被捕了，他和好几个同志恐怕会被牵连，他们当夜就得撤离上海。他说他主编的周刊必须像往常一样出版，而且——他说——必须照常出现这几个撤离的人的文章，以便迷惑敌人。他严肃地告诉我，要我仿照他和别人的笔调写文章发表在这杂志上，按期出版。他问：办得到吗？他没等我回答，赶紧补充说，我们相信你办得到。他严肃地紧握了我的手，走了；当然还有我熟知的几位“同道”也走了。我被宾符那种信任和亲切感动得没有话说。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写，我译，我编，仿照他和他们的文笔，“依样画葫芦”。宾符主编的那份周刊，一期一期地照常印行，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过了若干时候，宾符笑嘻嘻地回来了，显然是一个危机已经过去了——他笑嘻嘻地（不那么严肃了）连声说，好，好，下期起让我来罢。他没有说一句道谢的话，绝对没有，亲人之间是不说感谢话的。他只把工作接过去，重新默默地笔耕。他把笔耕看做一种庄严的工作，神圣的事业，他这精神感染了他的周围——连同我——使大家相信这工作是有成效的。他教会了我在紧急时如何悄悄地撤退，而在另一些时机又怎样勇猛地重新发动进攻。

1948年底，由于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白区条件猛然恶化，我被通知立即南行。

宾符赶到我所住的一个仓库的顶楼同我话别——此时他是兴奋的，我也是兴奋的，因为曙光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他把几张美钞交给我，他说，战事发展太快了，也许上海又会第二次成为被包围的“孤岛”（我知道他说这话的潜台词，因为他在日寇包围封锁下的“孤岛”中出色地战斗过，而且被日本宪兵特务迫害过），他说，这几个钱你到南方去也许用得着；他说，我们杂志有几个海外通讯员指望我们一点微小的津贴，你去接济他们；他说，也许可以买点有用的资料通过地下渠道运回“孤岛”；他说，只不过几个钱，你拿着，也许你自己也会有急用；他说，我们在胜利的上海再见。仅仅半年

以后，我绕过了南南北北许多地方，我们两人又在我的出发点重新见面了。宾符那份喜悦，那份热情，那份亲切，就甭提了。我们——宾符和我——两人那时都忙得“一佛出世”，顾不上叙旧，胖胖的笑嘻嘻的宾符到处奔跑着，在那过去的“冒险家的乐园”里热火朝天的革命气氛中跳着笑着：他开会，演讲，写作，翻译，编报，编杂志，还做人的工作。他把他积累下来的全部知识与力量，都贡献给人民的事业。他接触的人多，人们愿意和他接近。教员（他本人教过中学），编辑（他几十年如一日当过校对和编辑），作家（他一生写过译过不知多少东西），记者（他是职业的“报人”），职员，都喜欢接近他，同他来往，因为他懂得人家的苦乐，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精神世界，因为他明白知识分子往往要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的崇高境界，因为他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而且对人宽容；他为别人打算得很细——而从不为自己操心。他这种对人宽容而又乐于作自我牺牲的精神，在解放后我们——宾符和我——相处的十几年间，与日俱增。

解放后的十七年间，我们——宾符和我——很少哭丧着脸了，而他常常显得很快活。只有一次，那还是50年代初期，他在一个出版单位里安排几个党外专家当上正副总编辑，而他自己则乐于被称为“秘书长”，一个打杂的称呼。他那时的组织关系还没有公开，有一天他有点凄然地悄悄告我，他为这事“挨”批了——人家竟以他交“权”太多而有点责怪他。他以为他安排得并不错。他安于做他的“秘书长”。我当“后勤”有什么不好？他说。何况——实践证明，他这“秘书长”得到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的尊敬，他绝不只能管吃喝拉撒，举凡书稿上的一应疑难杂症，无不请他“会诊”，甚至由他出主意“拍板”。生活证明那时宾符做对了，我那时信服他的见解，现在则更折服了：几个党外专家都先后加入了我们党的行列，宾符知道我们的事业是靠党内党外的革命者一道完成的。他很会信任人。他发现了一个人，他就使你受到尊重，而且在他的感召下尽量发挥你自己的积极性。他一旦认为你可以按革命的需要挑起某一副担子时，他就把担子交给你，毫不迟疑。凡在他手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怀念他，不是因为他婆婆妈妈，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会同你喝酒抽烟，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从不呵斥人（他有时收起了平常那笑嘻嘻的脸，一本正经地轻轻地对你说：这样做不好，对什么什么不利，而绝不怒形于色），而是因为他要求严格，头脑敏感的同时，有一种善于体会别人处境的能力，有一副处处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的好心肠。唉唉，宾符，如果在十年浩劫中能同你在一起，那该多好呀……

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只有五十出头，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不治之症夺走了他，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的事业。如果他不走，在十年浩劫中他会熬过来的，而今日他会多么高兴呵，他那笑嘻嘻的脸，那善良的心，那不顾疲劳的手，将会带给多少年轻的编辑们同情，规劝，信心和力量呵。

1984年3月18日墨西哥城

记陈翰伯

陈翰伯，《读书》创办人，1988年8月26日凌晨悄悄地离开了人间，结束了他74年的勤奋生涯。他出生于苏州（1914），毕业于燕京大学（1936），毕生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给新闻界出版界和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26日傍晚，我从外地回来，在北京站口被告知，翰伯于当日凌晨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直奔他家，见到了他的亲人，一切如旧，一堆堆新书杂乱地散在桌上，然而翰伯去了。我不相信翰伯真的去了，连他的夫人也不相信。然而翰伯不在了，再也听不到他那不紧不慢的男低音了。这几年他被病魔折磨，但没有人会想到这么快，一转眼他就离开了我们。仅仅一个星期以前，也就是我去外地前夜，我们几个熟人和翰伯在一起筹划着编一种冲破海峡人为障碍的出版物；那天，他体力不支，但兴致盎然。临别，他叮嘱我说：你回来再来计议。我匆匆出去了七天，又匆匆回来了，可是我再也看不到翰伯，再也听不到他那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了。

被朋友们戏称为“CC”的翰伯和我，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相互支持，并肩战斗，这种友谊是珍贵的。他的职业是编辑，我的职业也是编辑；他写作，我也学着写。解放前他编《联合晚报》，我每天给写一段“天下纵横谈”；我编《读书与出版》，他每月给写一篇国际时事述评。金中华和冯宾符的《世界知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同时约我们两人为社外编辑，既看稿，又写稿。40年前即1948年底，翰伯奉命撤离沪滨，北上天津转入解放区；我奉命南行香港，随后也经朝鲜入根据地。我们两家人话别时都料想不到仅仅四个月后便在北京饭店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晚会上重逢。解放了，我们都像松了一口气，但来往也少了。“大跃进”那一年翰伯调来主持商务印书馆——而我则在出版局工作。那阵我们几乎每天子夜都通电话，因为他习惯于夜间改稿，而我也只有在午夜才能思考问题。那是愉快的通话，那是互相了解的战友之间的通话，那是给我很多启发的通话。二十年后，我被调去主持商务印书馆——而翰伯却在出版局工作。我们仍然在夜间通电话，不过不在子夜，因为我们年纪都大了，而且都受过那十年的摧残。在那十年中，翰伯和我，一起讲过“悄悄话”，一起坐过“喷气式”，两人被编成一个劳改小组，打扫厕所，打扫食堂——我们劳动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认真，翰伯做什么事都认真的，即使在“劳改”中，对劳动也“乐此不疲”。1969年我们同下干校，1972年同被“点名”调回京，以致干校同学们产生了幻觉，认为两个老“总”，一对“CC”，回京工作可能是对知识分子的好兆头。干校同学们的“海市蜃楼”很快破灭了：因为翰伯和我，还有范用，被好斗的“造反派”指斥为“陈陈范回潮复辟集团”，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这顶帽子可能是合适的，如果反抗“四人帮”那种灭绝文化的行动就是“回潮复辟”的话。我们懒得反击，更懒得“检查”。好容易在那黑暗十年中出现了一线光明：那就是1975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亏他还有那样的雄心壮志，竟要进行这样的工程；这就是后来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语文辞书编辑出版十年规划。翰伯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也抓住一些人不放，其中一个是我。那时，很少人相信“这是真的”，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有人

民。十三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十三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然而此刻，当大部头的中外语文辞书相继问世时，翰伯却去了，再也听不到他那低沉的充满信心的声调了。

60年代我们两人在海南军分区一位干部陪同下，到过“鹿回头”，到过“天涯海角”，见过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社会；80年代我们两人又同十位有识之士去过伦敦，去过牛津，去过剑桥，去过巴黎。无论是在60年代还是80年代的旅行中，翰伯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启发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这样，十年前当我躺在朝阳医院病床上“打点滴”（输液）时，翰伯同我酝酿办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这就是后来在真理标准论争前后创刊的《读书》。八年前当翰伯躺在朝阳医院同一个病房“打点滴”时，我和他多次商议，如何加速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如何能将张元济、严复、林纾以及所有文化先驱的著译传播人间。他念念不忘文化积累，不忘文化传播。然而此刻，翰伯走了，他默默地走了，他在那天午夜过后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但我深知，他留下了一个精神世界，他留下了“奉献就是人生最大幸福”那样的精神境界。

这境界第一个界碑是正直。正直真难呵，连高尔基也曾说过，在俄罗斯，做一个正直的人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其实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何尝不是这样。翰伯有时正直到令人吃惊的戆态。例如他相信读书无禁区。他认为下流的黄色的东西不是书，是垃圾，根本不在书林里。他坚持这样一个观念。他正直，他不会阿谀奉承，当他相信一就是一时，他就说是一，而不说是二。

正直而又有胆量，更难。他不怕谁。他不怕偶像。他不怕“官”，也不怕“管”。他只服从真理。那十年我曾劝他少说话，他不以为然，他认为该说时就该直言，决不沉默。甚至在最不利的逆境中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真正的观点。

达到这种精神境界是可贵的，同样可贵的是翰伯从来以平等待人，不管是什么人，除了恶人，他嫉恶如仇，可是对人，善良的人，真正的人，甚至懦弱的人，他都掏出心来，平等对待。这几年病魔缠身，他常常带点火气，但也掩不住他心中的那股热气。因为他正直，不会吹，不会油滑；不会打官腔，有时人觉得他有点冷——有时觉得他有点漠然。用时下的话说，那是表层结构，他的深层结构是热心肠：为了使干校同学脱离无尽头的“苦海”，他做过多少努力，挨过多少讥讽呵。

翰伯的精神境界是现实的。即使在近两三年恶病消耗了他的几乎全部精力时，他仍然念念不忘要吸收新知。有一天，他忽然打电话要我给他讲讲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的挑战。我带了一部手提的能打字、能绘图、能存储的电子书写器去看他，他聚精会神地看我“表演”了近一小时，然后筋疲力竭地、满足地笑了，他说我总算知道一点新的技术了。至于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风云变幻，他也时刻注视着，他常常找人去给他“传递信息”。他要作准备：万一有一天战胜了病魔，他还将带着新的思想去参加战斗。

倔强的人，正直的人，勇敢的人，永不向邪恶低头的人；为人民奉献了毕生精力的人：这就是陈翰伯。

1988年8月31日

记华应申

凡在早期的国际书店（现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工作过的人，无不怀念华应申同志。他在那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巧妙地处理了当时群众运动和外事交往中的许多棘手问题。是他最初明确这个开国后创建的对外文化贸易机构的性质和任务。他那特有的沉着、耐心、细致、和蔼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应申主持国际书店工作，可以说是由于偶然的机遇。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三反”运动把应申卷到这个单位来。他奉派到这里领导运动。这是1951年冬。不久我也被派到这里来协助他工作。经历过那场风暴的人们都会记得，当时对这个牵涉到多少有点“神秘”的外事单位，这个拥有巨额收支的贸易单位的“敌情”估计得多么严重，正所谓有山必有虎，山大林深风烈，正是“老虎”出没之处。“下达”的“老虎”指标是可观的。应申还有我被刮到这个“台风眼”中去了。坦率地说，那时谁都十分虔诚地膜拜在“左”倾思潮和无上权威脚下，没有人敢于去怀疑对“敌情”的估计是否准确。这是一场悲剧。难能可贵的是，应申是沉着的，他不急躁，不说大话，告诫我们要认真去找寻“老虎”的踪迹。是应申教会我们遇事不躁，临急不慌；是应申教会我们怀疑和推论都是必要的，但不要急促下结论，然后去找证据。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忠诚地日以继夜调查“虎”情，谁也没有一句抱怨，花了很大劲，也没有找到“老虎”，应申就说没有找到就是没有找到，不要说谎。因此他多次挨批评，说他“右”倾——我不能忘记好几个冬夜，我曾跟着他去“分享”这样的严厉的批评。不能埋怨那严厉批评的领导：他是忠诚的，也是认真的；但那样的夜晚却是不好受的。看得出沉着的应申也很难受，但他久经锻炼，他还是十分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子夜过后，我和他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分手时他怕我这个没有经过风雨的青年人气馁，总是勉励我说，明天从另一条路上山去找“虎迹”，他说会找到的。六个月日日夜夜的辛劳，却始终没能找到“老虎”的踪迹。应申把假想的“老虎”都放归山林了，但他对于是否在这个过程中损害过某几位读书人的自尊心，心里常在嘀咕。应申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人的利益高于一切。

风暴过去了。应申被留下来主持国际书店工作。我同时也被留下来。不幸我们两人都没有被允许离开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这样我们两人只好每天下午到国际书店办事，书店的日常业务重担就不能不落在薛迪畅同志身上，真难为了他。我是有幸的，因为我有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下班时总是跟应申步行回家——从苏州胡同步行到出版总署附近，约莫有半小时。应申是诲人不倦的好领导。对于我这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书生，这样的日子太珍贵了。我从应申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学会了做人，走路，处世，革命。我没有料到1939年3月我最初在白区参加工作，是应申第一个跟我谈话；而在十二年后，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又是应申引导我走上健康成长的路。

从主持国际书店工作那天开始，应申就全力去探索这个仓促之间按苏联模式创办起来的单位应当怎样走自己的路。为此，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做调查研究。而在回家的路上总是探索与此有关的各种问题。应申向上面向下面以及向各个方面去请教。他终于写成一个文稿。我记不得这个文稿是否已经形成了文件，但是我清楚记得这个文稿曾在领导机关的会议上多次讨论过。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那时的设想和一些基本论点却仍然清楚地呈现在我面前。可能这些论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用了，但我仍然认为值得把它们记录在下面，以便更好地了解应申那时的思路，而这思路，是集中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形成的。

——国际书店首先是一个文化事业，它应当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为书刊是知识的重要来源。

——国际书店同时是一个对外贸易机构，它应当而且必须运用所有贸易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国际书店得千方百计冲破当时被敌视我国的力量设置的“包围圈”，通过尽可能多的途径，获取我们事业所急需的资料，而不能满足于“一面倒”，仅仅成为苏联书刊的推销点。

——国际书店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革命成果输送到各国朋友和读者手中，扩大我们的影响，取得更大的精神援助。

——国际书店为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非认真培养自己的合格干部不可，目标是既要有敏锐的政治嗅觉，还要有熟练的业务能力，包括相当高的外语水平。

早期国际书店的工作者可能并不完全清楚应申这位开拓者的这些思路，但人们看到那短暂时期中开始实现的一些措施（当然其中有些是由应申的后继者们创造性地实现了的），例如：

——建立同西方国家书商做买卖的一套规章制度。

——通过某些国家和地区取得十分重要的资料（甚至那时苏联所得不到的资料）。

——创立中文书刊服务部，为各国读者作“零星”服务。

——创办外国出版物样本资料室（当时没有完成）。

——定期向中央汇报我国出版物在外国的发行情况（包括评介，翻译，展览等）。

——鼓励在政治学习中研究国际问题和各国情况。

——提倡业务干部学习外国语。

——把一批党内外青年干部安放在基层领导岗位。

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都是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实现的，有时还需要勇气和魄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应申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此刻，经过了三十六、七年的岁月，我只能说，所有这些应申只开了一个头，也许人们认为不必记述，但我今日可以强调，这个单位经过半年风暴之后只花短短的一年时间，便迅速恢复了元气，并且生机勃勃地阔步前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应申，只能归功于应申。

应申是一个能掌握全局，深谋远虑的事业家，他从不以势压人，他总是耐心地苦口婆心地劝说别人。他远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雄辩家，却无宁是一个谆谆善诱的善良的有教养的老师。看上去，他像个威严的长者，但是只要同他一接触，你就会感到真诚和温暖，他的心是掏给你的，因此他的脉搏同你的脉搏一起跳动。但他是严厉的，他不放过任何错误，他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不合格的东西谁也不敢（也不愿意）送到他面前；可是他对青年是宽容的，他说青年人的生活应该是活泼的，不要受什么框框的限制，他说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碰一些钉子，摔几次跤没有什么了不起，别揪住不放。我就是他眼中的一个青年人——我至今还记得他对几个青年人的严厉评论和有效

规劝，其中也有我。他好学不倦，然而他虚怀若谷。他的英文是自学的，学到能翻译的程度，并且在30年代就已出版过一部翻译书，后来他的革命职业没有让他再继续文字生涯，他从不抱怨，而且从不对人说起这件事。他“不耻下问”，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兴趣，他向一切人请教他所不懂的东西——“十年浩劫”的后期，他在边远省份听说我奉命召开过几次学者座谈会（当时多么希罕呀！），连忙来信要这份材料。他从不失望，从不悲观。他在病重时也不悲观。在一个部队医院做化疗时，他请我吃西瓜，谈笑风生，仿佛生重病的不是他。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不知疲倦的事业家，一个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最真诚的朋友。他离开国际书店好久好久了，如今也永远离开了他所有的朋友，其中也包括我，但他其实没有逝去，像他这样的人是永远在我，在我们身边的。

1989年初作选编后记

陈原

当十年噩梦醒过来时，我的“书林”只剩下十四平方米；这所谓的“书林”还得兼作饭厅和起居室。总算另外还有九平方米的卧室，不可谓不宽敞了。其实如今老伴早已在西山安息，这偌大的书房加上卧室，足够我独自在这书林里打滚，别说漫步了。

我日夜在这里漫步或打滚，确实怡然自得，历几十年而不衰；说是说日夜，其实漫步还是在夜间居多，因为过去几十年我的职业是打杂——有打杂这一行么？有的。打杂就是做各种各样的无效劳动。说得好听，是当“不管部长”；说得确切点，是消防队长或服务团长。过着这样的生活，有时也着实感到十分疲倦，真想永远倒在这书林中不起了，但歇了一会儿终于又重新爬起来，漫步如故。说穿了，只不过是如过去所谓未曾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有那么一块自留地，让自己偷闲在这没有世俗烦扰的、引人痛苦同时又更多地给人欢乐的书林里独自反省和沉思罢了。

姜德明同志从浩劫前的日子里，就关注着我的自留地。我感谢他过去常常引诱我，鼓励我，甚至逼迫我把漫步沉思写成文字。于是不时写一点，不时又收集成书，年复一年，书林纪事一类不三不四的文章，积成一大箩。于是这位年青人（不是年轻人）现今又来迫我编一部《书话》。我呢，不太愿意炒冷饭；他说，那就炒一点点冷饭，再煮一点点热饭。出版家则说，从炒的冷饭中，也可看出一个作者的心路历程。对，都说得对，只好又煮又炒，编成本集。

书分三辑，名之曰上中下三编。上编十二篇，全系新作，成于最近两年，讲的都是与书有关的“故事”，不不，应当说是有关我和书的私事。中编有五十三篇，作于1990年到1996年，其中约有半数已在报刊上发表过，不过尚未结集。这几十篇东西，乱得很，有讲书的“故事”的，有读书之后发点议论的，有感情激动、掩卷长叹的。至于下编，则近乎炒冷饭：因为都是从我的集子中选出来，当然还有已绝版了的著译的序言后记；有到外国去的旅行纪事；也还有我自己喜欢（却不一定写得好的）读书笔记或随感之类。编完一看，好像是书话，又好像不是书话。故友唐弢似乎认定“书话”这种文体是一种散文——特种散文；他提出过，这类散文“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他说得真好，而且很形象化。可否理解为既不全是资料，不全是考证，也不尽是理论分析？照此衡量，我只能很惭愧地告诉主编者、出版者和读者，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不及格，也许上编的几篇勉强得 60 分。没法了，真是罪过！

这几年，是世纪的最后几年，我自知到了人生的黄昏，并且确实从现实生活中退下来，醉卧书林，不问世事，以至朋友说我把自己封闭在三合土的“碉堡”里，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可是我却自我感觉良好，我发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清醒，更开朗，更宽容，也更会爱人；我活着，但灵魂早已飞翔到那无边浩瀚的书海去——不再漫步了，代之以书海夜航。

书海夜航！说不尽的风流潇洒！一望无际的大海。“老人与海”！无论是风和日丽，水波不兴，无论是天昏地暗，狂风巨浪，老人在大海中夜航，自有另外一番滋味：灵魂自由了，超脱了，得救了。天地间只有——或者说，只剩下——老人与海。天连海，海连天，人语也没有了，只能不断地沉思，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冥思。一个哲人说过，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有思想。一句话：我找回了思想。我找回了我自己。

这本小册子便是我的夜航纪事。我把它留给爱书的人、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1997 年春节

